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周志怀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108-0736-7

Ⅰ.①两… Ⅱ.①周… Ⅲ.①台湾问题-学术会议-文集 Ⅳ.①D61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5435号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

——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

作　　者	周志怀 主编　杨立宪　严　峻 副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9
字　　数	402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36-7
定　　价	6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论海峡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 …… 周志怀（1）
试析“交叉压力”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 王鹤亭（10）
海峡两岸共同利益的现实基础与认知原则 …… 李　鹏（22）
两岸共同利益视野下的和平发展 …… 倪永杰（30）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与两岸共同利益问题解读 …… 王建民（39）
试论两岸共同利益构建过程中的几组关系 …… 刘相平（49）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的挑战与动能 …… 周志怀（60）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征、问题及对策 …… 陈先才（68）
两岸政治谈判是大势所趋 …… 黄嘉树（79）
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两岸政治互信初探 …… 唐　桦（84）
两岸关系关键在建立互信 …… 吴能远（96）
努力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突破 …… 白光炜（101）
两岸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大陆软实力建设 …… 崔　萍　金苏源（107）
台湾民众政治认知变化与国家统一动力的重建 …… 陈　星（118）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刍议 …… 郑庆勇（126）
当前两岸关系中几个关键词之解读 …… 高　琛（132）
选举压力下的国民党改革 …… 周丽华　陈凌雄（140）
台湾政党体系发展趋势探析
——兼论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变化 …… 林　冈　万东青（152）
和平发展形势下民进党“务实台独派”的生存与困境 …… 杨　剑（169）
简论民进党的世代交替问题 …… 陈　星（179）
现阶段民进党基本态势分析 …… 林　劲（187）
民进党大陆政策走向分析 …… 陈从新（198）
马英九就任党主席以来相关言论意图解读 …… 杨立宪（204）
马英九上任以来台美关系的发展及其前景 …… 严安林　蒋晓燕（214）

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期的美国对台政策 …… 孔小惠（231）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模式演进、影响因素与推动策略 …… 单玉丽（241）
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两化”进程 …… 刘　红　王森森（253）
对大陆惠台政策效应的评析与思考 …… 盛九元（261）
ECFA 框架下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展望 …… 郭　丽（268）
建构两岸人民和谐共处的生活共同体：
　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 …… 严志兰（277）
从维系到整合：文化对稳固两岸命运共同体之意涵 …… 李　鹏（293）
大陆对台文化政策的演进及特点 …… 陈颖华（301）
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 彭付芝（309）
两岸文化交流与共同身份认同建构 …… 于海峰（320）
两岸政治文化的分歧与融和 …… 陈鸿惠（327）
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之初探 …… 刘国奋（333）
文化在推动两岸政治沟通和整合中的作用分析 …… 廖中武（341）
简论文化在两岸和平统一中的重要性 …… 张　露（349）
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　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 白光炜（359）
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和思路之分析 …… 王英津（366）
对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几点看法 …… 严　峻（371）
两岸文化交流面临历史机遇 …… 赵会可（376）
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 杨为华（383）
略论新台湾意识与两岸文化交流 …… 陈凌雄（388）
论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异化及其回归 …… 胡文生（393）
两岸军旅文化交流及路径探析 …… 叶世明（399）
以眷村文化为视角的台湾文化考察 …… 郝　晨（407）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的理念与实务 …… 叶世明（414）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其交流合作
　之探讨 …… 邓启明　熊德平（423）
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 …… 吴巍巍（433）
孙中山复兴中华文化思想及其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启示 …… 熊席麟（439）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变革与发展述论 …… 陈忠纯（447）

论海峡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

全国台湾研究会　周志怀

推动两岸关系实现和谐发展，是实现全民族团结、和谐与昌盛的重要一环。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对台工作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和谐、昌盛"①。这一讲话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十分突出地揭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实现全民族团结、和谐、昌盛的内在联系。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如何积极实践党的十六大以后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探讨实现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具体路径，为全民族的团结、和谐与昌盛奠定重要基础，是对台研究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和谐发展是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后的必然选择

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永恒目标。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看，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和为贵"、"和而不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都充分体现出"和谐"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精髓。

崇尚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影响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发展，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有学者在论及和谐问题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个思想传统，儒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这些构想在历史上尽管没有得到实现，但这些思想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可以参考的价

①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华社 2008 年 12 月 31 日电。

值[①]。正是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参考，使党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逐步形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2005 年 2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 年 4 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首次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 9 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由此，和谐社会作为党中央明确提出的战略任务，已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话题，和谐理念在中国内外政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愈来愈清晰。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曾在解读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时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奉行对外和平、对内和谐、同时谋求对台和解的核心理念，这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②]。从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角度观察，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以及对台谋求和解，已成为崛起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实现对台和解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而郑必坚先生将谋求"对台和解"也提高到与对外和平和对内和谐并重的位置，自然有其重要原因。一方面，2000 年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特别是陈水扁 2004 年获得连任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台海局势一直处于高危期，"台独"势力已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隐患。另一方面，"大陆对台和解政策与对内建立和谐社会、对外建构和谐世界的战略息息相关"[③]，三者关系密不可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只有处理好这三个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形成良性互动，才有利于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

① 汤一介：《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启示》，人民网，2006 年 10 月 11 日。

② 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的十点看法——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新华网，2005 年 8 月 11 日。

③ 赵春山：《台湾有什么理由对"和谐"说不?》，中国评论新闻网 2010 年 7 月 2 日。

保证。

和谐发展是两岸和解与和平发展后的必然结果。台湾学者认为，两岸关系的真正正常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和缓，和缓意味着两岸进入无恶性挑衅的阶段；其次是和平，而和平意味着两岸之间无战争威胁的状态；最终两岸关系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迈入和谐层次，这足可使两岸所关心的所谓“统、独”成为无意义的话题，而两岸的和谐关系，也足以作为世界其他地区排除重大难题的典范①。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看，2005 年以来，大陆对台和解政策的影响已得到充分显现。以胡锦涛总书记 2005 年邀请连战与宋楚瑜访问大陆为开端，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发生重大改变，两岸开始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其后，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国民党 2008 年重新执政后恢复制度化协商，两岸实现了直接全面“三通”，签署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实现了对峙与对立 60 年后的历史性和解，两岸关系已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两岸关系的快速发展表明，对台和解的核心理念已得到充分落实，在两岸实现和解、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轨道的大背景下，在“两岸往来之便捷、经济联系之密切、各项交流之活跃、同胞感情之融洽、共同利益之广泛”都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适时提出“和谐发展”，不仅对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而且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注入新的理论内涵

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是指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后所达成的和平共处、透明稳定、合作协调、相互依存和发展有序的一种良性互动状态。也就是说，和谐发展应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上，透过有一定透明度的政策调整和可预期的发展方向，逐步达成双方的相互合作与依赖，并通过制度构建使两岸关系形成有序发展。

实现两岸关系可持续和平发展的活力与生命力，来源于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和谐发展就是在新形势下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丰富两岸关系和平

① 杨开煌：《两岸和平协议的路径图》，杨开煌著：《新局：对胡六点之解读》，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 年，第 266 页。

发展内涵的积极探索。两岸关系由上个世纪的战争与敌对走向本世纪初的和解与和平，这必然要求大陆在对台政策理念上实现不断创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力求趋向思想。"和谐发展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两岸关系发展实践的进程，也是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后政策创新的要求。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势必要注入新的理论内涵，以有利于引导、塑造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走向。

2009 年 3 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曾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提出，要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就必须"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重要内涵"。笔者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注入的新的内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实践内涵，一是理论内涵。从可供操作的实践内涵看，我们已相继提出很多新课题，譬如：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商签文教协议；两会协商由经济性议题扩展到共同打击犯罪及开展司法互助等社会性议题；通过两岸协商，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来逐步探讨政治和军事等敏感问题等等。这些议题重在解决两岸交流交往所产生的重大实践问题，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注重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理论内涵，使和平发展新局得以巩固与持续。和谐发展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过程中，加强对和谐发展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将会使和平发展的理论内涵更加充实和丰富。

和谐发展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与目标的相互统一。对于和谐发展，当然会有人提出质疑，在结构性矛盾并未解决的情况下，两岸能够达成和谐发展吗？如果"台独"政党重新执政，和平都难以保证，还能侈谈和谐吗？本文当然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和谐发展不仅是我们要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同时更要通过追求目标的过程，强化与确保两岸关系的持续和平发展。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强化过程应该重于目标追求，过程对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要用和谐发展的方式争取达成一种现实目标，通过不断累积而取得阶段性成果。追求和谐发展的过程，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逐步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过程。其次，和谐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或

国际关系发展史看，都没有绝对的和谐。即使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谐，但大多也是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和谐。因此，即使两岸关系能够实现某种状态下的和谐发展，也只是一个动态而非常态式的发展状态。第三、“台独”分裂势力存在于台湾社会将是一个长期现象，政党轮替也会成为岛内政治发展的常态，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民进党可能重新执政就放弃对目标的追求。“不论将来台湾有没有政权轮替，和解是一条大家都接受的路，而且是合乎两岸及区域的共同利益”①。和解是一条大家都可接受的路，和谐之路更应如此。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都有可能出现反复。如果“台独”政党重新执政，两岸矛盾性质发生变化，和谐发展也会自然随之中止。也就是说，只有在对抗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时，两岸的和谐发展才有可能达成。这与历史的螺旋式发展进程并不矛盾。第四、和谐发展是一渐进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涉及两岸经济、文化、社会与政治的系统工程，并非一蹴而就。

和谐发展理应成为两岸民众的共同价值观。提出两岸和谐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设定一个绝对的静止的对象物，最重要的是“确立了一种以和谐为取向的带有根本性的价值目标”，从而要求我们不断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②。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价值认同的和谐已经越来越重要③。从两岸关系的深层发展看亦是如此，两岸和谐发展不仅应包括相互之间的利益和谐，更应包括两岸价值观念的接轨与和谐。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两岸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但也应看到，随着两岸关系发展的深化，仅靠惠台让利、扩大共同利益基础，靠利益的“量”或“向”的调节，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快速变化。“目前大陆各省省长访台，也只是比谁能花更大把的钞票在台采购，这些都是在‘物’的层次上打转。”④ 可以预见，共同利益多而共同价值少的发展模式，将会使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逐渐凸显。由于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

① 林碧炤：《试论台海地区的新安全观》，《2010 台海安全互信前瞻研讨会》论文集第 2 页。

② 李忠杰：《论和谐哲学》，北京：《新视野》2006 年第 4 期。

③ 罗文东、毛立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 年 1 月 30 日。

④ 社论：《陆生来台这件小事》，台湾《联合晚报》2010 年 8 月 22 日。

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①]，影响人们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看法，因此，两岸应采取共同的战略与政策，着力塑造两岸民众均可接受的共同价值、首先是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从而引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向，巩固和平发展基础。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期间，岛内原有的许多价值观念已被打破与颠覆，新的价值体系尚待建立。两岸应搁置意识形态争议，大力创造和谐发展价值观形成的内外环境，建构越来越多的两岸共同价值，并使之成为形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两岸关系和谐发展必须建立制度保证。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单纯依靠价值观、依靠道德的自我约束力是难以得到保障的。“随着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强，所有相关行为主体彼此损害的能力就越强”。为此，两岸之间必须要建立管理冲突或相互合作的制度化安排。从金门协议到汪辜会谈，从国共两党高层会晤安排到两会协商制度的建立，从两会签订的 14 项协议再到经济合作框架的签署，均体现了两岸制度化建设的成果。制度性安排是实现两岸关系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岸所构建的各种制度，必须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制度的建立不能仅仅依靠从上而下的改革，还需要从下而上的改革或者发展。如果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在制度变迁之中，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或者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信任，那么制度的价值仍不能得到人民的确认，那么这一制度的存在仅仅是形式性的[②]。”这一点在今后的两岸关系发展中尤其重要。

三、大力培育和谐发展元素

应该说，实现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于理论上如何可能，关键是实践上如何可能。罗伯特·基欧汉在论及国际合作时，曾认为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和谐，意指国际关系角色无须进行政策调整就自然而然地促成双方达到预定的目标，因为双方利益一致，处于和谐状态；第二种形式是合作，意指原来不和谐的国家或集团必须通过政策调整和谈判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第 624 页。

② 李屏南、朱国伟：《转型社会和谐利益场的构建：制度功能与政府角色》，《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协商，才能实现合作，采取一致行动。这种合作意味着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第三种形式是争斗，它与合作形式恰恰相反，意指处于不和谐状态的双方，经过政策调整后仍不能求同存异，观点和行动有严重分歧①。目前海峡两岸之间的大量合作是第二种形式，我们应避免最后一种形式，并可将第一种形式作为长期努力的目标。

培育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元素首先应致力于实现台湾社会内部的和谐。大陆内部对两岸关系发展虽然也有不同声音，但“异见”毕竟较小，大多并不是原则性问题，整合起来也较为容易。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台湾社会内部目前还远远不能适应两岸关系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台湾政治大学副校长林碧炤认为，两岸关系的广度及深度大幅提升之后，台湾内部的安全如何维持，共识如何去建立，以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②，这是台湾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即便很多人早就认识到“只有两岸关系和谐、台海情势稳定，台湾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否则台湾将很快被边缘化”③，但仍有一些人在两岸经贸关系已十分密切，并已给台湾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抱有很深的疑虑，认为台湾仍应与大陆保持一定距离。比如说，面对“轰轰烈烈的大陆各省市采购团”，有些观察者更在意的，则是两岸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的冲击：“平心而论，无论省市参访团是否真的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台湾已不可不重视其带来的文化冲击。”因为“大陆省市领导的脚步已经明显地跨过台北政商冠盖，走入大众生活；同时，利用各项文化交流，也让台湾人踏入了中国大陆的生活氛围中。”因此，“无论是统战或交流，两岸关系势必愈来愈密切，如何让两岸关系有点黏，又不会太黏，端看政府的政治见识和智慧了。”④ 这种心理层面上的疑虑与微妙变化的悄然显现，或许是两岸关系发生裂变以及走向和谐发展前的必然过程，但若处理不当，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阻力与杀伤力都不可小视。

实现两岸关系和谐发展应最大限度地消除“台独”分裂元素。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始终是一个毒

---

①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21 页。

② 林碧炤：《试论台海地区的新安全观》，《2010 台海安全互信前瞻研讨会》论文集，第 6 页。

③ 何博文：《王金平：两岸应速复谈，避免经济边缘化》，台湾《中国时报》2005 年 12 月 14 日。

④ 翟思嘉：《大陆团接连来，表演味道浓》，台湾《新新闻》2010 年 6 月 10 日－6 月 16 日，总第 1214 期。

瘤。2008 年民进党失去政权后，党内虽也不乏要求检讨大陆政策的声音，但并未能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 2008 年后的接连几次“立委”补选及 2009 年底“三合一”选举的胜选，使民进党感到陈水扁弊案影响减弱，基本盘回稳，因而继续毫无顾忌地操弄“倾中卖台”牌、“公投”牌、达赖与热比娅牌。2010 年 8 月 11 日，民进党虽然在中常会上通过了其“十年政纲”的“多元族群篇”，强调战后中国大陆移民不应再被视为外来他者①。但对照民进党籍高雄县长杨秋兴此前两天宣布参选大高雄市长、并表示有条件认同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随即便被同党扣上卖台倾中帽子，不仅让杨“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可怕”②，也的确让人怀疑民进党是否真的具有反省能力。由此也可看出，在岛内今后争夺执政权的斗争中，民进党仍然不会放弃“台独”神主牌，将会继续扮演开历史倒车的角色，从而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最不和谐元素。

两岸关系和谐发展需要双方培育更为理性与成熟的对话机制。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后，虽达成了“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共识，但台湾方面往往一方面拒绝涉及政治议题的接触与对话，一方面又频频提出增加国际活动空间、撤导等敏感话题。特别是 2010 年 8 月初，台“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演讲时公然提出要北京“废除武力对台的法律”③，令人感到十分唐突与费解。由这一政治话题应该引发的思考是，两岸到底应如何比较现实地追求己方的阶段性目标？曾有台湾学者在论及“冲突解决”时认为：君子所应该追求的“和”，乃是在不牺牲原则下的“和”，也才是“真和谐”；反之如果为了追求表面上的“同”，不惜放弃原则，乃是一种和稀泥的“假和谐”④。这一解读同样适用于两岸关系。要达到“真和谐”，双方势必要作出某些牺牲，但此前任何单方面的、天马行空式的放话，或许可以满足其某种特定时空环境下的需要，却也往往容易成为对方难以接受的噪音。

两岸关系要从表面和谐走向实质和谐，增进政治互信，改善两岸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现象，不失为一有效途径。此外，两岸在追求眼前利益

① 林政忠：《民进党政纲：大陆移民不应再视为外来他者》，台湾《联合报》2010 年 8 月 12 日。

② 郑纬武：《杨秋兴：过去扣人帽子，今被扣》，中国时报 2010 年 8 月 12 日。

③ 刘永祥：《赖幸媛在华府 吁北京废动武法律》，台湾《联合报》2010 年 8 月 5 日。

④ 许士军：《追求“冲突解决”的真和谐》，台湾《新新闻》2010 年 6 月 10 日－6 月 16 日，总第 1214 期。

的同时，更应放眼长期与根本利益。急于求成或一切以选票为依归的施政，是难以达到深化互信与促进和谐发展的目标的。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试析“交叉压力”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王鹤亭

当前，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两岸间过去单纯的功能性交流互动也逐渐过渡到较全面的制度化协商合作，两岸间不断发掘和发展共同利益，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逐渐坚实。但是共同利益并非合作、和谐的代名词，两岸“分歧中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利益中的冲突”将会长期并存。厚植两岸共同利益，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并不能自动生成或保持和谐、均衡、稳定、一致和共识；相反，两岸间及台湾内部存在着分化、分歧、矛盾及冲突，包括统独矛盾、认同冲突、价值分歧、政党分歧、族群和省籍冲突等等，分歧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这构成了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另一个侧面。

“规范的”目标必须经由“实证的”过程才能达成，两岸关系如何能达致和谐发展的状态，冲突与分歧的处理是个不可回避的课题。两岸关系的正向发展，人们往往着眼于“共识”、“共同利益”等价值、规范和行动的“一致性”，这些固然重要，但也更应全面分析冲突的功能，发掘和利用冲突与分歧的正面力量，引导两岸关系中的冲突与分歧成为凝聚两岸、建构和谐的积极因素。

一、冲突与分歧的整合性功能

对于两岸关系进程中的冲突与分歧，可以从两种角度或路径去处理。第一种是立足于减少、消弭冲突或分歧的正向途径，大多数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多从“共识”、“均衡”、“一致”等概念出发，期待以文化、价值、规范和行动的“一致性”、“共同性”作为两岸互动和和平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最终形成一种“稳定”的同一状态，认为冲突只具有“负功能”，而把两岸关系中的冲突和分歧作为一种破坏性、分裂性的负面因素来应对，这是在追求和平发展乃至完全统一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努力角度。强调由文化到社会到个体行动者的一致性达成统一的目标，经由同质性和互补性整合形成共识，注重对矛盾、分歧、冲突的协调等，都是从正面建构稳定均衡的两岸关系，在此不再专门加以详述。第二种则是立足于发掘和利用冲突的积极作用的反向途径，“将两岸的冲突视为常态，来加以重视，而不是将两岸冲突视为病态去逃避或应付”①，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岸政治、社会多样性带来的分歧，分析其内涵、成因和消解途径，使两岸关系中冲突或分歧的交叉分割成为凝聚两岸社会的积极力量、维持稳定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调适因素，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创造性与建设性的实践方向。因为一致性的追求往往是规范性和目标性的，往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达成，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要面对分歧、冲突丛生的现实，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诸多分歧与冲突对和平发展的超负荷冲击，进而考虑如何化阻力为动力，利用冲突的力量来达致全局意义上的两岸关系发展目标。这需要借助于冲突理论的分析工具，并立足于两岸冲突实践来加以探讨。

西方传统的政治社会学认为，压力、紧张和冲突是一种分裂性的消极因素，是社会系统内的“病态形式”。但发端于马克思、兴盛于20世纪中后期社会学领域的冲突理论则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揭示了社会冲突与政治稳定是辩证的动态关系，肯定了特定环境、条件和形式下的冲突对于整合社会将会产生整合性效果。从逻辑基础的角度看，冲突理论的出发点是复合异质性的社会构成，即由于历史和社会属性差异、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等原因，社会单元在种族、民族、部门、阶层、政党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呈现出自主性、多元性和交叠性局面，各种跨边界的群体或亚群体不断涌现。基于这种社会结构形式，一个社会成员因为可能同时归属多个群体或集团而具有多重的成员身份，社会人群大多隶属于相互迥异的组织结构中。同时，这种社会充斥着多样化的、不同领域的冲突类型，如种族或族群冲突、阶级冲突、政党冲突、宗教冲突、地域冲突、部门冲突、精英与大众的价值冲突等。这些冲突构成了各种相互排斥的“交叉冲突线”，并对社会结构沿着不同方向进

① 林孟熊：《从冲突理论解析两岸关系发展》（1987—2003）［D］，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3：201.

行切割，从而使它们之间的冲突相互抵消。从理论上说“多重成员身份”从微观层次描绘了社会个体身份的多重性和迭合性，而“交叉冲突线”则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勾勒出因阶层、宗教、种族和政党等歧异而构成的社会张力及其折冲消解①，在实践中也就形成了作用于个体和社会的“交叉压力”。从操作性的意义上看，如果一个社会在“多重成员身份”和“交叉冲突线”的交错上越丰富多样，对个体而言，他们因分属不同群体，其心理上的交叉压力往往导致其较温和的社会态度，多重身份具备了在社会中有各种联合的可能性，相对避免了某种分歧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冲突，正如李普赛特所言，“多元的和政治上不一致的隶属关系、效忠和刺激因素，可以缓和政治选择中的情感和挑衅性”②；同时，多种社会领域功能分化、互赖与联结，多重压力的相互牵引、彼此兼容，能够形成理性的冲突解决机制，使得冲突主体之间的利益和社会资源分配得到弹性的重整，从而最终保持了社会的自我调适和凝合。因此，“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内部分歧和外部争论，恰恰是与最终将群体联结在一起的因素有着有机的联系……在明显存在着社会各部分和各级划分的结构中，对抗所具有的积极整合作用就表现出来了”③，在分化与功能性相互依赖的系统中，冲突变得缓和，可能提高系统的创新与创造力水平，在冲突极端化前释放敌意，提高问题意识与创造规范协议的意愿，加强协作联合④。但是当社会成员所处的多重团体具有同质性或外延重叠性时，以及多种社会冲突的分裂线高度重合时，社会冲突的力量将不能交叉相融，而是相互加强，客观的社会差别，构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基础，政治分界将坚固地建立在社会分歧之上，各种冲突将形成“共振”，正如马克思所总结，当冲突中的人们逐渐两极分化，最初温和的冲突激烈化了，最终产生导致体系剧烈变迁的暴力冲突⑤。

总体来看，一个多元社会内部存在冲突和分歧基本上是一种比较正常的

---

① 详细论述见：胡伟、李德国：《异质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交叉压力》假说的理论脉络与解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6（4）：110－116，但笔者以“多重成员身份”代替其原文中的“重叠性成员身份”，因“重叠性”可能会指向“成员所处的多种团体在外延上是重合或包含的”。

② ［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M］. 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65.

③ ［美］L.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 孙立平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7.

④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上）［M］. 邱泽奇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3.

⑤ ［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上）［M］. 邱泽奇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68.

现象，当然，两岸由于尚未完全统一，也使得两岸关系中存在的分歧与冲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乃至完全统一的冲突的处理，首先要避免社会成员的同质性身份重叠以及各种冲突的重合，而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于台湾内部，统独冲突、省籍族群冲突、政党冲突、认同冲突等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如外省籍民众较高程度支持国民党，本省籍较倾向支持民进党①，外省籍相较于本省籍更偏向“统一”，本省籍更倾向“独立”②，外省籍民众较大比例倾向自己是“中国人”，本省籍更多倾向自己是“台湾人”，而且这些冲突的重合，往往在台湾选举和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被刻意的彰显和建构。因此，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创造两岸各主体跨越多元团体和领域的“多重成员身份”，以及不同子系统间丰富的“交叉冲突线”，逐步消解两岸间和台湾内部界限分明的壁垒，构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度弹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多重成员身份”间的角色冲突以及不同系统、功能互赖交错下的冲突，形成一种社会网络的“交叉压力”，成为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积极推动力。而这一点也在关于民众的族群认同、统独立场的研究中得到佐证，“自认为台湾人的选民处于低度社会网络交叉压力的比例较高；反之，自认为中国人者与‘既是台湾人亦是中国人’者处于高度社会网络交叉压力的比例较高，其中后者尤为明显；统独立场上，赞同台湾独立者处于低度社会网络交叉压力的比例较高；反之，认为两岸应该朝向统一者与主张维持现状者处于高度社会网络交叉压力的比例较高”③。

二、多元主体的两岸异质化社会

两岸大多数民众虽然源自同一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背景，并经由交流、合作及整合而再次逐步交融，但因两岸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使两岸内部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利益认知，甚至不同的族群、国家认同，两岸间及两岸内部也都将在长时期内存在与两

① 陈义彦：《选民的集群分析及其投票倾向预测》［J］. 选举研究，Vol. 1. No. 1.

② 陈陆辉、耿曙：《台湾民众统独立场的持续与变迁》［G］//包宗和，吴玉山．重新检视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图书，2009：179－185.

③ 吴重礼（Chung－Li Wu）、郑文智（Wen－Chi Cheng）、崔晓倩（Hsiao－Chien Tsui）：《交叉网路与政治参与：2001 年县市长与立法委员选举的实证研究》［J］. 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06－12. Vol. 18 No. 4：613.

岸关系相关的冲突和分歧。这就使得两岸社会具有多元异质性，两岸各相关行动者之间也很难形成一种覆盖全局的一致性或同一性。

首先，个人作为最基本的本体单位，是多种角色的复合体，成为联结两岸间及各自内部政治与社会互动的原点，既是理论分析的基本着力点，又是建构两岸和平发展进程中最具本源性的主体。但两岸间乃至台湾内部，民众主体性的发挥却未必具有同一性和同等性，往往具有较高的歧异性，如在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及追求完全统一目标上，中国大陆人民具有高度的坚定性和同质性，而台湾民众内部则有着“认同”分歧和“统独矛盾”，大部分则倾向于模糊地“维持现状”；两岸个体民众在主体作用发挥方式和效能上也存在差别，中国大陆民众高度拥护党和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而台湾民众则对于两岸事务具有较积极的政治参与和较强的政治功效感；此外，两岸不同的个人，如领导人、民意代表、政党领袖、党员、企业家、社会名流、一般民众等，他们的影响力并非是等同的。

其次，团体是两岸关系中较普遍、常见而有力的主体形式，两岸民众个体往往通过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团体虽然由个体的民众构成，但具有个人无法比拟的优势，而“有组织的少数能够一成不变地支配没有组织起来的多数”①。在两岸尤其是台湾内部存在众多影响台湾政治社会生活和两岸关系的团体，如政党、族群、地方派系、职业团体等，“具有联系民众，上达当局的能力。团体需要的发展既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众和阶层的需要，也能通过台湾的政治结构表现为一种政治力量”②。尤其是两岸的政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集聚能力，包括争取民众支持、募款、制造议题、引导民意等，有着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独特意识形态，是两岸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中国大陆也曾经将“国共合作”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但是很明显的，两岸间相应团体在利益诉求、利益综合、政策选择、资源整合与调配以及制度规范、角色建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冲突性，它们在影响两岸关系进程以及限定个人的角色期待和行为模式上也是不同的，两岸间团体互动也必然存在诸多分歧与冲突。

第三，两岸政府间的歧异与矛盾是非常显著的。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和

①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M］. 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2.

② 杨剑：《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目标的理论思考》［J］. 海峡评论. 2008/10. Vol. 214.

最主要的施动者，作为各自效力范围内的规则制定者和最大资源拥有者，承担着制定和执行一套两岸政策的责任，理应在一定领土上对人民行使约束性、稳定性的权威去推动和平发展。但两岸政府均无法建立同一宪政体系内覆盖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权威架构，而在主体性发挥上的不一致影响了统一性的两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更在方方面面影响到其他主体的效能。（1）两岸政府的主体作用经历了由路径差异到方向性差异的过程。两岸在从早期的武装对峙到接触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基本上维持了“一个中国”和统一目标的共识与默契，双方主体功能的差异在于统一路径和方式的差异，而在陈水扁执政后，两岸政府的主体作用则明显地进入了方向性差异阶段，台湾当局已不再有推动中国统一的政策或宣示。（2）两岸政府在对立情况下互信不足，放大了主体作用之间的矛盾。“正因双方执政当局欠缺互信与沟通，难以形成正面的心理基础，一方行为者的话语符号，即使是出于真实的善意，但另一方接受讯息时，亦每每容易趋向负面的思考与认知”①，两岸都以最为“安全”的策略去推测对方的意图并决定自己的行动，基于“最坏的情况”判断采行相应政策行动，不求更好，但求最“保险”，往往缺乏创新和改善的空间，而且即使在两岸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的情况下，两岸政府往往把自己作为唯一的主体或强调自身的主体作用，并视对方为消极因素，常指责对方是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原因，但是互信不足却造成了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无法形成主体作用的合力。（3）两岸政府的政治定位不明晰，影响了政府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上的优先性。对于大陆方面来说，虽然“中华民国政府”不具有合法性，但却不能忽视其存在，台湾地区政府维持了“中央政府”的架构，并得到台湾地区人民的认可和支持，而短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难以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同和服从。两岸间缺乏政治定位共识，使得两岸政府在互动中可能首要的考虑是如何保护自身主体性与存在合法性，难以顾及两岸关系整体发展的优先性，尤其是在合法性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例如，“为了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对抗中共的能力，‘国家’采取了强调台湾主体性和本土性的政策，并且成功地形塑了社会的意见。民间所谓‘台湾优先’民意的形成，与其说是多元社会自

① 余莓莓：《破冰与决堤：国共扩大接触对两岸关系的冲击》［M］台北：晶典文化，2009：6.

然互动的结果，不如从政权本土化的实际需要及与大陆折冲的角度来观察。”① 这实质上加深了两岸间的歧异与冲突性。（4）两岸政府对互动中的“标的”难以达成共识，使两岸政府主体在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互动存在着不稳定性和潜在冲突。两岸政府存在（或曾经存在）一些共同方向和共同利益，如和平发展、合作互利等，但“所遭遇的最大合作难题即在于双方无法就‘相互合作’的内容形成共识”，中国大陆政府强调的是主权利益，而“中华民国政府”所着重的是安全保障。“偏偏这二者在实质内涵与具体做法方面均相互冲突，中共越强调主权，台湾越缺乏安全感；而‘中华民国’对安全的诉求，又与中共所谓的主权观念相连。此为台海两岸既有合作关系中最不稳定的因子”②。

综合而言，两岸多元主体的多维互动逐步使两岸整体上形成一种歧异纷呈的异质性社会形态。“两岸关系不是一种纯粹以国家或政府为中心的结构，而是国家和民间社会一起参与的多行动主体的结构”③。当然，两岸关系曾经历过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历史阶段，在各自内部政府主导一切，两岸关系被简化为政治关系，实行“由上至下”的两岸政策，这一时期，两岸互动较为简单，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两岸间分歧也相对较少，但两岸的冲突性或矛盾却是相当剧烈的。随着大陆社会主义民主深化及台湾民主化，以及两岸关系内涵和范围的拓展，国家（state）或政府已不能排斥非政府组织、政党、企业、个人等力量的参与和权力分享，而各主体的作用发挥存在着能量、方向、路径差异，两岸间及内部的分歧大大增加，但冲突性或矛盾的剧烈程度却并未升高。存在于两岸政治与社会领域各方行动者之间绵密而错综复杂的合作与冲突，势将打破原本同质性的状态，形成两岸内部及两岸间新的互动情境和网络，但两岸间也难以达成“铁板一块”式的共识或行动甚至于共同利益。

① 包宗和、吴玉山：《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99：22.

② 包宗和：《台海两岸互动的理论与政策面向（一九五零——九八九）》［M］，台北：三民书局，1990：28.

③ 李英明：《重构两岸与世界图像》［M］. 台北：生智，2002：163.

三、两岸多元社会中的“交叉压力”

两岸社会的多样性伴随着两岸关系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分化、抗衡和冲突，而两岸关系中的“交叉压力”①，却可能成为凝合社会结构的积极力量，以及维持两岸关系政治稳定的调适因子。“交叉压力”下的两岸关系也将逐步达致秩序重构。两岸关系中的“交叉压力”包括行动者因多重成员身份所形成的内在角色冲突、行动者尤其是团体因成员交错重叠所产生的内聚力冲突、两岸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与整合而形塑的牵引力冲突、两岸互动中不同领域分歧的断裂线冲突，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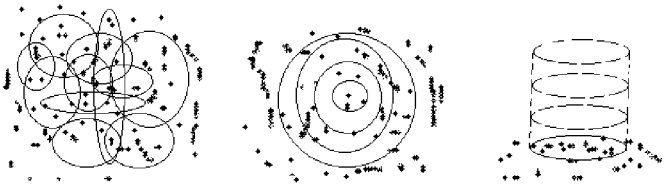


图1　三种“交叉压力”状态

两岸社会成员都具有多重身份和角色，这包括自然性的如血缘、家庭、族群、文化等，也包括社会性的归属感，如附着于工作单位和职业团体、参加或支持政治组织及社会团体等，而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日益增多与深化的两岸联结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了新的“两岸”角色，或原有身份和角色具有了更多的“两岸性”。以一个台湾民众为例，他可能是一位父亲、儿子、丈夫、本省人、中国文化认同者、公司职员、民进党支持者、公益事业义工、台干、对台政策获益者、朋友……，而不同角色所形成的要求往往不尽和谐一致，个体常常在“多重成员身份”的内在角色冲突下作出抉择，而在政治与社会上不一致的、多元的隶属、支持与归属感（Ⅰ型，高度“交叉压力”），都需要个体加以综合权衡，可以缓和个体选择的非理性、挑衅性与极端性。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多重身份或角色之间如果是相互强化的（Ⅲ型或Ⅱ型，低度“交叉压力”），则可能会降低选择的温和性，例如一位台湾南部民众，可能是传统产业工人、“绿营”支持者、本省人、弱势群体

① 胡伟、李德国：《异质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交叉压力”假说的理论脉络与解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6（4）：110－116.

一员、两岸经贸整合的受损者、大陆惠台政策的非受益者，显然角色的冲突会坚定其反对两岸整合的立场。随着两岸社会分化和联结的增加，个体拥有了多重群体联系，隶属于多个群体，具备了关联中国大陆的多重身份，而且，互动中的两岸民众个体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会出现一种利益和情感交织共生的局面，并处在社会网络的交叉压力之下，使其最终行为模式成为关涉两岸的多面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伴随着环境、结构、条件及利益的变换，个人的身份、需求、利益、价值观、认同意识、行为倾向等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不同的个体会根据不同的经验、理解和判断去决定自身的行动，最终通过各种管道影响两岸关系进程。

团体间成员交错重叠所产生的内聚力冲突，在作用方式上与社会成员角色冲突类似。内聚力冲突的第一种情况是团体内部并非都是铁板一块，可能有次级集团的存在，如民进党内，“基本教义派”、“新潮流系”、“美丽岛系”、“学运时代”、“扁系”、“谢系”等等，派系丛生，山头林立。第二种情况是一个团体中的很多成员同时属于其他多个团体，而这些团体的要求常常可能互相抵触，如民进党支持者中有许多属于两岸经济整合的获益群体，“奇美案”也反映了这一事实。那些同时属于不同团体的成员不可能对某一团体的要求百分百地支持，团体要获取最大成员支持，就必须提出兼容并蓄、比较中道的主张。总体上讲，“由于个人的交叉组织隶属和次级集团的存在，使得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利益制约关系，而他们之间的各种政治冲突与矛盾呈分散、变动、均衡的状态，社会难以形成两大或几大群体长期、稳定、刚性的政治对立与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持续政治分裂与对峙”①（Ⅰ型），以团体成员为出发点，“如果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人把自己认同于一个以上的群体，那么多数与少数之间的认同界线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多数与少数之间进行转换，这就减少了多数与少数之间相互压迫的危险”②。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化以及各类团体的互动，基于不同团体在成员、利益、功能领域等方面的重叠或交叉互补，使得一些团体为获取“最大化利益”，必须走“中间路线”，如台湾的政党“不管是在政党的结构组织上，或是党纲的精神上与竞选的策略上，都逐渐有现实主义

① 胡伟、李德国：《异质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交叉压力”假说的理论脉络与解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6（4）：113.

② ［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 上海：三联书店，1999：143.

取向，形成‘通吃党’”[①]。但对于团体内聚力冲突的结果上，仍需基于具体的变数进行分析和预测，包括团体间成员重叠多样性程度、成员所属团体的异质化程度等。

两岸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与整合而形塑的牵引力冲突，是两岸政治互动与社会整合间“分”与“合”的角力。宏观上，两岸民众交流的积极作用明显高于消极性，两岸民众积极的互动有助于缓和两岸政治关系的紧张，“跨越海峡的民众关系是利大于弊的，无论两岸最终政治关系如何，持续发展的两岸民众和团体联结网络有助于增进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共存的愿景”[②]；两岸“经济互赖能够增进两岸和睦的政治关系，部分地改变情境、形塑民众的利益与偏好，使他们偏向或要求和平的两岸关系”，虽然“大多数境况下，相互依赖并不导致政治统一，但两岸间独特的关系使得即便是统一也是可以期待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经济互赖能推进政治和谐”[③]。而在微观层次，两岸交流与整合也造成了个体成员内在的牵引力冲突，有位台湾官员形象地描述了台湾民众的内在矛盾，“政治面向让台湾人又恨又怕，经济面向让台湾人又爱又怕，社会（指狭义社会中的非经济部分，笔者注）面向让台湾人只爱不怕”[④]。这种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指向的却作用于相同对象的牵引力冲突也最终影响着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



交错型分歧线冲突　　重叠型分歧线冲突

图2　两种分歧冲突类型

两岸互动中不同领域分歧的断裂线冲突，主要考察台湾内部以及两岸间分歧与冲突之间是相互强化的，还是交叉相融或抵消的。毫无疑问，台湾内部以及两岸间在不同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与冲突，而这些分歧往往将社会分割为不同的群体，犹如社会在不同层面被不同的“冲突线”或“断

① 陈秉璋著：《政治社会学》[M]. 台北：三民书局，2000：255.

② Clough, Ralph N.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 [*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69.

③ Shelley Rigger and Toy Reid. *Taiwanese Investors in Mainland China: Creating a Context for Peace*? [*M*] // *Cross - Strait at the Turning Point: Institution, Identity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I Yuan, pulished by IIR, Cheng Chi University, 2008: 79.

④ 笔者访谈。

裂线”交错分割。一般来说，当这些断裂线相互交错时，分歧与冲突往往是相互抵消的；当断裂线沿着同一方向重叠时，就会造成多领域里冲突的强化，如同大陆阻止台湾当局的“国际参与”，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相强化。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将断裂线冲突比喻为波纹的相遇，“社会中那些不同的对立就像不同的波纹拍打着湖的对岸，如果一个波纹的波峰与其他波纹的波谷相遇的时候，它们就互相抵消；但是如果波峰与波峰相遇，波谷与波谷相遇的时候，它们就互相加强”，因此，“一个沿多种对立方向发展的社会比仅沿一个方向发展的社会被暴力分裂或肢解的危险可能要少”①。在两岸和平发展进程中，两岸分歧的“共振”与“两极化”正逐步减少，而不同分歧的交错与融合则会增多。

四、“交叉压力”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经由“分歧”和“冲突”的多元交错形成“交叉压力”达到两岸关系均衡稳定、和谐发展，这种“悖论”体现了现代多元化社会中冲突与一致的动态辩证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为能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实践提供启发。

首先，“交叉压力”使行动者或社会能够在各种冲突的力量作用下达成一种规范性的行动结果，这一概念辩证地整合了“冲突”、“分歧”与“一致”的关系，而非简单地将两者对立，丰富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观，为我们认知和研究两岸关系开拓了新的视角。对于两岸关系的认知和研究，不必预设“一致”、“共识”、“共同”为和平发展的架构、标准或起点，无须将“冲突”与“分歧”视为负面的、反功能的、消极的、干扰性的现象和因素，全面消弭两岸关系中的冲突与分歧是不现实的；冲突与均衡、分歧与和谐、稳定与变迁、功能与反功能、合作与竞争、共同利益与利益分立等，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却可能使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上升到和谐发展的境界，研究者和决策者不必对两岸关系中的冲突或分歧过于焦虑。

其次，“交叉压力”提供了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走向和谐发展的可行路径。从最终的价值诉求来看，“交叉压力”从反向的冲突与分歧出发，却导

①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Principle of Sociology [M]. New York : The Century, 1920: 164 - 165.

向正向的结果，建构一个动态均衡、和谐稳定的两岸关系，形塑一个具备开放性、包容性和弹性的两岸社会。按照“交叉压力”的作用机制，可以探讨将冲突和分歧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手段及相应操作方式，即借助于冲突与分歧的多元交错，以异质性冲突消解壁垒森严的同质性冲突，化解两岸对立或分歧的两极化，消除危机；以多元冲突下的“交叉压力”作用于行动者和社会，产生多维的角色、组织、利益、认同联结，创造和平发展的更多机遇，最终将两岸连缀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共同利益的现实基础与认知原则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李鹏

近两年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入，两岸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两岸对共同利益的强调越来越多，而对利益冲突的凸显越来越少。胡锦涛总书记、贾庆林主席最近几年在会见台湾各界人士时，就多次提到要“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要“厚植两岸共同利益”，两岸“共同利益之广泛前所未有”，等等。马英九当局也多次表示两岸可以“因共同利益合作”。“共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语言”。那么，到底什么是两岸的“共同利益”，它们的现实基础与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如何认知和维护这些共同利益？这些都成为在巩固和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两岸共同利益的理论意涵

发展两岸关系和解决台湾问题除了涉及民族大义外，也涉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问题。“利益”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从表面上看，利益表现为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一切东西，但从根本上说，利益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一方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联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利益具有自我性和社会性的特点，一方面，利益的实现是各个主体的自我行为；另一方面，利益必须而且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够得以实现。[①]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多种表现，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利益冲突和共同利益。两岸

① 李鹏：《海峡两岸的利益冲突及对共同利益的寻求》，《台湾研究集刊》，2001 年第 3 期，第 19 页。

关系也是一种关系范畴，大陆和台湾在交往过程中，也势必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共同利益。同利益冲突一样，共同利益是伴随着利益关系的产生而形成的，它在本质上是构成利益关系的各个主体的利益相互交叉、相互重叠或相互吻合的部分，它表现为不同主体对利益资源的共同认知和分享。整体来看，共同利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利益主体的多元性。自身利益具有主体单一性特征，即人们在谈论自身利益的时候，总是指某个具体行为体的利益。共同利益则具有主体多元性特点，即共同利益所代表的不是单个行为体的利益，而是众多行为体的共同需求。表现在两岸关系中就是涉及两岸关系的各种利益主体如大陆政府、台湾当局、两岸民众、美国等国际势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利益需求。

第二，利益内容的共享性。自身利益的主体单一性决定了利益往往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不同的主体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而共同利益则是众多行为体之间可以“共同分享”的利益，具有“非零和”的特点，也就是一方所得并不损害其他方的所得。表现在两岸关系中就是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某些外部因素，都可以在塑造和扩大共有利益中实现“多赢”或“共赢”。当然，利益的自我性决定了利益主体寻求共同利益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但共同利益一方面反映出两岸普遍的、共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大陆、台湾及其他利益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

第三，利益行为的合作性。在一般只追求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都是优先采取最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比较少去考虑他人的利益和实现利益关系的均衡。而挖掘和认知共同利益的目的是要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利益的一致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最牢靠的纽带之一。对两岸关系而言，利益的一致是双方和平合作的基础，共同利益有助于控制双方过激的政策行为和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有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共同利益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认知。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对共同利益的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利益作为所追求的目标的界定与表达，是一种主观认识，它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加以运用，同样是如此，都受

制于国家或政权的性质，统治者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①] 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统治者和部分政党或团体经常声称代表全体民众利益，都强调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但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需要作出客观的分析。一般来说，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习惯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权衡政策的标准之一，这就需要人们在认知和判断共同利益时，必须考虑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和实现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否则，共同利益就难以实现共享、导致合作。因此，在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的情势下，要想认知和判断两岸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是否能够导致两岸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和双赢，就必须了解两岸之间共同利益的基础所在和认知这些共同利益的基本原则。

两岸共同利益的现实基础

共同利益是处理和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即使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双方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着共同利益。自从 1987 年两岸开放以来，两岸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交往越来越密切，共同利益的内容和范围也空前扩大。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形成，如何善于认识、勇于发现这些共同利益是维护和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看到当前两岸关系中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政治难题尚未解决，在某些领域尚存在利益分歧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主动认知和珍视双方的共同利益基础，看到两岸相互需求、共同合作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岸利益分歧或冲突化解的最终反映就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两岸关系之所以经历军事对峙、反“台独”斗争等特殊时期，今天依然能够保持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两岸有着共同利益基础。

第一，绝大多数两岸同胞都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缘，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共同利益的情感基础。

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共同利益的根本不同，在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中华文化传统，有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共同期待。中华文化已经牢牢地根植于两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

① 俞正梁：《论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载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59 页。

生活之中，他们时时刻刻都从中华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精华，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生活。海峡两岸有着悠久的血脉相通的历史文化关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并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形式。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不仅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牢固精神纽带，在凝聚台湾同胞的民族意志和民族自豪感，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共同的情感基础，还会使得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更加容易被认知，更加容易得以强化和拓展。两岸分离几十年，依然有着深深的同胞情谊，大批台商选择到大陆投资，台湾同胞到大陆寻根、探亲、访友，都与两岸有着共同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第二，两岸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赖的态势已然成型，成为两岸扩展共同利益的坚实经济基础。

两岸经济关系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①]。过去近 30 年的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已经使大陆和台湾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结构性相互依赖”关系。过去 20 多年来，虽然两岸政治关系在很多时候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两岸经济合作的势头一直非常强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两岸经济相互依赖态势的形成，本身就是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两岸在经济领域的利益不断联结和融合的体现。随着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发展，通过合作来求和平、谋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要求与趋势。当前，两岸已经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迈出了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的步伐，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朝向“正常化”、“机制化”、“一体化”的整合方向努力，继续扩大两岸间经济互赖程度，力争实现两岸经济整合，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必将有助于两岸都能够从经贸关系的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且，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不仅使得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其效应也必然会扩展到其他领域。

第三，两岸民间往来日益频繁，衍生的相关问题逐渐增多，扩大了两岸相互合作的需求和机会，是两岸共同利益的社会基础。

当今世界面临着种种全球性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在想方设法加强合作应付这些威胁，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无法自外于这个趋势。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不断呈现。如何解决

①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中国台湾问题》，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27 页。

两岸民众在交流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两岸民众共同关心的社会安全、公共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领域的问题，两岸之间也有共同的利益需求。无论对大陆还是台湾来说，维护一个正常、安全、稳定的两岸交流交往秩序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2006 年 8 月举行的“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警学研讨会”上，时任国台办交流局局长戴肖峰就表示，随着两岸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使两岸间跨境的私渡、诈骗、假币、走私、绑架、勒索、贩毒等案件的发案率增加，跨境犯罪的途径、手段也日益多样化、高科技化，不仅影响两岸经贸往来的开展，更威胁到两岸同胞的安全和利益，这使两岸共同预防、打击犯罪面临新挑战，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前景广阔，两岸警方、警学界进一步合作，有利于维护两岸同胞利益，促进两岸和平稳定、经济发展。[①] 共同合作处理两岸交流过程中衍生出的这些问题，同样是两岸的共同利益所在。

第四，两岸能够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妥善处理两岸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两岸共同利益得以实现的政治基础。

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在马英九上台后得到很大改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两岸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即“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分裂，这也是两岸共同利益得以充分展现和实现的政治基础。应该说，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之间并非没有共同利益基础，无论是在民族认同、经贸联系、民间往来方面，两岸当时的共同利益基础依然存在，但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弃，不断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使得两岸不少共同利益出现认知视角的差异，难以充分展现。如两岸“三通”直航，很明显是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促使“三通”的实现，就是两岸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是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却认为“三通”将会给台湾带来政治上的损害，迟迟不推动两岸“三通”直航的实现。只有在台湾岛内政局发生积极变化之后，两岸在“九二共识”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才能够还原两岸利益关系的本色，最大限度地实现共同利益。

两岸共同利益的认知原则

两岸间共同利益的实现并不是两岸之间简单的利益重叠或利益妥协，更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进行平均分配，它的实现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个

① 《国台办交流局局长：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前景广阔》，中新社上海 2006 年 8 月 7 日电。

方面，即两岸共同利益基础的客观存在以及双方当局对共同利益的主观认识和进行合作的善意与诚意。这就需要两岸当局对利益进行判断，共同利益并非直接产生于大陆或台湾一方的自行决定或对价值的直接判断。它要求双方不仅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更要对对方的利益进行分析判断，以找出双方同一性、互补性和利益分歧中的共同利益。一般来说，认识自己一方的利益相对比较容易，但对对方利益的认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容易发生偏差，从而导致共同利益的埋没和利益冲突的产生。因此，大陆有学者提出，在审视和认知共同利益时，必须考虑到顾及原则和边界意识。所谓“顾及”原则，就是不仅考虑自身群体的利益，也顾及其他群体、其他国家的利益；不仅考虑局部，考虑一地、一国、一洲，也顾及人类全体；不仅考虑后果，也更直接地顾及手段。而所谓“边界”意识，也就是承认在行动和手段的选择上是有某种边界限制的，一般情况下不能越过这种限制。①

具体到两岸关系来说，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合作，能否产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效用，关键在于以下四个因素。第一，从观念层面看，双方对某些问题要有最基本共识，如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弘扬、台海和平稳定的维护、共同发展与繁荣的追求等等。第二，从环境层面看，两岸共同利益的实现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在军事对峙或者政治高度敌对时期，共同利益的实现就显得困难重重。第三，从行动层面看，双方要有合作的意愿和行动，如果双方都意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但却不采取实际的合作行动，这种共同利益只能是空中楼阁。第四，从机制化的层面看，两岸共同利益的实现不能长期处于自发和零星的状态，而应该形成机制化，这样才能够确保共同利益能够持续不断地转化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动力。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维护和拓展两岸共同利益，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促进和平的原则。和平的原则是维护两岸共同利益的根本前提之一。任何国家或地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才可能实现交往、才可能谋求发展。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涉及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利益问题，也是关系到台湾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利益问题。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利益需求，如果台海地区发生无法控制的军事冲突或战

① 章一平：《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与视角》，《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53页。

争，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影响到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对两岸同胞的情感造成一定的伤害，还会危及到美国等其他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战略利益。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为两岸共同利益的实现营造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虽然祖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目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途径等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必须在客观上保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状态这方面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的。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需求，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任何一方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发生的过激的政策行为产生制约作用，并进行某种程度的协调与合作，从而避免台海地区军事冲突的发生，实现台海地区的永久和平。

第二，平等互利的原则。平等互利是实现两岸共同利益的根本动力。共同利益之所以存在，各方之所以谋求实现共同利益，说到底就是为了实现“双赢”或“多赢”，自己也能够从中获益。但是，由于各方的实力不一样，发展水平不一致，在合作中往往会存在某一方获利比较多，某一方获利相对少，或者在某些时候一方获利多，一方获利少的情况。这其实都是合作中的正常现象，共同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要求各方都用“相对获益”的观念来看待合作，一定要谋求在合作中比对方获益更多。其实，只要各方能够秉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共同利益，获益就没有“你多我少”或“你少我多”的问题。比如，两岸经贸关系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遵循了“互利互惠”、“平等协商”这两个促进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两岸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只有着眼于互利共赢，才能够更好地节约成本、扩大贸易、吸引投资、刺激消费，不仅造福于台湾的厂商、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更可以实现两岸经济持久健康的发展，实现经贸关系的互利互惠，确保两岸合作的长期进行。

第三，务实合作的原则。合作是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的基本途径。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形成，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更加紧密，合作是两岸实现繁荣稳定的唯一正确途径。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必须在善意和互信基础上、在相互约束中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最终通过合作来实现和保障。善意和互信是拓展共同利益的必要条件，陈孔立教授认为，善意不是由自己的一方来界定，必须让对方感受到好意，或者由站在客观立场的第三者来判断，至少要向对方的要求靠拢、接近，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做

任何让步。[①] 这就要求两岸在合作中需要有务实的态度，两岸的共同利益能否导致合作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认知到共同利益所在，能否善意、客观、理性地看待对方的政策行为，能否建立其最起码的互相信任，能否做出适当的让步，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机制保障的原则。机制建设是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保障。虽然两岸已经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但这只是两岸关系朝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起步，从整体上看，当前两岸关系中机制化的程度还不高，一些共同利益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不利于两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维护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仅仅靠寻找共同利益、扩展共同利益是远远不够的，为保证共同利益得以维护，必须进行机制的建设。两岸关系建立和深化制度化协商的机制，是维护两岸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与最终实现完全统一的过程，就是两岸关系不断实现机制化，最终形成两岸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化安排的过程。两岸共同参与建立某种促进和规范两岸关系的机制，不仅意味着可以对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准确把握，促使两岸积极务实地解决存在问题，使双方的相关政策措施更具稳定性和长期性，更有利于两岸共同利益的实现，也将进一步有力推动两岸关系朝向构建和平发展框架的方向迈进。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① 陈孔立：《观察台湾》，北京：华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两岸共同利益视野下的和平发展

上海台湾研究所　倪永杰

2008 年 5 月以来，和平发展已成为两岸的主流民意，也是两岸最高价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是不断培植两岸共同利益、形塑两岸共同价值的过程，实现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双方、两岸同胞最高的共同利益。两岸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构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两大支柱，培植两岸共同利益，形塑两岸共同价值，则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路径，两者相互促进，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腾出时空纵深与战略回旋，使之螺旋上升、不可逆转。笔者曾发表《两岸共同价值的意涵与形成机制》一文，对两岸共同价值的内涵、形成机制进行探索。[①] 如何更快、更好地培植两岸共同利益，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以便深化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的认识与研究。

一、两岸共同利益的意涵

一般而言，利益的构成有三个要素：需求、关系及手段；利益是有层次的，可分为个体利益、团体利益及国家利益；利益还有差异，可分为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②] 两岸各种利益纠葛构成两岸关系总和，其中有共同利益、也有特殊利益；有些是相容相吸的，有些则是冲突排斥的。胡锦涛总书记在“12·31”重要讲话中指出，“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两岸共同利益涵盖两岸关系的各个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能源、环境，以及外交、军事、安全等诸多层面。所谓两岸共同利益，广义来说，就是两岸之间

① 参考香港《中国评论》2009 年 9 月号。

② 陈敏昭：《利益协调机制的重构》，引自《现代经济探讨》2007 年第四期。

凡是对两岸双方不构成零和的、独享性、排异性的利益交集；狭义来说，两岸之间暨两岸涉外事务中，相同的并且可以通过相互合作共同谋求的利益重叠。因此，两岸共同利益是与零和博弈相反、与两岸单方特殊利益相异的利益共享，是两岸双方利益的交集，可由两岸同胞所分享。两岸共同利益具有明显的两岸特色、中华文化内涵，具有永恒性、不可逆转性、超意识形态等特征，各利益要素互为关联，相互促进。

培植两岸共同利益是建构两岸共利共享结构、形塑共同价值的不二途径。两岸共同利益越多，两岸同胞之间合作双赢的机会就越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越坚实；两岸共同利益越多，两岸民众情感融合的渠道就越多，两岸民众之间产生误解、曲解、甚至敌意、仇恨的可能性越低，两岸同胞间排他性、冲突性越少，包容性就越高；两岸共同利益越多，两岸民众就越能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发生对抗、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两岸共同利益越多，两岸民众间的共同点就越多，两岸民众形成共同价值的可能性就越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越不可逆转。因此，我们相信，两岸共同利益越多、越广泛、越多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动力就越强劲，两岸同胞的情感交流越容易、越深入，两岸就会渐行渐近、渐行渐顺，而决不会渐行渐远、渐行渐难。

二、两岸共同利益的结构

按利益的政治属性，两岸共同利益可以区分为非政治性共同利益与政治性共同利益，其中非政治性共同利益可按内涵划分为经济、文化、社会、科技、能源、环境、信息等诸多方面；政治性共同利益可区分为低政治性共同利益与高政治性共同利益，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安全、战略等领域。

（一）两岸非政治性共同利益

两岸非政治性共同利益，不仅仅指两岸经济、物质层面，还包括文化、社会等内容，涵盖两岸同胞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两岸关系持续发展，两岸非政治性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构筑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物质基础、思想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互动基础。

1. 经贸交流合作。两岸经贸交流数十年，贸易、投资已十分活跃。截至2010年4月底，大陆方面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80883个，实际吸引台

资502多亿美元，加上经第三地来大陆投资的实际台资金额逾千亿，培育了上千个知名台资品牌，两岸品牌成为真正的世界品牌。目前两岸双向投资亦已启动，陆资赴台投资掀起热潮。两岸贸易额历年累计高达9500多亿美元。萧万长日前呼吁未来以两岸经济圈的模式，发展一套新的产业分工模式，结合双方人才、资金、及技术，共同发展华人品牌，开拓世界市场。[①] 陆客赴台带动台湾旅游市场，自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陆客赴台旅游达128万人次，带来消费658亿新台币。若加上商务、探亲等多达201万人次，消费1100亿新台币，预计今年陆客赴台将达150万人次，成为台湾最大的境外游客来源，陆客、陆资成为台湾经济的重要活水。两岸携手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相互扶持，共克时艰。大陆对台采购，既是让利，也是为了两岸共同发展。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使两岸经贸关系制度化、机制化、正常化，使两岸共同利益获得机制性保障。

2. 文化交流合作。胡锦涛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传承并弘扬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责任。文化是软实力，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先导力，中华文化培育了两岸同胞，滋养了两岸共同的文化利益。两岸拥有相同的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相似的媒体、电影、文化、创意、教育、文物、艺术、宗教体系等，两岸经由长年的文化交流合作，产生共同的文化价值、文化需求与文化利益。特别是因为两岸双方重视文化创意产业，为两岸文化共同利益的发展提供重大契机。[②]

3. 两岸同胞生存发展共同需求。随着冷战的终结与全球化的开启，与两岸同胞生存、发展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共同利益的重要内容，而且是长期的、全局性的。当前，两岸对于公共卫生、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海上搜救、护航、能源开发利用、以及太空探索、信息与互联网资源的合作、共享，两岸在诸多方面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多。[③]

4. 两岸社会发展。台湾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较为顺利，大

① 引自台北《中国时报》2010年8月13日。

② 参考杨渡《建构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新平台》一文，引自《"马总统"执政后的两岸新局》，台北远景基金会2009年9月出版。

③ 参见周振春：《论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及其国际作用》，引自《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0年第1期，总第13卷第1期。

陆当前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期。两岸在社会福利、养老、保险、社会运作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相似性，易于培植两岸社会的共同利益。

一般而言，两岸非政治性共同利益是两岸共同利益的基础与前奏，两岸政治性共同利益正是在非政治性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得以演变、发展、壮大，可以为两岸政治性利益的培植提供更多的平台、渠道，酝酿更多的机制、更多的原动力。

（二）两岸政治性共同利益

按政治性敏感程度区分，两岸政治性共同利益可以区分为低政治性共同利益与高政治性共同利益。两岸两会事务性协商中签署的部分协议如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等属于低政治性共同利益范畴。两岸双方高度默契地实现了连战出席 APEC 峰会、台湾以“中华台北”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年会（WHA），拓展了两岸同胞在国际上的共同利益。这些低政治性共同利益对于两岸高政治性共同利益的培植具有重要功能，包括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发现、开发两岸高政治性共同利益的增长点等。人们普遍相信，两岸可经由低政治性共同利益的磨合、培植逐渐进入高政治性利益的酝酿、滋养较为自然。两岸当前敏感的政治议题如共同商议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签署和平协议等，都属于高度敏感的政治性议题，两岸双方如何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培植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培植高政治性的共同利益，两岸没有现成的经验、法则可以借鉴、参考，需要发挥两岸同胞的智慧，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找到解决之道。

当前，两岸政治性共同利益的培植尚处于起步、摸索阶段，但已有所收获，呈现一条由低到高、由易而难、由简入繁、逐渐稳步发展的通道。

推动两岸关系永续发展，基础在于非政治性的经济、文化、社会、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关键在于培植更多政治性共同利益，为破解两岸关系政治难题打下基础。

三、两岸共同利益的障碍

虽然两岸关系已步入了和平发展的轨道，但由于两岸分隔 60 年，影响

两岸共同利益发展的障碍千丝万缕，既有台湾内部的障碍，又有来自台湾外部的阻隔。逐步削弱、消除阻碍两岸共同利益增长的不利因素，是当前培植两岸共同利益的当务之急。

1. 民进党、“台独”分离势力的阻挠、牵制。民进党仍保有40%左右的基本盘，岛内“台独”势力活动仍然猖獗，民进党习惯站在大陆的对立面、站在两岸共同利益的对立面处理两岸事务，陷入“逢中必反”、“抹红”对手、乱扣“帽子”的制式反应，对两岸共同利益的成长构成极大危害。

2. 台湾“主体意识”的障碍。台湾“主体意识”本质上只是朴素的乡土意识，不能等同于“台独”意识，但容易被误导为对抗大陆的“台湾优先意识”。即使马英九也不断强调“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先连结台湾才有中国”，每当两岸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讲“台湾优先”，不顾大陆方面的利益，甚至以损害大陆利益作为获取台湾单方利益的手段。可见，这种台湾“主体意识”对两岸共同利益的培植构成重大障碍。

3. 台湾歧视性法律法规的障碍。出于规范、限制两岸交流的需要、防范大陆“渗透”的政治考虑，台湾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限制两岸交流、歧视大陆民众、大陆党政部门、团体的规定，剥夺、限制大陆同胞、大陆方面的利益，从而给两岸共同利益的培植、成长构成政策法规上的种种限制。

4. 台湾与大陆长期进行军事对抗。台湾军方向来以解放军为假想敌，长期整军备战、以武拒统。陈水扁时期制定所谓“有效吓阻、决战境外”的攻击性战略，马英九当局则改采“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守势战略，但仍积极对美军购，积极研发攻击大陆沿海城市甚至内陆的“天弓”导弹，对大陆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显而易见，台湾对大陆的军事对抗严重阻碍了两岸共同军事安全利益的成长。

5. 国际反华势力的插手干扰。以美、日为首的国际势力对于两岸和平发展怀有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它们乐见两岸关系缓和，意图从中可以分享到和平“红利”；另一方面，美、日等国担心两岸联手，威胁美、日在亚太区域战略利益，因此美国亟需构筑“亚太版北约”，对中国构筑“C”形包围，进行新一轮的战略遏止。预计美、日等国将极力阻挠两岸共同政治、军事、安全、战略利益的发展，以此维护其自身的战略利益。

面对上述两岸共同利益的诸多障碍，需要两岸同胞本着同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精神，思考民族长远利益，从两岸共同需要出发，破解各种制约，强化共同利益，弱化乃至消弭分歧，推动两岸共同利益永续发展。

四、两岸共同利益的实践路径

培植两岸共同利益，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支柱，又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路径。不断巩固、扩大现有的两岸共同利益格局，并在既有的基础上培植更为宽广、绵密的共同利益，拓宽领域，提升层次，经由两岸非政治性共同利益的成长，逐渐导向两岸政治性共同利益的培植，这是当前发展两岸关系的当务之急，也是破解两岸政治难题的必经之路。胡锦涛总书记高度重视两岸共同利益的培植，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会见连战等台湾各界人士时，主张增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力、激发和平发展的生命力、提高两岸经济的竞争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获得与会台湾各界人士的热烈回响。[①] 台湾大学张亚中先生提出了实现两岸共同体的七个梦想，倡议两岸应着手开展文化统合、货币统合、经济统合、身份认同、安全认同、国际参与以及和平框架等七项统合工程，最后实现两岸整合。[②] 两岸同胞是培植两岸共同利益的行为主体，应当激发广大同胞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一）共同发展、共同成就、共同分享

两岸双方首先应确立两岸共同发展、共同成就、共同分享之路。面对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两岸应携手应对外在挑战，基于同胞情谊，两岸更应走共同发展之路，有效整合两岸双方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军事、外交、安全、战略资源，实现双赢。台湾有人呼吁："通过共同发掘、创建当前'两岸和平发展'进程中所具的进步价值与理念，进一步构建具有共利性格和共同成就的'两岸共同家园'目标与前景，一同参与此涵盖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伟大历史事业。"[③] 海峡两岸分隔分治60年，基本上走各自发展之路。面向未来，两岸有必要、也有条件走共同发展之路。两岸有关方面有必要调整战略、调整决策思维，大陆在规划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时，要将台湾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来，台湾在制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战略时，也应更多地考虑两岸资源互补、互为后盾，两岸联手，

① 新华社上海2010年4月29日电。

② 张亚中：《论两岸统合的路径》，引自香港《中国评论》杂志2009年4月号，总第136期。

③ 台湾《统讯》杂志2010年4月号社论：《深化两岸互信基础，建设两岸共同家园》。

共同发展。两岸有关双方可透过国共平台、海协海基两会、“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等机制平台，加强沟通、协商，为两岸共同发展制定切实可行方案。

（二）循序渐进、上下结合、官民合作

培植两岸共同利益须遵循二个原则。推动程序上，采取“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由低到高、由简后繁”、先外围后核心的推动路径，循序渐进，稳步发展。操作策略上，应遵循两岸政府规划、引导，两岸基层、民间跟进落实的原则，上下结合，官民协作，全民参与，共同分享，共同推进共同利益的发展。因此，两岸双方应成立共同利益协调机制与调节机制，共同规划、指导、培植共同利益，并依循关怀民生、照顾弱势的原则合理调节、分配共同利益流向，让更多的基层而非上层、普通民众而非财团分享两岸共同利益。

（三）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大胆突破

眼界决定境界，思路决定出路。在培植两岸共同利益的迫切情景下，需要具有超越时空、超越蓝绿、超越两岸的气魄与胆略，善于异向思维，勇于机制创新。一切有利于拓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纵深、有利于培植两岸共同利益的思想、理论都应获得实践的机会。包括两岸共同论的思想、两岸主权共享思想、两岸共同价值、两岸共同记忆观点、两岸共同治理的理论等等，都应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获得实践、总结、提高的机会。因应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需要，两岸需要重建交流秩序，创新体制、机制，两岸共同成就世博、分享世博，透过海西建设、平潭试点，摸索一条两岸共同治理之路，为两岸共同利益开辟广阔道路。

（四）盘活资源、激活平台、培植增长点

两岸双方应该巩固既有两岸共同利益，盘活资源，激活平台、管道，创新体制、机制，培植新增长点，使两岸共同利益螺旋上升，持续攀升。在此基础上，两岸双方应未雨绸缪，累积互信、累积动力，依循中华文化脉络，破解政治难题，尽早实现两岸政治议题的对话、沟通、交流与谈判。

（五）全方位交流，可持续发展

促成两岸多轨交流、多点对接、多轮磨合、多区域联动、多磁场感应，实现两岸共同利益的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如今两岸关系已进入双向、全方位、多轨道交流的快车道，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态势渐趋成形。建构绵密繁杂、覆盖两岸各区域、各阶层的交流网络，填补交流空白、消除死角，是促进两岸共同利益持续上升的最佳途径。

（六）两岸需要相互战略保障、政治承诺

两岸政治性共同利益的培植需要两岸双方进一步累积政治互信，当两岸政治性共同利益超越两岸政治分歧时，两岸政治难题终将迎刃而解。在当前中美关系敏感时刻，两岸需要相互战略保证，需要双方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承诺。具体包括五个方面：

1. 巩固并深化“九二共识”，共同反对“台独”，避免内耗，使“九二共识”法律化，获得台湾政治上、法律上的保障。

2. 台湾方面自觉遵守“一中宪法”，承诺不分裂中国。台湾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领域内真正落实“一中宪法”内涵，将“统独”、两岸协议、两岸事务排除在“公投法”外。台湾内部治理事务的“公投”大陆不会也不便表示意见，但牵涉到两岸议题、国家领土、主权范围的内容不得成为“公投”议题。

3. 双方尽快确立“一中框架”，核心是“两岸同属一中”。马英九如今也讲两岸“民族一中”、“文化一中”、“一中宪法”，逐渐向“两岸同属一中”靠拢。实际上“一中框架”比一中原则更为弹性、更具包容性、可塑性。

4. 以“两岸共同论”来深化两岸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未来两岸双方要共同缔造一个全新、未来的中国。

5. 相互照顾彼此的关切、尊重彼此利益。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日前撰文称“两岸需要同情的相互理解”。[①] 的确，大陆了解台湾选举的重要性，但台湾方面亦应充分尊重大陆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不要在海外民运、“法轮功”、“东突”、“藏独”等议题

① 引自台北《联合报》2010年8月14日。

上制造问题、踩大陆敏感红线，伤害全体大陆同胞的情感。

结　语

西方谚语称“罗马不是一天造成”。两岸共同利益培植永无止境，决不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尤其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复杂的岛内政经环境下，更需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持续坚持。培植、谋求两岸共同利益既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两岸同胞、海内外侨胞的共同心愿。当两岸共同利益超过两岸单方面特殊利益时，当两岸共同利益超越两岸分歧时，两岸任何难题终将被破解，两岸盛世迟早到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态势就不可逆转，和平统一就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与两岸共同利益问题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王建民

在海峡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的同时，两岸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也越来越突出，已影响到两岸的政治互信与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充分显示两岸关系已逐步进入一个新的盘整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两岸在继续巩固政治互信的基础上，需要厚植共同利益，确立共同目标，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化解矛盾，努力实现两岸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其中，“厚植共同利益”与“寻求共同发展”应成为未来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

一、当前两岸关系形势解读

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呈现一种紧张、对立与危机状态。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积极变化，两会制度化协商取得重大进展，两会签署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两岸关系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有学者称之为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历史性转变，甚至有人认为目前两岸关系是60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不过，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之后，两岸关系并没有向着更为积极、和谐的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一些微妙变化，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隐忧[①]，经济利益分歧更为突出，政治敏感议题逐渐浮上台面，两岸关系相对和谐的气氛趋于紧张，两岸政治互信面临新的考验，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影响两岸经济合作，影响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

① 苏起发表文章认为，两岸关系此刻正进入一个全新、具有更大挑战的阶段。如为两岸继续和平发展着想，双方应该继续“求同存异”先交流后谈判，同时试着抛弃一些旧思维、老习惯，改用同情的理解来看对方，用更大的耐心、智慧及务实态度来准备将来“求同化异”。苏起，“两岸需要同情的相互理解”，台湾《联合报》，2010年8月14日，A4版。

（一）违背客观现实与条件，急于由“先经后政”转入“政经并举”或“亦经亦政”，希望很快进入两岸政治对话与协商阶段，造成两岸政治互信紧张与两岸关系形势的微妙变化

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只是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与机制化发展的开端，后续协议的协商将更为艰巨，时程更久，整个谈判与实施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ECFA的签署仅仅标志着两岸即将迈入“ECFA时代”，而不是两岸媒体与学者所谓的“后ECFA时代”①。于是不少大陆涉台学者认为②，两岸签署了ECFA，不可能再有更重要的两岸经济合作协议的签署，就不能只坚持“先易后难”与“先经后政”的两岸互动原则，而是应“政经并举”或“亦经亦政”，“要逐步破解政治难题”，乃开始积极宣扬与探讨两岸政治对话、政治协议以及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逐渐在两岸形成一种声势与气氛，大有两岸从经济协商、经济合作进入政治协商与政治合作阶段之势。尽管主张进行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只是大陆涉台学界的讨论，但逐渐形成一种气势，让台湾方面解读为大陆在进行政治协商试探，不能不面对来自大陆的舆论与压力。可以说，大陆涉台学界的这种冒进主义倾向，不仅影响到大陆的决策层，而且给马英九当局形成很大的压力。

绿营一直攻击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走得太快，反对与抵制ECFA，对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形成很大压力。尤其是国民党在年底“五都选举”形势很不乐观的情况下，大陆的政治对话呼吁，马当局怎敢接招？反而让台湾当局的政治立场更为强硬，更为坚定，向大陆提出更高的政治要价，就是旨在对大陆要求进入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设立防火墙，让大陆知难而退。

目前两岸形势变化的焦点是，大陆急于进行政治对话、协商与台湾当局力阻政治对话、协商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对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两岸关系发展的复杂性、敏感性、曲折性与艰巨性。两岸直接“三通”从提出到实现用了30年时间，而马英九当政后两岸关系转危为安及两岸关系缓和与经济合作制度化发展只有两年多时间，大陆学界就急于从经济

① “后ECFA时代”应是指ECFA基本目标与任务实现之后的时代。像后冷战时代是指冷战结束后的发展时期，而不是冷战开始的时期。

② 也有少数台湾学者要求进行非经济议题的讨论与协商。南方朔就指责马当局“以拖待变”（“两岸政军问题还能拖几时?”，香港《明报》，2010年8月2日）。

领域进入政治领域，过于迫切，超越了客观现实。

两岸经济合作与事务性交流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两岸政治互信基础仍然非常脆弱，政治敏感议题还不敢有任何的碰触，尤其是岛内蓝绿对抗激烈，政治斗争尖锐，马英九执政困难，两岸关系面临的结构性政治障碍没有任何变化，因此目前还不具备两岸政治对话与协商的基本条件。最近，马当局发表谈话指出，两岸应先“推动和解，再走向合作，最后巩固和平”，显然将和解、合作作为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重点，政治协商尚未列入议题。

大陆必须有信心，有耐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急躁，不能冒进，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于进行两岸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否则只能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目前甚至在较长时期内，两岸应集中精力全面推进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尤其是落实与充实 ECFA 的内容，努力实现两岸的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厚植共同利益，为未来两岸政治协商积累经验，创造条件。只有在条件成熟之后，两岸方可进行两岸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尤其是在 2012 年台湾领导人“大选”前，不宜再积极提议或倡导两岸进行政治对话与政治协商问题，包括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

（二）台湾当局的政治立场越来越强硬，对大陆的政治要价越来越高

我们对马英九当局采取务实、积极的两岸政策尤其是两岸经济合作政策给予高度肯定，也对两年多来两岸务实合作取得的经济合作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但近期以来，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思维出现某些偏差，不仅对两岸经济合作的态度“由软转硬”，而且政治立场趋于强硬，对大陆的政治要价越来越高，不断为两岸关系发展设置新的障碍。一方面，台湾当局对来自大陆要求进行政治对话、政治协商的压力越来越大，不断为两岸政治协商设立更高的门槛与防火墙。另一方面，台湾当局没有对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及两岸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调整做出准备，反而进一步强调与强化台湾的主体性，企图将两岸“只谈经济，不碰政治”长期化与固定化，封堵两岸进行政治对话与协商的发展空间。

笔者观察近一年多来台湾当局对两岸关系的表态与主张，尽管仍强调坚持“九二共识”与“不统、不独、不武”的基本原则，但对台湾主体性的坚持越来越强烈，政治立场越来越强硬，而且不断强调台湾前途由台湾 2300 万人决定，其政治立场越来越民进党化。

一是台湾当局逐步步民进党的两岸政治主张后尘，不断强调台湾的主体性，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或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的未来只能在一个中国框架内解决，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而不是台湾方面一直强调的“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台湾当局高层则不断表示，“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民做出民主、自由的选择，不能任由中国大陆片面决定”。这一论断是典型的民进党与“台独”言论，彻底违背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不符合目前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九二共识”，充分显示台湾当局对国家的认同出现严重偏差，对一个中国的认同越来越远。台湾教育部门公布的课程纲要，不断强调“要将台湾打造成为海洋国家”。马英九在就职两周年施政报告中更提出所谓的“创新强国”、“文化兴国”、“环保救国”、“宪政固国”、“福利安国”与“和平护国”等“六国论”主张。这对大陆主张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是公开挑战大陆旨在遏制“台独”、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相关法律政策。在台湾“内政部”通过节假日条例草案中，不仅没有废除民进党执政时期制定的旨在反制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的“反侵略日”，反而继续列为公众节日。这一消息未引起大陆的足够重视，但问题十分严重，显示台湾当局对大陆遏制“台独”法律的不满，公开与大陆为敌。日前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在美国的谈话再次挑战这一法律。8月4日，赖幸媛在美国右翼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发表演讲时表示，大陆持续扩增对台军事部署，同时在思维上不愿改变不放弃武力对台政策与法律，“这两项问题是两岸关系发展中必须去除的障碍，中国大陆必须改变思维，调整政策”[①]。8月5日，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刘德勋进一步明确表示，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绝对不需要，而且影响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并强调反分裂法的框架和执行确实有检讨的空间和必要。这些言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两岸政治协商设立防火墙，而是充分显示了执政当局内部对两岸关系发展的一种政治思维与心态，要大陆容忍“台独”势力的发展，而且涉及干涉大陆对台政策的嫌疑。这种言论与目前两岸关系发展形势极不协调，甚至是极为反动的，将造成两岸关系发展新的

① 李春明、周伟：《台首次呼吁大陆废除对台动武法律》，《环球时报》，2010年8月6日，第10版。

裂痕。

三是台湾当局强硬回应大陆提出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与撤除导弹部署问题。撤除导弹问题本来是一个由民进党制造的假议题，却逐渐演变为岛内蓝绿共识，演变为影响海峡两岸互动与两岸政治互信的重大政治问题。台湾当局与媒体不断制造大陆对台部署导弹问题，影响到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观感，于是提出大陆撤出对台导弹部署，可改善两岸关系，增进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同。台湾当局甚至还将大陆撤除对台导弹部署作为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幸媛甚至表示，“撤弹不应有政治前提，撤弹是要做的，不是说的”。而另一方面，台湾却持续加强对美军备采购，持续进行“汉光”演习与兵棋推演，依然将大陆作为唯一的假想敌，模拟解放军攻台，制造两岸的军事紧张。

（三）在两岸经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两岸经济利益冲突越来越突出

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可以称为两岸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目前两岸经济合作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在大陆充分考虑台湾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是大陆做出重大“让步”、“让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是完全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互利互惠与单边利益让渡相结合”基础之上的。随着两岸经济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展与深化，两岸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与利益博弈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需要引起海峡两岸的高度重视。最近以来，两岸直航新增航班的争议充分反映了两岸经济利益冲突越来越突出。尽管这一争议最后仍以大陆的“让步”解决，但确实对两岸经济合作是一个重要警讯。一是两岸经济合作有共同需要，有共同利益，但也有利益冲突，不能只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二是两岸经济合作，既要考虑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与两岸经济规模的差异性，大陆可以适当“让利”，但也要充分考虑市场机制，减少政策性干预。三是两岸经济合作需要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相互体谅对方，夯实合作基础。四是对于两岸经济合作，台湾方面需要认真换位思考，需要从两岸互利双赢思考出发，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对方的利益。

尤其是两岸虽然签署了 ECFA，但台湾对大陆市场的开放与陆资在台投

资及经营活动限制依然严苛，阻碍着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化与发展。后续ECFA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保障协议等的谈判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与挑战。如果不能厚植共同利益与互利双赢目标出发，仍过度强调台湾经济困难与两岸经济规模的差异性，则会影响 ECFA 的后续发展与两岸经济的广泛深入合作。

（四）台湾当局极力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将冲击两岸互信与长远发展

两岸签署 ECFA 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但台湾当局赋予签署 ECFA 的意义，远远超越经济意义与两岸意义，还将 ECFA 视为台湾对外签署 FTA 的敲门砖，作为大力推动台湾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平台。7 月 1 日，马英九在“台湾新契机，亚洲新时代”的记者会上指出，ECFA 使台湾跨出三大步，即台湾突破经济孤立、两岸经贸走向互惠合作、加速亚洲经济整合，对两岸经贸关系制度化、促进台湾进一步国际化、避免边缘化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在两岸签署 ECFA 的过程中，台湾就已经启动与有关国家签署 FTA 的工作。两岸签署 ECFA 一个多月之后，台湾就与新加坡发表声明，双方同意在 WTO 框架下，台湾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名义与新加坡探讨签订经济合作协议 FTA 问题。除了新加坡，台湾还提出许多可能商洽 FTA 的名单，几乎包括了美国、日本、欧盟、东盟等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国家或经济集团。除此之外，台湾还全面启动加入国际组织与进入国际社会的活动，而且取得一系列新的进展。台湾“教育部”2010 年度施政目标与重点中提出“强调本土，重视国际化”，却没有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措施。如此下去，台湾的国际化发展更会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框架将会受到新的挑战，并将影响到两岸的互信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总之，近期以来，台湾当局高层官员的一系列谈话与政治主张以及目前两岸关系出现的新变化，给了我们重要的警示：两岸关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形势一片大好与乐观，两岸的政治对抗仍十分严重，岛内分离主义倾向不仅在持续蔓延，而且向台湾当局高层渗透，将严重冲击与影响两岸政治互信与两岸关系的发展，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充满着更多隐忧与变数。

二、厚植共同利益，逐步化解矛盾与分歧

两岸关系发展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需要在两岸互动与两岸关系发展中解决。其中，厚植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一步。7 月 12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指出，ECFA 是一份为民谋利、互利双赢、影响深远的好协议，希望尽快落实，继续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制度化；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只要双方良性互动、平等协商，就能够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利益，也要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①]。这一谈话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一个是厚植共同利益，一个是增强民族认同。这里就厚植共同利益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政治上暂时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化解矛盾，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实现两岸关系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什么是两岸的共同利益？内容非常广泛，会有不同定义。但其中维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最根本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责任。这既是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攸关两岸共同利益或中华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目前，海峡两岸在对一个中国的认知上有所差距与区别，但不能否定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认知与认定，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两岸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九二共识”，也体现了两岸对一个中国的坚持。台湾当局坚持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明确确认了这一点。目前，海峡两岸在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关系定位上存在矛盾，但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既是两岸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岸的共同责任，需要两岸合作，共同维护与保卫。反对“台独”、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两岸同胞享有和平环境，是两岸最重要与最根本的共同利益。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越来越突出的一个挑战与任务就是海峡两岸需要合作，共同维护包括南海、东海（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①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 年 7 月 13 日。

及海洋资源，就是维护两岸的共同利益与根本利益[①]。

民进党执政时代，“台独”势力企图通过放弃南海、钓鱼岛主权换取相关国家对“台湾独立”的支持，这是两岸的不幸，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在维护南海与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明确，强调“无论就历史、地理及国际法而言，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周遭水域”，“都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不容置疑”[②]。在这一问题上，海峡两岸的立场是一致的，利益是一致的，可以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主权，保护资源，对两岸关系发展意义重大。

（二）在经济上积极合作，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厚植共同利益

两岸共同利益众多，但最直接、最广泛的共同利益还是两岸共同的经济利益。台湾与大陆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各有各的经济利益，但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经济，也就是说台湾经济与香港经济、澳门经济一样，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维护与发展两岸经济，不论是台湾经济还是大陆经济，都是在推动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

就现阶段来讲，台湾经济发展放慢，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相对的大陆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与崛起之中，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日前经济规模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在两岸经济合作中，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让利”，可以协助台湾经济发展，让台湾经济逐步摆脱困境，获得新发展，是实现两岸共同利益的另一种表现。因此，在中华民族经济的大前提下，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不论是大陆的让利还是台湾的得利，只是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再分配，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华民族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两岸的共同利益所在。

当然，台湾与大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必然存在竞争关系，存在利益冲突，就像一个经济体下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问题是两岸之间应在遵守共同经济规则下相互合作与公平竞争，尽量减少在政策上有歧视与不公平待遇。尤其是台湾方面，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没

① 中国军事科学院罗援教授将南海与东海视为“祖权”，主张两岸军人共同捍卫祖宗留下的共同财产。

② 白冰，“台湾大事记”（2010年7月），《台湾周刊》，第31期，2010年8月2日至8月8日，第34页。

有或很少考虑两岸的共同利益，而是更强调台湾的经济利益，对大陆采取许多歧视政策。台湾方面认为，由于大陆经济规模大，国有企业实力强，台湾经济规模小，对大陆开放市场，大幅开放大陆企业投资，会对台湾经济造成冲击。但这不是合理的解释。美国、欧盟与日本等经济规模比大陆大，跨国公司实力比大陆国企强，台湾对美、对日、对欧开放投资，就不会冲击台湾经济？对大陆开放就会冲击台湾经济？显然是政治考虑造成对大陆的不公平待遇，在阻碍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检讨目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台湾当局在陆资入岛、市场开放方面是需要逐步改进的，要继续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发展，真正落实互惠互利原则，是有利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是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

另外，两岸合作进行环境保护，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两岸的共同利益。气候暖化、环境保护是当今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两岸共同面对的问题。大陆北方沙漠化发展造成严重的沙尘暴天气，已不仅仅影响大陆地区环境，而且已跨越海峡，影响到台湾的空气质量，成为一个区域性气候与环境问题。这就需要两岸的共同合作，共同解决沙漠化问题。

（三）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两岸的共同利益

中华文化是两岸的共同历史遗产，是两岸的宝贵财富，是实现两岸共同发展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要不断加强两岸的各种文化交流，共同继承与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化解两岸之间的误解与矛盾，对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在国际社会共同合作与协助，实现两岸的共同利益

两岸共同利益也存在于两岸在国际社会的互动、合作、发展与维护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一直困扰、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影响两岸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提出“外交休兵”主张，表达了某种善意，大陆也给予积极回应，两岸在国际社会的互动情况有所改善，台湾当局不再大张旗鼓地推动“加入联合国”行动，而是采取更务实的做法，以合适名义争取加入争议较少的国际组织，两岸在此基础上妥善地解决了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

问题，台湾正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大会（WHA）的观察员。另外，两年来，台湾还正式加入了其他多个国际组织或机构，包括加入 WTO 下的政府采购协议。两岸签署 ECFA 后，台湾在 WTO 的框架下迅速与新加坡正式展开 FTA 的商洽。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越来越广泛。如果两岸能够在国际社会进行广泛合作，相互协助，共同维护两岸利益，符合海峡两岸的共同利益。反过来，两岸在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相互合作与相互支持，又能增进两岸互信，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尤其是未来，两岸应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加强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与相互支持，共同维护两岸在国际社会的利益。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8 月 31 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试论两岸共同利益构建过程中的几组关系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　刘相平

两岸共同利益构建是近年来逐渐受到两岸学界关注的议题，查诸文献，大陆方面较早关注两岸共同利益的学者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李鹏，他在《台湾研究集刊》2001 年第 3 期发表了题为《海峡两岸的利益冲突及对共同利益的寻求》的文章，认为："两岸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的情况下，要大力挖掘和发展共同利益，防止利益冲突的恶化；同时，两岸应该在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寻找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力争在经济领域建立利益共同体，寻求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① 随着近年来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开展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文就两岸共同利益构建过程中的几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浅见，祈请方家指正！

一、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

关于"利益"的内涵，西方近代功利主义者边沁认为，个人利益是"一件事物如果趋于增大某个人的快乐之总和，或者（也是一回事）减少他的痛苦之总和"。②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对利益的理解含义比较宽泛，他指出，利益不只是指金钱，"我是把它一般地应用在一切能够使我

① 李鹏：《海峡两岸的利益冲突及对共同利益的寻求》，《台湾研究集刊》2001 年第 3 期，第 19～27 页。

② 《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第 583 页。

们增进快乐，减少痛苦的事物上”。①

大陆学者王中保认为可以从5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第一种角度，是从利益产生的根源即需要来解释利益，认为没有需要就没有利益。奥塔·希克（O. Sik）指出，“利益正是人们为满足客观引起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集中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意向。这种意向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上就是不断地、努力地、顽强地，有时甚至是热情地追求这种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贯彻和实现他们的利益。”第二种角度，是从需要的满足来解释利益，认为需要的满足才是利益。谢虹认为，“利益与需要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利益可以被认为是对需要的满足。”第三种角度，是从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来解释利益。洪远朋指出，利益是能满足人们自身需要或其他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和。第四种角度，是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方式来解释利益，认为需要的满足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受到一定制度、机制和社会经济形式等的制约。薛永应就强调利益范畴中应该包含满足需要的方式，并指出“所谓经济利益，就是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成果在满足主体经济需要时所获得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经济形式。”第五种角度，是从上述综合的角度来解释利益。朱鸣雄认为“利益是人们能满足自身需要的一部分社会物质财富和一部分社会精神财富之和，以及来自社会的其他需要的满足。”②

显然，“利益”与“需要”密切相关，而“需要”又包括物质需要（经济需要）和精神需要（非经济需要），因此，“利益”也有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之分。非经济利益则主要包括文化教育利益、政治利益、军事安全利益等等。

同样，两岸共同利益中也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

二、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

大陆学者樊锐则认为，所谓“利益”，是指社会生活中一定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或同主体生存发展的符合、接近。利益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尺度的现实表现，它的使命，是要从主客体关系的高度，揭示对象的为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4页。转引自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6～17页。

② 王中保著：《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利益关系的变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1页。

人存在的性质。[①]

人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生活得以实现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因此，人是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所谓社会生活，就是由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相互关联而构成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根据一般系统论，如果把社会生活看成是一个总系统，则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作为构成该系统的基本要素，可看作三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或说亚系统，由此，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是处于人类社会生活这一母系统之下，且处于同一层次的人类社会亚系统。[②] 所谓“创造历史”的人类活动本身只不过是满足人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的过程。这些需要首先表现为维持具体个人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要，既包括物质方面的需要，又包括精神方面的需要。因此，相应地，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们就要进行各种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提供活动。这样，提供物质产品的经济生活和提供精神产品的文化生活便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是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利益要求，从而实现人类这种特殊生命体的生存与不断发展的基本需要的人类生产劳动过程。[③]

利益不是物本身的固有的抽象的属性，利益总是现实的人（或人群、人类）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关系，它在每一具体的场合都表现为一定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或同主体生存发展的符合、接近；利益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的，个人、群体、社会、人类等不同层次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主体尺度是有个体性和群体性的。[④] 利益总是人的利益，但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不是以单个人的形式存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个人单独进行的。马克思指出，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利益及人对利益的追求具有社会性。利益是一种社会形式。社会是有层次的，因而，利益也表现出层次性。[⑤] 随着人类分工的出现，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利益也随之分为不同的层

①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 11 页。

② 陈世香：《一个新视角：政治本质的参照系分析》，《探索》2000 年第 3 期，第 36 页。

③ 陈世香：《一个新视角：政治本质的参照系分析》，《探索》2000 年第 3 期，第 36 页。

④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20～21 页。

⑤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21～22 页。

次。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利益区分为包括个人利益、阶层利益、阶级利益、族群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等等。

各种利益之中，最简单最直接的是个人利益，即私人利益，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私人利益不是孤立主体的个性表现。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个人利益的历史先决条件性，使它具有某种不依赖于主体意志的社会客观性，因此它才成为一种“社会存在”，而不是“个人存在”或“社会意识”。社会历史条件对于个人利益来说，就是一种客观的制约因素。①

利益总是主体活动的直接的、自觉的目的的基础。不管主体是否意识到，它总是把利益作为衡量自己与他人或事物关系的一个尺度，等等。② 而对立的主体之间根本利益也是冲突的。

不过，唯物史观认为，有了社会或说人类按一定方式组织而成的社会共同体，就有了共同体自身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③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或说共同利益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得以维持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任何利益都是与一定的主体相联系而存在的。所谓“两岸共同利益”，其核心涵义是两岸相互依存而形成的共同利益，也就是两岸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共同利益必须以共同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两岸共同利益的存在，有赖于两岸人民是否成为一个共同的主体。

显然，“大陆人民”、“台湾人民”是两个当然的主体。但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由于台湾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其人口组成被历史性地分割为外省人、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等诸多族群；同时，由于台湾政治形势的发展，其选民又被区分为蓝（深蓝、浅蓝）、绿（深绿、浅绿）阵营，这使得台湾方面的共同利益主体多样化，也使得两岸共同利益的建构工作复杂化。

---

①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 24 页。

②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20～2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7 页。

三、客观利益与主观利益

由此可见，利益具有客观性。所谓利益的客观形态或客观利益，是指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在事实上发生或存在着的利益关系及其效果。一般说来，这种客观上关系着人的生存发展的事实，包括未经人们利益判断的利益现象，并不是我们利益理念的产物，而是利益理念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与之相区别的所谓利益的主观形态或主观利益，则是指人们关于利益的意识，包括人们所持的各种意向、态度、评价等。包括利益理念在内的各种主观形态，对人们的行为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它们却需要以客观的利益形态来证明和检验。[①] 总之，利益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内容和主体尺度的现实表现。因此，我们在承认社会生活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活，而不是某种抽象的物质或观念的运动时，都必须承认它的主体性和主体尺度，承认利益关系的客观存在。[②]

诚然，包括利益理念在内的各种主观形态，对人们的行为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它们却需要以客观的利益形态来证明和检验。而保持对利益的客观形态和主观形态之间的适当区分，意味着在谈论利益时，首先要着眼于利益的客观基础和根据，即人的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方式。[③]

显然，“两岸共同利益”也存在客观形态和主观形态之分。所谓“两岸共同利益”客观形态或客观利益，是指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在事实上发生或存在着的两岸利益关系及其效果。“两岸共同利益”的主观形态或主观利益则是指人们关于两岸利益的意识，包括人们所持的各种意向、态度、评价等。

因此，李鹏认为，两岸共同利益的实现取决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即两岸一致性共同利益基础的客观存在以及双方当局对共同利益的主观认识和进行合作的善意与诚意。这就需要两岸当局对利益进行判断。共同利益并非

---

①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1～32页。

② 参见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0～21页。

③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2页。

直接产生于大陆或台湾一方的自行决定或对价值的直接判断，它要求双方不仅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更要对对方的利益进行分析判断，以找出双方同一性、互补性和利益冲突情况下的共同利益。一般来说，认识自己一方的利益相对比较容易，但对对方利益的认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容易发生偏差，从而导致共同利益的埋没和利益冲突的产生。①

海峡两岸固然不必从主观形态上过于夸大了共同利益，但也不能无视客观形态上的共同利益，甚至扭曲、遮蔽共同利益。而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让利说”遭到台湾方面的扭曲，实属憾事。

四、虚幻的共同利益与真实的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在本质上是构成利益关系的各个主体的利益相互重叠或相互吻合的部分，它表现为不同主体对利益资源的共享。但是，它与社会具体个体的私人利益之间却并不总是相一致的。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的利益需求与现实可能性之间一直存在着差距，加上不同个体在生理、心理及社会分工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歧，从而导致特殊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只要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有其局限性，只要还存在着人们各自的私人利益或利益分歧，就必然要产生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②

由此，为了维持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实现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生命种群的历史持续和不断发展，满足社会共同利益需求的人类社会活动——政治活动便与社会共同体本身一起应运而生。“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③ 在自发分工的条件下，从个人利益发展而来的共同利益在其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普遍利益”的形式，这种“普遍利益”的形式使得共同利益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并使得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在现实中

① 李鹏：《海峡两岸的利益冲突及对共同利益的寻求》，《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第26页。

② 陈世香：《一个新视角：政治本质的参照系分析》，《探索》2000年第3期，第36页。

③ 《马克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具有极为复杂的特点。[①]

所谓虚幻的共同利益，是指在自发分工条件下，当共同利益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现实中以“普遍利益”的姿态出现时，它是一种和人们实际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不完全一致的东西。虚幻的共同利益并不是指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是自发分工条件下共同利益的现实表现形式。只是由于它采取了“普遍利益”的形式而在内容上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因而我们说它是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

在自发分工的条件下，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共同利益，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必然表现为虚幻的共同利益。这是因为，随着自发分工逐渐取代原始的自然分工，共同利益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也随之成为现实，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共同利益的发展。但是，在自发分工的条件下，由于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只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即使是担任公职的个人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共同体内的其他非公职人员则逐渐丧失了对共同利益的决策参与权。因而，在其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的过程中以“普遍利益”形式出现的共同利益，必然逐渐转化为共同利益承担者的特殊利益，亦即变成了虚幻的共同利益。[②] 换句话说，在自发分工的条件下，为统治阶级所宣称的、以“普遍利益”的形式出现的共同利益，本质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真实的共同利益。[③]

既然共同利益必然采取虚幻的形式，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也不是一个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平面式的矛盾，而是一个个人利益、真实的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三者相互缠绕的矛盾的复合体。这个矛盾的复合体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个人利益与真实的共同利益的矛盾。真实的共同利益作为共同体内个人利益之间的共同性，在本质上和个人利益是不矛盾的，但是，它们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存在着对立。

个人利益与虚幻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对个人而言，虚幻的共同利益借共

①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54～55 页。

②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 55 页。

③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 56 页。

同利益之名，行特殊利益之实，它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力量。因此，个人总是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中反对这种“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虚幻的共同利益总是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为幌子，并借助于共同体的力量对个人利益直接进行干涉和压抑。现实生活许多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其实就是指个人利益与虚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共同利益与虚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虚幻的共同利益是真实的共同利益在自发分工条件下的现实表现形式，但是，虚幻的共同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和歪曲了真实的共同利益。在这里，如何使真实的共同利益得以实现，同时又有效地防止虚幻的共同利益借共同利益之名行特殊利益之实，就成为全部问题的关键。①

对于海峡两岸而言，首先要将构建真实的共同利益设立为追求目标，同时，及时地、不断地调整两个个体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缩小和消解其冲突性，扩大其一致性。

五、“由下向上”还是“由上向下”

利益的自我性决定了各个主体寻求共同利益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一般来说，共同利益有三种形成方式：第一种是由同一性利益重叠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即两个或多个主体间的利益目标、性质和手段绝大部分或完全相同；第二种是互补性利益相互吻合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即利益主体的目标和性质虽然不同，但它们能够在利益的交换中互为补充共同得利；第三种是从新的角度审视冲突利益而得到的共同利益，即在主观认为的利益冲突中衍生出的一种能够在客观上满足各方共同需求的次利益，但它并不能改变原有冲突利益的性质。这种共同利益隐藏在利益冲突之中，很难被发现和认识，但对缓和利益冲突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稳定，容易因情势的变化而减少甚至消失。②

如果说，人类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以提供社会具体个人赖以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个体生存与发展所必需之

① 樊锐著：《地球村——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第 57～58 页。

② 李鹏：《海峡两岸的利益冲突及对共同利益的寻求》，《台湾研究集刊》2001 年第 3 期，第 24 页。

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需求为基本目标，那么，人类政治生活无疑是以促成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为基本目标。具体说来，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主要是指社会共同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利益。[①] 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产品应该是“秩序”，是一种秩序产品，也就是提供合理的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确保社会共同体的有序存在及运行。[②]

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直接地与具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利益发生关联；它们对社会共同体的影响或说对社会共同利益要求的满足一般是通过先满足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方式才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同时也是社会共同体得以生存与发展，或说社会共同利益得以实现的基本要件。但是，相对于社会成员个体利益需求的实现而言，这一目标是间接的。

然而，社会政治生活却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提供社会秩序产品，也就是要形成这样一种秩序：它要把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范围内，使它们不至发展到危及整个社会共同体生存与发展进程的程度，以实现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因此，尽管社会政治生活往往也会涉及到具体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种种相关个人利益，甚至成为某些成员（如政治活动家、政治官员）实现个人利益的途径，但它更主要地以社会共同体的整体生存与发展利益，或说共同利益的满足为主要内容。对社会政治生活而言，它的直接目标只能是社会共同利益，个人利益要通过共同利益目标的完成才可能得以实现。[③]

由此可见，共同利益的形成存在两条途径，一条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入手，由下而上累积而成，是由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发展；另外一条是从社会政治生活入手，由上而下予以推动，是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发展。

事实上，自发分工的发展是导致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分裂和矛盾的根本原因。“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相互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④]

因此，要解决这对矛盾，应该首先发展个人利益，因为只有当个体生存与发展得到保证，或说个人生存与发展利益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才有可能考

① 陈世香：《一个新视角：政治本质的参照系分析》，《探索》2000 年第 3 期，第 36 页。
② 陈世香：《一个新视角：政治本质的参照系分析》，《探索》2000 年第 3 期，第 37 页。
③ 陈世香：《一个新视角：政治本质的参照系分析》，《探索》2000 年第 3 期，第 37 页。
④ 《马克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6 页。

虑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只有当个体利益需求得以满足之后，共同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形塑两岸共同利益，应该由下而上，由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而社会政治生活，由民间而后官方，先打下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才能建立起宏伟的共同利益的大厦。

六、谁是两岸共同利益的代表，大陆抑或是台湾？

在阶级社会中，一方面，在与统治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赢得全社会特别是其他被统治阶级的支持，总是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竭尽全力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的特殊利益，也总是宣称自己是全社会利益的当然代表，总是这样那样地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装扮成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并必然同样也"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②

显然，在1949年以前的国共对抗斗争中，国共双方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式以取得自己的正当性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在两蒋统治时期甚至在李登辉"执政"前期，海峡两岸的利益格局依然如此。大陆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国民党台湾当局则以"中国的法统继承人"自居。不过，李登辉执政后期及2000年台湾所谓"政党轮替"后，李登辉、陈水扁推动"台独"，企图分割两岸共同利益，两岸政治利益格局出现巨大变化，两岸形势遂而陷入紧张的泥潭。

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后，两岸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和平发展成为共同主题，建立互信、共创双赢成为共同的近期目标。但不可否认，两岸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利益依然比较单薄，两岸社会政治生活尚未真正起

① 《马克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② 《马克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

步，“秩序”之建立工作尚未开始。

因此，在海峡两岸共同利益代表权的问题上，两岸应该“搁置争议”。

七、寻求两岸共同利益的途径：团结、妥协还是斗争、冲突？

承认两岸存在共同利益，并不能否认两岸在经济利益以及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利益有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边际利益之分。核心利益是关系到利益主体生存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利益，也是最难妥协的利益，重要利益次之。两个利益主体如果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一致，则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较低，即使发生利益冲突也比较容易协调；如果核心和重要利益冲突对立而且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他们的关系就会长期处于紧张或对立状态，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①

显然，目前海峡两岸处于共同利益和冲突同时存在的格局，这要求我们奉行“两手策略”，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经济并积极开展斗争，捍卫自己的利益与信念；另一方面必须牢记两岸共同利益的存在，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妥协，努力实现两岸的和平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结　语

综上可见，海峡两岸共同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非经济利益；其存在既包括客观形态，也包括主观形态。海峡两岸应该由下而上，由经济、文化而政治，积极地、全面地推动共同利益的构建工作。应该说，在经历了“争利”、“让利”、“互利”等不同阶段后，两岸共同利益构建工作必将能取得成功。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① 李鹏：《海峡两岸的利益冲突及对共同利益的寻求》，《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第20页。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的挑战与动能

全国台湾研究会　周志怀

2008 年以来，台海局势一如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的主流预期一样，发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变化，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逐步迈入和平发展轨道。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所出现的历史性转折，具有深远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两岸经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为海峡两岸的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赢得重要机遇，同时也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展示了美好前景。两岸关系已取得重大进展，但进一步开创和平发展新局面仍需正确判断形势，妥善应对各种挑战，积聚新的动能。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性进展

伴随着历史性转折，新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必然会带有与过去时代所不同的明显印记。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渐变也在悄然发生，尽管它们暂时还隐藏在一些显性变化之下，不是十分明显。总结与探讨两岸关系在新形势下所出现的各种变化与进展，将有利于我们鉴往知来。

1. 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由过去的“台独与反台独”、“和与战”转化为如何共谋和平发展与共享和平红利。民进党的八年执政曾一度将海峡两岸推向战争的边缘。江泽民同志 2004 年 9 月 20 日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在军委第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国家安全最大、最现实的威胁就是‘台独’分裂势力”①。事实表明，2004 年获得连任后的陈水扁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台独”分裂活动，并企图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直难以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07 页。

消除，海峡两岸“台独”与反“台独”的尖锐斗争，将“和与战”的艰难选择很现实地摆在两岸面前。民进党“台独”政权的垮台，标志着“台独”高危期的结束，从而为实现两岸和解创造了必要条件。

2008 年以来，海峡两岸均采取积极政策措施，推动台海局势稳定发展，和平发展观念已深入人心，并成为两岸间又一重要共识。2009 年 10 月，中共中央电贺国民党 18 全大会召开时指出：近年来，贵我两党共同努力，积极推进双方达成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共识，开启了两岸关系的历史新篇。国民党中央复电时同样体认：贵我两党本着务实沟通、开创未来的共同体认，建立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与目标，改变了两岸间的对抗性矛盾，推动海峡两岸共同迈入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和平发展新阶段。

2. 两岸关系初步实现了动态式平衡的良性发展。这种动态式平衡，首先是基于两岸和解与合作的迫切性。民进党八年执政持续采行“台独”路线使两岸关系陷入严重危机，两岸双方都亟需采取积极政策，以改变台海局势的长期危局。此外，两岸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以及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也亟需彰显其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诸多因素的相互交织，都凸显了双方加紧合作的迫切性。但是，需要看到的是，2008 年以来的两岸互动毕竟是在固有矛盾和重大分歧尚未解决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不能不使近年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带有先天性的不稳定特征，因而政治观察家们不仅有远虑，也不乏近忧，不知道这种暂时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甚至于何时会被打破。

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动态式平衡，一方面是双方都互不挑战对方的政策底线，未选择将矛盾公开化或激化的做法；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两岸都能够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坚持民族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共同出发点；坚持共谋和平发展与共享和平红利的共同阶段性目标。正是在这“三个坚持”的基础上，两岸实现了制度化协商，使两岸间的动态式平衡有了重要保障。

两岸关系实现动态式平衡还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保持双方高层沟通管道的顺畅，这对两岸搁置争议与增进互信尤为重要。2008 年以来，国共论坛、APEC 会议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场合都为两岸高层直接会面提供了平台。2010 年 4 月 29 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等在上海与胡锦涛总书记会面时就特别为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增加两岸直航班机、开放大陆游客入台自由行等问题表达意见。连战还特别强调，马英九对

于胡锦涛在两岸关系上提出的善意及正面引导做法，也多次表达肯定与谢意。由此可见，保持高层沟通对于实现动态式平衡的重要。

3. 两岸经济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悄然启动。推动两岸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是越来越多的“新大陆人”与“新台湾人”的产生及其对当地社会的融入。随着两岸全面“三通”的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日趋紧密且逐步走向正常化。截至2009年12月，两岸累计贸易额已达9500多亿美元，台商在大陆设立投资项目已近8万个，累计实际投资达493亿美元。如果加上台商经过第三地的转投资，累计实际投资约800多亿美元。台湾是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顺差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①]。两岸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新大陆人”。据台湾海基会民意调查显示，台湾受访者有家人在大陆投资、工作或居住者占15%，受访者本人或家人曾在大陆居住累计超过3个月者则占17%，而近年来在大陆长期居留的台胞大约在百万人左右[②]，这便催生了包括在大陆大学以及台商子弟学校就读的不同年龄层次的庞大“新大陆人”群体。与此同时，“新台湾人”也伴随着两岸双向交流大门的洞开而逐步增加。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已经起步，大陆学生入台就读则已是大势所趋。而两岸通婚亦日趋热络，根据台湾海基会受理文书验证资料统计，截至2008年4月底，两岸通婚数超过30.8万件。另据统计，截至2008年1月，大陆配偶申请去台人数达25万人[③]。

随着“大三通”的全面实现和两岸“一日生活圈”的形成，使两岸的经济与社会往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密切。对于更多的“新大陆人”或“新台湾人”来说，给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生活居住地的改变，而是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在内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价值观念、心理需求的相互碰撞、认同与融入，这势必会对推进两岸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产生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不同影响。

4.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可逆性日益凸显。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两岸关系大幅改善，敌意明显降低，大陆政策与“活

① 陈德铭：《在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两岸经贸交流》，2010年第1期。

② 王茹：《“两岸族”台胞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两岸命运共同体》，载周志怀主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机遇管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③ 《海基会统计：海峡两岸通婚数已逾30.8万》，中评社香港2008年6月7日电。

路外交”成为“马英九各项施政措施中最令其自傲的项目”[①]，和平红利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首先，两岸经济合作已难以再出现开倒车的状况。日益深化的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以大陆游客赴台对经济的拉动为例，2009 年陆客入岛对台湾 GDP 的贡献就达到 0.49%[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应将更趋明显。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初步建立了制度化机制，两会协商平台的建立、两岸高层沟通管道的顺畅，两会接二连三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对巩固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均具重要的实质性意义；第三、中美台同时处于良好关系，台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扩大了台湾的国际参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可期，国际社会普遍表示欢迎与肯定。

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世人有目共睹。即使民进党重新执政，要如何面对两岸达成的既有协议，如何面对两岸建立的既有协商与谈判平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与马英九进行 ECFA 辩论后表示，如果马政府执意要与大陆签订协议，一旦民进党在 2012 年重新执政，就会发动公投废止 ECFA。果真如此，民进党势必会打破两岸现有交流与协商秩序，把既有的沟通管道与交流成果毁于一旦，那么它必须要考虑的是，这种做法能否获得岛内主流民意的支持？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鉴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尽管不能排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反复，但台湾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已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与大趋势。正如《亚洲周刊》深刻阐述的那样：两岸民间的最新互动，肯定产生了比原子分裂还具爆炸性的能量，刺激制度创新的力量，进而为中华民族焕发更巨大的软实力，“汇聚成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③]。

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应关注的主要问题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彼此间的固有分歧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诸如两岸政治定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① 邵宗海：《马英九就职一周年》，澳门：《九鼎》月刊，2009 年 6 月。

② 马英九：《陆客去年贡献台湾 0.49% GDP》，中评社台北 2010 年 4 月 7 日电。

③ 邱立本：《比原爆更强的制度变革》，香港：《亚洲周刊》2010 年 4 月 18 日。

等问题，仍会不时浮上台面，成为困扰两岸关系再突破的主要束缚。另外，随着两岸大交流的双向开展，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也相伴而生。与这些基本问题密切相关，当前我们尤应关注以下一些问题：

1. 应积极探讨两岸经济合作中强势方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为何不为弱势方所接受。海峡两岸目前的经济合作模式是国际间合作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在研究国际合作时，根据合作产生的途径，将合作分为三种类型：心照不宣的合作、经谈判导致的合作和强制的合作[①]。其中心照不宣的合作不需要行为体之间的沟通与明显的协议，具有高度的理想性，两岸合作显然不适用于此。大量的两岸合作当然是经谈判而产生的合作。但我们在关注强制性合作类型，即“强势方强迫弱势方改变自己的政策”时，则会看到在两岸经济合作中的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合作中，大陆虽属强势一方，但却往往迫于弱势方的利益需要，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也就是说，大陆并没有随着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增长，对台湾采取更强势的政策。2010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提出“让利说”；4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人士时再次强调，大陆“会充分考虑两岸经济规模和市场条件不同的实际情况，切实照顾台湾中小企业、基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但这些善意并不为台湾所接受，甚至成为台湾在野势力攻击执政党的口实。台湾目前仍未能摆脱大陆欲“以商围政”泛政治化思维，但大陆也应深入探讨如何达到惠台政策实际效果的最大化。

2. 台湾民意变化与走向应是大陆对台工作始终予以关注的重大课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实际上是两岸相互争取民心的博弈过程。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由于岛内大环境未能改变，民进党“逢中必反”、“逢马必反”，岛内民意并未出现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立即转变。台湾“行政院研考会”2009 年 5 月的民调显示，在 2007 年至 2009 年连续三年的民调中，台湾人认同分别为 63%、67% 和 65%，而中国人认同的比重则出现下降状况，分别为 15.4%、13.6% 和 11.5%。台湾《远见》杂志 2010 年 3 月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受访民众中有 44.1% 认为两岸关系是生意伙伴，18% 认为是朋友，7.5% 认为是家人，5.2% 认为是亲戚，5.1% 认为是敌人。这种情况表明，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虽为引导与改变民

① 转引自惠耕田：《沟通理性与国际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年第 2 期。

意走向提供了一种重要支撑，但仅此并不足以促使台湾社情民意发生基本转折。大陆应着力塑造一个有利争取台湾民心的内、外部环境，增加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增加台湾对大陆的认同感。

3. 民进党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变数与障碍。2008 年以来，民进党执政时所主导的“去中国化”进程被暂时终止，岛内“台独”空间也受到明显挤压，其大陆政策开始由“急独”转为“缓独”与“反统”。目前，民进党虽基本盘回稳，但依然脆弱。面对两岸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民进党并未认清台湾真正的利益所在，也未认清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从而无法在新格局中理性选择自己所处的位置。目前，民进党对内不愿与执政党进行理性沟通，对外又无法实现与大陆的对话，这只能使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角色更趋弱化。

2010 年 5 月初，尽管蔡英文连续发表“不排除在不预设政治前提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直接并实质的对话”、“民进党若能在 2012 年重新执政，中国政策一定比 2000 年首次执政时更稳定，更有预测性”等谈话，但受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左右与牵制，我们很难寄望其对大陆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当蔡英文仍在与马英九持续论战是从中国大陆走向世界，抑或是从世界走向中国时，有一点是十分明确与清晰的，这就是民进党要走上重返执政之路，中国大陆永远都是一个不可能绕过去的因素。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评论双英辩论时曾指出，“如果继续让两岸问题成为国民党的专利，不只是民进党的不幸，更是台湾的不幸”①。这一论点确实值得民进党人深思。

三、开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的主要动能是继续深化政治互信

2008 年以来，两岸实现了全面“三通”，建立了制度化沟通与协商平台，签署了 12 项协议，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也在积极商谈之中。两岸关系虽取得重大进展，但要进一步开创和平发展新局面尚须酝酿新的动能，而形成这一动能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继续深化两岸政治互信。正因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5 年以来涉及两岸关系的历次重要讲话中，一再强调要

① 许信良：《民进党不应恐共敌共》，中评社台北 2010 年 4 月 27 日电。

恪守一个中国，继续增进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力。

1. 两岸在协商、对话与谈判中增进与深化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在经济合作问题上、在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上，已比较顺利地达成了一些协议。但随着两岸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协商议题开始由经济问题向政治与军事安全问题过渡时，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就显得并不稳固，有时甚至还会十分脆弱。这在两岸政治对话与协商的不同态度上、在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上、在事涉台湾前途走向上，都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在协商两岸政治、军事安全问题的准备与起步阶段，增进政治互信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2. 价值认同与责任期待是深化两岸政治互信的关键。从政治学理论上说，“政治信任就是一种价值认同，也是一种责任期待”①。从价值认同与责任期待的角度解读，影响大陆民众对马英九政府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是其大陆政策的统、独走向；而影响台湾民众对大陆政治信任的最主要因素则是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基于两岸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基于“政治信任是一个历史的，不断调整、修复和发展的动态过程”②，两岸要实现价值认同与责任期待的相互容忍与接纳，尚须经过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因此，两岸在建构政治信任方面不仅要付出艰苦努力，且更需做长期思想准备，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与作法将无益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3. 妥善处理波动甚至低潮中的两岸关系有助于深化政治互信。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获得快速与突破性进展。但受各种内外因素影响，特别是随着岛内选举周期的来临，两岸关系发展可能会出现一个间歇期。一方面，马英九背负“倾中卖台”的沉重包袱，大陆政策被民进党严重妖魔化，甚至成为影响马英九民望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势必会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内马英九当局大陆政策的推展。另一方面，年底“五都选举”和2012年“大选”又将接踵而至，在选举压力期内，马英九政府为应对绿营的“抹红”伎俩，短期内难以再推出比较积极的政策举措。这从日前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五都”选举前，将规划减少两岸交流工作，已可略窥一斑③。两岸关系发展时快时慢，时张时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使出现短暂的调

① 齐卫平：《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信任的动态建构及其路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② 刘昀献：《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及其培育》，《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③ 《国民党证实将减少两岸交流工作》，中评社台北2010年5月8日电。

整，两岸间的政治互信基础并不应因此而受到冲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也不会因此而中断。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无论是处于快速推进阶段，还是陷于波动甚至低潮，双方都应在增进相互信任方面进一步夯实基础，这样才能为两岸关系的新突破持续积聚新动能。

尽管两岸关系发展的和平与深化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两岸双方仍应采取积极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并积极为破解政治难题预做准备，以逐步改变两岸政治对话落后于经济合作的状况。后 ECFA 时期，两岸更应寻求新的切入点，双方可就商签文化与教育协议、互设办事机构、进行高级别会晤与对话以及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接的可行途径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力求在经济合作与政治对话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从而改变两岸关系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以利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特征、问题及对策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陈先才

随着国民党在岛内的重新执政，两岸关系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正在不断形成和深化。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发表以来，两岸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呈现出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两岸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迈进。当前，两岸关系正处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虽然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非常良好，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中仍然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直接关系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因此，在当前两岸新局的情势下，为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实现持续和平发展，就必须大力加强研究工作，争取破解两岸关系中的难题，从而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不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向前迈进。

一、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特征

2008 年台湾政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正不断得到深化。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两岸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一）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格局已然形成

随着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执政，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不断推进两岸关系的改善，不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形成与深化，当前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格局和态势已然形成。

首先，长期以来影响两岸交流的制度性障碍已经排除。2008 年下半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在台北达成了两岸通航、通商和通邮等协议，为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创造了条件，标志着中断 60 年之久的海峡两岸直接通航、通邮和通商全面实现，客观上为两岸的交流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使两岸交流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和态势，有利于两岸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整合。

其次，目前两岸各种类型的沟通交流机制开始建立起来。既有官方的沟通交流机制，又有民间的联系渠道，还有由官方委托民间主导的半官方沟通管道。当前两岸从国共两党交流机制、两会机制，到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台商权益保障工作会谈、两岸产业合作机制等等，由于两岸双方沟通交流机制的确立与多样化，并由官方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两岸交流机制的制度化发展趋势客观有利于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的不断深化。

最后，两岸民间及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自 2008 年 7 月台湾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以来，大陆旅客赴台人数不断增加。随着两岸人员往来的增加，客观上促进了两岸民间交流的增加。两岸民间交流目前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过去一年来，两岸人员往来更为频繁，两岸已在 200 多个领域进行广泛交流。随着两岸“三通”的全面实现，两岸经贸交流与两岸民间人员交流不断发展。近年来两岸经贸交流不仅继续向外延扩大，而且还向内涵加深。两岸产业交流互动增加，必然要求两岸在产业法规、技术与标准等方面进行合作，从而使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加深。随着两岸产业标准的统一，以及两岸检测验证的相互承认，对于缩小两岸经济差距，加深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两岸政治互信开始积累但互信基础仍然薄弱

当前，两岸在政治关系领域的互信基础不断得到累积，但进展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双方的政治互信基础仍然薄弱。我们看到，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虽然两岸双方都追求两岸关系的改善，但双方在政治领域的互信进展仍然比较缓慢。中国大陆对台湾也释放了相当的善意，马英九当局也感受到了这种善意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但是面对中国大陆的善意，台湾方面呈现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以民进党为首的反对势力仍然顽固反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然对马英九当局推动的两岸开放政策持反对的立场。而执政的

国民党方面虽然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在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方面的意愿并不积极，马英九甚至多次公开表示在其任内不会推动两岸政治对话的进程。而在一些政治敏感性度极高的议题上，台湾方面的一些做法也在客观上损害了两岸的互信基础。包括马英九当局同意达赖访台等事件对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都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特别是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在两岸关系快速改善和不断缓和的情势下，台湾当局仍然向美国采购高达60亿美元之多的武器装备，这与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氛围完全不符合，不但对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利，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两岸政治互信的根基。

此外，虽然目前国民党在岛内全面执政，虽然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但两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随着国民党的重新执政而消失，这些不易化解的矛盾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使两岸互信基础的建立相当缓慢。正是由于两岸政治互信仍然严重不足，客观上使两岸军事互信的进展相当缓慢。

二、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不断深化，但两岸关系发展中仍然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两岸关系长期积累下来的、不易化解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类是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两岸互动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

（一）既有的结构性问题

所谓两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指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包括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两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既与历史因素紧密相连，又受到两岸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对比的严重制约。也就是说，两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并不会随着台湾政党轮替而自动消解，不会随着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中华民国”问题。

“中华民国”问题是两岸关系中长期存在并且不易化解的最大政治难题。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相当明显。在大陆内部，有相当多的人

认为“中华民国”只是旧中国的一个政权符号，它在1949年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华民国”早已被消灭掉，它本身就是一个假议题。因此，在两岸关系中根本不存在“中华民国”这个问题。事实上，对于大陆而言，如果承认“中华民国”，不但面临两个中国的现实困境，而且还面临1949年以后大陆政权合法性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在“中华民国”问题上大陆自然是相当谨慎与高度警惕。但在台湾，多数民众仍然认为“中华民国”仍然是国名，仍然是国号，它仍然存在着，台湾不少民众对“中华民国”仍然有着很深的历史情感。因此，在当前两岸关系发展中，由于双方在“中华民国”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交集，两岸双方目前对于“中华民国”议题仍然相当敏感，两岸的政治互信基础相当缺乏，因此，两岸要进行任何的政治谈判和政治对话，其协商基础都不稳固。

其次，台湾当局政治定位问题。

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问题仍然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台湾当局到底是一个叛乱政权，还是一个政治实体，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政权，还只是一个地方政权？这就需要解决“台湾当局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目前两岸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非常严重。大陆长期以来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只承认过它是经济实体、卫生实体等等。然而台湾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其与大陆是对等的政治实体，也认为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来看，两岸在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问题上仍然有着较大的分歧，短期内这个问题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是严重影响两岸政治互信的重要障碍所在。目前台湾方面希望通过两岸“互不否认”，来达到最终相互承认的目的。这是我们需要研究和关注的地方。

再次，两岸军事互信问题。

目前两岸军事互信的基础仍然薄弱。台湾长期以来始终把中国大陆视为其安全上的最主要敌人，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这一负面定位与角色认知至今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不断形成和深化，但台湾当局并未改变其固有的传统安全观念，仍然把大陆视为其安全威胁的最主要来源。马英九当局继续向美国购买高达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继续加强军备竞赛。这说明两岸在军事领域的互信基础相当缺失，大陆要在短时期内改变台湾方面视大陆为主要敌人负面认知的可能性很低，两岸军事互信之路仍然相当漫长。事实上，如果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大陆不能有效改

变台湾社会及当局视大陆为主要敌人的历史惯性心态，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构建将面临很大的挑战，即使两岸能够在军事安全领域进行一些合作，但这种合作也不可能会深入，其根基也不会稳固。

第四，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

对于两岸来说，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就是一个高度复杂而敏感的政治议题。两岸围绕着台湾国际活动问题的矛盾涉及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问题，短期内即使透过协商谈判也难以彻底解决，如果两岸无法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不但会影响到两岸政治互信的积累，而且也势必会影响两岸政治对话和谈判进程的开展。目前来看，两岸虽然在个案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例如大陆在帮助马政府参与 WHA 问题上就释放了极大的善意，但毕竟这只是一个个案处理模式，并没有为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提供一个通案处理的模式。两岸未来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与冲突仍然会继续存在着。

最后，“台独”问题。

“台独”问题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障碍。虽然目前这一问题的现实急迫性并不突出，这与目前岛内执政的国民党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岛内政治情势发展莫测，“台独”势力在岛内仍然有一定的支持基础，“台独”势力仍然有重新执政的现实可能性。在当前国民党执政的情势下，台湾当局在“台独”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将直接考验两岸政治关系的基础是否稳固，进而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来看，两岸在处理“台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大陆自然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能够不断削弱“台独”的生存基础，但执政的国民党方面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出发，虽然公开反对“台独”，但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有利用“台独”势力对抗大陆的策略考量。

（二）两岸关系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

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不断形成与不断深入，仍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各种问题。毕竟两岸 60 年来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两岸在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和根本区别。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两岸之间的交流与接触相当广泛和深入，有接触必然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从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摩擦，并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一些冲击和挑战。具体而言，在目前情势

下，两岸关系发展中可能会产生以下一些新问题：

首先，政治摩擦与冲突方面的问题。

目前两岸在政治制度及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两岸长达60年的相互敌对与敌意教育宣传，使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完全缺失。在长达60年的分离状态中，台湾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引用过来，并在岛内生根发展。而大陆则结合自己的实际也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具有大陆特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由于台湾和大陆政治制度及政治理念的重大差别，在两岸的实际接触中，双方可能会对某些政治现象及政治事件的判断上产生明显的分歧，从而给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冲击。事实上，目前虽然两岸关系正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迈步，但我们要看到，马英九也多次表示，两岸之争是制度之争，从台湾方面来看，他们认为其民主制度是台湾重要的软实力，认为他们掌握了两岸关系中关于民主的话语权。因此，我们不能排除随着两岸政治、经济及社会互动的更加频繁，台湾当局可能会携带所谓的西式民主、自由等旗号，充当西方世界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重要棋子，加强对中国大陆的攻势。同时，随着两岸人员往来更为密切，特别是大陆游客赴台人数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势下，台湾将越来越成为海外反华势力和流亡海外人士的聚居地，成为这些人对抗中共政权，对大陆进行负面宣传的重要场所。因此，无法排除未来两岸在政治领域的冲突再起，从而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事实上，2009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同意达赖访台，其本身就是此类事件未来可能继续上演的征兆。

其次，两岸社会管理领域都面临新的问题。

在两岸“三通”的条件下，随着两岸人员往来的更加频繁，很多问题可能会对两岸社会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一是社会稳定的影响。两岸人员的密集互动，使双方都会产生管理上的困难，从而可能会对两岸的社会治安，包括跨两岸的社会犯罪问题都会给两岸的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二是可能会增加两岸之间的社会矛盾。人员的互动增多，随之而来的是跨境犯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增加民众，特别是岛内民众对大陆不佳的观感。三是对两岸的社会管理制度带来极大的挑战。由于目前两岸的社会管理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随着两岸民众的互动增加，这可能会大大增加对现在社会管理制度的压力。

第三、两岸经济领域面临新的问题。

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需求和压

力，台湾岛内要求加强保护主义的呼声必然高涨。这对于两岸社会一体化的进程来说，也是一个冲击。特别是在“三通”背景下，由于大陆广阔的市场需求，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台商企业来到大陆发展，从而会使台湾方面产生被大陆严重掏空的恐惧心态。台湾方面必然会产生被大陆绑架的害怕心理，必然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因此，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岸在经济领域仍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第四，两岸文化领域面临新的问题。

两岸在文化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岛内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文化、生活方式、教育方面都非常突出。以媒体为例，新闻媒体在岛内是第四大公权力，其影响力已完全深入到岛内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它对政治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随着两岸开放的推进，台湾媒体逐步会大量进入大陆来发展。无论是其报道的内容选择，还是形式加工方面，不仅与大陆的新闻媒体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且它本身也会大大冲击大陆关于新闻媒体方面的管理制度。这种冲击和影响甚至可能会造成双方严重的矛盾冲突，从而影响到两岸社会一体化的发展。

第五，两岸安全领域也会产生新的问题。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推进，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风险在增加。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其安全领域的威胁不只包括台湾方面，更主要的还是面临国际社会的安全威胁。这种威胁包括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也包括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例如，在两岸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排除外部势力利用两岸交流频繁的机会，通过台湾增加对大陆军事、政治、主权、领土以及经济、文化、生态、科技、信息安全等方领域的情报、资讯的获取，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推进两岸关系持续和平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从上面分析来观察，两岸当前面临的问题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又有新的现实问题出现。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我们要利用当前有利的两岸关系，努力创造条件，有效破解难题，从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向前迈进。

首先，在两岸层面，要加强两岸协商，努力用框架与体制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既有成果巩固下来。

目前的两岸关系是60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努力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用法律与框架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稳定奠定重要的基础。

从必要性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两岸政治制度有很大差异性，台湾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选举社会，政党轮替已成为台湾政治生活的常态，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民进党等政治势力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而民进党长期以来坚持“台独”分裂路线，如果重新执政，势必会对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格局构成挑战和隐患，势必会影响到两岸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另一方面，从过去二十多年两岸交往的历史过程来观察，特别是在台湾社会，只要用法律规范过的东西，即使民进党上台后也无法全部推翻。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来看，虽然民进党过去8年执政时期，一心想推行“宪改”，但最终都无功而返，其“台独”野心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的“宪政体制”决定了民进党推行“法理台独”面临着极大的现实阻力，无法轻易突破。因此，我们当前要努力推动国民党执政当局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成法律化的框架，即使未来民进党上台后也无法轻易推翻。

从可行性来观察，目前两岸双方共同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一是国民党方面有这个需要，毕竟两岸关系改善是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大的政绩所在，用法律框架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固定，本身就符合国民党自身政党的利益。二是也与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相符合。三是目前泛蓝在台湾“立法院”掌握多数席位，国民党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和程序来使之合法化。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思考，可以借鉴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类的思维模式，把两岸交流中的各项成果都以框架性的形式加以固定与协议化，努力使两岸交流，包括人员交流、社会交流、经济交流、政治交流、文化交流都完全正常化。

其次，在大陆层面，加强涉台立法体系的全面建构，包括制定和出台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系。

从目前来看，大陆在涉台立法方面仍然不完善，涉台立法体系并不健全，至今还没有制定出关于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系。纵观国际社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出国家统一的法律规范。即使在台湾，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半期，也曾出台过“国统纲领”以及“国统会”等类似的组织。在这方面，

大陆就相当缺失。虽然我们在2005年制定出《反分裂国家法》，但毕竟此法并不是一部有关统一事项的法律。只有制定出统一的法律之后，大陆在推进统一的步骤与采取措施方面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才能有战略性的规划与考量。

我们要加强涉台立法体系的创新。当前大陆缺乏一部全国性的涉台综合性法律规范。这方面，大陆完全可以考虑借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台湾相关“立法”的经验。虽然制定一部全国性的涉台综合性法律规范的难度比较大，但却有着重大的实质性意义与宣示性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要改变传统上涉台立法即“台商大陆投资”立法的思维模式。长期以来，经贸尤其是投资问题在大陆涉台立法框架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两岸关系发展的不断多元化，这一立法模式已非最优选择。大陆应该逐步改变涉台立法即“台商大陆投资”立法的思维模式，充分发挥立法尤其是行政规章在两岸文化交流、社会融合及其他经贸交往方面的作用，在更广阔的领域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适当的规范。

同时，我们在创制涉台新法的同时还要适时对旧法进行修订。长期以来，大陆涉台立法存在着重创制新法而轻修订旧法的现象。事实上，目前我们还在使用的很多涉台规范，都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颁布实施的，这些涉台法规迄今未有任何修改，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亟待调整。

再次，在国际层面，继续在国际社会建构一中框架，使一中框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识。

一是使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社会成为主流声音和共识，牢牢束缚“台独”势力的企图。二是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这一问题上，除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外，还需要在国际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和引导。

在当前两岸关系新局情势下，我们在国际社会建构一中框架，还需要主动积极向国际社会宣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导向，通过建构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格局，使台海地区成为两岸和平之区，成为东亚和平之区，从而使国际充分享受到两岸和平发展的红利。

同时，我们要坚决与国际社会支持“台独”的外部势力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行为，我们在涉及一中框架议题上一定要守住底线，不可退让。

第四，在战略层面，大力加强两岸社会融合，增强两岸利益的联结，促使台湾民众和社会享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

当前，两岸交流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两岸关系进入了全面融合的新时期。两岸“三通”的最直接意义是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两个60年来相对独立发展的社会开始全面走向融合的进程已经展开。根据多伊奇的交往主义理论，不同形式的交往与社会沟通是人们相互联系程度的表现；使人们在交往中的共同获益损失较小时，人们就会喜欢这些交往；当这些交往很明显、容易认同和区分，涉及这些交往的人们就可能形成共同体或集团意识；当这种交往是获益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就是积极的，共同体中的“我群意识”将会形成。在此基础上，随着这种共同获益的不断强化，将会导致更大的凝聚力和习惯力量的形成。因此，随着两岸人员往来不断密集、交流渠道不断畅通，两岸社会融合的进程大大提速，这为两岸社会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岸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员往来将快速增加，这必然会使两岸民众在就业、求学、婚姻、消费、居住、看病、养老及娱乐等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增加，这种生活需求的积累必然会形成巨大的民间社会力量，使两岸之间的利益不断联结在一起，使两岸人民越来越享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红利。

因此，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我们要大力推进两岸社会融合的历史进程，大胆进行制度创新，为两岸社会的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五，在战术层面，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建立两岸关系全面发展的实践平台，推进福建成为两岸和平之区域，为台海和平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我们要推进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就有必要向台湾同胞展示我们的最大善意，我们可以选择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为实验区域，把海西区建设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平台和模范基地。福建与台湾不仅地缘相近，而且在血缘、人文、语言、民间信仰及自然气候等方面与台湾相近相似，可以说以福建为主体的海西区是全面与台湾进行社会融合和对接的最佳区域。

鉴于目前台湾社会对大陆有很深的顾虑，我们应该抓住台湾主流民意期待和平的特点，努力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两岸和平的试验区，成为两岸军事的缓冲区域。对于目前的两岸关系而言，海西区完全可以发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作用。福建由于地缘因素，一直是两岸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

要发生地，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军事因素，它主要包括跨境犯罪、传染疫病、重大事故、恐怖主义等，必须要借助于两岸的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在传统安全领域，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一直把中国大陆视为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源，这是台湾社会对大陆缺乏好感的重要因素所在。在当前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向前迈进，推进争取台湾民心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就需要我们以海西区为载体平台，努力使海西区成为两岸建立军事互信的重要区域，使台海地区成为两岸的和平区域和安全区域，这对于消除台湾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大陆威胁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参见中评网，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2010 - 03 - 10。
2. 参见马英九就职演讲稿。
3. Deutsch，K. W. （1964），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in P. E. Jacob and J. V. Toscano （eds），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Philadelphia：J. P. Lippencott and CO.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两岸政治谈判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民大学　黄嘉树

两岸关系发展到某种程度，就必然引发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的需求。以下几项原因决定了两岸政治谈判的必然性：

1. 先就客观需求而言，“三通”后两岸民间交流交往迅猛发展，双方交通、经贸、金融、文教、政治等事务越来越繁杂，随之衍生大量法律问题，仅仅以默契和“政策灵活性”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求助于公权力和制度化的机制才能确保有序稳定的发展。两岸再互称对方“非法”显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官方对口接触已是时间早晚问题，其实官员已经上桌直接谈判了，只不过还戴着两会的“白手套”而已；现在台湾方面已经大幅度放宽公务员登陆限制，两岸官员接触将更频繁，对两岸关系发展也提供更多机会。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展，很多议题如国际空间、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都将涉及政治考量，不论通过什么管道，两岸早晚要就这些议题进行商谈。

2. 再就各方认知而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已经得到了台湾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欲求和平发展的成功，必经对话谈判的路径，而对话谈判必然不可能仅仅限定于经贸文化领域，迟早要进入政治领域。胡总书记在2008年12月31日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①，台湾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两会谈经济问题的空间已经缩小，接下来要谈的问题涉及政治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两岸谈判有必要适时转入政治话题的讨论。如马英九的核心智囊、“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在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两岸“化异”的过程“当然应该，而且也必须”启动；苏所持的理由是“消极的说，台湾不可能永远回避两岸在主权、国际空间、军事议题上的重大歧异。即以

①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第一版。

军事互信为例，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即已两次表态鼓励。而积极的说，如黄海与南海的大水花所显示，这些非经济议题正在加速冲击台湾的周遭环境；面对它们、处理它们，反而可以让台湾更好的掌握自己的未来。而在两岸最新的经济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讨论这些难题，双方也必然可有较大的相互谅解空间"①。马英九既然以推动和平发展为其执政的基本特色，就必然要接受和平发展内在逻辑的导引，从经济走向政治。所以马从未说过"只经济、不政治"，他只能说"先经济、后政治"，即认为政治议题也要谈，只是时间顺序上"滞后"一些。

3. 耐人寻味的是，民进党同样也受上述逻辑的制约，它没办法反对和平发展，从而就不能总是抵制两岸谈判：它同样要享受两岸经贸谈判的成果（如直航），从而就不能总是抵制大陆的"经济让利"；它既然被动地迈出了前两步，就不能不接受"先经济、后政治"的提法。民进党明白两岸不谈则已，一旦谈起来，早晚要进入政治领域，故将其底线设定为届时不能让国民党垄断谈判权，民进党也要"在场监督"；最近蔡英文表示"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愿与大陆对话"，亦显示出民进党对于在两岸对话与谈判中"缺席"的担心。总之连民进党都已经有了两岸终将共同探讨政治议题的心理预期，而且该党也希望届时参与其中。

4. 经过两年多的和平发展，两会协商和谈判的制度化加强，至2009年年底已签订了12项协议，今年又顺利签订了ECFA。去年底陈云林会长第2次访台虽仍遭民进党聚众抗议，但抗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已小于前年；现在台湾民众已把两会商谈及其制度化交流视为当然甚至必然，连高雄也在邀请陈会长往访。大陆省级高官访台络绎不绝，"陆客"成千上万出入岛内，这些热络场面也已经被台湾民众视为常态。去年11月中旬在台北召开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是两岸交往中第1次在台湾举行有大陆退役将领和退休大使参加的公开研讨会，也是双方智库学者第1次在台北公开讨论敏感政治议题，从台湾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来看，似乎已经不排斥双方开始"二轨"性质的政治对话，到明年或后年，两岸智库进入这种性质的对话还是可以期待的。民进党之所以提出"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愿与大陆对话"的说法，其实也是察觉了民意的这种微妙变化。

以上所论，只是一方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两岸政治谈判也

① 苏起：《两岸需要同情的相互理解》，台《联合报》2010年8月14日。

有很大的阻力，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讨论了。简要言之，在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的问题上，个人以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先经后政”的顺序仍然应当坚持。我们不能认为有了 ECFA 就意味着经贸交流议题将退入后台，下一步就是政治接触。如果过快进入政治议题，可能使双方的矛盾过于凸显，反而冲淡甚至伤害两岸和平发展的和解与善意互动的氛围。两岸经贸交流仍有大量工作要做，ECFA 只是很粗的框架性协议，需要不断细化。已有的经贸交流形式和管道也须不断强化和调整；近两年来大陆的对台措施距离让台湾的多数人满意，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关注两岸人民福祉的提升和两岸人民感情的交融，毕竟这些才是和平发展乃至和平统一的根本凭借，而不断推动两岸的经贸交流和两岸民间往来更上层楼，使之机制化、细致化，正是达致两岸不断强化共同利益纽带和不断增进理解及感情的不二法门。

2. 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面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我们在认知上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预期，即我们将遇到更多结构性障碍和现实压力的“反作用”，双方可能都不得不做出一些令对方不那么满意的事情。7 月，吴伯雄荣誉主席向胡主席转达了马英九的 16 字箴言即“正视现实，累积互信，求同存异，续创双赢”[①]，坚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就是“正视现实”的选择或曰具体体现，但“正视现实”应与“累积互信”同步进展。“累积”意味着首先是“保持”，然后还要“添加”，保持和添加什么？——互信！互信什么？最关键的就是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的政治互信。假设没有这样的政治互信或任由原有的互信不是逐步加强反倒是日渐衰落，那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可能演变成最后的反目成仇。

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些年争论太多，如去年在台北“两岸一甲子”会议上，台湾有些学者、包括一些过去坚决赞成一个中国的蓝营学者，希望大陆应尽量“一中不表”或“一中少表”，这是大陆绝对不能同意的，而且必然招致大陆的疑虑，不利于双方累积互信。我个人近来在一些会议上，一再呼吁对一中问题应有三种概括：一是“一中各表”，大陆应更明确的表示同意台湾对“一中原则”有其自己表述的空间；在整个和平发展阶段，双方不可能就“谁是主权国家”、“谁是中央政府”等结构性分歧达成共识，只能以“各自表述”加“搁置争议”的方式处理；在今后两岸政

① 见《人民日报》2010 年 7 月 14 日。

洽谈判乃至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一中各表”也可能发挥其特殊功能，即制造出双方“互不同意但又互不冲撞”的模糊空间。8 月 11 日，大陆海协会执行副会长李亚飞在台湾出席《两岸和平创富论坛》时将“九二共识”概括为是“两会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台湾方面将此概括为“各表一中”①，虽然“各表一中”与“一中各表”侧重不同，但毕竟这是大陆首次正式接受了“各表”，此中善意，台湾方面不可不察。二是“一中共表”（“一中同表”），为了防范“一中各表”变成“两国论”式的、指鹿为马式的表述，即在“各表”的幌子下变成“你表一中，我表两国”，个人认为双方实有必要通过协商，找出一个对一中原则的“共表”方式。在 1992 年，大陆为搁置争议，主张“暂不讨论一个中国的内涵”，而今 18 年过去了，两岸关系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暂不讨论”终究不是办法，还是要尽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更具弹性的表述方式，才能适应两岸关系的新格局，并为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奠定基础。三是“一中新表”。如大陆近来提出“一中框架”的概念，就比原来的“一中原则”的提法更有弹性和包容性；有学者从“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角度，或从“宪政主张”的角度，或“两岸共同价值观”的角度，来铺垫双方都能接受的表述方式，都是有建设性的思路。

3. 开拓更多合作领域，建构更多合作机制。两岸关系要改善、要和平、要和解，这些已经成为岛内共识，甚至民进党也不反对；国际上也对两岸的和平和解普遍表示欢迎。这种和平和解的趋势延续下去，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两岸合作的加强，除了在既有的领域内以既有的方式继续深化合作外，更重要的是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建构新的合作机制，下一步重点是推动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如出版、电影、电视剧等方面的合作，其他如“新闻交流”、“中华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辛亥革命”、环保、低碳经济、甚至南海开发——等多重领域，两岸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多样的合作机会。

4. 适时开展政治议题的对话协商，至少学者和智库层次应先作准备。

尽管个人反对揠苗助长式的人为加快政治议题的对话，但从“深化”的角度讲，无论早晚，两岸关系的发展躲避不开政治议题的讨论。对于那些困扰两岸 60 年之久的结构性争议，也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才可能找出化解之道。因此，两岸官方（包括两会）直接进入政治对话与商谈的时

① 参阅：《九二共识 两岸互信的根基》，台《中央日报》2010 年 8 月 14 日。

机固然尚未成熟，但为此做必要的准备则不应该再人为的拖延。作为第一步，可以由学者和智库各自就相关问题研究或联合研究，以加强相互的了解，砥砺和启发彼此的思路，并通过与对方的论辩找出各自视野中的盲点。和平发展已经使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研究新问题，如：台湾的政治地位如何表述？扩大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如何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矛盾？征服型统一与合作型统一如何区隔？合作型统一的意涵、路径、动力……是什么？如果将来是两岸共议统一，共同决定，那“共议”机制如何建构、议题如何设定？如果出现争议谁来裁判？和平、发展、统一三者间之关系？何谓双赢？大陆想赢什么？台湾又想赢什么？如果一方想要的是另一方输不起的，能双赢吗？两岸关系的和平机制建构与“不武、不独、不统”是何种关系？除了以和平协议为基础的政治机制之外，这一“架构”应该或可能涉及其他哪些领域的机制建构？两岸和平机制中的谈判机制、经济合作机制、文化合作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彼此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两岸和平机制如何与两岸统一的最终目标衔接？——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用更宽广的胸襟、更解放的思维，去寻求新的方案和办法。

现在两岸都呼吁对方要“解放思想”，但双方都有必要降低期望值，都有必要重视对方坚持自己底线的“顽固性”。特别是台湾方面，绝不可低估大陆追求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如果把大陆“解放思想”的期待值设置为希望大陆有一天会承认“中华民国”、或承诺“放弃武力”、或以任何方式明确的或含蓄地表态将放弃统一目标，那都是不现实的。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两岸政治互信初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唐　桦

两岸关系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彼此的发展。两岸政治互信是一种相信并有所托付的一种政治心理，表现为两岸之间互动合作和趋近关系。政治互信内生于两岸参与者的博弈过程，并作为博弈的均衡形态外化形式出现，得以成立取决于两岸在博弈过程中构建的一系列制度。理解两岸政治互信的发展过程就等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理念的方式，有利于减少两岸交往的复杂性。

一、两岸政治互信的博弈诠释

经典博弈论在解释那些已经稳定下来的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在制度变迁问题上很难描述“从均衡到均衡”的跃迁。与经典博弈论相比，青木昌彦所发展的“主观博弈论”探索性地运用博弈论清晰表述了制度变迁问题，并考虑观念的因素，把制度变迁模型化为博弈参与人“共有信念”系统的改变，更适合两岸政治互信的研究。青木昌彦将制度定义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①] 两岸政治互信是由两岸的策略互动内生的，存在于两岸参与者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两岸政治互信作为两岸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两岸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起着协调两岸参与人信念的作用。互信也许存在于人们的默契理解之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之中，某些理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和维系，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演化为政治互信。两岸的博弈是重复进行的，由此演化

① 关键一点在于，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当参与人相信它时才能成为制度。

出一个稳定结果（行动组合），每个参与人基于个人经验对两岸博弈进行的方式形成了大致的认知。参与人依靠这些浓缩信息得出自己的行动规则（策略）。政治互信对应着的就是两岸参与者共享的那部分均衡信念，其中信念是关于两岸博弈将实际进行的方式的预期。两岸政治互信是一种均衡状态，但不是在一次博弈下的结果，也不是一种完全的静态平衡，它代表了实际上重复参与博弈的两岸自我维系的基本预期，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两岸关系参与者构成的长期经验的产物”。[①] 两岸政治互信是指两岸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彼此对对方能作出符合制度行为的持续性期望。所以，我们把两岸政治互信定义为两岸在主观博弈模型中显明和共同的因素，即关于两岸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理念。

政治互信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秩序，从而满足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全需求，也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秩序。两岸政治互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因而它必然内生于两岸博弈过程之中，它通过其扼要表征——默契的或符号的——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而做出的策略决策共同决定了政治互信的再生，政治互信反过来又强化了关于它的概要表征，参见图 1.1。政治互信的本质是对两岸博弈路径显著和固有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政治互信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出来。[②] 所以，政治互信虽然是内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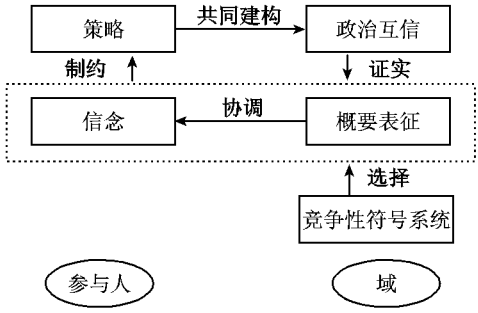


图 1.1　作为共有信念和均衡概要表征的政治互信

①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第 13 页。

②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第 28 页。

的，但同时又客观化了，也就是说，政治互信具有内生性[①]和客观性的双重性质。

两岸政治互信的博弈诠释必须包含五个相关方面：首先，政治互信是在两岸博弈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外在给定的。第二，两岸参与人在做决策的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必要预期对方所做决定的每一个细节。政治互信是浓缩信息的载体，这些信息涉及参与人在一些重要场合行动决策的基本特征，降低了有关他人决策的不确定性。第三，政治互信概括为两岸参与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方式的共有信念系统，它能够经受住环境的连续变化，但当冬天过程的后果导致了危机或者困局时就要面临考验。它应该被看做是环境和内部变化在一定边界内相对不变的东西；同时还应该强调政治互信对参与人微小偏离行动决策的隐含规则的承受力。第四，两岸关于政治互信必须有一些共同理解或共享认知，虽然可能对这些状态的含义的解释因人而异。第五，政治互信是人为的秩序。政治互信对两岸关系中的行动决策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它帮助主体节省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它又对主体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虽然我们致力于把政治互信理解为“内生的博弈规则”，但是哪一个均衡被选中无法由模型内生决定，我们有必要获知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和过去通行的规则以及邻近域所通行的规则，这些因素促成了对特定均衡的选择。

二、两岸政治互信的演进轨迹

两岸政治互信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变化，而推动这种变化的力量，来自于两岸之间的相互交往。两岸的政治互信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又延展到将来的流形，这个流形由一系列局部博弈过程所构成。每个局部博弈过程都是一个特定博弈实现均衡的过程，它基于以前的博弈均衡，从一个随即突变开始，以实现某个均衡为结束。参照丹麦新制度主义研究者尼尔森教授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四个理论支柱[②]，对于政治互信的参考价值在于：要分析政治互信的演进轨迹首先要找出政治互信的形成时段，即确定应当追溯的影响政治

① 青木昌彦的制度观只是强调制度的内生性特征，但并不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以及第三方监督，这在青木昌彦近几年的观点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② 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互信的历史时段到底有多长，初始设置应该划在哪里；其次是要分析政治互信的正反馈条件和自我复制机制，即找出政治互信的依赖路径及深层原因；再次是要找出政治互信发展中的断点均衡，即政治互信的断裂点和新的关键节点的形成期，分析这种均衡的形成及断裂的原因与规律。用图 1.2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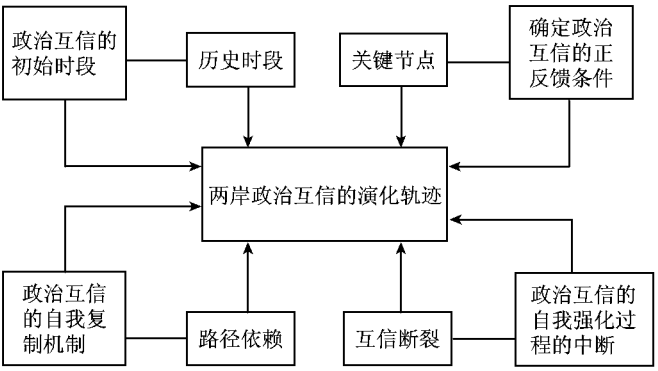


图 1.2　政治互信历史演进的分析框架

结合两岸关系的历史分期，首先来回溯两岸政治互信的这个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两岸关系最本质的内涵是政治关系，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中国内战及其延续所造成的政治对立。1946 年 6 月，中国内战爆发。这场内战的根本原因是，参与双方对中国统治权的争夺。[①] 尽管内战规模巨大、损失惨重，但参与的双方始终坚持的，都是争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地位，即中国的统治权，而没有任何一方试图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中国内战及其延续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影响，首先并最集中地表现在对两岸政治互信的影响上。[②] 在中国内战延续的六十多年中，双方之间的政治互信，特别是 1949 年以后的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及其发展变化，却有更为复杂的表现。

政治互信的演进过程是一个间或被一些转折点所穿刻的过程，当实质性的变迁发生时，就会由此产生出某种“关键节点”，使得政治互信的发展走上某种新的道路。在政治互信的演化起点与历史跨度大体确定之后，我们要确立一些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时间点即“制度断裂点”（关键节点）。很显然，1979 年，1992 年，1995 年，2002 年，2005 年及 2008 年，

① 内战一方的国民政府坚持“动员勘乱”，力图消灭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内战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力图消灭另一方的国民政府。

② 郭震远：《中国内战及其延续中的两岸政治关系——关于两岸政治协商起点的探讨》，《中国评论》，2010 年第 5 期。

都是这样的关键节点，在这些关键节点[①]上，两岸关系中的制度设计者们的某一重要决策直接决定了下一阶段两岸政治互信的方向和道路。这些时间点上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政治互信的发展轨迹，形成一种“断裂”，很长时间内影响着后续的两岸关系。[②] 结合两岸关系的历史分期和关键节点的分析，本文将政治互信的演进轨迹分为四个阶段：

1. 1949—1987 年，两岸之间存在薄弱的政治互信

1949—1979 年，两岸关系格局的基本特点是全面隔绝和军事对峙，两岸之间没有政治互信的基本状况。但当时台湾的数位密使多次与大陆交往、沟通，表明两岸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薄弱的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互信。1958 年的金门炮战后，两岸由过去激烈的军事对抗转向以政治对抗为主、军事对抗为辅的对峙状态。[③] 当时，大陆连续发表了两份《告台湾同胞书》，其中都提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④] 金门炮战及其长达 20 年的延续，是以两岸之间重要的政治互信为基础，即以双方之间存在着的关于反对美国“划峡而治”，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两个中国”的互信为基础，而达成默契的结果。[⑤]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通过两岸的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为双方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同时提到“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⑥] 此后，中国政府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

① 不仅重要的历史事件，某些微小的细节也可能引起制度变迁。

② 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往往在最终推动政治互信的发展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能够解释政治互信在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可能性。

③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外事人员读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年，第 39 页。

④ 《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6 日；《再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6 日。

⑤ 郭震远：《中国内战及其延续中的两岸政治关系——关于两岸政治协商起点的探讨》，《中国评论》，2010 年第 5 期。

⑥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1 日。

础上，积极推动两岸各项交流和人员往来。大陆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关系缓和的措施，提出了“三通”的主张。台湾当局前期由于担心两岸关系发展会威胁到“反共戡乱体制”，制定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坚持“反共拒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两岸接触的频繁，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也出现松动，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取代了“反共复国”。[①]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在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都承认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基础，如共同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双方都反对“台湾独立”或国际托管，双方都强调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谋求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强盛、繁荣，以及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幸福。[②]

2. 1987—1999年，*两岸政治互信前期初建，后期中断*

进入80年代以来，两岸经贸往来、人员交流持续、较快增长，军事对抗逐渐缓解，反映两岸之间出现了保持台海和平、促进两岸交流、交往的互信。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被迫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两岸的民间交流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1988年李登辉上台之初，延续了蒋经国的一个中国立场，1988年12月，李登辉首次提出必须面对“中国只有一个，但却无法有效在全国行使统治权的现实”。[③] 1991年2月23日，台湾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正式提出“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虽然仍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并没有做出说明。3月9日，台湾率先成立“海基会”，希望借此推动两岸对话，两岸交流进入双向交流的对话阶段。1992年3月23日，两会协商正式开始，此后在北京、厦门、香港、台北举行多轮两岸对话。1992年8月，台“国统会”就一个中国涵义发表声明，提出“中国暂时处于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1992年10月28—30日，两会在香港举行商谈，集中讨论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1992年11月，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为“汪辜会谈”及此后各种事务性协商谈判奠定了基础。1993年4月27—30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在祖国大陆的积

① 李鹏：《海峡两岸关系析论——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之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② 朱天顺：《国民党与中国统一》，朱天顺，《当代台湾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③ 李登辉：《李登辉先生七十九年言论选集》，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年，第35页。

极推动下，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①]“九二共识”，以及第一次汪辜会晤，进一步表现了两岸之间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互信，“一个中国”仍然被视为两岸走向整合协商的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原则或主要条件。[②]

1995 年李登辉访美使得两岸事务性协商中止，台海地区出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公然表示，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③] 台湾当局的两岸“主权分裂论”逐渐发展成为“台湾主权独立论”。1999 年，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其中就明确提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及其附属岛屿，以及符合国际法规定之领海与邻接水域。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当局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由混淆、否定演变为背弃，两会商谈被迫中断，刚刚初建的政治互信也被迫中断。

3. 2000—2008 年，政治互信中断，但基础在累积

2000 年台湾政权出现首次“政党轮替”，标举“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取得了执政地位。陈水扁就职时提出“四不一没有”[④]，大陆提出“听其言、观其行”。2000 年 8 月，钱其琛副总理提出“一个中国”的新三段论述，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容分割”，作为善意回应。2001 年大陆一方面对岛内“台独”活动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强调只要台湾当局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就能恢复对话和谈判，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陈水扁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定九二共识；2002 年，陈水扁提出了“一边一国”论，让两岸关系再次跌入谷底。2003 年至 2004 年，陈水扁在竞选过程中变本加厉地抛出“台独”主张，不仅将选战定调为“一边一国”对“一个中国”的对决，并推出“台湾正名”、“公投制宪”的“台独时间表”，以“公投

① 虽然台湾当局以“单向、间接、局部、渐进”为原则，希望借此限制两岸人员往来和民间交流，但两岸交流交往的扩大和深化的格局已逐渐形成。

② 邵宗海：《两岸关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第 301 页。

③ 新华社（北京），1999 年 7 月 11 日电。

④ 2000 年，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

绑大选”的方式强势进行“和平公投”；此后，陈水扁更是有恃无恐地推动“去中国化”、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鼓噪“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明显需要主权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推动举办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授意民进党炮制“正常国家决议文”这一新的“台独纲领”等等赤裸裸的“台独”分裂活动。① 陈水扁大肆推进“台独”路线，严重破坏了两岸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的，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政治互信。这不仅导致台海局势、两岸关系几次陷于高度紧张和危险之中，而且对未来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

2005 年 4、5 月间，大陆相继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政党沟通交流平台，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4 月 29 日胡锦涛和连战的会谈新闻公报中就提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共同的主张。② 在与亲民党发表的会谈公报中也提到，1992 年两岸达成的共识应当受到尊重。在两岸各自表明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即“九二共识”（“两岸一中”）的基础上，尽速恢复两岸平等协商谈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务实解决两岸共同关心的重大议题。③ 两岸关系以政党交流的模式，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2005 年 8 月，国民党台中市、彰化县、台南市、新竹市党部参访团先后抵达厦门、青岛、深圳、苏州展开交流访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基层党部交流分阶段展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之间的政党沟通平台启动后，不仅使两岸的政党关系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而且国亲新三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互信，在两岸的政党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政治基础，为两岸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

4. 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互信得以恢复

两岸政治互信在李登辉、陈水扁于台湾执政期间遭到严重损害，但在

① 李鹏：《海峡两岸关系析论——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之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 年，第 71 - 72 页。

② 《胡锦涛与连战会谈新闻公报（全文）》，人民网，http：//tw. people. com. cn/GB/26741/47107/47312/3360547. html。

③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会谈公报》，中国日报，http：//www. chinadaily. com. cn/gb/doc/2005 - 05/13/content_ 441721. htm。

2008 年 5 月以后，在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历史新阶段进程中，得到明显加强。2008 年 5 月 20 日，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两岸双方得以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互信，两岸关系也朝着改善和缓和的方向发展。两岸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尽管协商都没有涉及具体的政治事务，但都应视为两岸之间的政治交往，因为都是两岸官方授权的机构的接触、沟通。2008 年 9 月马英九在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的专访时，就两岸关系作出新的诠释，说海峡两岸双方的关系应该不是“两个中国”，“而是在海峡两岸的双方处于一种特别的关系”。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指出：“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胡锦涛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提出新的表述，他指出：“1949 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并且指出：“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建立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自“三通”以来，两岸各项对话全面开展，国共党际交流平台也逐步得到新的确认与发展，从而初步形成海峡两岸之间“两轨交流机制”，为两岸之间保持沟通、消弭误解、增进互信、并达成共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后，政治互信有了很大的发展。面对两岸关系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巩固和深化两岸政治互信就成为可能，并显得尤为必要。

三、关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思考

我们假定，两岸博弈结构参与人只拥有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我们把每个参与人对博弈结构的主观认知称为主观博弈模型。[①] 两岸关系中的参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行动决策的主观集合与决策规则的方式，不是随

①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第 240 页。

即和相互独立地发生，而是以相互协调的方式进行的，最终将导致共有信念系统（两岸政治互信）的产生。虽然自发性和诱导性的政治互信的变迁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它们在变化过程中必须满足一个共同条件：在初始政治域，必须有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修改对于域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认知，并以分散化或相互协调的方式联合采取新策略，这样才能导致新均衡序列（稳定的政治互信）的出现。

政治互信的主观博弈模型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参与人 i 技术上可行的策略决策的客观集合 A_i（$i \in \mathrm{N}$）可以用一个无限维的空间代表，但是在任何时点上都只有一个有限维的子集处于启用状态，它被称为行动的启用集合。

第二，对于博弈的内生性规则，参与人共享一个公共信念系统 $\sum^*$，即制度；除此之外，当博弈的实际策略组合为 $s \in \times_i S_i$ 时，参与人对于博弈域的内在状态还形成私人剩余信息 $I_i(s) = \sum_i^*(s) - \sum^*(s)$。这两者的加总就是参与人对于博弈的全部主观认知。

第三，给定被认知的制度 $\sum^*$，每个参与人拥有一个主观的后果函数 ϕ_i（.，l_i（.）：$\sum_{,e}^*$），其中 S_i 是参与人的决策，e 是参与人对博弈域环境的解释。这个后果函数就是参与人的主观推断规则。

第四，参与人从行动启用集合中选择策略 S_i^*，使其预期效用 $u_i(\phi_i$（s_i，I_i（s）：$\sum^{,e}$）最大化，由此得出的策略选择称为最佳反应决策规则。

政治互信的主观博弈模型可以被他们的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动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从政治互信的主观博弈模型中我们可以思考如何进一步增进两岸的政治互信。外部冲击、博弈域的扩大、其他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后果函数中参数的巨大改变、认知的改变以及博弈域内部的累积性影响，都可能影响政治互信。

首先，社会经济系统和政治背景的大范围变化产生出某种特殊的情势，在这种情势下，博弈域会扩大。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两岸经贸关系不断拓展和深化，两岸民间往来更加便捷密切，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大势，成为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追求。未来两岸之间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加深，通过加强交流，加深理解，消除敌意，为政治互信累积基础。

其次，除了外部环境引发的博弈域的扩大，可以以分散化或集体的方式试验涉及扩大行动启用集合的新策略。比如用“大中华”框架来思考两岸

关系，经过两岸的沟通和协商，促成台湾方面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2009年的WHA，就是有效的例证。另外，朝野对于两岸关系的定位认知存在巨大的落差，使得两岸关系的发展受到朝野关系变化的影响。台湾的政党轮替对博弈环境的不同解释，从行动启用集合中选择的是不同策略（这些最佳反应决策使他们预期效用最大化），策略选择的差异很容易使初生的政治互信变成泡影。

再次，尽快实现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制度是政治互信的基础，制度化之后的两岸关系中的政治互信是一种边际量上的累积，是稳定的，显示出连续性的特征，突发事件下的非连续的制度变迁也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不断发生的边际调整的累积性结果。制度化可以使两岸之间的“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真正落到实处，并在此基础上来建立和增进政治互信。同时配合互信机制的建立，才能减少交往中的风险、增进交往各方的相互依赖、维持持续的交往关系，更好地维护长期利益和维护自身声誉。

最后，只要主观博弈模型的第二个条件——共同认知无法满足，两岸的政治互信则很难建立。由于长期的敌对和隔阂，虽然两岸已经开放了二十多年，但两岸之间依然缺乏深入的了解，存在认知与现实的不对等，互信基础严重不足。如果要增进政治互信，就必须打破过去认知障碍。两岸关系中的认知障碍有三个层面：（1）历史上形成的对对方的刻板印象，成为两岸政治互信建立的障碍。两岸分离一甲子，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对对方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又很容易按照之前的印象预期对方的行为。比如，台湾民众在过去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教育下，对大陆形成了所谓“妖魔化”的认知；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对“一个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为“如果台湾还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既然就是承认中共是中国，而自己当然也就不是中国了”。[①]（2）统一性知觉造成对政治互信的理解太单一。认知主体总是采用直接而同一的方式把对象知觉为统一的整体，而不是知觉为一群个别的感觉，这会造成我们在政治互信上只考虑执政党之间的互信，而事实上，不仅国共之间，国共双方与台湾其他主要政党之间也要逐步要建立互信。（3）诱发定势，即双方以自己的关注点为中心，不能从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考虑，这样也会阻碍政治互信的建立。两岸要建立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政治互信，就必须从调整所有参与人的认知着手。

① 姜新立：《由“两岸中国”到“一个中国”》，（发言稿）2001年3月25日。

两岸双方都带着自己由历史给予的“视域”去理解对方时，就一定会出现两个不同“视域”的问题。我们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带来的“先见”[①]，又不能以自身的先见去任意曲解对方，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融合产生的新的可以扩大行动启用集合的更大的视域，意味着给两岸政治互信开辟新的可能。两岸的政治互信就是我们在互为“他者”的情境下，互相理解，然后形成共同理解。透过双边持续性的交流互动，逐步产生认同并营造共同利益。两岸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唯有透过持续、善意的交流，重建对“他者”的认知图像，才可能为增进政治互信夯实基础。尊重可以产生信任，信任可以使人敞开心扉，寻找共识，寻求合作的可能。减少侮辱、蔑视和暴力，不断地把“他”变成“我们”，不断加强对话和交往共同体内的联合，从而增进人们的“团结”，形成和创造更具包容性的两岸“命运共同体”。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1页。

两岸关系关键在建立互信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吴能远

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之后，两岸经贸关系可望逐步迈入正常化、机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具备了更扎实的基础，但是展望未来的两岸关系，不少人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趋势依然持续，而忧者，则是两岸共识薄弱、互信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隐藏着两岸关系出现曲折的风险。对此，本文不在学理上展开论述，拟就现实角度进行剖析。

一、维护大局需要互信

两年多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呈现出从所未有的新气象：两岸紧张对抗的气氛有效地缓和，两岸经贸合作更加的深入，两岸民间交往也空前频繁。两岸关系首呈祥和局面，可谓得来匪易，弥足珍惜。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三个要点：

首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系到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大陆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视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之前的必经阶段，把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视作为战略需要。马英九当局也很清楚，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取得政绩的重要支持与保证，是2012年国民党能否继续执政的关键所在。

其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机遇。2005年国共两党达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项愿景，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使落实五项愿景成为可能。国共两党正面临创造历史的难得的机遇。把握机遇上焉者是增进共识，建立互信，积极寻求化解分歧，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建构更多的机制性框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长期稳定的基础；次焉者是着力加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借由推动合作与民间交流，逐步消除存在于两岸人民之间的不了

解、误解，乃至敌意，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下焉者是依然保留较多的两岸交流合作障碍，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点状突破、局部进展，而难有全面的改进。

最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过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而非一蹴可及，有些规律甚至可能尚需经历曲折与反复，才能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因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但也要讲求把握节奏，不能无所作为。

迄今为止，两岸领导人对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充分把握机遇，有明确的共识，相互不断传达善意与诚意，但在着眼点与具体考量上也存在分歧。大陆较多的是从战略、宏观的视野，寻求前瞻性、长期性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长治久安之局。马英九当局早先也试图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大格局思考，一再强调要“为台湾谋数十年之和平”，但随后即愈来愈呈现出缺乏驾驭主流民意的理念、胆略与能力，受制于绿营的牵制，也囿于选举选票的考量，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更多地寻求大陆的让利与让步，让台湾获得实际利益，满足选民对于经济发展和扩大“国际空间”的期待。

这样的分歧对于两岸建立互信的作用有待观察，但客观上似将产生三项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一，有可能冲撞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两岸分歧的根本在于政治分歧。马英九当局一方面婉拒两岸进行政治对话，另一方面，受制于民进党的严格监督，在政治立场上几无妥协空间，因此在两岸关系上，或则借助于民进党煽动民意，构成对大陆的压力；或则先下手为强，造成“生米煮成熟饭”之势，逼迫大陆作出让步，如此终有可能导致撞及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而一旦大陆基于原则立场，未能尽孚其所求，有可能导致两岸关系出现波澜。

第二，有可能使“台独”声势难以削弱。就大陆而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民进党的“台独”是势不两立的，但就马英九当局而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却是必须接受民进党严格监督并寻求妥协的，因此，就大陆而言，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台独”，而就马英九当局而言，却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寻求妥协，共同面对大陆。其结果，迄今为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民进党的“台独”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两岸关系呈现出大交流、大合作的氛围与态势，冲击民进党僵化的两岸关系政策主

张，但另一方面，马英九当局的两岸关系政策并没有挑战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有可能使得民进党更为坚持“台独”。

第三，有可能使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更为复杂难解，主权问题是两岸政治分歧的核心。民进党坚持“台独”、国民党坚持“主权独立”，使得台湾民众对“主权”认知益形混乱，长期以观，即使对于国民党坚持“中华民国”，也会愈来愈构成挑战。国民党的立场其实在自我消耗“中华民国”。

二、求同存异有赖互信

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达成了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共识，事实证明，这样的共识是务实且有效的。但随后的事态发展也凸显，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仅仅依据上述共识，甚或囿于上述共识，是不够的。其理由有三：

首先，两岸经贸合作并不必然导致两岸政治分歧的逐步化解，而寻求两岸政治分歧的最终解决，始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症结所在。“先经”未必开拓“后政”之途，“先易”未必有助于解决“后难”。

其次，马英九当局的两岸关系政策中，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高阶经济议题业已涉及两岸政治分歧，何况马英九当局不断地强调“正视现实”、拓展“国际空间”及大陆放弃使用武力等政治要求，显示“搁置争议”的功能是有限的。

第三，“搁置争议”的目的是为最终化解争议创造条件，“求同存异”的目的是寻求趋同化异之道，然而目前的两岸关系却呈现出凸显两岸政治分歧，强化甚至固化两岸差异的态势。

两岸关系中，似乎存在着不同的四项坚持。

大陆的四项坚持是：

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分裂，也不容分割。

二、坚持国家最终统一的目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有助于统一的最终实现，而不能导向和平分裂。

三、坚持国际社会一中格局不被削弱。因此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独”。

四、坚持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邓小平一再强调党的各代领导人都要牢

记此点，并说这是战略问题。

马英九当局似乎也有四项坚持：

一、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并强调在“主权”问题上“寸土不让”。

二、坚持台湾必须有“国际空间”，并把拓展“国际空间”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三、坚持台湾必须拥有足够的“国防力量”，因此坚持对美军购，并强调只有在“国家安全”获得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从事两岸交流。

四、坚持台湾人民的“主权认同”必须持续增强，为此坚持用“九二共识”取代一个中国。

目前，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大陆的认知，“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在马英九当局的解释，则“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两岸存在分歧，但尽管如此，在两岸两会平等协商及所签订诸项协议中，事实上均未违背下述共识：

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二、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分裂。

三、双方共同反对“台独”。

这是迄今为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进展的基础，也是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推进的保证。因此，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即令一本“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之初衷，但直面政治问题，积极增强上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立互信，厥为关键。

三、建立互信当务之急

当前两岸关系令不少人心怀杞忧的原因是，迄今为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未缓解两岸结构性的矛盾，反而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持续深入，两岸政治分歧愈益凸显，甚至已成为两岸亟需谋求解决的协商议题，当此之时，建立两岸政治互信已经成为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关键所在。

建立两岸政治互信有三项内涵：

其一，明晰意图。理论论述能力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明确的政治理念是政党及其领导者向人民展示愿景的动力。对于两岸关系，大陆的政治意图是明确而坚定的，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马英九当局的政治意图却不尽明晰，有些暧昧，表述时见矛盾之处，行动多有摇摆之嫌，这将妨碍互信的

建立。台湾有些政治学者、政治评论家认为马英九当局“在努力淡化一中”，推行“B型台独”或“隐性台独”，或许正是因此而发，马英九当局不可不慎。

其二，增进共识。共识是互信的基础。共识愈深厚，愈坚定，则互信也愈易建立。大陆期待两岸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化，而马英九也通过“正视现实、累积互信、求同存异、续创双赢”新十六字箴言传达了善意和诚意，不过，马英九的新十六字箴言似乎也包含有两层意思：

一是两岸关系互信的取得，是大陆“正视现实”的结果，因此，未来两岸关系，只有大陆继续“正视现实”，才能“累积互信”。但问题在于，马英九所强调的“现实”意所何指？如果将“现实”解释成“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两岸分裂分治”，则指涉的其实恰恰是两岸建立互信的结构性障碍。或许两岸首先必须就“两岸关系现实”进行对话，以求共识。

二是意在回避两岸政治对话，期待依循大陆让利的模式，进行后ECFA时期两岸经贸交流和合作，是之谓“双赢”。

上述两岸分歧反映的正是两岸共识薄弱的问题，不增强共识，互信似难以建立。

其三，对话协商。如前所述，两岸各有自身的坚持，建立互信就是努力寻求在两岸分歧中，找到化解和解决之道。倘若一方高姿态地强化自身的坚持，并意图迫使对方接受此种坚持，显然只会使得矛盾激化而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两岸对于一时尚未找到解决办法的分歧暂时搁置，而先就可解决的问题加强合作，与此同时，积极寻求经由政治对话、平等协商的途径，逐步破解政治难题，为两岸关系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不断开创新局。

长期以观，国际形势与两岸关系形势必将愈来愈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是世界的潮流所致，时代的趋势所驱，而且也将是两岸关系发展必经的一个新的阶段，尽管它可能还要经历种种曲折，但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更不会逆转。深切地期盼两岸政治领导者能够认清大局，把握机遇，为两岸人民的长远福祉而谋篇布局，也让自身在历史上留下足供后人景仰的定位。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努力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突破

军事科学院台海军事研究中心　白光炜

2008 年 5 月以来，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的重大战略转折，开始步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阶段，新型两岸关系加速形成。全面客观分析两岸关系发展形势，努力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突破成为两岸应当面对的历史任务。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出现是两岸关系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2008 年以来，在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倡导和两岸人民共同推动下，理性处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存在的分歧和争端，成为双方主动恪守并善加维护的准则。尽管双方政治互信仍有待增进，一些政治滋扰事件不时闪现，但海峡两岸政治气氛进入了 1949 年以来最和谐稳定的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一是两岸民众期待两岸关系缓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有利环境前所未有。根据岛内《远见》杂志的民调，2008 年 5 月以来，岛内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缓和的乐观指数一直保持在 60% 左右，最高达 68.5%，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持乐观看法的民众比例远高于持悲观态度的民众。尽管“台独”势力的社会基础无法在短时期内削弱，民进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阻挠不断，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岛内民众带来的便利和实惠显而易见，两岸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期待不可改变，尤其是两岸直航打造了两岸“一日生活圈”，降低了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成本，民间社会力量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使得民间社会力量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力军。二是双方致力于消除恩怨增进互信，两岸交流协商机制不断充实完善。从交流主体看，两岸公权力部门、政党、企业等多元行为主体参与两岸交流。从交流渠道看，两岸沟通、协商的管道与平台不断充实扩大，“两会”制度化协商、“国共论坛”、

党际交流、海峡论坛、智库交流、互设办事处等，使得两岸政治关系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两年来，两岸执政党领袖实现了6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胡锦涛总书记先后10多次会见台湾高层，更有大陆240多位省部级以上官员以适当身份赴岛内交流，交流频率与层级之高堪称60年之最。“两岸一甲子研讨会”实现了双方最高级别智库学者在台交流，我退役高级将领正式公开登岛；今年4月初，台湾退役将领代表团访问北京，受到了大陆军方高规格接待，被媒体称为，“显示中共高层推动两岸建立军事互信，从退役将领做起进入实质阶段。”上述互动，为增进两岸互信、减少两岸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经贸文化交流空前密切热络，两岸人民利益共生关系稳步强化。两年来，两岸“三通”实现，双方签署了12项协议和2项共识，两岸地方政府、行业和企业签署各项经济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录150多个，人员往来年均超过540万人次。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两岸同胞相互支援、相互关怀，共同应对，增进了感情，两岸利益联结更加紧密。同时，两岸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也日益深化，往来更加密切，大陆“文化入岛”十分活跃，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迈向新阶段。据岛内《远见》杂志3月19日的民调显示，仅有5%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关系最后会成敌对关系，有79.6%的民众自认是中华民族一份子。四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两岸在国际场合配合默契，在国际社会上的斗争趋于缓和，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空间”得到合理安排，双方因此避免了大量不必要的内耗。海峡两岸共同维持台海地区和谐稳定，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一个中国”格局更加稳固，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信心明显提升。特别是中国大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使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有利。

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特点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重大战略转折，两岸新格局已经形成。从效果看，两年来的经贸文化交流成效是显著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是丰硕的。但同时也应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刚刚经历两年时间，60年来形成的两岸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影响和平发展的隐患和不确定因素也没有得到根

本改变，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停留在经济利益层面，岛内政治气候多变，两岸关系基础依然脆弱，和平发展仍面临诸多隐患。一是两岸结构性矛盾并未改变，两岸政治互信基础脆弱。两岸关系的敌对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两岸对于推进政治谈判、签订和平协议的时程安排存在较大分歧。随着两岸交流议题地不断深入，两岸对于台当局政治定位、台湾国际空间、军事安全互信等敏感议题存在固有矛盾和分歧，如果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有可能压缩两岸政治谈判空间，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二是台湾主体认同形成已久，岛内民意走势复杂。台当局、岛内多家媒体民调显示，马英九上台后，陈水扁时期迅速膨胀的“台湾主体意识”未被有效遏制，岛内民意出现“统消独长”的反常现象，赞成统一的民众依然维持在不足10%的境地，这一态势并没有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所改变。大陆争取台湾民心，仍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复杂工程。三是岛内政治气候多变，民进党士气回升。岛内两党政治形成，政党本土化基本实现，党派制定政策将立基台湾，使我面临的对手将更加复杂多样。民进党在经历了近几次的选举胜利后，士气逐步回升，社会动员力依然强大。在岛内政党轮替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民进党东山再起的可能不断增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存在重大隐忧。四是美日等外部势力影响相对弱化，但对两岸关系发展的警惕性上升。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趋势难以遏制，美、日等国实力削弱并有求于我，在许多国际事务中不得不与我合作，必然降低其在两岸关系中的影响力。但出于遏阻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美、日对两岸在政治与军事安全层面发展关系保持谨慎与疑虑的态度，其干扰和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企图与能力不容低估。特别是马当局推行“经济依中，安全靠美”的策略，两岸开放政策的广度与深度将受到美、日强力牵制。五是和平发展中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在推动两岸合作交流过程中，双方在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的同时，也将随之衍生一些新问题，需要引起我高度重视，及时评估和妥善处理，否则，将可能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常推进。上述因素都可能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常推进，而且在和平发展的初期甚至中期会一直存在下去，这意味着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各方力量博弈仍然激烈，台湾前途的各种选项仍在“拔河”，决定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然是长期较量、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马英九执政后两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法获得更大突破的情况下，岛内及国际社会对于大陆未来推动和平发展是否有耐心极为关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为和平统一前的历史过渡期，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渐变性的特点，其发展可能呈现出若干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两对不同性质、内涵和不同解决途径的矛盾：一个是大陆希望加快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意愿与台湾民众主体认同之间的矛盾，另一组是我们与“台独”势力之间的矛盾。前一对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沟通交流、谈判协商等途径加以解决，后一对则是对抗性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这两对矛盾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阶段

两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了良好开端，这种发展势头持续一个较长时期，必然会给两岸关系带来结构性变化。目前，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大合作大交流大发展阶段，其影响是深远而多层面的，并呈现双向性特点。所谓深远是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决定着两岸关系的最终走向；所谓多层面是指，从交流内容上可区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安全等多个领域，从影响效果上看呈现出双向性的特点。特别是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大陆官员赴台交流后，不仅带去了大量资金与优惠政策，而且学到了台湾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于两岸双方都是一个互相学习、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既有利于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增进互信，又会给两岸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强烈冲击。同时，大规模的交流也会衍生一些新的问题，产生一些摩擦甚至带来负面影响。

历史实践证明，30 年前中国大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的面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剧变，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积累了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正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立基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之上。同时实践也告诉我们，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乃至和平统一归根到底取决于祖国大陆实力的不断壮大。随着交流往来的不断深入，两岸关系可能会从热络式的大发展进入到一个相对摩擦和“雷区”增多的正常状态。眼下，两岸已经进入到了交流合作、和平竞争、全方位较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岸既合作又竞争、既团结又斗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和平发展的走向，其中阻碍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入的是政治对立，关键在于两岸三方对岛内民心的争取。民意如流水，需要引导和塑造；民心工作重在实效，需要细致耐心的工作。和平发展形势下的两岸竞局已经不再是零和竞局，而是共创双赢的局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着眼于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岛内政局发展的良性互动，重点是让岛内普通民众享受到和平发展“红利”，并转化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突破的驱动力。可以看出，在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正常化后，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再突破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课题。

四、努力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突破

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牢牢把握两岸话语权，扎实有序地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再突破是未来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

一是牢牢把握和平发展话语权。胡总书记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的提出，正如当年邓小平同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革命性地影响着中国发展道路一样，决定性地影响着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这一思想提出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充分展示了我党从全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两岸关系的全新思路，超越了历史恩怨、党派利益和双方固有矛盾，体现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和自信。我们所提倡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要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更要展现中国文化“以民为本”的传统思想，即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两岸同胞谋福祉。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不仅要理解和坚持和平发展思想，更应充实和完善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以牢牢掌控两岸话语权竞争中的主导地位，指引两岸关系向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二是持续推动两岸增进政治互信。两岸政治互信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形成的过程，体现在两岸交流交往的各个层面。互信建立的关键是心态与观念的调整，两岸双方不仅要把为两岸民众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是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因此，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双方必须清醒认识形势，精心应对两岸交流中的每一件事，在交往过程中把握良好心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理性商谈如何共同相处、共创双赢，大陆方面应当通过和平发展让台湾同胞更多地感受到利益与尊严，台湾方面则应在共享和平发展成果的同时，理性看待大陆同胞的诚心与善意，

共同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向深入。

三是共同形塑和平发展历史记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两岸民众增进了解、加深互信、共塑历史记忆的过程。因此，应当理性看待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客观地认识当前两岸关系所处的政治环境，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扎实有序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一方面，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增强自身软、硬实力，以实力凝聚两岸民心；另一方面，要扎实有效地做好工作，既要拿捏好政策力道，又要区分不同对象；既要给予经济支持，又要强化文化认同，使两岸真正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形塑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历史记忆，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两岸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大陆软实力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　崔　萍　金苏源

随着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拓展文化教育交流”，“进一步凝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增强两岸政治互信。”然而，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要达到这些期望，大陆仅依靠发展传统的“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软实力的运用能够提升大陆的综合竞争力和对台湾的吸引力，利于两岸人民思想感情的大融合，亦能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此次，温总理在报告中也较多地凸显了软实力的重要性。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运用软实力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升大陆软实力在发展两岸关系中的重要意义

（一）软实力理论

软实力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1989年的著作《注定领导》（Bound to lead）中提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它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①] 可见，软实力强调行为主体达成预期的“无为”方式，而不是行使暴力和

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 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Vol. 77, Issue 5, 1998, p. 86.

利益引诱。

软实力的提出是相对于传统的硬实力而言的，它涵盖了价值、生活方式等领域，可以说，软实力是行为体具备的一系列无形资产的综合。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更具渗透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

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① 行为体通过运用各项软实力资源，使其政策和行为在他方认为具有合理性时，“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②，软实力就已成功地发生了作用。

软实力发挥效用的一般过程是某一行为体本身具有的实际因素对他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进而左右他者的偏好。然而，产生吸引力的对象有时是对象自身建构而来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它可以是通过预先塑造一种情势，设置议程并限定规则的结果。在价值观多元的现实世界里，真正产生由“仰慕”到“追随”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软实力发挥作用主要的途径就是巧妙地造就情势，微调他者的认同。

（二）大陆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意义

软实力理论问世之后，受到了人们高度关注，同时在政治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各行为体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软实力是行为体实现其利益不可或缺的方式。由于软实力具有“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③ 的能力，因此，如何加强软实力建设，成为各行为体的首要战略目标。

当前，海峡两岸处于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期，各个方面的交流和来往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的蓬勃发展局面。在交往中，由于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两岸对一些事件和问题的看法不相一致，进而可能产生误解。在政治实践中，行为体之间的矛盾较多地来源于彼此间的错误认知。常有的场景是：己方的行动意图经常被他方错误理解，他方基于这种错误理解产生的反

①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11页。

②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 New York：Basic Books，1990：32.

③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应和行动又会导致己方对他方认识的错误。如此发展下去，占据己方和他方之间的就是纷争、冲突。假使己方可以发现自身对他方行为意图的认识不足，或者与他方的真实意图有很大差距，而他方也有产生同样错误的几率，那么错误的决策就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当共有知识[①]在不同的行为体之间形成时，和谐的关系就会出现。

可见，在两岸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加深的同时，“错误知觉”也会伴随其中。如何让台湾同胞能够真正了解大陆的现实，防止和减少两岸“错误知觉”的产生，就有必要借助于软实力的“力量”。

两岸历经了几十年的隔绝，现今两岸“三通”虽已正式启动，经济交流与合作呈现崭新局面，但政治互信依然不足。因此，“增进两岸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大融合，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②] 提上议事日程。有关软实力的理论为促进两岸相互了解，发展海峡两岸关系，处理两岸各项事务，减少两岸误判情况的发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解决方法。加强大陆软实力建设，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大陆软实力的内涵

关于软实力的内容，奈认为主要来源于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然而，软实力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间、空间和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很难归纳出一个普遍性的软实力内涵。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和理论，仅是给出软实力内涵的大致框架，各个行为体可以在结合自身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发展软实力的具体内容。因此，在两岸环境下，对大陆软实力的内容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大陆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吸引力

文化是软实力构成的重要来源，“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

① 按照秦亚青的解释，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这个环境中，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32 页。

② 《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网站，2010 年 3 月 13 日，http：//www. cppcc. gov. cn/page. do.

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的”[①]。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华文化，大陆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除了存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和古迹之外，最重要的是有效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和合”文化，“即一种基于辩证哲学思想的以包容事物差异为前提的注重事物共存与发展的双赢性文化类型”。[②] “和合”文化承认不同事物矛盾的存在，并将各个不同事物放入对立统一的和合体中，求同存异，形成和促进共同发展。“和合”文化的兼容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是大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容和共赢是“和合”文化的两大特点，这些特点在大陆处理两岸事务方面有着显著体现。例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包含着丰富的“和合”文化思想，其内涵就是在包容台湾与大陆制度等差异的基础上，把两岸置于一个和合体中，在和合的过程中寻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现今，在两岸密切往来的时期，我们不仅需要把握中华文化联系两岸的脐带作用，更需要充分发挥大陆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吸引力。

（二）有效稳定的发展模式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自身实际相结合，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大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循序渐进，集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等。这种发展模式促使大陆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道路和模式被评价为“北京共识”，主要特点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逐步推进发展，这种模式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了溢出效应。“政府在国内外的政策是软实力的另一潜在来源……政府的政策可增强或者减损国家的软实力。”[③] 可以说，大陆有效稳定的发展模式是大陆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和提升的坚实基础。

---

① 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国际观察》，200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② 邓遂：《论和合文化及其现实功能》，《兰州学刊》，2008 年第 6 期，第 146 页。

③ 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1－13 页。

（三）务实的战略理念

战略理念是指导发展与前进的方向标，大陆的战略理念对大陆的发展和前进发挥了指导作用，是大陆软实力具有先导性的构成要素。现今，大陆对外推行“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对内则是积极构建“和谐社会”，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大陆发展战略的主线。实现这些战略目标需要一定力量的支撑，对此，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刻把握住了发展的规律，从原先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总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理念为大陆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撑。

（四）规模相当的传媒实力

传媒实力作为一种规模实力，是行为体综合实力的体现。其中，传媒实力的硬件和产业属于综合实力的硬实力部分，而在传媒产业基础上发挥的舆论导向等功能和影响，则是一种软实力。因此，传媒产业的发展状况能够直接影响传媒功能的发挥。在当今社会，传媒作为信息的主要传播载体，日益成为一项影响行为体软实力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大众传媒具有议程设置、观点交流和舆论导向的功能，对内的动员力和对外的影响力是传媒实力的两大体现。因此，传媒的信息活动是行为体软实力的主要表现方式。在两岸的交往中，大陆传媒在塑造良好的大陆形象、真实传递大陆的信息和观念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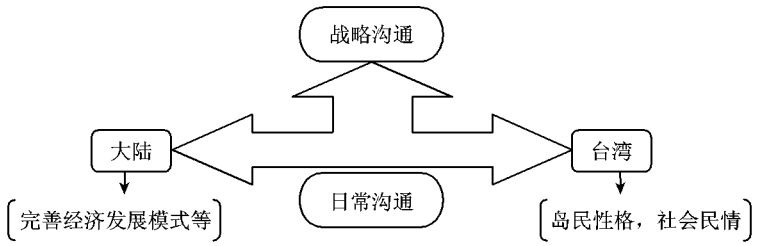
目前，大陆的传媒实力半数以上排名世界前三，分布在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信、电视等各个领域，已形成庞大的整体规模。在此基础上的大陆传媒产业也具有很大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据《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估算，2008 年大陆传媒产业总产值约为 4220.82 亿元，较前一年增长 11.36%。可见，大陆的传媒产业具有可观的发展规模，规模之大是传媒软实力得以提升的基础和保证。

以上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支持，构成了大陆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同时也是我们建设大陆软实力有利的可用资源。我们建设大陆软实力的目标是

塑造良好的大陆形象[①]，增强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并在两岸事务上控制“话语权”以及占领“道德高地”。大陆形象是在海峡两岸长期持续的互动中形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两岸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前进发展，虽然路途艰难，但这能够逐渐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认识。在交往中，由于台湾同胞自身认识的特点和外部力量的干扰，使得他们对祖国大陆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评价。因此，良好的大陆形象对有效展示大陆寻求两岸和平发展的意图，及推进两岸关系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全面加强大陆软实力建设

显然，大陆目前已经具有相当的软实力资源，但是要把这些资源转化提升为强大的软实力还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同时，软实力的建设与双方的联系、沟通、交往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大陆对台软实力的建设贯穿于大陆和台湾交往过程之中。而且，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把工作时刻与台湾独特的岛民性格及社会民情相结合。因此，笔者尝试提出大陆对台软实力建设的路径——“沟通模式”：



我们可以将两岸日常沟通和战略沟通相互交织，同时结合大陆自身建设和台湾社会民情一同构成建设大陆软实力的基本框架。

（一）进一步完善大陆自身建设，巩固大陆软实力的基础

大陆自身的发展能够为增强软实力辐射能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需要及时发现大陆建设过程中的缺失和不足，加强这些方面的改进和完善。主要有：

① 学术界一般将“国际形象”概念用于探讨中国软实力相关问题中，然而根据本文探讨的主题限定，即大陆软实力建设，软实力发挥的对象是台湾，故定义为大陆形象较为贴切。

1. 优化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是软实力的重要构成，优化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软实力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发展模式作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它的完善本身就是大陆软实力的提升；二是完善的发展模式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保证，同时，这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又成为大陆软实力上升的基础。因此，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模式，事关大陆软实力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摸索并开创了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大陆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然而，该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环境污染、地域失衡等问题。避免经济发展中类似问题的出现就需要升级现有的经济模式，令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均衡地发展完善。坚持公平原则，促进大陆各地区平衡发展，实现共同进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和保护等。

2. 努力提高大陆公民对台湾及相关事务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通航等一系列便利条件的达成，两岸交往的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大，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交往结构。对大陆而言，在交往主体扩大的情况下，顺利进行两岸交流、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就需要对公民普及涉台事务的相关知识，避免交往障碍的出现。公民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与其责任意识有紧密的联系，我们进行软实力建设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社会精英的事务，而是整体大陆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公民对涉台事务的认识在发展两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应加大对公民涉台知识普及的力度和广度，极力预防和避免因公民涉台知识不足，而造成两岸沟通出现障碍。大力普及涉台知识，提高大陆公民对涉台事务重要性和政策性的认识，有利于两岸交往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实现。

（二）进行两岸文化战略沟通，建立共同的战略价值观

纵观海峡两岸30年的交往，经济交流一直占着主体地位。两岸文化交流虽然开启了20多年，但与其他领域的交流相比仍显弱势。随着两岸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密切的经济联系将有力推动文化交流的繁荣。大陆日益重视两岸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将成为继经济交流之后另一个影响两岸关系的核心因素，也是增强大陆软实力辐射力的重要因素。

历史资料显示，台湾文化始自大陆的中原文化，但大陆文化在迁徙台湾途中经过了几次嬗变，同时，台湾还受到荷日殖民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两岸

文化有过封闭隔阂的时期，确实造成两岸文化一定的差异性。然而，差异性只在于表现形式的不同，本质上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华文明，这一同根同源的事实不可改变。基于两岸存在这样的文化基础，大陆软实力发展的路径可以着眼于两岸的文化战略沟通，未来建立可供两岸共同使用的战略价值观是两岸融合的关键举措。同时，世界多元文化的现实也促使大陆和台湾以共同的价值观抵御多种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侵袭。

1. 整合两岸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文化核心价值对接

两岸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表现在，一方面大陆和台湾各自拥有相当数量的实体文物。台湾目前公立博物馆有100多家，私立的达上千家，单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就有60多万件文物，而遗址和文物点比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有圆山遗址、大坌坑遗址、十三行遗址等；大陆博物馆的数量在2005年底已达1500多家，遗址和文物点的数量不计其数。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对扩大两岸同胞之间的了解，尤其是加深岛内民众对祖国的认识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双方存在许多重合的文化价值领域。比如两岸可以加强佛教、道教的交流合作，弘扬共同的宗教文化；将两岸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对接，加强对岸少数民族的祖国认同等。

2. 共同对外推广中华文化，致力于中华文化现代化进程

面对文化多元的世界，两岸深度发展文化交流的最终目标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为民族发展提供不断创新的文化底蕴，这是历史赋予两岸同胞的共同使命。共同推广中华文化是两岸互相学习、互相认同的助推力，大陆软实力也得以在此过程充实并发挥影响。

中华文化现代化包括两岸文化生态保护和两岸文化产业建设两部分。两岸只有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并通过产业化路径走向世界，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推广传播。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和文化产业建设密不可分，但他们又是相互独立的系统工程。中华文化的生态保护需要两岸各自对辖区内的文化资源予以保护，并在此基础上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提高文化生态保护水平；产业化水平不高一直制约着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发展，两岸应该有效整合双方资源，利用各自的特色优势携手打造中华文化产业。

台湾长期避免和大陆进行深度的文化合作，因担忧大陆占领台湾的文化市场，进而“干扰”岛内民众的认同意识。所以，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能够给两岸文化交融提供契机，扩大两岸文化交流范围与深度，利于大陆软实力的提升。

（三）建立畅通的日常沟通渠道，增强大陆软实力的投射力

台湾对大陆的认知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如果大陆不主动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任意表达。目前，大陆传媒规模实力居世界第二位。也就是说，大陆可以发挥传媒实力量多的优势，对台湾客观真实地表达自己。

1. 做好大陆良好形象的宣传工作

首先，在大陆本地宣传方面，要明确本地的信息传播不应该仅面向大陆民众，还应该意识到这样的传播会不会对大陆形象有所影响。有一事例，“在英国发生了一系列铁路事故后，英国的媒体讽刺英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一些外国媒体在未解释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就在自己的报道中重复使用这一用语，从而为英国的衰败国家形象添油加醋。”① 因此，我们在对台事务进行媒体宣传时，也要避免宣传途径和用语引发对岸同胞和国际媒体误解的情况发生。

其次，在台湾岛内宣传方面，一要逐渐扩大在台宣传大陆形象的普及率。尤其是台湾南部地区，长期作为绿营的“势力范围”，对大陆存在一定的偏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信息传播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二要降低传播内容的政治性，较多地向岛内民众传递大陆人民的生活场景，增加台湾同胞对大陆民间的了解，同时努力挖掘台湾同胞关注的话题。

2. 全面提高大陆应急反应能力

对大陆来说，两岸和平发展过程中需要应对的突发事件主要是两岸交往中人员安全问题、岛内“独派”分子破坏两岸和平的行为、国际势力干扰两岸事务等。随着大陆和台湾的交融更加密切，发生突发事件的几率也更高。突发事件容易转化为危机，一旦失去控制，带来的不单是经济损失，还会对大陆形象造成很大损害，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加强自身的危机管理能力。

大陆需要及时应对的突发事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事务层面。在两岸交流的具体事务上，应事先考虑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两岸交往事务中涉及的名称、概念、性质等技术性问题，对此制定正确有效的应对措施，充分做好应急准备工作。二是理论层面。理论层面的突发事件是指岛内“独派”和

① 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18 页。

激进派随时可能抛出的不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一系列言论。例如，“新主权观”、“台湾地位未定”等所谓的“台独”理论，以及“大陆威胁说”一类谬论。相比事务层面而言，理论层面出现的突发问题以及应对更加具有战略性。突发事件由于通常无法进行有效的预测，如反应不及时或处理不当，都有可能损害大陆形象，并一定程度上会误导部分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认知。因此，我们对此类突发事件一定要有战略性预测和前瞻性认识，争取话语解释的主动权，对岛内可能出现负面言论的话题提前给予解释，并有效传播到对岸，减少负面理论的产生机会以及避免负面影响的扩大。

（四）了解台湾岛民性格和社会民情，采取有效方式提高大陆软实力的影响力

在讨论大陆软实力建设这个话题中，台湾民众是最终的接受者，因此，软实力建设是否有效部分依赖于受众的吸收和认同程度。我们需要了解台湾的岛民性格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民情，综合对岸的语言、符号、习惯等因素，采取有效实际的方式提高大陆软实力对台湾的影响。

1. 台湾独特的岛民性格会影响大陆软实力的辐射效果

台湾的岛民性格是指台湾岛内普遍的并具有持久性的人格特点和人格类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台湾政治文化的形成，进而影响大陆软实力的投射效果。台湾岛民性格的形成与台湾的地理和历史因素有密切关联的。台湾是祖国东南方的一座岛屿，岛上民众面对的是土地面积小、资源少、人口多的环境，为了生存和发展，岛民一方面积极海外拓展，争取外部资源，一方面对内争夺仅有的土地和水等资源。历史上，台湾先后经历了多个政权、多种文化的统治，每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加上现今台湾还有外劳群体形成的外劳文化等，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浅碟文化。

除了“文化浅碟”之外，这种独特的岛民性格还表现在“政治浅碟”和“经济浅碟”方面。即无论“独派”或统派，其内部都有很多分支，同时各政党和地方派系纵横交错，各自为政，政治短视且缺乏务实政策。以及民众相信“炒作”和“限量”为特征的消费文化，呈现出强烈的“蛋挞效应”[①] 等。

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台湾曾一度出现蛋挞热，一时间很多蛋挞店开张，民众对蛋挞疯狂追随，但等热情过了，蛋挞店又近乎全部消失。台湾把这样或类似的现象称为“蛋挞效应”。

台湾特殊的地域性格在塑造群体政治文化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此文化基础上的岛民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判断能力均处在浅薄的层次，一方面岛民较为缺乏政治主见，另一方面易受媒体言论和党派主张的煽动，集体不理性的情况经常发生。对大陆和两岸事务的看法，岛民也同样会产生一窝蜂地现象，对于岛内独派分子的煽动言论，在岛民一时无法正确辨识情况下，进而对大陆印象可能产生错误的定位。因此，关注和了解台湾岛民性格，有利于我们策略性的对台湾民众传播大陆讯息，扶正岛民对大陆的认识。

2. 深入了解台湾民众生活，丰富两岸交流的“共同话语”

由于地域分离和历史差异，海峡两岸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民情，而大陆软实力的建设和发挥是建立在两岸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因此需要尊重对岸民众生活的现实，才会产生效力。目前，了解台湾民众的生活情况，从社会领域寻找共同话题是加深对岸对大陆良好印象，提升大陆软实力的必要手段。其中手段之一就是加强两岸社会民情的交往，这对加深两岸同胞情谊和增强大陆的亲和力有重要作用。

民情主要是指一个地区民众的生活、风尚、习俗等情况，区别于前述岛民性格等意识因素。一直以来，大陆对台湾的关注重心在于政经文领域，使得社会领域的交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针对台湾民众生活风尚的特点，比如台湾民众对布袋戏的喜爱、对棒球运动的热爱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加强两岸交流往来的切入点，共同举办这类活动，为两岸同胞的情感联系提供有利的平台。同时，“共同话语”的增多益于台湾同胞对大陆认同感的提高，也有助于大陆软实力影响力的增强。

大陆软实力建设所触及的根本是两岸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相处的问题，研究和建设大陆软实力的初衷是完善自身，积极寻求两岸和平发展的新途径。但需要明确的是，软实力从建设到最终发挥实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不能急于求成。同时，要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软实力建设，虽然两岸目前各项交流都呈热络的景象，但是台湾政坛的变故随时会冲击两岸和平发展的状态，因此，我们应着重软实力建设，以期在未来两岸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台湾民众政治认知变化与国家统一动力的重建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陈　星

在对台湾民情和民意的讨论中，台湾民众政治认知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方面。自2008年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以来，台湾民众的政治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认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同时，对两岸关系基本态势的认知也更加趋于理性化。这些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事业的推进来说非常重要。系统讨论台湾民众政治认知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是在新形势下重新构建和加强国家统一动力必须重视的问题。

台湾民众政治认知系统的变化

政治认知系指政治体系内民众对该体系的一般性认识。大致来说，政治认知可以分为价值层面、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三个层次。价值层面的政治认知主要指某一政治系统内的政治价值观，诸如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和对政治基本价值的诠释等；制度层面的政治认知主要指民众对政治制度的基本看法；政策层面的认知则是指民众对政党及其政策以及对政治人物个人形象的基本评价。从稳定性上说，价值系统的认知显然是最为稳定的，制度层面次之，政策层面的认知最为活跃和易变。但是这种情况也并不绝对，有时比较剧烈的、对政策层面政治认知的变化也可以直接导致政治价值观的改变。这种情况在政治局面较不稳定的社会表现较为明显。不过，一般情况下，政策层面的认知变化会或多或少地传导到制度层面和政治价值的认知层面，不过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而已。

自2005年民进党的弊案群东窗事发以来，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特别是2008年二次政党轮替以后，以国民党价值重建和两

岸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中心的政治变迁对台湾民众政治认知造成的冲击尤其明显。

经过马英九两年的执政以后，台湾社会已经接受民生价值高于“台独”意识形态价值的基本诉求。马英九执政以后，首先展示给民众的就是清廉的决心，以及在清廉诉求下对执政团队政治操守的高要求。这与民进党当政时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特别是马重新担任党主席后，力求改变与地方派系结盟的方式，力图利用这个契机实现与“黑金政治”的切割，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动员方式和政党运作模式。这已经让国民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近选举中出现的连败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些选举的失败未必完全是马英九改革的错，但是要说与他的改革没有关系，显然也不客观。不过这些改革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已经说明了改革是大势所趋。

经过了陈水扁执政八年的充分表演，台湾社会的清廉价值已经基本回归。这种情况最起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到台湾政治的发展：（1）引发对什么是“爱台湾”的重新思考；（2）对省籍问题进行重新认知；（3）对政策目标的重新解读，即政策目标应该以什么标准进行衡量；（4）对“清廉”与“本土”关系的重新认知；（5）对两岸关系的可能与必然趋势重新审视等。清廉价值的回归其实破除了民进党以“本土”和“台湾主体意识”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爱台湾”概念的垄断性解释权。如此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所谓“台湾主体性”诉求的意识形态狂热，也给“台独”运动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使台湾社会进一步认清了台湾政治的基本发展方向。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影响政治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政治行为模式。[①] 台湾社会的政治认知在经过了政党轮替以后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台湾的政治发展，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民众对马英九两岸政策的普遍支持态度。

从马英九的角度来说，以下论断是不言自明的：台湾要发展，台湾社会要改变，天天空喊意识形态口号显然是不行的，关键在于要踏踏实实做出成绩，以民生价值为基本出发点，实现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马英九自执政以来，在内政方面屡遭诟病，包括“八八风灾”救灾不力等问题，只要事

① ［英］海伍德著，吴勇等译：《政治学核心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269 页。这也是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政治态度和价值的公民文化分析的主要观点。

情一出来，就被修理得满头包。但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台湾民众始终给予马团队较高评价和较多肯定。这说明，台湾民间对于两岸关系交流和扩大两岸经贸交往其实是欢迎的，台湾民众对于马英九以民生议题为优先发展两岸关系是支持的。而事实也证明，马英九并不像部分台湾媒体所描绘的，是“好人＋笨蛋”型的领导人。经过了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台湾的经济景气状况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升。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最近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台湾总体竞争力名次大幅跃进，从去年的第23名跃升至第8名，创历年最佳，也是受评58个国家和地区中进步最大者，企业竞争力从去年的第22名大幅跃升到第3名，政府效能从第18名进步到第6名，都是历年来的最好表现。

国民党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台湾社会大众，“爱台湾”不只有民进党坚持“台独”意识形态一途，国民党可以创造出另外一种“爱台湾”的方式，就是通过加强两岸联结促进台湾民生福祉的方式。从民进党执政八年一直到现在，民进党的“爱台湾”方式已经被证明是不能长久的。毕竟，大陆的崛起和发展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虽然民进党一直不愿意直面“两岸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问题”的事实，其实在台湾最有内战思维的还是民进党，虽然两岸开放、交流、融合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民进党还是力图遏阻这种融合的速度。在两岸交流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民进党仍旧不断强调对大陆的“心防”，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显然不是一个可长可久的办法。马英九上台以来的台湾竞争力提升说明，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台湾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确处理两岸关系是“爱台湾”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是谁都不能忽视。

国民党在解决台湾经济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台湾民意的变化，对民进党形成了现实的压力。台湾《远见》杂志5月29日的民调显示，58.3%的台湾民众认为民进党应在未来2年内调整大陆政策，比去年年底增加了7个百分点；认为民进党与大陆接触将会使台湾受益者从去年底的49.1%上升到53%。政治认知改变意味着台湾社会价值系统的重新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清廉的价值、发展的价值、和解的价值都已经成为“台湾主体性”和“台湾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台湾未来的发展正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认知的改变是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个过程虽然很慢，但是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

政治认知变化的内外因素

政治认知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政治认知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观念的变化。按照一般的逻辑，观念是镶嵌在环境里面的，与周围环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就政治变化过程[①]的起点来说，观念是影响政治变迁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一定的政策行为只能是在一定的观念结构下形成。正如基欧汉所说，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观念规定着行动可能性的领域。这些观念植根于一种文化的符号之中，并深深地影响着思维模式。[②]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强调了观念对行为的影响，而没有述及行为对观念的影响。事实上，一旦政治变迁过程展开，观念会随着政治实践的推进改变自己的基本样态。台湾民众政治观念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认知的改变，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整体政治形势的影响。政治形势是政治力量及其结构对比的外化形式，反映的是政治力量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的分布情况。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治观念也会相应调整。就台湾而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尤其大。大致来说，影响台湾民众政治认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诸端：（1）中美关系的利益攸关度加强，台湾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视野中逐渐被边缘化；（2）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台独”的梦想越来越遥远。随着大陆的快速发展，遏制“台独”的能力也随之加强，“台独”运动的空间已经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压缩。从长时段的两岸关系发展趋势看看，时间肯定不在“台独”一边。（3）两岸全面整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交流日益扩大，经济和文化整合已经开始，未来两岸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4）在岛内空谈“台独”意识形态只能使台湾浪费太多的发展机会，民生经济议题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议题。台海整体形势的发展已经使越来越的台湾民众不再反对两岸经济交流，也不再反对与大陆交往。

二、政策导向的影响。政策导向主要指行政当局的政策诉求。台湾的政

① 这一过程可包含制度变迁过程、政策变化过程以及政治心理变迁过程等各个不同的方面。

② ［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O. 基欧汉编，刘东国等译：《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 页。

策导向主要有国民党的经济民生导向和民进党的“台独”意识形态导向两个类型。政策导向受到民意的牵制，或者说受到民意结构的影响，但是政策决策对政党和政治人物来说显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执政的政治人物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面向来满足特定支持者的需求。具体而言，民进党执政期间并不是不谈经济，国民党在台上的时候也并不是不谈政治问题，但是从目前两党的政策决策实践来看，政策的诉求显然是不一样的。[①] 不同的政策导向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为民众政治认知产生的改变开辟了空间。在马英九上台前，台湾民众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两岸关系发展到现在的模样，当时对两岸关系发展抱持疑虑的人非常多。及至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渐次出台，台湾民众才真实地看到两岸关系缓和的可能性，政治认知也相应改变，对两岸进一步交流的疑虑相应减少。

三、切身利益的影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切身利益可能是政治观念改变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两岸开放交流后，台湾的企业界获利良多，[②] 台商投资大陆使台湾的企业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有的企业甚至因此起死回生。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台湾普通民众也从两岸交流的扩大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大陆游客赴台带来的消费扩大，台湾农产品销售大陆带来的实质利益增长，都可能使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基本认知发生改变。如果说以前两岸关系不过是台湾民众意识里面的一个抽象概念，那么随着两岸交流的发展，这个概念已经具象化了，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四、两岸政治互动产生的影响。两岸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一个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要想让台湾民众认同两岸和平发展，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困难之根源在于要消除台湾民众对大陆和平发展政策的疑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让台湾民众认识到大陆的发展对台湾而言是机会而不是威胁，要经过长期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互信的培养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岸和平发展首先是“心防”的融化，是两岸心理的融合。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信心来自于两岸互动的进展。自 2008 年以来，事实证明中国大陆所承诺的事项都在逐步实现，例如

① 政策诉求的确定与政党自身的特点有关。在台湾，国民党由于外省族群的身份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原罪感”，以经济民生议题为导向与民进党区隔显然是一个较优的选择。

② 当然，大陆也从台商投资中获益很多，诸如改革开放初期的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

大陆一系列对台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台湾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取得的进展等，均说明在两岸协商的情况下，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片面炒作两岸关系于事无补，只要是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坐下来认真去谈，认真思考解决之道。

当然，影响台湾民众政治认知的因素不止上列诸项，本文仅就主要的方面进行简单的描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政治认知的变化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说，政治认知包含有想象的成分和先入为主的特点，即一旦政治认知形成，要想改变殊为不易。在影响政治认知变化的诸因素中，有些是直接的，如经济利益的影响，有些是间接的，如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但是这两者未必在所有时候都是一致的，在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出现背离的现象。例如，台湾部分民众虽然从两岸交流中获得了利益，但是对大陆的“心防”却依然存在，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也就是说，在两岸关系认知方面，利益观虽然有所改变，但是政治观却没有一时难以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需要时间进行化解，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消融两岸心结，需要长期的工作和耐心的疏导。

政治认知变化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动力重建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①] 争取台湾民众的支持是实现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关键所在，立基于台湾民众政治认知变化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国家统一的动力，是实现两岸和平发展，推动国家走向统一的重要途径。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以下事实在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中逐渐被接受：（1）大陆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趋势；（2）台湾的发展离不开两岸关系的恰当处理；（3）中国大陆和平发展是长期与稳定的政策；（4）在两岸和平发展的背景下，经过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问题可以得到逐一解决等。这些政治认知的改变对台湾政局

① 相关内容见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的四点意见之第三点，“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及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明显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台湾已经很少有人再单纯反对扩大两岸经贸交流规模。即使民进党和“台联党”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大陆影响力增加和两岸经济联结加强等是泛绿阵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民进党的执政县市长已经有多人登陆推销执政县市的农产品，更说明民进党已经务实地认识到两岸关系的大势所趋。

重建国家统一动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和平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可以说，国家统一的逻辑起点和基本的价值诉求并没有改变，都是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福祉，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不同的是，国家统一不再诉诸战争的手段，而是主要诉诸和平统一，诉诸于两岸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从顺序上说，内战时期的两岸统一问题是要先解放台湾然后再开始国内的经济建设，而现在的顺序则是在进行建设的同时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的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国家的发展则成为和平统一的重要手段。所以，国家统一动力的构建在和平发展时期与战争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重建国家统一动力的核心内容是：循序渐进，构建统一的需求。两岸人民的支持是国家统一的动力源，所以，和平发展时期国家统一动力重建的重要工作在于在两岸人民中间创造出统一的需求。从目前情况来看，统一的需求存在于两岸经济发展、社会整合等各个层次。但是这种需求在不同的时期和两岸关系的不同阶段强度是不一样的，应该说，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展，两岸民众统一的需求会逐步增强。

这里需要强调的问题有两点：（1）国家统一动力的重建着眼于两岸关系由内战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这一基本事实。[①] 所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已经是作为前提和预设而存在的，不需要特别说明；（2）所谓的“国家统一动力重建”，主要是着眼于内战状态的国家统一模式与和平时期的国家统一模式的差异，因此对于国家统一动力的类型必须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对各种不同状况下的国家统一动力进行深刻的考察，着眼于构建和增强和平发展情境下国家统一动力问题。

统一需求构建的过程其实也是消解“台独”势力和“台独”运动的过程。这与重新构建和强化国家统一动力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构建统一需求的

① 从法律状态上结束内战关系是另外一个问题，和本文所说的“两岸和平状态”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到目前为止，两岸并没有在法律关系上正式结束两岸内战状态。

过程内蕴地包含着以下内容：消解两岸由于内战状态和部分政客刻意操作形成的敌意；强化两岸合作，在合作中建立对彼此的基本信任；通过制度化过程，建立两岸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框架；以统一促进发展已经成为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的普遍认知等。

统一动力的重建还在于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目标。价值目标分为不同的层次，较高层次的如人文关怀、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等，较低的层次如对民生福祉的关注等。目前由于两岸关系的特征，双方在较低的价值上面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两岸关系当中，民生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不能舍弃的方面。在台湾，无论是泛蓝还是泛绿都无法否认这一价值诉求。所以说，两岸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价值诉求的一致，祖国大陆的和平发展为台湾人民所接受，就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较高层面的价值目标需要长期的历史演变才能达成，但是较低层面的价值目标达成已经为较高目标价值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基础。

统一动力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摸索出两岸人民都可以接受的统一路径。在和平发展的语境下面，两岸统一大致是沿着“交流→发展→整合”的路径向前推进。可以看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两岸统一的路径其实是开放的。国家统一路径本身就是在发展中自然生长出的制度性结果。在这个路径的形成过程中，其实还包含着这样的基本路径样态：“两岸关系变迁→台湾民众政治认知改变→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台湾民众政治认知改变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的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与变迁的方向并不都是正向的，有时也可能出现负向运动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和两岸整合的加强，两岸关系走向正向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台湾民众政治认知的变化对重建和加强国家统一动力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事实上，这也可以认为是国家统一动力重建进入加速阶段的表现。毕竟，两岸之间，人民最大，一旦民众认清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质，认清了国家统一是两岸人民发展的必由之路，认清了国家统一是难以阻挡的趋势，对统一的要求自然会加强，国家统一的动力自然会得到强化，国家统一也就水到渠成了。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刍议

全国台湾研究会　郑庆勇

2008 年 5 月以来，在两岸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之间实现了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两岸关系呈现出 60 年来未曾有过的良好发展势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顺利开局与两年来所取得成绩，为两岸民众及国际社会所称道，可以说，两岸关系真正步入了和平发展轨道，进入了和平发展期。为此，两岸应该抓住机遇，总结成功实践经验，不断充实和平发展内涵，采取更积极有力举措，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持续和平发展。

一、两岸领导人新思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基础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2007 年中共十七大后，对对台政策实施了重大战略调整，逐渐形成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政策基石，以和平发展为主轴，以共创双赢为目标的新时期对台政策。而国民党在重新执政后，面对大陆的崛起，为兑现竞选承诺，提振台湾经济，改变了过去与大陆敌对和对抗的思维，调整了其大陆政策。马英九上任之后，明确表示，海峡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种特别的关系”，[①] 在政治上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在两岸关系上强调“不统、不独、不武”；在对外关系上推行“活路外交”，主张两岸“外交休兵”，不进行恶性竞争；对内则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优先。两岸领导人的新思维和新观念体现在两岸关系及相关政策上，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敌对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而形成了以“搁置争议”、

① 马英九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系集团董事长巴斯克斯的专访。台湾“中央社”，2008 年 8 月 26 日。

“共创双赢”的新思维、新观念。在这样的新思维与新观念指引下，两岸关系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取得重大进展。事实表明，今天的两岸关系与过往相比，具有如下重大不同特点：

一是两岸执政党建立了对话机制与交流平台。国共两党之间不再相互敌对，执政党领袖实现了正式会晤，最高领导层之间多次晤谈会商，已经形成有效合作互动机制。两党达成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五点共同愿景，以及通过举办“国共论坛”形成的共识正作为具体政策目标加以落实，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两会”建立了制度化协商机制。两年来，两岸行政当局透过海协会及海基会，进行了四次“陈江会”，达成涉及航空、旅游、劳务、金融、司法等诸多领域共 12 项协议和 2 项共识，两岸全面、直接、双向大“三通”得以实现。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三是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日趋明显。在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马英九当局为提振台湾经济，对束缚两岸经济往来的政策法规进行了调整，采取措施扩大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开放陆资入岛，使两岸经济由单向投资发展至双向往来，成为双方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在推动即将商签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过程中，大陆充分照顾台湾利益，多次表达让利于台湾，积极争取协议早日顺利签署。ECFA 的商签将更有利于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并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四是两岸社会一体化进程加快。随着两岸经贸、文化、教育、人员往来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两岸交流的层级与质量越来越高，两岸互动的制度化保障越来越强，尤其是两岸民间交流蓬勃展开，更提升了两岸的社会一体化程度。据统计，2009 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 540 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大陆方面赴台人数超过 93 万人次，是 2008 年的 3.4 倍[①]，这种大范围、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有利于构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有力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五是两岸之间的包容性和互信程度大为提升。两岸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建立互信，使得妥善解决台湾“国际空

① 《国台办主任王毅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2010 年 1 月 24 日。http：//www. gwytb. gov. cn/zyjh/zyjh0. asp? zyjh_ m_ id = 1934

间”问题成为可能。两岸60年来首次在国际领域实现了“外交休兵”，台湾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人选问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两次代表台湾当局参加APEC会议，并与胡锦涛主席会面。同时，台湾也实现了期盼已久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WHA）的愿望。

两年来的实践证明，两岸领导人已经彻底转换思维观念，两岸领导人的新思维、新观念已成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指路明灯，未来，也必将贯穿在漫长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内。

二、厚植共同利益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目标

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中明确指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有责任把她维护好、建设好。”还指出，“通过交流合作增进感情融合、增加共同利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两岸共同构建，两岸的共同家园，需要两岸执政当局和两岸民众共同努力，共同缔造。厚植共同利益，培育主流社会新的情感认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内的重要阶段性目标。

首先是厚植两岸的共同利益。经济是整合的重要基础，两岸融合，关键因素是经济。台湾民众长期以来对统一有疑虑，主要原因就在于台湾经济发展水准高于大陆，担心统一后，生活水平下降。但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惊人，总体经济实力高居世界前茅，并且有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发展后劲，尤其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挥之不去的情况下，大陆已成为带领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而台湾由于自身的种种限制，导致近10年来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从此次针对ECFA展开的“双英辩”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马英九提出的“走进大陆，再走向世界”，还是蔡英文提出的“走向世界，然后与世界一起走进大陆”理念，他们主观上深知，台湾经济要想永续发展，必须与世界经济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大陆是这个体系重要成员。台湾没有逃避全球化的本钱，开放、竞争、优势才是台湾发展之道。客观上，台湾若不与大陆签署ECFA，原向台湾采购者会移到有优惠的地区采购，在台湾的厂商会被逼着到有关税优惠的地区投资，势必会造成台湾外销市场流

失、厂商外移、失业增加、经济衰退等困境。因此，与大陆商签最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 ECFA，为台湾企业和人民建立完善的经营环境，才能为台湾开创黄金 10 年，这是台湾经济永续发展之道，也是爱台湾的具体表现。台湾利用两岸经济的高度互补，以其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的优势，相互协同，共同发展，可以与大陆形成广泛的共同利益体。如果仅从市场、资金、游客的角度看待两岸合作，单方面要求大陆更多优惠、让利，台湾经济要根本转变则很难。

在厚植两岸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外，还需培植共同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等，才能逐步构建共同家园。

其次是培育主流社会新的情感认同。两岸之间互利容易，交心难。随着两岸交流越来越紧密，两岸民众间心里鸿沟仍然很深。造成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敌意与疑虑的原因，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两蒋时期的反共教育，恐共心理；二是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去中国化”和对大陆的片面宣传，误导台湾民众；三是大陆快速崛起，台湾经济优势丧失，两岸形势发生彼消我长，引起的恐惧感和不信任；四是自持拥有优于大陆的“软实力”，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阻挡两岸交流和情感融合。改变台湾民众这些旧观念、旧思维，特别是构建新的情感认同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两岸执政当局及全体民众的长期共同努力。建构两岸新认同，要将两岸关系建立在两岸同胞共同需求的物质与精神上，避免把两岸关系过于物质化。“两岸关系物质化”固然有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但是并不必然能够加强两岸的认同巩固，有时可能反而会更加深两岸的认同分歧。[①] 因此，特别需要在文化、教育、人员往来方面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内涵，加大力度予以推动。

总之，两岸融合需要经济、文化、观念的滋养，需要理解和包容，需要环境和时间来培育。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岛内影响日益增强

随着国民党的重新执政，两岸达成了一系列涉及经贸、文化、教育、金

① 张亚中《马英九从一中各表转向淡化一中》。中评社 2009 年 2 月 9 日。

融、人员交流等多方面的协议和共识，使得两岸的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历史潮流，不可阻挡，随之而来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岛内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1.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大成绩亮点。马英九上台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台湾经济低迷不前，失业率高居不下，尤其受“八八水灾”和“美牛风波”影响，使其连连失分，质疑执政能力的声音不绝于耳，民调一路下滑。据《联合报》资料显示，马英九担任台湾当局领导人以来，声望由就职初期的66%好评一路下滑，2009年执政周年时虽回升至52%，但在“八八水灾”后，满意度重挫至29%，此后一直维持在30%左右的低迷水准；在当选两周年前夕，马英九声望未见起色，好评更降至27%新低点。但在4月底针对ECFA举办的“双英辩”后，虽然不满意马英九施政的人还是居多，不过，好评上升到38%[①]，是近一年来最高点。究其原因在于，通过ECFA辩论，人们对ECFA商签后台湾经济好转更充满信心，对两岸关系更有期待。

2. 民进党也难以回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民进党长期以来坚持的“台独”分裂路线，使其在两岸关系方面没有话语权，只能一味地为反对而反对。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入，两岸关系涉及台湾的生存命脉发展，如何处理是民进党不能回避的问题，终需严肃面对。蔡英文当选党主席后，对民进党僵化的两岸路线不得不反思，主导提出了“十年政纲”，表示在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下，为未来两岸关系预留两岸协商空间。虽然民进党内部对此意见不一，更多解读有为年底“五都选举”，甚或2012“大选”铺路，以争取中间选民的目的。但处理不好两岸关系，必将影响其未来的发展，民进党就不可能成为让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所信任与放心的政党。

3.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湾主流民意的选择。在台湾的选举文化中，民意的变化影响着蓝、绿双方的政策主张，虽说民意如流水，但民意的重要性和可变性不容忽视。从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中，可以看出，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岛内民意密切相关。一方面，可以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台湾主流民意的选择。马英九在竞选的时候，明确阐述了两岸和解的政策，

① 中新网，2010年6月10。http：//www.chinanews.com.cn/tw/tw-twyw/news/2010/05-19/2290463.shtml

最后民意选择了他。马英九上台之后实践承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快轨道。另一方面，大陆因素对台湾民意的影响非常大，不可或缺。大陆政策如果得到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两岸关系发展就能进入顺境。反之，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寸步难行。第三，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也将会引导台湾主流民意的变化。随着两岸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特别是两岸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让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中南部民众和中小企业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获益，让民众感受到因两岸和平发展而更加自豪。届时台湾的民意变化，恐怕不是一点点，可能是翻天覆地的不同。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当前两岸关系中几个关键词之解读

全国台湾研究会　高　琛

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与进展以来，有许多既亲切又熟悉的关键词跃入人们的眼帘，这些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关键词吸引了全球华人期盼已久的目光，代表了两岸人民发自肺腑的呼唤，诠释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与未来，点燃了两岸人民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荡漾激情。在此，笔者选择其中的几个关键词予以解读。

一、“炎黄子孙”、“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

在广阔富饶的中华疆域，无论是东北的黑土地还是西南的雪域高原，无论是西北的天山草原还是东南的沿海岛屿，处处都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繁衍生息，他们虽然语言不同、传统各异，却同属一个大家庭，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华民族。

1. 两岸人民同是“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并非只是几个简单的文字符号，它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承载着中华各族人民厚重沧桑的历史，传承着中华各族人民绚丽多彩的文化，代表着中华大家庭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之情，它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无法抹去的符号象征。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今天，“炎黄子孙”这4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文字，再次被赋予了更新的时代内涵。每当人们谈到两岸关系时，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寓意着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各族人民，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关系。

不论就血缘、地域还是历史、文化而言，台湾人无疑就是中国人。但由于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特殊的历史经历使相当一部分台湾人在两岸统一问

题上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他们对大陆存有某种复杂的情感和矛盾的心理。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和它的家园曾多次遭受过外国列强的侵略与欺凌，香港、澳门和台湾更是被外国殖民者强行长期霸占。1895 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并强行侵占台湾 50 余年。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大陆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致使千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但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也得以重回祖国怀抱。如今，香港、澳门都已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而台湾却因“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与大陆对峙了几十年。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李登辉、陈水扁推行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一边一国”等“台独”政策，更使两岸之间形势严峻、危机重重，严重威胁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尽管两岸关系曾几度出现过对峙、波折与危机，但两岸人民之间血浓于水的兄弟姐妹之情却从来没有被阻断过。他们渴望相互交往，共同建设好自己的美丽家园。无论何时，只要谈到两岸关系，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两岸同胞息息相关”。

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多次提到，要把台湾同胞当成是骨肉兄弟和发展两岸关系、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把最大限度地为两岸同胞谋和平、谋福祉作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宿”，把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在谈到部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和疑虑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对于部分台湾同胞由于各种原因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对发展两岸关系持有疑虑，我们不仅愿意以最大的包容和耐心加以化解和疏导，而且愿意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增进福祉。对于那些曾经主张过、从事过、追随过“台独”的人，我们也热诚欢迎他们回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①]

2010 年元旦，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以“改革、奋斗、台湾再起”为题，发表 5000 多字的元旦祝辞。在两岸关系上，马英九希望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他表示期盼“营造和平环境，深化两

①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2009 年 1 月 1 日 02 版）。

岸交往”。他认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但两岸分隔60年，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确实需要一段长时间交往，相互了解。”2010年3月23日，马英九在回答中评社记者提问有关温总理的“让利说”和“两岸是兄弟”时再次表示，“两岸人民都属于中华民族，这是我们一贯的看法，而且这也是事实。”据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在上任两周年记者会上希望“在中华民族智慧的导引下，让同样是炎黄子孙的两岸人民寻求两岸问题的解决方案。”① 马英九强调“两岸人民都属于中华民族，同样是炎黄子孙”，代表了台湾方面认同两岸人民是同胞、是兄弟的手足关系，我们对此感到亲切和欣慰。

2. 两岸人民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② 胡总书记的这段讲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和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所倾注的满腔亲情与深切关怀，是代表13亿大陆同胞向台湾同胞做出的庄严承诺，是对台湾同胞最大的理解与信赖。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意义深远，是对过去两岸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关系进行的高度概括和肯定。它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超越两岸在历史形成的政治对立、社会差异和治理体系的矛盾，希望通过两岸民众共同生活的经历，消弭两岸之间各族群差异和矛盾，通过共同社会生活来增进共同的情感和共同记忆，从而奠定两岸之间的集体认同。

两岸在中华民族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所经历的发展道路不同，但都有各自的可贵之处，彼此都应肯定、欣赏对方的经验和成就。两岸同胞是兄弟姐妹，理应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理应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交往，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理应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携手并肩继续拓展领域、提高层次，培育共同的经济利益，增强共同的中华文化纽带，使彼此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不断推进两岸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① 新华网：2010年3月24日消息。

②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近年来，在两岸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大陆与台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客货运包机、两岸人民往来观光、共同打击犯罪、货币清算、金融监理、两岸“三通”、农业合作、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完成多项实质性协议，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使彼此感情更加融洽、合作更加深化，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两岸关系的曲折历程不断说明，两岸分则两害、合则两利。共同的血脉、文化，共同的两岸关系前途，共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把两岸同胞紧紧地连在一起。

3. “和平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渐进过程

近年来，祖国大陆以民为本、和平发展、共创双赢的对台务实政策和所展现出的高度诚意与善意，以及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坚持落实国共两党所达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在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与大陆一同打开了两岸关系的僵局。可以说，两岸双方的共同努力使得两岸关系在短短两年之内取得空前的突破，在过去两年所取得的进展超过了过去的 60 年，两岸关系持续的改善和发展，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两岸关系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改变。目前的两岸关系已由对抗走向和解，由濒临战争边缘走向和平发展，由民间、间接、单向、局部的交流走向准官方、直接、双向、全面的交流。

随着中断近 10 年之久的两岸两会制度化协商谈判的恢复，两岸“三通”达成，四次“陈江会”举行和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的签订，以及两岸关系在经贸、人员往来和金融合作等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ECFA）签订，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正在迈向正常化、机制化、制度化。一种互利共赢、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正在形成，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共识下稳健向前迈进。

毋庸讳言，两岸关系现状的改善与发展，仅仅是和平发展进程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和平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方位的渐进过程。笔者认为，目前两岸只是在和平发展大框架下的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部分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并未触及诸如政治、军事、外交等敏感领域。大陆虽然多次向台湾表示与其就上述领域进行政治对话、务实探讨的诚意，但台湾方面迟迟未做反应。台湾方面应当认识到与大陆只在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部分领域发展关系是有局限性的，就像是一个人用单腿走路一样，既不能确保平衡也无法走的快或跑起来，因此，两岸只有推动全方位的和平发展，才能根本解决上述问题。

然而，两岸在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对话与谈判，将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两岸关系错综复杂，内外因素兼具，因此两岸关系全方位的和平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我们应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智的心态客观面对。对此，两岸双方既要积极面对、又要有足够耐心，既要看近、也要看远，既要求同、也要存异。只要双方都牢牢把握和平发展的主题，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循序渐进，就会逐步建立互信、减少误解、达成谅解、形成共识、消除怀疑与隔阂。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全面发展，必然促进两岸相互之间的全面了解与理解，降低乃至转变敌意与排斥、增进好感、建立情感，进而做到同舟共济、摒弃前嫌、相互扶持、共创双赢。

二、“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与“政治互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从1949年至今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任何“台独”势力和国际上支持“台独”的势力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1. “一中原则”是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的有力武器，是维护两岸关系基本稳定的要件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我们对台方针政策的基石，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的有力武器，是维护两岸关系基本稳定的要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十七大报告对两岸协商谈判提出了具有意义深远的重要主张：“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这是我们党关于两岸协商谈判主张的新发展，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的规划。两岸双方只有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对话，并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两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的办法，才能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

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马当局虽然在改善两岸关系，提升台湾经济的竞

争力等方面得到了岛内民意的肯定，但岛内形势复杂多变。一方面，马当局在处置台湾“八八水灾”不当，以及在几次选举中的连连失利等，使马当局在施政方面承受着极大压力。另一方面，民进党及其“台独”势力顽固地坚持其“台独”纲领，他们逢中必反，制造各种危言耸听的政治谣言，制造岛内社会恐慌，他们坚决反对和抵制两岸签署 ECFA，鼓吹马英九当局的两岸政策“过于倾中”，叫嚣台湾会在两岸日益密切的交流往来中被“出卖”，提出只有“台湾独立”才是“台湾前途的唯一出路”。致使岛内相当部分民众对大陆推动和平发展“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诚意存有疑虑，担心两岸的综合实力的差距将越拉越大，担心大陆会“并吞”台湾，担心来自大陆的“武力威胁”。岛内先后披露的一些民调结果也印证和反映了部分民众面对岛内形势的不安和不满情绪，甚至一度出现“统消独长”的反常现象。因此，“台独”势力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两岸关系发展不能忽视的隐忧，如果“台独”势力东山再起，将会导致两岸关系再次紧张。在国际方面，美、日“以台制华”战略的破坏力也不可低估。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政治谈判的基础。台湾任何政党，只有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双方才能更好地协商与合作。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两岸协商谈判，关系到两岸关系的性质和前途，也关系到协商谈判最终能否取得成果。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保障和促进两岸关系全方位的和平发展。

2. “九二共识”是两岸谈判的对话基础

两岸关系虽已走出僵局，取得空前进展，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仍然存在。两岸在诸如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两岸结束军事对峙以及和平协议等一些重大敏感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两岸之间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知分歧与主张差异，甚至存在重大矛盾分歧，若处理不好，将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甚至延缓和平发展进程。

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在马英九上任届满两周年之际，台湾民众为马当局两年来的施政表现打出了 58 分的分数，使马声望回升至近一年最高点，其中稳定两岸关系是马当局最获民众好评的施政。岛内主流民意支持两岸关系持续改善，为未来开启政治谈判累积了一定的民意基础。马英九在 2010 年 5 月 19 日记者会上谈及两岸关系时表示，“以海峡两岸于 1992 年所达成的‘九二共识’为基础，展开两岸的关系，我们先推动和解，

再走向合作，最后建立和平。”马英九还表示，“这不是短程可以达到的目标，也不是立刻就要解决，我们能够把这问题一步一步找到解决的方案，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①

马英九关于先推动和解，再走向合作，最后建立和平的意愿值得肯定，但关键在于行动。从其就职两周年发表的关于“六国论”演说中我们不难看出，马英九所谓的“创新强国”、“文化兴国”、“环保救国”、“宪政固国”、“福利安国”和“和平护国”主张，似乎在刻意回避最重要的两岸关系。马英九一方面想透过改善两岸关系来实质性地提升台湾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分强调两岸关系的密切化，容易引发台湾社会对马英九维护“主权”的疑虑，因此刻意将两岸关系淡化在其“六国论”里。其实，谈经济的“创新强国”、涉及认同的“文化兴国”、关乎台湾地位的“宪政固国”，以及与军事安全有直接关系的“和平护国”都离不开两岸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他希望“在中华民国宪法及九二共识前提下，坚持不统不独不武，在保证不伤及台湾主权与尊严之下，和平建立台海秩序”② 显然只是站在台湾一方的角度谈问题，没有顾及大陆方面的立场。马英九“六国论”中的国，显然是指“中华民国”，而这正是两岸未来政治谈判的焦点所在，说明两岸关系中的最大难题仍然是认同问题。

笔者认为，我们讲“九二共识”没有等同“一中各表”，至于如何在今后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达成“一中共表”或“共表一中”，需要双方在政治对话与谈判中解决。“九二共识”的根本意义在于双方都承认同属一个中国，有此共识就奠定了双方政治对话与谈判的基础，双方在此基础上应尽快开展政治对话与谈判。

3. “政治互信”是确保两岸关系稳定地、全方位地持续和平发展的关键

两岸关系是否稳定地、全方位地持续和平发展，“政治互信”是关键。双方确立了“政治互信”，就确保了两岸关系稳定和全方位持续和平发展的常态化。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两岸目前政治接触仍处在艰难的“准官方阶段”，涉及两岸关系中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地议题至今仍处在冰冻期。大陆方面已多次向台湾方面表达了积极诚恳的态度，并不断务

① 《侨报网讯》：2010 年 5 月 19 日消息。

② 中国时报：2010 年 5 月 20 日消息。

实地为两岸政治对话创造条件，何时才能解冻，要看台湾方面的诚意与行动。希望台湾方面积极行动起来，尽快与大陆进行政治接触，开展政治对话，使双方的政治接触官方化、常态化、机制化，在解决具体问题中逐步积累和建立政治互信，为今后的政治谈判与和平协议开辟最佳途径。

大陆前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对开启两岸政治谈判始终持积极态度。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就“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政治关系问题、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进行务实探讨”的提议，进一步表明大陆方面为实质性地推进两岸和平发展所传递的善意与诚意。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不要错过这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为台湾人民、为两岸和平、为中华民族、为共同推进两岸和平发展与大陆握手言和，共同就解决两岸政治、军事、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和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展开政治对话、进行务实探讨。

2010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应邀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台湾各界人士时强调：“要继续增进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力；要继续扩大两岸各界交流，不断激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命力；要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不断提高两岸经济的竞争力；要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①]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岸关系的“四个继续”、“四个不断”的讲话，指出了近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工作的重点。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继续密切两岸经贸金融交往，加强两岸民众和社会各界交流，共同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进一步凝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识。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① 两岸关系：2010年5月（总第155期）

选举压力下的国民党改革

浙江台湾研究会　周丽华　陈凌雄

马英九重掌党主席之后，再次提出“端正选风、强化基层组织、培养青年人才、党产处理”[①] 等改革目标，以期通过改革为百年老党注入新鲜活力，促使国民党转型成为选举机器，以崭新面貌获得民众支持。但改革触动了部分既得利益者，引发党内反弹，使得国民党从2009年云林县“立委”补选开始，遭遇了执政后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反过来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面对年底“五都选举”输不起的压力，国民党调整了改革策略并放缓了改革节奏，应对年底“五都选举”产生正面影响。

一、国民党改革存在的问题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先后进行了五次“立委”补选和一次“三合一选举”，接连遭遇选举失败，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国民党改革存在的问题，显示过去一年多来，国民党改革方式过于简单，方向未能深入人心，尤其是对地方派系的改革和精简人事的做法脱离实际，遭致了地方势力的反弹和基层党工的不满。

（一）对地方派系改革遭遇挫折

在过去长期执政中，国民党利用地方势力维系其执政根基，地方势力则运用政商关系垄断地方资源，产生了严重的“黑金”问题。马英九希望通

① 根据马英九就任国民党主席就职演说内容整理归纳五大改革内容：一是端正选风，做到选举不买票，提名清廉、正派、能干之人，以干净选风打造国民党正派、清廉的形象；二是强化基层组织，扩大执政基础，鼓励地方派系在民主机制下良性竞争并进步转型，成为台湾建设性的草根力量；三是积极培养青年人才，增强党的肌体和力量；四是尽速处理党产，提出党产处理的最终方案；五是加强与在野党的对话沟通，增进朝野互信。

过改革重新整合地方派系，改变地方生态，逐渐摆脱地方派系的纠缠。实际操作中以“排黑条款”排除涉及黑金的国民党人参选公职，甚至放言“宁败毋滥”，提名时排斥形象欠佳的地方实力派，不愿用实质利益换取地方派系的支持，希望以此宣示与派系划清界限。但这种做法导致地方势力强烈反弹，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经历挫折后，国民党一方面高喊“拒绝派系”，另一方面又被迫衡量现实选票压力，放弃坚持，向派系妥协。“三合一选举”时，国民党在云林县提名云林最大派系“张派”的张丽善，张丽善最后退出竞选，国民党才征召云林科技大学教师吴威志，前后矛盾的提名标准凸显了国民党对待基层派系时的犹豫与妥协。又如台东县长邝丽贞任内所作所为充满争议，未能获得国民党提名竞选连任县长，但被提名参加“立委”补选，被外界视为利益交换。新竹“立委”补选时，国民党提名在“三合一选举”中公然与党决裂的前县长郑永金的胞弟郑永堂，明显又是出于平衡派系利益的考虑。新竹县长提名落下国民党分裂后遗症，“立委”补选时，马英九亲自出面请邱镜淳、张碧琴和郑永金围炉餐叙，邱、张两人握手言和，共同宣布撤回“三合一选举”时向对方的诉讼。但郑永金当年获得15万票，当选新竹县长，其胞弟郑永堂参加“立委”补选却只获得5万多票，输给对手，10万选票的落差说明裂痕远未弥补。

国民党在派系改革方面所出现的前后不一、进退失据的矛盾做法，不仅影响改革的成效、削弱中央权威，也削弱了进一步改革的信心。

（二）精简人事缺少配套措施

国民党现有党职员工及支领月退休金或优惠存款补贴利息的离退党工2000多人，每年人事费高达新台币15亿元。臃肿的机构和人浮于事的沉疴，无法推动党务和选务的高效运转，又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马英九提出机构精减的改革措施，希望透过精简组织和人事将国民党转型成为兼具效率和战斗力的选举机器，这也是金溥聪接任国民党秘书长的主要任务之一。金溥聪曾试图仿效企业管理的模式对国民党的人力资源进行规划重整，培养提拔优秀青年，担任基层党工，通过基层民代选举的锤炼，培养人才。然而，此项改革措施却饱受党内同志的质疑。

人和机构向来是敏感复杂的核心部分。国民党的机构改革、人事精简工程浩大，涉及一大批多年为国民党打拼、在基层服务的党工。如何照顾他们的利益、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是国民党成功转型的关键。然而国民党既没

有提出振奋人心的政治理念，号召广大党员参与改革，又缺少配套措施让基层党工获得利益补偿，只想通过简单的考评与盘点，汰弱换强，只会引起基层党工的强烈不满，削弱国民党传统的组织动员能力。而且，在新的以理念价值为核心的志愿者动员模式尚未真正建立之前，贸然对党工进行过多的淘汰和对派系进行过早过急的切割，不仅无法顺利实施机构人员精减，反而会阻碍国民党整体改革的进程。

（三）清理党产初见成效，财务压力不容忽视

国民党党产取得有很大的不正当性，虽有历史成因，却也广为社会各界诟病，成为选举时被民进党攻击的有力武器。2000 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后，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试图减少党产问题的负面影响。马英九再次担任党主席后，提出了“党产归零”的具体目标。2009 年 12 月 30 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党营事业最终处理方案”，宣示今年 6 月底前完成中央投资公司公开标售，“正式告别党营事业历史包袱”①，彻底解决党产问题。一方面，党产对国民党的形象伤害极大，影响选票；另一方面，巨额党产既是党务经费的主要来源，更是选举经费的重要保证，党营事业也是政治酬庸的重要去处。“党产出清”后，国民党甩掉了包袱，却失去了正常的经费来源，如何支付庞大的人事开支，是国民党中央面临的严峻考验，存在严重的后遗症。

（四）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缺乏沟通、党意与民意脱节

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原有一个沟通平台②，成立于 2005 年马英九任国民党主席后，由国民党党中央与党籍县市长轮流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举办协调会议。会上，各县市长提出地方施政报告或由党中央提出政策议题，集思广益，共同讨论，形成共识，此一机制为失去政权的国民党提供了凝聚党籍县市长力量的舞台，有利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有利于掌握地方政情民意的脉动，为国民党巩固地方实力、重新执政积蓄了能量。然而，这一机制在国民党重新上台半年后停摆，代之以中常会、中山会报等沟通平台，从而产生行政与“立法”的隔阂、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疏离、党籍“立委”不

① 《党产处理案出炉 马英九启动国民党再造》台湾《中央社》电 2009 年 12 月 30 日。

② 刘东皋：《行政院会应向县市长开门》台湾《新新闻》周刊第 1196 期（2010 年 2 月 4 日－10 日）。

为党的政策背书、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怪现象，拉大了党意与民意之间的距离。由于缺少沟通环节，导致有些政策出台伊始便饱受民众批评，甚至在民意压力下荒腔走板或朝令夕改，损害了国民党和执政当局的形象。

（五）缺少大局意识，个别政务官失言惹风波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行政与党的重点工作脱节，多名政务官员失言惹出风波，既不能为党加油补气，反而损害党的形象。如“立委”补选和“三合一选举”期间，党务人员全力辅选之际，行政部门却在投票前一日宣布调涨油价、气价；又如“美牛事件”中，蓝营地方县市首长相继大动作公开表态抵制，与执政当局唱反调。至于政务官员的个人独白给外界不良观感的就更多了，这些政务官员虽然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但面对公众利益和个人信念，不能做到兼顾现实和专业，还频频直白失言惹出风波，多少降低了国民党的改革正面效应。

二、近期国民党改革的策略调整

马英九坚持改革理想，但轻忽了党内政治现实和长期形成的地方政治生态，“马式改革”的副作用在几场地方选举中充分暴露，使国民党的改革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左右为难。当马英九和国民党再次享受执政成果之后，又意识到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空谈改革于事无补。面对选举压力，马英九召回爱将金溥聪，调整改革策略，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以期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实现国民党向选举机器的转型，为赢得 2012 年“大选”奠定基础。选举压力下的改革，变得更加务实，也少了理想性，多了功利感。

（一）政务改革和党务改革配套执行

虽然国民党输掉了多场选举，但 2010 年 3 月《远见》民调显示：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任指数反而上升了 3.5 个百分点，[①] 说明多数民众对国民党的改革仍抱持期待，国民党坚持改革努力，获得了民众的鼓励和支持。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坚持稳步改革才能获得多数台湾人民的肯定。对于执政党来

① 《2010 年 2 月“台湾民心指数调查”》台湾《远见》杂志 2010 年 3 月号。

说没有政务改革、缺少政绩支撑的党务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民众无法从改革中获得实惠和利益，改革就成了无源之水，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与支持。2010年3月3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对“立委”补选进行检讨，党主席马英九强调国民党坚持改革之路不会改变，提出：国民党继续改革的路线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党务改革，第二部分是政务改革，持续推动贴近庶民、反应民怨的重要政策。[①] 马英九首次将党务改革和政务改革紧密联结，同步推进。可以说，政务改革是党务改革的一部分，甚至是今后国民党改革的重要工作。

1. 出台多项以疏解民怨为主的政务改革措施

一是启动疏解民怨工程。配合“行政院长”吴敦义提出的“庶民经济”理论，推出“庶民精简行动方案”。针对民怨集中的内容提出改善规划。由“经建会”定期公布“庶民生活相关经济统计表”，涵盖与百姓生活相关的经济指标（包括所得、生产、消费、金融等）13项内容；由“主计处”定期公布“消费物价指数”，涵盖衣食住行和医疗保健教育娱乐等424项内容。通过解决民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入手，重点关注劳动就业、住房保障、控制消费物价上涨等重点“民生工程”来疏导、化解民怨。

二是建立民怨快速反应机制，搭建舆情沟通平台。金溥聪主导建立“府院党”三大秘书长的定期会议，在第一时间掌握民情、反映民意，化解民怨，在酿成民愤之前提前灭火。这一新的党政运作平台，扭转了外界对国民党反应慢、沟通不足的负面印象。如，环保署研议禁止走路抽烟一事，引发民众强烈不满，金溥聪快速反应，透过党政平台，化解了政策争议。

三是落实司法改革，疏解司法民怨。针对司法界存在的问题，台“司法院”和“法务部门”提出了多项涉及民生和司法改革的“修法”、“立法”草案；对“检察总长”陈聪明违法失职进行调查弹劾。1与5日、19日，台“监察院”两次启动弹劾审查会，最后以8比3通过对陈聪明的弹劾，迫使陈提出辞呈并获得马英九批准。民众对陈聪明袒护扁案十分不满，普遍认为陈聪明是“陈水扁”贪污洗钱等弊案审判的绊脚石，陈聪明的下台，化解了民众对马英九处理扁案缺乏魄力的怨气，鼓舞了蓝营士气，也有利于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

① 《国民党坚持改革，必能获得人民的肯定》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新闻稿2010年3月3日。

四是加快灾后重建，纠正“八八风灾”的负面印象。台湾民众对2009年“八八风灾”当局救灾不力怨声载道，为化解民怨，尽快推动灾后重建，行政“立法”各部门多管齐下，通过了灾后重建的特别预算，“行政院”出台重建方案和“灾区划定特定区域草案”，通过了“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发起人养家园活动，得到民间慈善团体的积极响应，灾区重建的各项工作有序展开，灾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受创产业也逐渐得以恢复，救灾不力的负面印象逐渐淡化。

2. 加大宣传ECFA的力度

与大陆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是国民党今年的二大任务之一，也是马当局的年度施政重点。为提高民众对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台湾经济发展以及融入区域经济整合重要性的认识，马当局可谓全力动员，各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宣导ECFA议题，有效扭转了民进党对ECFA污名化宣传的负面效应。

一是吸取“美牛事件”缺少沟通酿成风波的教训，加强ECFA协商的透明度。为减少民众疑虑，马英九公开承诺ECFA协商和协议内容会接受“立法院”的监督[①]。“陆委会”、“经济部”等部门在不影响协商进度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向民众公开信息，宣传时使用两岸经济协议的中文简称，以便减少使用英文缩写带来的“疏离感”，让更多的民众接受ECFA。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陆委会”、“经济部”等部门已经办理超过700场ECFA说明会或座谈会，并利用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网络、户外媒体等刊登广告及制作专题节目，还通过寄发折页文宣品，甚至邀请知名人物、台商代表代言广告，多层次、多渠道的进行宣传，达到一定的效果。

三是马英九亲上一线，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围绕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举行辩论会。“双英辩”中马英九使用“签署两岸经济协议，等于打通台湾经贸任督二脉”、“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带领台湾找回失落的8年，开创黄金十年”等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阐述政策，表现突出，受到了岛内民众尤其是蓝营支持者的高度评价，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马个人的支持度，由3月下旬的27%上升为38%[②]，也有利于营造两岸签署ECFA的舆论氛围，使

① 范凌嘉：《马宣示ECFA未来每月向立院提报告》台湾《联合报》2010年1月29日。

② 联合报系民意调查中心民调 台湾《联合报》2010年4月26日。

更多民众了解并转而支持两岸签署 ECFA。根据旺旺中时民调中心民调：53%的民众观看了“辩论会”，对 ECFA 的知晓度提升至 78%，支持度上升为 48%，比 4 月初上扬了 7%，反对的比例由之前的 38%下降为 30%[①]，为两岸签署 ECFA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府院党”发言人同步调整

今年 2 月下旬，台“总统府”、“行政院”和国民党三大发言人同时换将，分别由罗智强、江启臣、苏俊宾出任。罗智强和苏俊宾均为马英九竞选“总统”时的总部发言人，具有选战实战经验。苏俊宾出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并担任国民党发言人后，通过参加中天电视“星光大道”栏目，利用政论节目舞台，既大力宣传执政当局的执政措施，又及时为政策辩护，增强了政策辩论和朝野攻防的活力，弥补了国民党对外辩才匮乏的不足。江启臣的专长是国际政治经济、区域整合和两岸关系，在完成国民党和马当局年度重要任务、宣导 ECFA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最近“双英辩”及 ECFA 民意支持度明显上升可以看出，“府院党”全面注入新鲜血液有助于国民党转动选举机器，实现改革目标。

（三）组织与文宣双轮驱动，党机器平稳运转

改造国民党这部老旧机器，实现“选举不买票”的改革理想，需要一批与国民党中央同心同德的地方党工，更需要唤醒基层党员之心，通过组织与文宣双管齐下，形成中央、地方、党员的协调运转，实现国民党向“选举机器”的转变，并在“五都选举”中发挥作用。

1. “2010 深耕专案”[②]是组织战的重要内容

国民党拥有 80 多万党员，组发会计划从 4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用四个月时间完成至少对 70 万党员的访问，尤其是 5 个都市的党员。具体做法是：各县市专职党工深入基层，挨家挨户拜访辖区内全部党员（只允许对 20%的党员采取电话访问形式），党工将拜访过的党员情况建立数据资料。中央根据资料按比例抽样回访，核实党工是否到每个党员家庭进行登门拜访，以考核党工的工作态度，作为日后考核留任的依据。“深耕专案”一方面向党

① 《ECFA 辩论，马表现由于蔡》《中国时报》2010 年 4 月 26 日。

② 《国民党深耕 拟亲访 70 万党员》台湾《中央社电》2010 年 3 月 15 日。

员发出号召[①]，呼吁党员支持国民党和国民党的改革；另一方面要求党工通过访问了解基层党员需求，沟通民意，与民众博感情，强化基层的动员能力，为赢得今年的五都选举奠定基础。“深耕专案”立意颇好，但由于国民党官僚体系问题根深蒂固，部分基层党工阳奉阴违，也影响了成效。据悉：日前已抽查4月1日至30日的党员资料，从完成访谈的10万名党员中，依县市比例抽样3800名，进行电话核实，有的县市不合格率竟高达39%。

2. “文宣快递”成为文宣战的主要形式

国民党文传会根据工作重点，以“文宣快递”形式每隔1－2日电邮给地方党部，地方党部依据资料内容设法刊登到各县市或全台性的媒体，博取新闻版面。同时，地方党部必须将“文传快递”资料转发给各县市的文宣成员（大部分是地方民意代表），要求他们向民众进行宣讲，通过国民党中央、地方和民意代表结合的立体网络，快速传达中央的精神。对地方党部推动文宣的力度，国民党中央也制定了考核机制和实施规则，用计考核积点的方式进行考核。另外，国民党中央也会定期打电话给各地文宣成员，了解是否受到地方党部转发的“文传快递”资料，同样构成对地方党工的考核的内容，并会成为将来淘汰党工的依据。

（四）调整地方党部主委，增强地方组织动员能力

2010年1月，国民党先后对台北县、台东县、宜兰县和台中县4位地方党部主委进行调整，又闪电撤换了嘉义县党部主委陈明振。据悉，临阵撤换陈明振是因为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过高的经费要求，并扬言经费不到位就不配合嘉义县“立委”补选[②]。金溥聪主导调整地方党部的人事，展现小刀锋芒、赏罚分明、不受地方势力绑架的工作作风，补强了地方组织动员实力的同时，又空缺八个地方党部主委的位置，为日后通过“深耕专案”和“文传快递专案”执行情况的考核，对严格执行中央党部指令的党工委以重任预留了空间。

---

① 国民党深耕专案号召，具体内容：百余年前，无数热血同志响应了中国国民党的号召，经过十一次革命，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民国34年，更多同志响应了号召，历经八年浴血抗战，战胜强敌，让台湾摆脱了长达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2008年，“总统”改选，国民党成功完成二次政党轮替，为台湾写下民主的历史新页。在每一次国家兴衰与改革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同志都是幕后最重要的主导力量。此刻，在进行政党改造、塑造台湾光明未来的关键时刻，你，也将是我们最信赖的主导力量。

② 蔡佩芳、陈志平：《金溥聪斩党工烧钱选举迷思》台湾《联合晚报》2010年2月8日。

经过这一波以政务改革为主的改革行动，党务与政务的配合，展现了执政党和执政当局的努力决心，获得了民众的肯定，马英九个人和国民党的民调满意度均有所上升，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国民党的改革方向及对“五都选举”的影响

改革是国民党焕发青春活力的唯一出路。虽然在推行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上存在问题，引发地方派系及基层党工的反弹，导致地方组织的涣散，在三场“立委”补选以及“三合一”选举中辅选不力，遭遇执政后的选举连败，整体士气和“马金体制”受到冲击，但马英九利用国民党重新执政的优势，改善党的机体，败选因素正在得到改善，形势逐渐好转，长期来看对国民党的发展和改革有利。

（一）国民党未来改革的方向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国民党未来的改革应朝稳妥务实、兼顾选票和形成机制方面努力：

一是灵活处理对地方派系的改革。台湾地方派系多达上百个[①]，有的派系大老长期经营地方，拥有一呼百应的能力，其动员选票的能量甚至可以左右选举结果，派系与国民党政权，犹如皮肤与毛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未来国民党对派系的改革应谨慎为之，稳步前行并不断配套和调整，避免未蒙其利，反受其害。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派系的发展也处于转型阶段，派系中已涌现出一批年轻人物，虽出身派系，却学有所成，形象清新，展现出与老一辈派系人物截然不同的处事风格和行为规范，国民党若能善加对待，委以重任，定能透过他们的联结，更好地扮演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作用，透过他们对基层的耕耘和服务，增强国民党的基层动员能力，扩大执政基础。

二是完善廉能机制和排黑条款。国民党担任党主席后，成立了廉能委员会，对国民党公职人员的廉能情况进行考核。《党章》制定了排黑条款，即

① 翟思嘉：《派系问题，马英九的双面刃》台湾《新新闻》周刊 第1179期（2009年10月8日－14日）。

规定“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一年以上者不予提名”。但马英九因特别费案被起诉，国民党十七全二次会议又通过党章修正案，将党章排黑条款“一审判决有罪不能参选”的规定，修改为“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丧失参加党内初选资格，并不得由党提名参选公职”，为马英九参选排除了障碍。由于排黑条款在执行中存在“因人设置”的问题，故而造成某些候选人的不服，退党参选、违纪参选时有发生，导致国民党在某些选区或县市的分裂。未来，国民党的改革可能更注重制度面的建立，尽量减少“因人设置”的现象。

三是对党籍不分区“立委”的言行做出相应规范。国民党个别不分区“立委”经常在媒体镜头前对施政发表尖锐批评、上演砲打国民党中央戏码，地方党部和基层党员对此意见很大，要求党中央应该与不分区“立委”签订问政公约。不分区“立委”作为政党的代表，理应捍卫党的决策，为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做出贡献，建立相应的问政公约应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同时应约束政务官的言行，重建行政伦理，在兼顾现实和理想之间，强调依法行政，畅通党内意见疏通渠道，真正做到“言无不尽”。

四是重建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有效的沟通平台，真正了解民意，提出符合民众需求的政策措施。中央施政需要地方执行，前提是地方的理解和支持，应建立国民党执政县市长联席会议，并邀请民进党籍执政县市长的参加，减少将民进党排除后可能引起的反弹。

五是彻底处理党产。“中投公司”如能按预定计划在6月底成功标售，所得款项将用于支付国民党现有符合退休规定的党工退休金。大批党工退休之后，国民党在人事方面会逐渐瘦身，财务压力也会逐渐减轻。未来，国民党应逐渐采用专职党工和以党员为主的志愿队伍相结合的模式，经费来源依靠募款和政党补助款。只要国民党执政能让民众看到“社会渐趋稳定、失业逐步减少、生活品质越来越好”的希望，就能获得民众的信心和支持，就能募集更多的捐款，民意支持越高，获得的政党补助款越多，国民党的财务压力就会越小。

（二）国民党败选因素的改善

经历了一连串的选举失败，民众的不满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国民党也从中看到了警讯，调整了策略，通过改善民生、疏解民意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国民党败选的因素逐渐得到改善，总体来看将有利于年底的选举。

一是台湾经济已经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景气指数连续好转。台湾主计处已将原来预计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GDP）4.72%大幅上调为6.14%，改写近6年新高。2010年第一季台湾GDP出现13.27%的高成长，创下31年以来单季最高纪录。第一季的民间投资成长率37.11%，幅度惊人，创下近35年单季新高。出口表现也是非常亮眼，整体而言，台湾经济已由去年的谷底弹升，回复到金融海啸前的水准，并可望出现睽违已久的“中度成长”局面。[①] 加之两岸已顺利签署ECFA，也将有利于改善台湾整体经济形势，从而改善国民党的执政基础。

二是马英九领导风格有所改变，特别是他强势主导“地制法”在“立法院”临时会通过，展现了领导人的魄力，有利于树立民众对国民党改革和执政的信心。

三是行政效率和危机处理意识和能力正在得到改善。比如高雄县甲仙乡发生地震，执政当局快速启动救灾机制；韩国“天安舰”被击沉，马当局则快速启动国安机制讨论事态，其他诸如“废死刑”与执行死刑引发的风波、研拟“走路禁烟条例”的争议等等，执政当局均快速反应，及时处理，改变了过去“遇事慢半拍”的作风。

四是调整选举提名办法。在2010年的“五都选举”中，国民党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尊重地方人事的前提下，采用“协调、民调、征召”的办法，并明确表示不举办党员初选，提名机制公开透明，避免了内部大的分裂，也没有出现“三合一选举”时花莲县提名办法出现反复变化的情况，虽然台南县李全教和郭添财的民调数字在误差范围，国民党征召郭引起李全教的不满，但整体来说，提名过程公正公开，有利于党内团结。

综上所述，国民党败选的因素正在得到改善。而且，年底的“五都选举”属于都会型选举，地方派系势力干扰因素相对较弱，国民党继续坚持清廉执政、正派选举、并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将有助于吸引中间选民回流，应有利于国民党年底的“五都选举”。

四、结　语

马英九推动的国民党改革是一项全面的系统改造工程，主要目的是将国

① 徐碧华：《主计处：今年GDP上修至6.14%》台湾《经济日报》2010年5月21日。

民党由过去传统的政治资源分配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政党，转变以政治精英为核心，以文宣、组织两方面的选战为工具、以政党补助款和募捐为主要的经费来源的选举机器，透过理念聚集党员志愿者、通过政绩吸引民众支持，斩断传统国民党“黑金政治”的根源，实现马英九“清廉执政”的理想，并以此赢得选举。然而，马英九推动的国民党改革难以一帆风顺。对内，必须面对传统势力的挑战以及改变与地方派系互动模式的考验；对外，蓝绿高度对立的政治环境中，任何疏漏都会被民进党利用，成为打击国民党的利器。尽管改革之路困难重重，充满艰辛，但改革终归是百年老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的唯一出路，国民党不应停止改革的脚步，也无法停止已经启动的改革列车。面对选票的压力，为了长期执政的考虑，国民党的改革将会在更加务实稳妥，在妥协与摇摆中螺旋式的前进，在兼顾现实和理想间灵活运用。笔者认为，无论是推动什么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只要让老百姓真正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人安居乐业的美好前景，改革就会得到支持，国民党也就可以在民众的支持中实现改革的目标。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台湾政党体系发展趋势探析

——兼论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变化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林　冈　万东青

2009 年台湾县市长选举和 2010 年初两次“立法委员”（以下简称“立委”）补选后，民进党的气势从 2008 年的低谷回升，在即将到来的“五都选举”中，该党推出强棒人选，与国民党候选人对决。在 2010 年 7 月的党代会上，民进党改组了领导阶层，强化了蔡英文的领导地位。民进党的发展趋势及大陆政策走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议题。民进党止跌回升的势头，是否将延续到 2010 年“五都选举”和 2012 年的“立法院”和“总统”大选？台湾在未来是否会出现均衡发展的两党体系？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基于台湾内部“蓝、绿”区隔的意识形态和选举制度的诱导，岛内政党体系（party system）将走向比较均衡发展的两党制。这里所讨论的选举制度，不但指涉台湾“立法院”选举所采取的以单席选区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两票制，也包括台湾各级领导人选举所采取的相对多数当选制。所谓两党体系或两党制是就有效政党数目（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而言，不包括泡沫型政党。根据雷伊（Douglas Rae）的定义，两党制指的是两大政党的得票率总和超过 90%，且没有一个政党的得票率超过 70%。[①] 本文在其有关两党制定义的基础上，将均衡两党体系界定为：两个主要政党在重要选举中的得票率超过 90%，两党的得票差距以及其在议会席次率的差距少于 10%。根据基恩·布隆德尔（Jean Blondel）的理想分类，政党体系可以根据政党的数目和大小区隔为：1. 两党体系，即两党在议会的席次比为 50 - 50 到 55 - 45 之间（假设总席位是 100，下同）；

① Douglas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52.

2. 两个半政党体系，例如三个政党的席次比为 45 -40 -15；3. 一党优势下的多党体系，例如 45 -20 -15 -10 -10 的席次比属于此类；4. 不具一党优势的多党体系，席次比可能呈现为 25 -25 -25 -15 -10。[①] 马尔克·拉克索（Markku Laakso）和莱茵·塔克佩拉（Rein Taagepera）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有效政党数目可以通过政党得票率或议席比例来加以计算，其公式是用 1 除以主要政党得票率（或席次率）的平方和，即 $Nv = 1/\sum vi^2$，或者 $Ns = 1/\sum vs^2$。[②] 根据这一公式，如果两党得票率为 50% -50%，有效选举政党数目（effective number of elective parties）就是 2，如果是 55% -45%，有效选举政党数目就是 1.98，如果三党得票率是 45% -40% -15%，有效选举政党数目即 2.33。对政党席次率也可进行同样的计算，以得出有效议会政党数目（effective number of parliamentary parties）。本文将结合上述方法，探讨台湾政党体系的发展趋势。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选举制度的视角，分析台湾政党体系的演变过程。第二部分以 2009 年县市长选举为例，说明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第三部分以 2009 年以来的几次“立委”补选结果和 2010 年五都选举的可能前景，推论台湾政党体系的发展趋势。

一、台湾政党体系的演变

从 1986 年民进党成立以来，台湾内部出现了以两党对抗为主、多党并存为辅的局面。2000 年以前，在台湾政坛比较活跃的主要是国民党（大）、民进党（中）和新党（小）三股政治势力。2000 年后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又相继分化出亲民党和台联两个中、小型政党。在 2001 年和 2004 年的“立法院”选举后，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台联和其他小党（包括无党籍人士）在“立法院”的席次率先后出现过 39% -30% -20% -6% -4% 和 40% -35% -15% -5% -4% 的光谱分布，与布隆德尔的两个半政党体系模式有点相似，但国民党和民进党为台湾政坛“泛蓝”和“泛绿”两股主要势力的代表者，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小政党的出现主要不是因为意

① Jean Blondel, “Party Systems and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2 (June 1968), pp. 184 -187.

② Markku Laakso and Rein Taagepera,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 (1979), 3 -27.

识形态的多极化，而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一区多席的选举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

2008 年台湾“立法院”选举采取单席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两票制后，台湾的政党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曾在政坛上扮演或试图发挥“关键少数”角色的新党、亲民党和台湾团结联盟（台联）迅速泡沫化，亲民党仅分得 1 席原住民“立委”席位；台联虽然在“区域立委”（包括原住民选区）选举中获取 0.96% 的得票率，但没能得到任何席位。根据迪威尔热（Duverger）定律，单席选区制有利两党体系的形成。[①] 从制度演变的轨迹来看，选举制度改革是国、民两党在势均力敌情况下，为蚕食小党票源、争取选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虽然新制兼容了政党比例代表制的精神，但因为比例代表的名额不到区域“立委”的一半，而且各政党所获区域“立委”和比例代表“立委”席位之和占总席次的比例可以高于政党得票比例而不受限制，对大党尤为有利，加上 5% 的政党得票门槛，第三党在“立法院”随之失去存活的空间。

不过台湾初次尝试上述这一制度，并未在“立法院”形成均衡的两党体系。国、民两党在该次选举中“区域立委”的得票率，分别为 53.5% 比 38.2%，总和超过了 90%，符合两党制的定义。但两党的得票差距超过 15%，在席次率上更呈现 72% 比 24% 的极不对称状态（在 113 席“立委”中，国民党获得 81 席，民进党获得 27 席），只能视为失衡的两党体系。仅就席次率而言，甚至可以称为一党独大体系。[②] 如果采用上述拉克索和塔克佩拉计算有效议会政党数目的公式，用 1 除以政党席次率的平方和，则只能得出 1.7 个有效政党数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迪威尔热定律失灵呢？

根据迪威尔热的理论，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的影响通过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二是机械因素（mechanical factors）。

心理因素指的是选民不愿将选票浪费无法胜出的小党身上，而采取策略

①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1963);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p. 124; Giovanni Sartori, "The Influence of Electoral Systems: Faulty Laws or Faulty Methods?" in Bernard Grofman and Arend Lijphart, eds.,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pp. 58 - 59.

② Douglas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性的投票行为，从而影响有效选举政党数目。机械因素指的是从选票到席位的转换方式将影响到有效议会政党数目。[①] 从2008年台湾“立法院”选举，可以同时看到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新党得到3.95%的政党票，却不参加“区域立委”选举，台联获得3.53%的政党票，在“区域立委”选票上的得票率却不到1%，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选民心理因素的效应。在“立法院”席位的计票方式上，如果台湾采取的联立式两票制（compensatory two-vote system）而不是并立式两票制（parallel two-vote system），国民党依据51.2%的政党得票率，便只能获得58个席位，由于其已经在“区域立委”和“原住民立委”部分获得61个席位，就不能参加34席“不分区立委”名额的分配，维持61席不变。而民进党可以根据36.9%的政党得票率，获得42个席位，扣除已经获得的13席“区域立委”，尚可分到29个“不分区立委”名额（剩下的5席名额作废），加上亲民党和无党籍人士的5个“区域立委”和“原住民立委”席位，这样“立法院”的席位总数就将是108，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席次率将分别为56.5%和38.9%，与现行的并立式两票制的计票结果（席次率72%比24%）大有不同。如果“不分区立委”的名额增多，或废除小党的得票门槛（5%），席次的分配又将有所不同。可见，选举制度的设计确能间接（心理因素）或直接（机械因素）影响到台湾的政党生态。当然，台湾能否最终形成均衡的两党体系，除了选举制度的诱导外，还要观察政党票源基础的具体变化。

除了历经改革的“立法院”选举制度外，台湾长期实行以相对多数决选举产生地方县市长的制度，在1990年代后又将这一选举方式延伸到台北市和高雄市选举和“总统”大选，对岛内政治生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多数当选制和绝对多数当选制不同，绝对多数当选制可以为两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留下在第二轮投票时的政党结盟空间，并不完全排斥多党体系；相对多数当选制则有利于形成两党体系。[②]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89年到2001年，台湾的23个县、市一共举行了4次县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囊括了85%以上的得票率。[③] 从表2可以看出，在这12年期间，第三

① 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p. 226; Arend Lijphart,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0 – 72.

② 王业立，《比较选举制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第55 – 59页。

③ 唯一的例外是在2001年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和新党共推新党候选人王建煊候选人参选台北县长，导致新党得票率的明显上升。

党或无党籍候选人前后一共才获得10个/次县市长席位，占历年92个/次席位总和的比例不到11%，而且都是些相对不太重要的县市长席位，其中还有3个县市长席位系由与国民党同属“泛蓝”联盟的亲民党和新党所得（详见表2）。参照布隆德尔的分类标准，既然第三党或无党籍人士不管是在得票率还是席次率上都未达到半个政党的门槛（15%），台湾政党堪称两党体系，不属两个半政党体系。但从国、民两党在4次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均不到90%，席次率分别为53.3%和35.9%来看，与均衡两党体系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①] 不过，从2005年以来的两次县市长选举，可以看到国、民两党的得票率之和均已超过了90%，两党的得票率差距也都在10%以内。特别是2009年的县市长选举，除了脱党参选的傅崐萁获得花莲县长职位外，其余16个县市长全为两大政党所囊括。唯在席次率的差距上，与均衡两党体系尚有距离。

表1　1989年以来台湾各政党在县市长选举中的结果

年份	席位	国民党		民进党		亲民党		新党		台联	
		得票率	席位	得票率	席位	得票率	席位	得票率	席位	得票率	席位
1989	23	56.1%	16	30.1%	6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尚未成立	
1993	23	47.3%	16	41.2%	6	尚未成立		3.1%	0	尚未成立	
1997	23	42.1%	8	43.3%	12	尚未成立		1.4%	0	尚未成立	
2001	23	35.1%	9	45.3%	9	2.4%	2	9.9%	1	无候选人	
2005	23	51.0%	14	42.0%	6	1.1%	1	0.2%	1	1.1%	0
2009	17	47.9%	12	45.3%	4	无候选人		无候选人		无候选人	

资料来源：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989年的数据源自网络维基百科和Steve Tsang & Hung-mao Tien, eds.,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8。其他资料源自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网站：台湾选举类别与结果线上浏览，http://vote.nccu.edu.tw/cec/vote4a.asp

与台湾“立法院”新的选举制度并没有马上带来均衡的两党体系相映成趣的是，台湾在1994年初次开放台北市长选举时，出现了三党竞争的局面（分别为国民党的黄大洲，民进党的陈水扁和新党的赵少康），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的得票率分别为25.9%，43.7%和30.2%，结果民进党胜出。在1996年开放最高领导人选举时，则出现过四组候选人相竞争的局面（分

① 在这四次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共获得39个/次县市长席位，民进党获得33个/次县市长席位，将其分别除以92，得出上述比率。

表 2　1989 年以来台湾各政党及无党籍人士在各县市执政情况

	1989	1993	1997	2001	2005	2009
台北县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停选
基隆市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宜兰县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国民党	民进党
桃园县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新竹县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新竹市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苗栗县	国民党	国民党	无党籍	无党籍	国民党	国民党
台中县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停选
台中市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停选
彰化县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南投县	国民党	国民党	无党籍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云林县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嘉义县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嘉义市	无党籍	无党籍	无党籍	无党籍	国民党	国民党
台南县	国民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停选
台南市	国民党	国民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停选
高雄县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停选
屏东县	民进党	国民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民进党
台东县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亲民党	无党籍	国民党
花莲县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无党籍
澎湖县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金门县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新党	新党	国民党
连江县	国民党	国民党	国民党	亲民党	亲民党	国民党

别以国民党的李登辉、民进党的彭明敏、脱离国民党竞选的林洋港和陈履安为代表），在 2000 年也出现过三组主要候选人（以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为代表）角逐大位的情况。但这些只是在刚开始实行新的选举制度时的过渡现象。1998 年后的“直辖市长”选举和 2004 年后的最高领导人选举，均以两组候选人的对决为基本规律。如果对比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选举可以看出，高雄市没有第三党存活的空间，所以在 1994 年初次开放选举时虽然新党推出候选人汤阿根，但只得到 3.5% 的选票；新党当年在台北市有一定实力，所以才出现了三组候选人激烈角逐的态势。但因为选举制度的诱导，最

终都归于两党竞争。如表3所示，2001年以来国民党和民进党在重要选举中的得票率之和，都超过或接近95%，其他政党的得票率则不到5%或略微超过。国、民两党的得票率的差距基本在10%之内。虽然民进党在2008年最高领导人选举和两次台北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均偏低，但如与其他数字平均计算，也就相差无几。随着民进党政治实力的增长，台湾两党制的特征将更为明显。

表3　2000年以来国民党和民进党在重要选举中的得票率（%）

党派	最高领导人选举			台北市长选举			高雄市长选举			两市合计		
	2004	2008	均值	2002	2006	均值	2002	2006	均值	2002	2006	均值
国民党	49.89	58.45	54.20	64.11	53.81	60.67	46.82	49.27	49.14	57.85	52.11	56.42
民进党	50.11	41.45	45.80	35.89	40.89	39.33	50.04	49.41	50.86	41.01	44.08	43.58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网站的资料整理。其中最高领导人选举的均值，系将某个政党在两次选举中的得票数相加，除以两次选举的有效票数之和而得出。台北市长和高雄市长选举的均值，系将某个政党在某市两次选举中的得票数相加，除以某市两次选举的有效票数之和而得出。两市合计的均值系以某个政党在北高两市两次选举中的总得票数除以两次选举的所有有效票数而得出。

二、主要政党的实力变化

2009年县市长选举，带有明显的两党对决色彩。在这次选举中，民进党不但夺回宜兰县，在桃园县、南投县、云林县、屏东县、基隆市和新竹市的得票数也显著增加，国民党则相形见绌。国民党因为提名作业没有摆平内部矛盾，在新竹县的选票大量流入脱党竞选的候选人张碧琴手中，以险胜告终；在彰化县的得票率虽然不变，但选票流失了2万多张；唯有在苗栗县、南投县和嘉义县等地才有所斩获（详见表4）。

就2009年17个县、市长选举的总体得票率而言，民进党从2005年的1,764,734票（包括台联的58,243票），增加到1,982,914票，多了218,180票；得票率则从4年前的39.5%提高到45.3%，增加了5.8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国民党的得票数则比4年前“泛蓝”阵营总得票数2,331,337少了236,819，得票率由52.18%下降为47.88%，减少了4.3个

表 4　2009 年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主要县市长选举中得票数（率）的变化比较

主要县、市两次选举得票比较		2005 年		2009 年		票数增减
		得票数	%	得票数	%	
宜兰县	有效票数	236, 336	100. 00	245, 863	100. 00	+9, 527
	国民党（吕国华）	121, 463	51. 39	112, 469	45. 74	−8, 994
	民进党（林聪贤）	112, 853	47. 75	133, 394	54. 26	+20, 541
桃园县	有效票数	803, 728	100. 00	758, 722	100. 00	−45, 006
	国民党（吴志扬）	488, 979	60. 84	396, 237	52. 22	−92, 742
	民进党（郑文灿）	307, 965	38. 32	346, 678	45. 69	+38, 713
新竹县	有效票数	234, 049	100. 00	252, 424	100. 00	+18, 375
	国民党（邱镜淳）	157, 012	67. 09	97, 151	38. 49	−59, 861
	民进党（彭绍瑾）	77, 037	32. 91	77, 126	30. 55	+89
	无党籍（张碧琴、曾锦祥）	0	0. 00	78, 147	30. 96	+78, 147
苗栗县	有效票数	280, 284	100. 00	284, 138	100. 00	+3, 854
	国民党（刘政鸿）	134, 277	47. 91	181, 256	63. 79	+46, 979
	民进党（杨长镇）	83, 694	29. 86	95, 469	33. 60	+11, 775
	无党籍（李佳穆）	62, 313	22. 23	7, 413	2. 61	−54, 900
彰化县	有效票数	668, 626	100. 00	634, 640	100. 00	−33, 986
	国民党（卓伯源）	370, 790	55. 46	348, 341	54. 89	−22, 449
	民进党（翁金珠）	270, 949	40. 52	276, 897	43. 63	+5, 948
	无党籍（张春男）	26, 887	4. 02	9, 402	1. 48	−17, 485
南投县	有效票数	275, 374	100. 00	269, 217	100. 00	−6, 157
	国民党（李朝卿）	124, 777	45. 32	136, 951	50. 87	+12, 174
	民进党（李文忠）	85, 503	30. 33	107, 023	39. 75	+21, 520
	无党籍（张俊宏、陈振盛）	67, 064	24. 36	25, 243	9. 38	−41, 821
云林县	有效票数	377, 007	100. 00	351, 790	100. 00	−25, 217
	国民党（吴威志）	167, 690	44. 48	121, 832	34. 63	−45, 858
	民进党（苏治芬）	201, 192	53. 37	229, 958	65. 37	+28, 766
嘉义县	有效票数	292, 668	100. 00	317, 135	100. 00	+24, 467
	国民党（翁重钧）	109, 192	37. 31	128, 973	40. 47	+19, 781
	民进党（张花冠）	183, 476	62. 69	177, 333	55. 92	−6, 143
	无党籍（萧登标、翁玉隆）	0	0. 00	10, 829	3. 41	+10, 829

续表

主要县、市两次选举得票比较		2005 年		2009 年		票数增减
		得票数	%	得票数	%	
屏东县	有效票数	468, 108	100. 00	455, 786	100. 00	-12, 322
	国民党（周典论）	195, 928	41. 86	185, 384	40. 67	-10, 544
	民进党（曹启鸿）	216, 200	46. 19	270, 402	59. 33	+54, 202
	无党籍	55, 980	11. 96	0	0. 00	-55, 980
台东县	有效票数	105, 080	100. 00	107, 156	100. 00	+2, 076
	国民党（黄健庭）	0	0. 00	56, 354	52. 59	+56, 354
	民进党（刘权豪）	0	0. 00	50, 862	47. 41	+50, 862
	无党籍	105, 080	100. 00	0	0	-105, 080
花莲县	有效票数	156, 055	100. 00	151, 730	100. 00	-4, 325
	国民党（杜丽华）	66, 575	42. 66	38, 603	25. 44	-27, 972
	民进党	30, 988	19. 86	0	0. 00	-30, 988
	亲民党	38, 379	24. 59	0	0. 00	-38, 379
	无党籍（傅崐萁、张志明）	20, 113	12. 89	113, 127	74. 56	+93, 014
基隆市	有效票数	185, 108	100. 00	156, 065	100. 00	-29, 043
	国民党（张通荣）	76, 162	41. 14	86, 001	55. 11	+9, 839
	民进党（林右昌）	2, 771	1. 50	65, 673	42. 08	+62, 902
	亲民党	47, 932	25. 89	0	0. 00	-47, 932
	台联	58, 243	31. 46	0	0. 00	-58, 243
	无党籍（李步辉）	0	0. 00	4, 391	2. 81	+4, 391
新竹市	有效票数	161, 998	100. 00	166, 563	100. 00	-4, 565
	国民党（许明财）	112，221	69. 27	92, 667	55. 63	-19, 554
	民进党（刘俊秀）	49, 777	30. 73	68, 822	41. 32	+19, 045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网站的资料整理计算。澎湖县、嘉义市、金门县和连江县的得票情况，因为“蓝、绿”变化不大而从略。括号中的人名为2009 年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

百分点。两党得票率合计 93. 2%，差距 2. 5%，符合均衡两党体系的标准。同时这 17 个县市长选举的有效票数较之 2005 年也减少了 9 万多（见表 5）。两次选举的投票率由 67. 5% 下降为 63. 3%，这意味着“泛蓝”阵营的原先支持者，固然不乏弃选者，但也可能有不少选民转投了民进党候选人。①

① 假设国民党所减少的 24 万票全属弃选，民进党所增加的近 22 万票也来源于原先不投票者，那么有效票总数就应该减少 2 万票，而不是 9 万多票。

民进党在2009年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为其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从表1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进党在历年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维持在41.2%到45.3%之间，国民党的得票率，则维持在35.1%和51.0%之间（如果加上新党和亲民党，则是在43.5%和52.3%之间）。民进党执政县、市数目最多的是1997年，为12个，国民党执政县、市数目最多的是1993年，为16个。从民进党1986年成立以来在县、市层次的执政情况来看，其执政历史最长的是高雄县（1989年至今），其次是台南县（1993年至今）、屏东县（1989－1993，1997年至今）、台北县（1989－2005）、宜兰县（1989－2005，2009年至今）、台南市（1997年至今）、新竹县（1989－2001）、嘉义县（2001年至今）和彰化县（1989－1993，2001－2005）。民进党目前除了掌控宜兰、云林、嘉义和屏东四县外，在台南县、台南市、高雄县和台北县，都有较深厚的执政基础或历史（见表2）。特别是在台南县和台南市，民进党在最为颓势的2008年，还能囊括所有的“立委”席次。如果这四个县、市在2009年没有停选的话，有可能为民进党所得。这样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就可能达到8个，仅次于1997年和2001年。

按照民进党在选后的评估推测，假设2009年所有23个县、市一起选，该党的得票率就将是48.7%，仅次于其在2004年最高领导人选举的得票率。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停选的台北县、台中县、台中市、台南县、台南市和高雄县这6个县市而言，“泛绿”阵营在2005年的得票率约46.7%，按照同样的增长幅度，假如这6个县、市没有因为升格而停选的话，民进党可望获得52.2%的得票率（减去0.3%的偏差）。与该党在17个县、市实际得票率合起来计算（17个县、市与6个县、市的人口数相当），民进党的总得票率可能冲到48.8%。与此相对照，国民党在2009年17个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较之4年前“泛蓝”阵营的总得票率52.2%少了4.3个百分点，只有47.9%。按照同样的减幅推算，国民党在停选的6个县、市的得票率也可能由4年前的52.4%降到47.8%（减去0.3%的偏差），与国民党2009年在17个县市长选举中的实际得票率（47.9%）合计，如果6个县、市没有停选的话，国民党在2009年的得票率很可能是47.8%，比民进党低了1个百分点（见表5）。国、民两党得票率非常接近，不管是从2009年17个县市长选举的实际得票率（47.9%比45.3%），还是23个县市长选举的假定得票率（47.8%比48.8%）来看，都仅次于1997年县市长选举时两党的得票率差距（42.1%比43.3%）。但在1997年两党的得票率合

计仅占所有选票的85.4%，而2009年则高达93%以上。民进党在23个县市长选举（假如没有停选的话）的预估得票率48.8%，更是创下历史的新高，意味着均衡两党制的到来。

表5　国民党和民进党在2005年和2009年县市长选举得票数（率）变化比较

	年份	有效票数	国民党（“泛蓝”）		民进党（“泛绿”）	
			得票数	得票率（%）	得票数	得票率（%）
17县市	2005	4,467,939	2,331,337*	52.18	1,764,734*	39.50
	2009	4,374,932	2,094,518	47.88	1,982,914	45.32
	增减	-93,007	-236,819	-4.30	+218,180	+5.82
6县市	2005	4,409,203	2,308,761*	52.36	2,059,799*	46.72
	2009			47.76**		52.24**
23县市	2005	8,877,142	4,640,098*	52.57	3,824,533*	43.08
	2009			47.82**		48.78**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网站资料整理计算。国民党在2005年得票数包括亲民党和新党，民进党的得票数包括台联，均以*在表中标示。**为估算值。估算办法如下：假如2009年6个县、市没有停选的话，国、民两党的得票率可能互有增减，故以两党在2009年在17县市长选举中的得票率较2005年的增减幅度予以推论，并各减去0.3%的偏差，令其合计为100%；在这一估算基础上，分别加上两党在2009年17个县市长选举的实际得票率，除以2得出假如6个县市没有停选的话，两党在2009年23个县市长选举中的可能得票率。相加除以2的理由是，17个县、市和6个县、市在2005年的有效票数接近，故对其细微差别忽略不计。

三、台湾政党体系的发展趋势

民进党实力回升的另一指标是在2009年9月以来的多次“立委”补选中，增加了6个席位，从原先的27席，增加到33席，席次率将近3成。其中3个席位是因为国民党原当选“立委”因为贿选被认定无效，使民进党得以推出在2008年“立委”选举中落选的3位候选人（刘建国、简肇栋、郭荣宗）再次上阵，在竞选中赢回这3个席位。另外3个席位则源于国民党“立委”转换跑道，获选台东、桃园和新竹县长而出现空缺，使民进党得以推出赖坤成、黄仁杼和彭绍瑾，分别与国民党籍候选人邝丽贞、陈学圣和郑永堂竞争，获得了这3个席位（见表6）。原任台东县长邝丽贞未能接替黄健庭留下的空缺，原任嘉义县长陈明文却可以接替张花冠留下的“立委”席位，同样是转换跑道，成败结果迥异，从另一方面展现了两

大政党政治实力的消长。补选结果对“立法院”政治生态的影响，由表7可以概见。

表6　2009年以来“立委”补选情况一览表

补选对象	选区	补选原因	补选时间	当选者	党籍
李乙廷	苗栗县第一选区	贿选当选无效	2009. 3. 14	康世儒	无
李庆安	台北市第六选区	双“国籍”当选无效	2009. 3. 28	蒋乃辛	国民党
张硕文	云林县第二选区	贿选当选无效	2009. 9. 26	刘建国	民进党
吴敦义	南投县第一选区	出任“行政院长”	2009. 12. 5	马文君	国民党
江连福	台中县第三选区	贿选当选无效	2010. 1. 9	简肇栋	民进党
廖正井	桃园县第二选区	贿选当选无效	2010. 1. 9	郭荣宗	民进党
黄健庭	台东县选区	当选台东县长	2010. 1. 9	赖坤成	民进党
吴志扬	桃园县第三选区	当选桃园县长	2010. 2. 27	黄仁杼	民进党
邱镜淳	新竹县选区	当选新竹县长	2010. 2. 27	彭绍瑾	民进党
张花冠	嘉义县第二选区	当选嘉义县长	2010. 2. 27	陈明文	民进党
傅崐萁	花莲选区	当选花莲县长	2010. 2. 27	王廷升	国民党

表7　2008年“立法院”选举以来国民党和民进党在“立法院”席位变化情况

	“区域立委”			“不分区立委”		原住民“立委”		合计		
	国民党	民进党	其他	国民党	民进党	国民党	其他*	国民党	民进党	其他
2008. 1	57席	13席	3席	20席	14席	4席	2席	81	27	5
2010. 8	50席	19席	4席	20席	14席	4席	1席	74	33	5

* 包括亲民党籍原住民“立委”林正二。2010年7月林正二因被认定贿选而当选无效，不再补选，故现在“立法院”只有112个席位。

从表8可以看出，在11个“立委”席位的补选中，民进党所获得票数比国民党多了5万多张，占所有票数的比率也比国民党高了5个多百分点，两党得票率合计超过90%，符合均衡两党制的定义，只不过两个政党的强弱易位而已。其中最值得观察的是新竹县的“立委”补选：民进党籍候选人彭绍瑾在参选2009年县长时拿到77,126张选票，少于国民党籍候选人邱镜淳的97,151张选票，但在2010年2月的“立委”补选中，却能稳住71,625张选票；与此同时，国民党候选人郑永堂在该县一对一的“立委”补选中却只拿到56342张选票，反映了国民党选票的大量流失。当然，“立委”补选与周期性正常选举的意义不完全一样，故而不能据此简单推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表8可以看出，“立委”

补选的投票率普遍偏低，与2008年1月选举时58.5%的投票率（指的是“区域立委”投票率，“不分区立委”投票率为58.28%）和2009年县市长选举时63.3%的得票率均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民进党支持者的投票率高于国民党的支持者，投票率低对国民党明显不利。但国民党即使催票成功，能否维持2008年选举时的领先地位，却是不无疑问的。

表8　2009年以来“立委”补选中各政党的得票数和得票率（%）

选区	总票数	国民党		民进党		无党籍		投票率
		票数	%	票数	%	票数	%	
苗栗1区	81792	40096	49.02	/	/	41696	50.98	42.11
台北6区	94186	46065	48.91	36465	38.72	11656*	12.37	39.12
云林2区	126297	29278	23.18	74272	58.81	22747	18.01	
南投1区	119284	65922	55.30	53362	44.70	/	/	
台中3区	115111	51776	44.98	63335	55.02	/	/	45.09
桃园2区	92382	36989	40.04	53633	58.06	1760	1.91	38.42
台东选区	46887	21215	45.25	23190	49.46	2482	5.29	39.44
桃园3区	96404	42600	44.37	45363	47.25	8441*	8.38	
新竹选区	127967	56342	44.03	71625	55.97	/	/	
嘉义2区	84589	27138	32.08	57451	67.92	/	/	
花莲选区	81491	39379	48.32	33249	40.80	8863	10.88	
合计	1066390	456800	42.83	511945	48.01	97645	9.16	

资料来源：根据维基百科网站的资料整理。* 表示不止一个无党籍人士参选，但为制表方便而合并计算。

面对即将来临的2010年“五都选举”，国民党确实没有乐观的理由。一般认为，民进党在大高雄和大台南胜算较大，国民党在大台中较有把握，在台北市和新北市（原台北县）两党势均力敌，胜负难料。根据“蓝、绿”两个阵营在上述地区最近3次的选举得票情况统计分析，国民党在台北市、新北市和大台中处于领先地位（分别领先17.7%，2.9%和12.8%），在大台南和大高雄则处于落后地位（分别落后11.6%和8.0%）。台北市的选票结构历来是“蓝”大于“绿”，民进党在台北市从未获得过半选票，陈水扁在1994年只是因为三强鼎立才以43.7%的得票率获胜。在2010年一对一捉对竞争的情况下，苏贞昌的丰富选战和从政经验，是否有助于其击败治理和公关能力有不足之嫌的郝龙斌，打破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得票记录，值得审慎

观察。民进党在新北市有长期执政的经验（1989—2005），“泛蓝”在新北市的得票率从1997年的41.07%，上升到2001年的48.2%，在2005年始以54.9%的得票率，取回执政权。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新北市，并非该党的首选人物，只是因为苏贞昌在国民党决定推出朱立伦参选新北市后，擅自宣布参选台北市，才使民进党被迫调整选战部署。蔡英文和朱立伦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亲和力，但蔡英文既不善于也未必有精力经营基层的选战方式，以及其与苏贞昌的心结，是否将影响到“双城奇谋”的实现，也是值得认真研判的。国民党在大台中有着厚实的选票基础，现任台中市长胡志强的执政和公关能力首屈一指，为此，民进党在中部的胜算并不大。与此相反，民进党在高雄县的得票率遥遥领先于国民党，多了18个百分点（2001年选举时更领先国民党25个百分点）。如果高雄县市没有合并，国民党在高雄市还有较大的可为空间，合并之后，国民党在大高雄的差距甚至比大台南更大（见表9）。

表9　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五都”的选票基础

地区	年份	有效票数	国民党		民进党	
			得票数	得票率	得票数	得票率
台北市	1998A	1,498,901	810,829	54.09	688,072	45.91
	2002	1,361,913	873,102	64.11	488,811	35.89
	2006B	1,286,089	745,366	57.96	529,241	41.15
	均值	1,382,301	809,766	58.85	568,708	41.14
新北市	1997C	1,405,658	576,418	41.01	571,658	40.67
	2001D	1,704,188	820,808	48.16	874,495	51.31
	2005	1,802,072	988,739	54.87	798,233	44.30
	均值	1,637,306	795,322	48.58	748,129	45.69
台中市	1997E	362,036	175,953	48.60	186,063	51.40
	2001	435,722	213,866	49.08	177,515	40.74
	2005F	450,217	272,728	60.58	175,592	39.00
	均值	415,992	220,849	53.09	179,723	43.20
台中县	1997G	593,603	318,094	53.59	229,172	38.61
	2001	657,034	325,117	49.48	269,548	41.02
	2005	703,401	418,144	59.45	275,153	39.12
	均值	651,346	353,785	54.32	257,958	39.60
大台中市	总值	1,067,338	574,634	53.84	437,681	41.01

续表

地区	年份	有效票数	国民党		民进党	
			得票数	得票率	得票数	得票率
台南市	1997H	324, 884	130, 715	40. 23	180, 373	55. 52
	2001	328, 121	122, 726	37. 40	141, 840	43. 23
	2005I	324, 254	134, 248	41. 40	190, 006	58. 60
	均值	325, 753	129, 230	39. 67	156, 740	48. 12
台南县	1997	499, 998	171, 357	34. 27	328, 641	65. 73
	2001	532, 235	236, 670	44. 47	274, 086	51. 50
	2005	532, 012	250, 887	47. 16	267, 583	50. 30
	均值	521, 415	219, 638	42. 12	290, 103	55. 64
大台南市	总值	847, 168	348, 868	41. 18	446, 843	52. 75
高雄市	1998J	796, 185	389, 689	48. 94	387, 797	48. 71
	2002	772, 157	361, 546	46. 82	386, 384	50. 04
	2006K	767, 868	378, 303	49. 27	386, 016	50. 27
	均值	778, 737	376, 513	48. 35	386, 732	49. 66
高雄县	1997	525, 725	234, 960	44. 69	271, 989	51. 74
	2001	579, 873	170, 787	29. 45	317, 763	54. 80
	2005	597, 247	244, 015	40. 86	353, 232	59. 14
	均值	567, 615	216, 587	38. 16	314, 328	55. 38
大高雄市	总值	1, 346, 352	593, 100	44. 05	701, 060	52. 07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网站的资料整理。2006 年台北市和 1997 年台中县和台南市的选举资料源于维基百科的资料补充。表中大台中、大台南和大高雄的数字，系将县市长数字的均值相加并予以计算而得出。

A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新党候选人所得选票（44, 452 票，3% 得票率）。

B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所得选票（53, 281 票，4. 14% 得票率）；民进党的选票包括台联候选人周玉蔻所得选票（3372 票，0. 26% 得票率）。

C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新党候选人所得选票（32, 902 票，2. 3% 得票率）。

D 国民党得票数（率）一栏系新党候选人所得选票。

E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新党候选人所得选票（26, 515 票，7. 3% 得票率）；民进党的选票包括“建国党”候选人所得选票（6, 622 票，1. 8% 得票率）。

F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亲民党候选人所得选票（10. 061 票，2. 23% 得票率）。

G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郭荣振（173, 667 票，29. 26 得票率）和徐中雄（144, 427 票，24. 33% 得票率）两组候选人所得选票。民进党的选票包括“建国党”候选人所得选票（5, 950 票，1% 得票率）

H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林南生（68,124 票，20.97% 得票率）和陈荣盛（57,854 票，17.81% 得票率）两组候选人所得选票以及新党候选人（4,737 票，1.46% 得票率）；民进党的选票包括脱党竞选的许添财所得选票（64,228 票，19.77% 得票率）。

I 民进党的选票包括台联候选人所得选票（42,000 票，12.95% 得票率）。

J 国民党的选票包括新党候选人所得选票（7,457 票，0.8% 得票率）。

K 民进党的选票包括台联候选人所得选票（6,599 票，0.86% 得票率）。

根据民进党在大台南和大高雄的选票基础，选情的最大变数是该党能否有效整合党内资源，避免或减弱脱党竞选的负面效应。目前高雄县长杨秋兴已经宣布自行参选大高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很可能如法炮制。杨秋兴和许添财的脱党竞选，是对陈菊和赖清德产生分票效应，还是对国民党在“南二都”的候选人黄昭顺和郭添财形成“夹杀”威胁，在理论上取决于他们的票源与民进党候选人的票源是重叠性高于互补性，还是互补性高于重叠性。在经验上“夹杀”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例如，民进党候选人在 2005 年一对一的新竹县长选举中拿到 77,037 张选票，得票率为 32.9%，但在四年后形势看好的同样选举中，却只多拿了 89 张选票，得票率反而降为 30.6%。原因之一即是在 2009 年选举中，民进党面对的是两个对手的“夹杀”，故而未能拓展选票。根据 TVBS 在 2010 年 7 月底所作的民调显示，一旦杨秋兴以无党籍身份投入选战，陈菊和黄昭顺都会受到影响，陈菊的支持者中有 24% 的人可能转向支持杨秋兴，黄昭顺的支持者中则有 31% 的人转向支持杨秋兴。其结果是陈菊的支持度下滑到 43%，杨秋兴的支持度为 26%，黄昭顺下跌至 16%，杨秋兴参选对国民党候选人并不有利。①

四、结　论

本文以 2008 年台湾“立法院”单席选区两票制和多年来县市长、“直辖市长”和最高领导人选举所实行的相对多数当选制为例，说明单席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有利于两党政党体系的形成。但选举制度变化对政党体系的影响，有时存在滞后效应。就心理因素而言，政治人物和选民对新的选举制度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均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只有当实践表明，单席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确实不利第三党存活的时候，人们才会调适原有的政党

① “民调：杨秋兴可吸走 24% 陈菊 31% 黄昭顺票”，中评社香港 8 月 3 日电，http://www.zhgpl.com/doc/1014/0/2/0/101402013.html?coluid=93&kindid=2931&docid=101402013

认同，采取策略性投票行为。此外，台湾“立法院”保留了少部分的政党比例代表席位，以及县市议员（包括台北市和高雄市议员）选举仍是采取一区多席制，第三党或无党籍人士在一定时期尚有部分的存活空间，但不会影响到两党体系的发展趋势。2009 年以来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和“立委”补选表明，民进党的政治实力已经从 2008 年的低谷回升。单席选区相对多数当选制所隐含的“赢者全拿”（the winner takes all）的政治逻辑，在“蓝”大于“绿”的选票结构下固然对国民党有利，但一旦“泛蓝”选民的投票意愿发生变化，也可能导致选举结果的逆转。民进党籍候选人彭绍瑾在 2009 年 12 月新竹县长选举和 2010 年 2 月新竹选区“立委”补选这两场选举中转败为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几次“立委”补选的结果和外界对 2010 年“五都选举”结果“五五波”的推论，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维持长期的优势均非易事。鉴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有源于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基本支持者，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统“独”议题、两岸关系、涉外关系方面存在较明显的“蓝、绿”分野，民众在政党认同上也曾出现过“蓝、绿”平分秋色的现象，有理由预料均衡发展的两党体系和政党轮替，终将成为岛内的政治常态。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8 月 31 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和平发展形势下民进党“务实台独派”的生存与困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　剑

一、问题的提出

两岸关系已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两岸共同努力，实现了“三通”，实现了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观光，签署了 ECFA。共同的努力将两岸人民的关系带进了一个大交流、大合作的场景中。但从和平发展的进程来看，台湾部分民众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混乱的情况将长期存在，而“台独”意识和主张“台独”的政治派别也将长期存在，甚至会在特殊的情况下给和平发展进程带来曲折和反复，这些都是推动和平发展进程需要面对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发展论，开启了两岸关系“社会作用于社会”的阶段，大陆的社会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作用于台湾社会。这是以前没有的局面。胡锦涛总书记在 2010 年 4 月 29 日会见台湾各界人士时提出了促进和平发展的“四个力”① 的主张。这标志着大陆透过“社会作用于社会”的工具对台湾民意进行整体改造工程的开始，将台湾各界逐渐内部化过程的开始。充分的交流使台湾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更加两岸化，也就是说，台湾内部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离开了两岸关系都难以得到很好的处理。这种情况的出现，加深了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加深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意义的体认，加强了台湾政党将处理两岸关系作为执政能力的

① 2010 年 4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上海会见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台湾各界人士时强调：要继续增进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增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动力；要继续扩大两岸各界交流，不断激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命力；要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不断提高两岸经济的竞争力；要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要素的认识，也压缩了民进党以区隔两岸人民来建立台湾认同的活动空间。

台湾政坛在两岸关系上过去一直存在着区隔论（主张限制两岸全面交流，区隔两岸人民以建立台湾认同并独立于中国之外）与关联论者（主张承认两岸利益的关联性，在加深联系中获取台湾的安全与发展）之间的拉锯战。经过两年多的和平发展的实践，关联论者已经占据了上风。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人在失去政权之后并没有涣散。民进党失去政权之后，一方面要巩固在台湾内部的支持基础，消除陈水扁贪腐集团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两岸和平发展的趋势，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态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进党未能阻止两岸经济关系的加深，同时也提不出自己的两岸关系新主张。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痛苦磨合之后，民进党开始重新积聚力量，逐渐调整政策，继续以一个台湾主要政治派别的身份存在。在两岸关系的推进与摩擦中，民进党直接或间接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开始调适，如何在坚持“台独”立场的同时，在两岸和平发展的环境下寻求生存和发展。

从大陆一侧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之所以提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台湾民意在较短时间里无法很快地扭转到统一的方向上，两岸政治关系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无法解决，台湾社会统一动力的重建也必须在“台独”意识的干扰下展开。对于占台湾人口相当比例的支持绿营的台湾民众还要有润物细无声的功夫。

简而言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两岸关系这个领域中，“台独”主张者将面临和平发展这个大的环境和秩序，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需要调整和适应。而大陆方面推进和平发展也将长期面临如何处理与“务实台独派”的关系的问题。分析“务实台独派”在两岸和平发展环境下的生存与困境也成为这个时期的必修之课。

二、什么是“务实台独派”？为什么是“务实台独派”？

1. 什么是“务实台独派”？

“务实台独派”定义：民进党有人自己称为“稳健台独派”。林浊水先生的描述是：在与大陆打交道时应“立场清晰坚定，态度善意互惠，政策

务实弹性。”[①] 或者说是“和解不退缩，坚定不对立”。

具体说来，“务实台独派”的主张是，其一、在政治上坚定主张“台湾独立”，认为两岸关系的走向应当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其二、在策略上主张台湾已经“独立”，不必再宣示“独立”。愿意接受“中华民国”这个躯壳，主张“中华民国”即台湾；其三、在手段上，放弃通过“制宪建国”的道路，不主张以战争等极端手段获取“台独”成功。以“主权在民”的说辞强调现状的改变须经过台湾住民公投决定。

“务实台独派”在民进党内一直都存在，因为选举的需要，因为执政地位的变化，务实“台独”主张一直在民进党内游离于民进党主流左右。1996 年 5 月《“台独”运动的新世代纲领》开始了务实“台独”论述的尝试，强调主权现实的“台湾国家主义”，“当更改国体、国号等与凝聚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可以暂时放弃更改国体、国号”。[②] 许信良担任党主席时也尝试向务实“台独”的方向调整。1998 年，民进党中常会于美国克林顿总统在上海提出“三不”之后，通过了“七点声明”，“承认并维护中华民国现状，任何改变现状的要求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加以认可。”[③] 陈水扁在 2000 年“大选”竞选期间也通过往务实态度方向调整获取了更多的选票。陈水扁在其竞选纲领中表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在统一问题上，他的表述如下，只要经过台湾全体人民同意，任何特殊关系都不应当排除。[④]

2. 为什么是“务实台独派”？

“务实台独派”的真正代表人物应当包括许信良、林浊水等人。林浊水一直坚持务实“台独”的主张，既反对放弃“台独”又反对采取极端激进方式实现“台独”理想。许信良在民进党 2008 年败选后，迅速回到民进党党内，企图影响民进党的发展方向。

陈水扁将“台独”的信用卡刷爆，最令“台独”主张者愤恨不已。2008 年民进党在“大选”中失去了政权。败选之后，民进党内没有发生大

① 林浊水《历史剧场：痛苦执政八年》台湾刻印出版，2009 年 2 月，第 154 页

② 《“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1996 年 5 月。

③ 《一个思考方向：从“台独”公投党纲转向统一公投宪典》，《联合报》，1998 年 7 月 3 日，第 2 版。

④ 陈水扁竞选委员会编《新世纪新出路——陈水扁国家蓝图》台北：1999 年 11 月，第 14 页。

的路线清算和斗争。经过2008年之后的逐渐调整，“务实台独派”已经占据了民进党的主流地位和权力中心。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陈水扁执政期间极端“台独”的做法给台湾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台湾民众已经用选票表示了反对；二是陈水扁执政8年的贪腐行为是对“激进台独”支持者热情和信仰的巨大消耗，指望尽快实现“台独建国”的人数也在减少。民进党的主流成员继续选择激进“台独”的社会基础削弱。

“务实台独派”的民进党人对陈水扁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一开始走了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不可取，在立场上出了问题，二是真正提出了理性正确的路线后，在态度上又反反复复，挑战和挑衅的语言多余而无益，成为无法让两岸对话的重要因素。①

那么蔡英文是否是“务实台独派”呢？许信良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许信良说：蔡是“主权主义者”，她认为“主权”在2300万人手上，但是这是民进党的一贯立场，只要“公投”支持统一，我们接受，这就不是铁杆的“台独”主义者；“主权”属于2300万人，人民决定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如果2300万人接受一中原则，民进党也可以接受！这样的立场就代表民进党不是一个极端的“台独”主义，这是民进党的主流派意见，一向如此；主张“公投”、接受“公投”结果，这就不是一个激进的“台独”主义。②

3. “务实台独派”嬗变问题

在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务实台独派”会向哪个方向的嬗变？

“务实台独派”是另一类的现状派。国民党是放弃了信仰，维持现状，靠特殊时期的两岸的需要而获得存在的意义，终非久长之计。而民进党中的“务实台独派”属于有坚定的信仰者。“务实台独派”坚信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必然对立，但为了生存和执政，他们愿意沿循务实的道路。

随着形势的发展应当有两种嬗变的可能。一种是变成激进“台独”。当“台独”被作为一种不变的主张和信仰时，如果“务实台独派”手中权力膨胀，如果大陆出现内部社会动荡而自顾不暇之，如果台湾岛内民意出现倾向“台独”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国际势力决意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大陆故意推波助澜，“务实台独派”很可能会再次脱下“务实”外衣，变成激进“台

① 林浊水《历史剧场：痛苦执政八年》台湾刻印出版，2009年2月，第135页。

② 许信良语。见“民进党与大陆对话的前景和挑战”，《中国评论》2010年7月号。

独”，推动“法理台独”，将一切束缚“独立”羁绊撤除，乘机完成所谓的“独立建国的志业”。另一种情况是，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下，体认中国崛起的事实和影响力，接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在准备执政的过程中，逐渐减少“台独”行为，搁置“台独”诉求，长期维持务实的行为方式，与民意一起做相应的调整，逐渐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中一个非阻力的政治派别。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的发展，它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反对涉及统一的任何主张和谈判，扮演台湾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刹车片的角色。

三、台湾社会对“务实台独派”存在的需求

1. 出于对于“台独”立场的需求

李登辉和陈水扁前后20年的执政，在构建台湾命运共同体方面，在去中国化方面还是给“台独”政治派别留下了一笔厚实的遗产。“两国论”在绿营支持者中间的影响根深蒂固。特别是台湾民众中，认定并坚持“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的大有人在。“台独”运动的政治运作尽管因为陈水扁的下台而处于低潮，但作为“台湾独立”政治诉求的社会基础，即区别于中国认同的台湾认同，仍居高不下。1992年针对“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的问题，回答“中国人”者为26.2%，回答“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者为45.4%，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受访者只占17.3%，2001年针对同一问题，回答“中国人”者为10.9%，回答“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者为43.9%，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受访者已经占据了40%。到了2009年6月回答“中国人”者为4.4%，回答“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者为39.2%，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受访者占52.1%。[①] 当然，这个数据只能作为参考，但它所反映的趋势是值得警惕的。

马英九上台后尽管在坚持“宪法”、在历史教育等方面开始做一些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收效不彰。台湾一些民众，包括青少年开始对马英九在“宪法”之下进行回归性的立场调整开始不适应。他们需要温和的“台独”立场来确定台湾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与自己的期待相一致。

① 资料来源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趋势分布》。

2. 出于把握两岸互动节奏的需求

在两岸关系中，大陆一方为主动并相对较强一方，而台湾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台湾社会成员虽然要获得合作交流的好处，但也担心两岸关系发展的节奏自己无法掌握。民进党以务实“台独”的立场和“台湾主权”的诉求来质疑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的政策，不断地进行抗议和质疑，也迫使国民党当局照顾了更广泛的利益，同时也变成台湾作为一个整体与大陆讨价还价的因素。

3. “务实台独派”的政治包装迎合了台湾政治生态中一些选民的偏好

“务实台独派”的政治包装有两性：一个是民主性，一个是开放性。这与台湾的政治生态吻合度较高，也使得一部分台湾民众，包括中间选民愿意接受。而“只许言统一，反对言独立”的排除选项的做法，容易被带上“反民主”的帽子，这也是国民党高层有时也会露出“不排除独立选项”的言辞的缘故。“务实台独派”提出，台湾的前途命运由台湾住民一人一票来共同决定，这样的说法比较容易满足“自我决定”的权利的感受，比较容易在选举中获得部分选民的偏好；另外“务实台独派”主张开放所有选项（当然也包括统一选项）的说法，在台湾认同出现“优势”，本省人占据选民多数的情况下，并不影响他们“台独”的基本主张。

四、“务实台独派”的困境

1. 困境之一：要维持“台独”立场与正常处理两岸关系能力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要解决坚持“台独”立场与重新成为执政党并顺利执政的问题。

“务实台独派”的主要任务第一是执政，第二是执政，第三还是执政。民进党要执政，缺的不是“台独”立场，缺的是“是否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的政党”，因为如今的两岸关系在经济上、在安全上、在社会生活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民进党“务实台独派”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需要大陆方面用行动来帮助证明。陈水扁 8 年执政无法证明这一点，蔡英文做过“陆委会主委”，做过“行政院副院长”也未能证明这一点。但是蔡英文要率领民进党再次成为执政党，这个“没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标签一定要拿掉。原先民进党没有准备在 2012 年重新执掌政权，而“五都选举”的形势以及马英九的困境让民进党感到了希望和可能。这方面要求也更加强烈和紧迫。

自2008年败选后，民进党沦落为在野党，失去了与大陆对话的筹码。如果当时大陆抓住机会，在民进党人集体处于失败情绪的情况下，对民进党敞开大门，民进党就有可能进一步分裂或转型。现在民进党基本稳住了阵脚，已经准备积累筹码和实力与大陆进行对话。

2. 困境之二：要避免出现台湾主要政党竞相与大陆靠拢，最终使台湾民意发生根本变化的状况。这会危及民进党经营多年的民意基础。

民进党也担心，一旦与大陆对话，特别是这种对话开始之后，民意可能发生的转变。民进党与大陆对话的开始，就证明了谁执政也离不开两岸关系的论调。马英九当局有可能因为大陆事务的主导权受到民进党的进逼，进一步向大陆所要求的立场靠拢和调整，从而获得大陆更多的资源，这也会进一步给民进党带来新的压力。这样的竞争容易形成国、民两党争相向大陆靠拢的印象。马英九本来有顾忌而不愿意将其终统的思维展现，在民进党的积极探索与大陆接触和对话可能性的过程中，民进党很可能帮助马英九摆脱顾忌，进一步展现两岸统一的思维。赖怡忠在一次访谈中表达了以上的担心。[①]

五、“务实台独派”对大陆的需求

1. “务实台独派”在与大陆对话问题上的主要策略

首先，让非两岸因素成为民进党获取支持的基础，或者说，放大非两岸问题的重要性，让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的短板隐藏起来，以便重新获取更多的执政资源。

其次，通过岛内各层级的选举，让大陆逐渐体会到其实力，让大陆最终认定民进党是一个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党派。

再次，民进党希望表现出，它比国民党更加坚持所谓的“台湾主权”，以堆积木的方式积累资源、展现实力，塑造有能力代表台湾与大陆互动的形象。

最后，它以“主权在民”为主要支撑，坚持维护目前“台湾独立的现状”，主张由台湾住民的“自决权”来决定台湾的未来。称，“如果台湾民众未来选择统一，民进党也同样支持”。借此，改善民进党的极端“台独”

① 见“民进党与大陆对话的前景和挑战”一文，《中国评论》2010年7月号。

形象。

2. 目前“务实台独派”对大陆方面的主要要求

首先，要求大陆开始与民进党建立交流和对谈的管道和平台。对于目前阶段的民进党来说，谈的内容并不重要，但有这样的平台和管道至关重要。希望现在就开始沟通，以沟通的现象说明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这样的对话可以帮助民进党建立有信心、有筹码、有能力的形象。陈淞山在一次座谈中谈道：“为了2012年重新执政，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和“中国沟通管道”的建立，不能等到2012年，而要从现在就开始。”①

其次，要求大陆在没有预设立场的情况下与民进党展开对话。大陆也不应当要求民进党承认“九二共识”，承认一个中国，放弃“台独”党纲；作为回报，民进党也不要求大陆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不要求大陆放弃导弹对准台湾等。

再次，在不可能全面接触的情况下，可就具体事项与大陆相关方面进行正式、高层级的接触，即“陈菊模式”。

最后，向大陆说明，国民党不可以代表所有的台湾民意，两岸政治关系有民进党的参与才可能向前发展。所以要求大陆不要区别地对待民进党。

六、“务实台独派”如何寻求新论述的方向

“务实台独派”一定要有一套新的论述来解决它与大陆进行对话的政治基础问题。“台独党纲”与“台湾前途决议文”是其最大的束缚。要进行全面修改的难度很大，“务实台独派”的思路还是在经由诠释变成一种新的论述。从目前获得的材料看，民进党的“十年政纲”的讨论只能算是一次初步的思想动员，要真正消除绿营支持者中间的恐共、惧共、逢中必反的心结，“务实台独派”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要真正取得大陆的基本信任开展实质的对话，“台独务实派”也要下一番工夫来探索新论述，为自己解套。

笔者认为“务实台独派”寻求新论述的方向极有可能从陈水扁的若干实践中去寻找。理由有几个：其一，陈水扁竞选期间和执政初期做了多种尝试以获得“有能力处理两岸事务”的印象。这里包括“同属中华民族”、

① 见“民进党与大陆对话的前景和挑战”一文，《中国评论》2010年7月号。

“未来一中”等，这些尝试对于今日想重新获得政权的“务实台独派”来说，具有借鉴意义；其二，陈水扁当时的很多尝试是他的幕僚共同研拟的结果，今日蔡英文当时也在陈水扁的幕僚圈子之中，思维的连贯性依然存在；其三，今日“务实台独派”对陈水扁两岸政策的批评主要是“方向并没有错，只是态度和做法错了”（林浊水语），那么“务实台独派”还是会在陈水扁探索的方向中寻找目前所需要的论述。其四，在野的时候政策以变化和批评当局为主轴，而执政后必须考虑当局政策的延续性和执政本身，所以陈水扁执政8年的探索的深度比现在处于在野位置的“务实台独派”所需要的立场要深远一些。

未来两年“务实台独派”的新论述探索不会比在位时期的陈水扁走得更远。“务实台独派”会避免陈水扁“出尔反尔，前后不一致”政策路径，抛弃陈水扁后期“台独激进路线”，但在务实论述方面，也许会比陈水扁更加保守一些。如2004年陈水扁的“双十讲话”的要点很可能是“务实台独派”寻求新论述的参照。陈水扁2004年“双十讲话”要点包括：一、“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主权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联合国1971年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并未赋予北京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二、不承认“ 九二共识”，而采取模糊“九二会谈”表述方式；（这一处理与陈水扁当时身份相关，如今在野的民进党“务实台独派”不一定会沿用，可能另寻表述方式）；三、支持筹组由台湾“朝野”人士组成的“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四、举起“和平发展、自由选择”的旗帜，只要2300万台湾人民同意，未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台湾与中国之间，将发展任何形式的政治关系，都不排除；五、搁置争议，寻求互惠。

以上只是一个分析和推测，“务实台独派”今后将如何进行新论述的探索，必然是两岸观察家重点关注的事件。

七、结束语

相对于“极端台独派”，“务实台独派”的危害同样很大。应对“极端台独派”，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因为“台独务实派”有了“务实”二字，更容易为部分台湾民众所接受，执政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另外，在一个主权纷争的场景下，在一个社会群体间的排斥中，也许行为可以判断高下，但对于立场的坚持很难在理论上、在道义上加以驳倒。因此相对

于“极端台独派”，“务实台独派”更加难以击溃。

“务实台独派”，目前主要聚集在民进党内，同时也有很多的“务实台独派”在民进党外。也就是说，“务实台独派”客观存在于台湾社会，即使没有民进党它也会存在。在和平发展期，这个“务实台独派”会与和平发展阶段共生共处。如果和平发展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发展，“务实台独派”会逐渐分解释然。与“务实台独派”的较量是一场持久战，要在“接触加压力”的政策下，规范其政治行为，促其改造成为一个两岸和平发展中非阻碍性的政治派别。

自身重新获取执政权的需要，以及在政治上有所获利，都会迫使“务实台独派”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或做出更加务实的姿态。民进党核心最近提出的“十年政纲”以及两岸对话说，说穿了就是要营造有利于它要争取北台湾的中间选民的支持，获得更多执政资源的气氛和环境。如果民进党迟迟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管道、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政党，就难以重新成为执政党；即使成为执政党，其执政能力也因为两岸关系的僵局受到质疑。这说明，长期下去如果民进党无法从支持两岸关系正面发展中获得政治利益，民进党只能选择对抗，而且会继续不遗余力地巩固对抗的社会基础。民进党要从两岸和平发展中获得以执政为核心的政治利益，从根本上讲，就是放弃“台独”立场，回到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两岸人民生活幸福的正轨上来。中期观察，“务实台独派”的政策调整还是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其政治利益的追求需要有正确的导向。这个导向一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包括台湾民意的根本性转变，一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再就是“务实台独派”自身的调整。由这个导向反映出来的利益，也就是两岸地位、国际形象和岛内权力。“务实台独派”的根本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时机，也需要利益的获得。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简论民进党的世代交替问题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陈　星

民进党的世代交替随着该党派系的解散和“天王”势力的式微显得越来越紧迫。不过，在既有结构束缚下，民进党年轻世代要想取得党内支配性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情况对民进党未来发展无疑会产生较大影响。

一、民进党世代交替的困境

陈水扁家族及民进党高层腐败案东窗事发打乱了民进党的世代交替步骤。陈水扁当政期间，确实在按步骤和计划推动民进党的世代交替工作。2005年县市长选举时，陈水扁甚至越过党内的提名程序，以世代交替之名，钦点了罗文嘉、林佳龙等参与县市长选举，并有意扶持陈其迈参选高雄市长，以增加他们的行政历练，为未来的接班做准备。陈水扁的这些接班安排基本上是以他为中心展开的，他所栽培者，都是其比较中意的“子弟兵”。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进党当时的世代交替安排与陈水扁个人地位强化是相吻合的，是民进党内权力格局演变的延伸。不过，随着扁案的东窗事发，以及随后而来的民进党几次选举失败，经过很长时间辛苦栽培出来的“接班世代”，几乎全部落马。虽然民进党中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管控，尽量降低弊案风暴对这一世代造成的冲击。但是这批人要想东山再起，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民进党下台后，接班问题所面临的时空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陈水扁下台及扁系势力的削弱使以陈水扁为中心的接班模式已经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同时，虽然陈水扁势力削弱留下了权力真空，却也引发了各个政治山头激烈的权力斗争，而这些斗争主要是以“天王”为中心展开的。民进党的年轻世代由于没有形成独立的山头，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根本无

法完成替代“天王”的重任。世代交替在民进党下台后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没有成为中心议题。

同时，就年轻世代本身而言，在原来培养的“接班世代”群体没落以后，新生力量很难立即补上他们遗留下来的空缺。民进党执政时期为培养“接班梯队”占用了很多资源，这批人拥有较多媒体曝光和政治历练的机会，相对来说其他人可能得到的机会就少得多。另一方面，从台湾的选举生态来说，政治人物长期经营地方，强调的是深耕基层，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内年轻世代向更广阔空间发展的机会，如果不是党中央刻意安排，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很难形成全岛性的政治声望，也很难形成全岛性的政治动员力。所以，民进党在讨论世代交替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人才匮乏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陷入扁弊案的年轻世代政治人物摆脱阴影，以及如何培养新的接班梯队，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的“天王”们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不至于失去自己的舞台。一方面，这是由于民进党目前的权力生态决定的：民进党内的“天王”有全岛性的知名度，如谢长廷、苏贞昌等，均是如此；其次，在党内，这些“天王”们依然是政治力量组织的关键节点，在权力结构重新分化组合之际，也是年轻世代政治人物集结的重要依附对象，而这些“天王”也有意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强化自己政治山头的力量；再次，依民进党内的权力斗争状况，依托特定的政治山头去争取政治地位和政治资源的模式在未来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因而，民进党的“天王”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活跃于民进党的权力舞台。

同时，民进党内也依然存在着所谓“天王”的迷思。民进党下台之初的几次选举中，就不断有声音呼吁“天王”再起，似乎只要他们一出马，就可以所向披靡。对此，《中国时报》的社论评论说，“这反映这种渴望重温旧梦的心理现象，也揭示民进党重新出发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这一群脑袋不清、逻辑不通的天王拥护派，若不是未来负责党务及辅选的地方党部主委，就是被视为政治主力部队的立法委员。”[①] 不过，如果客观地分析，这种情况最起码反映了以下现实：在遭受重大打击之后，民进党内的年轻世代人物还没有能力扛起振衰起弊的大旗，他们不得不继续依附于原有的“天王”去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同时，民进党既有的接班格局被打破，但

① （台湾）《中国时报》，2008 年 7 月 18 日。

党内对于未来接班格局的基本发展事态认知还是比较混沌，这也是党内“天王迷思”存在的重要原因。

虽然民进党在世代交替问题上辙乱旗靡，但世代交替毕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形势发展逼迫民进党不得不推进世代交替工作。

蔡英文出任党主席后，成功整合了内部派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陈水扁的切割，[①] 同时还不遗余力地为民进党规划未来的政策论述，重新建构民进党的价值诉求。蔡英文的这些做法已经使她逐渐在民进党中站稳了脚跟，其领导风格也逐渐为泛绿势力所接受。蔡英文的地位巩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世代交替的开始。或者可以说，蔡英文的地位巩固本身就隐含着世代交替的意涵。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蔡英文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她完全掌控了民进党。蔡英文最大的问题是她没有派系，没有自己的班底。当然，这不意味着她未来不会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这需要时间。所以，蔡英文还无法、也不愿甩开民进党原有的权力结构去经营民进党。对蔡英文来说，如何处理与“天王”的关系，仍然是她绕不过去的一个槛。因此，未来“天王”还会有发挥影响力的空间。至于“天王”们能够将自己的影响力持续多长时间，则依其在选举中和政治斗争中取得的政治资源数量而定。目前看，年轻世代中能够在2012代表民进党参选者大概只有蔡英文一人，而以她在党内没有派系的特点来看，现在说她能够出线，显然还为时过早。

二、民进党世代交替的特征

在民进党发展历程中，自“美丽岛律师世代”以降，“恩庇－侍从体制”下的世代交替就成为代际传承的主要模式。无论是曾经的学运世代，还是后来的幕僚世代，他们的成长道路与政治领袖人物的提拔是分不开的。这决定了他们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现实政治斗争中都无法摆脱上一世代的束缚。这种情况已经沉淀为民进党的政治伦理，深刻地影响到了世代交替的基本样态。在上个世纪90年代，民进党这种“恩庇”特征的政治伦理并不

① 与陈水扁的切割目标只能说部分实现。因为陈水扁还在看守所里关着，一旦陈水扁走出看守所，他仍会对民进党产生不小的影响力。

是那么清晰，也不那么成系统，党内山头林立，各自为政，代际之间以及派系与党中央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民进党内这种以“恩庇－侍从”为中心的政治伦理逐步确定下来，代际之间和山头领袖与党中央之间的基本秩序也在这些政治伦理的约束下变得比较稳定，这也决定了，民进党的世代交替只能走比较平缓的道路。

以陈水扁为中心的接班安排破产给其他政治山头扩张势力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扁系衰落以后，以苏贞昌为中心的政治山头实力开始膨胀。2010年7月民进党的第14届“全代会”上的权力改组中，到处充满了政治山头人物的影子，除了谢长廷和苏贞昌亲自下海参选以外，他们还纷纷支持自己的子弟兵上垒，如蔡宪浩、张宏陆这样长期追随苏贞昌的政治人物在苏的帮助下纷纷出线。所以，陈芳明在评价民进党2010年7月的权力核心改组时说，“这次民进党权力改组的方式，与陈水扁时代完全没有两样，还是需要人头党员，需要派系谋略，需要换票联盟。这种露骨的权力交易，赤裸裸显示一个庞大的人格市场。整个演出模式，二十余年来完全没有改变。”① 可以看出，民进党的世代交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恩庇”模式。从这个角度说，蔡英文的崛起不过是一个特例，如果不是民进党进入多事之秋，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蔡英文根本不可能进入民进党的权力中心，因为在世代交替的谱系中根本排不上她。

蔡英文出任党主席后，民进党中央在世代交替方面的作用在逐渐加强。以2009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为例。在这次选举中，民进党中央顶住了“天王”出马的声音，派出比较有实力的新一代人物参选。如彰化县提名翁金珠、南投县提名李文忠、基隆市提名林右昌、新竹市刘俊秀、嘉义市涂醒哲等。在民进党提名的这些候选人中，有许多是该党未来的希望，他们即便在这次选举中不能取得胜利，却可以经过这次选举的历练增强他们未来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实力。在这些政治人物中，有一些是党内比较有论述能力的“年轻世代”代表人物。这次选举没有响应民进党内要求“天王”出马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民进党中央对世代交替干预的加强。②

在民进党世代交替的过程中，世代之间的交替与价值重建是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民进党的世代交替是价值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进

① （台湾）《联合报》，2010年7月22日。

② 当然，这也可能和这些选举较为不重要，轮不到“天王”出马有关。

党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的时候，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形象清新，尤其注重清廉的形象。民进党在选举中向传统价值“勤政、清廉、爱乡土”的回归，力图利用年轻世代的清新面孔重新唤回民众对民进党的信任，重新博取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在政治价值上的认同。就目标而言，通过与有贪腐纪录的政治人物进行切割，通过选举的方式将他们淘汰出去，与为党的机体补充新鲜血液，使民进党恢复活力，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所以，民进党世代交替是价值观念的世代交替，同时也是政治形象的世代交替。

民进党的世代交替夹杂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剧烈的派系重组。民进党目前派系重整的主要任务，就是排除陈水扁在党内的影响，将扁系势力逐渐清除出去。包括不为陈水扁背书、阻止扁系势力作为公职候选人代表民进党参加选举等，蔡英文的一系列举动，“党内同志心知肚明，主要关键还是如何切割阿扁残存的旧势力，不让他有机会再‘兴风作浪’。”[①] 而党内的“天王”级人物因为自身实力的不同及在党内地位的不同，对世代交替的态度也不一样。2009 年 10 月，游锡堃抛出“天王”不该参选直辖市长的“政治分赃”说，认为大老不应跟年轻人抢位子。[②] 这种说法被认为是专门针对气势正盛的苏贞昌而言。在 2010 年的民进党中央权力核心改组中，扁系势力一败涂地，仅陈其迈因为王定宇的“礼让”才进入中执委的名单，基本上已经被排挤出了民进党的决策核心圈层。

由于扁系成为民进党内多数人要疏离的对象，所以在对扁系的斗争中，民进党以前世代交替时的激烈斗争方式又重新出现。最典型者，莫过于 2010 年底“五都选举”提名中赖清德与属于扁系的许添财、苏焕智之间的斗争。赖能够出线的最大关键是在台南县市营造出的“世代交替”声浪，这股声浪不但曾经让缺乏行政资源的陈唐山黯然退选，也波及现任的许添财和苏焕智。有评论认为，以现任县市长之优势，许、苏两人却在民意支持度上落居赖清德之后，主因在于两人已执政八年，民众期望换人做做看。[③] 而在双方的政见发表会上，赖清德更是直言不讳地诉求于世代交替，赖清德以党主席蔡英文为例，强调“若不是新人领导民进党，恐怕党现在还趴在地上”，直指台南县市长苏焕智、许添财应“提携后进”。[④]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

① （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4 月 2 日。
② （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10 月 19 日。
③ （台湾）《中国时报》，2010 年 2 月 1 日。
④ （台湾）《中国时报》，2010 年 4 月 19 日。

中，世代交替成为有力的武器。这多少反映出民进党内对世代交替已经有若干共识，不过不同者是，陈水扁这样的丧家之犬是要被快速“交替”掉的，而对于苏贞昌这样在党内仍有发展前途者又另当别论。

2008 年以来，民进党遭受的重大打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世代交替的速度。但同样是世代交替，接班者却发生了变化。学运世代已经整体没落，幕僚世代则成为接班的主体。相比较而言，幕僚世代长期追随政治人物，政治历练比较完整，但也更加务实，他们比学运世代的理想色彩更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进党未来准备接班的这一群人对民进党中央和政治山头领袖的依赖性更强，当然，不同山头之间的激烈斗争又当别论。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经受了世代交替的冲击，政治山头领袖也不一定被彻底边缘化，他们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保存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在政治山头领袖影响力仍在的情况下，与山头领袖的关系及能否得到党中央的支持就成为年轻世代政治人物能否出头的决定性因素。

三、世代交替与民进党的未来发展

民进党这次世代交替对民进党未来发展关系重大。原因在于，这次世代交替对民进党权力结构以及行为模式的变化会有较为重大的影响。

世代交替加剧民进党派系[①]的“山头化”倾向。2005 年派系解散之后，民进党的派系“山头化”倾向就越来越明显。以陈水扁“正义连线”为中心的派系格局崩解，民进党的派系运作呈现离散式的特征。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派系以某一政治人物为中心聚集而成，派系的组成与分解以政治资源的分配为中心要素，单纯以政治理念为中心组织派系的情况会越来越少，派系的兴衰取决于政治资源取得的数量。具有这种特征的派系会更加强调选举的有效性，政治人物会更加理性和务实。现在讨论民进党派系的时候，已经不得不把陈菊系统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陈菊因为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聚集了一批党内政治精英，俨然已经形成一个新派系。未来幕僚世代出身的年轻世代进入权力核心之后，民进党政治山头的重新分化改组会变得更加频繁，直到形成新的力量平衡。

① 本文所谓的“派系”和“政治山头”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笔者认为民进党的派系本来就是一个个的政治山头。但是在表述的时候，在有的地方还是按照学界的习惯称其为“派系”。

陈水扁执政八年来使民进党形成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认知，也导致他们对民意变化变得非常不敏感。民进党世代交替将打破这种局面，重新以选举为中心组织政治活动。年轻世代这种务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向民意的回归，以及对民进党发展路线的检讨，这种检讨不大可能直接涉及政治路线，但是最后会对政治路线产生影响。所以说，民进党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呼应社会的需求，而不是闭着眼睛对社会需求视而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进党在后扁时代，世代交替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与民意互动模式调整的过程。在世代交替基本完成后，民进党的政治生态大致回到90年代初的状态，当时选举路线是党内的主流政治路线，“党内各世代、各派系同心协力，分进合击，攻城略地，执政宏图清晰且准确的呼应社会脉动，”① 意识形态诉求比较而言处于较低的位阶。这种情况对民进党而言意味着政策诉求向民生议题层面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在岛内政策和两岸关系上向更加务实方向转化的可能。

目前来看，民进党处于世代交替的关键时期。民进党传统政治山头领袖在短期内还有舞台，但是长期看他们的势力正在逐渐衰落，2012年可能就是他们最后的表演。他们衰落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以来活跃于政坛，在选民中形成的光环逐渐消退，同时也因为政治资源分配问题引发党内不满，导致部分支持者流失；（2）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他们的新鲜感消失，换人做做看的声音会渐趋高涨起来；（3）随着年轻世代的崛起，新老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麻烦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老一代政治人物渐渐淡出。尽管老一代的政治人物可以一时将某一批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压制下去，但是显然抵挡不住一波波的攻击。

不过，如上文所说，民进党的世代交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年轻世代政治人物如果想在党内形成优势，成为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按照以前的经验，如果要成为一个比较稳固的派系或者说是政治山头，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能代表派系不断取得选举的胜利，不断以政治资源的分配巩固和加强派系凝聚力。目前民进党内似乎还看不到哪个年轻政治人物有这样的出头机会，而且，在“天王”迟迟不能退位的情况下，还没有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足以挑战他们的地位。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年轻世代政治人物不能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派系和政治山头，取代上一世代的能力会受到

① （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4月6日。

相当限制，年轻世代要在上一世代的阴影下挣扎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在政治上占据了要津，但是却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性。到头来，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还是无法摆脱上一世代的控制，这无疑会阻碍年轻世代的发展。

能够在台湾政坛保持长期活力的政治人物，一定要具备两个特点：（1）要有长期为民众制造愿景的能力；（2）要有控制内部精英团结在自己周围为自己所用的能力。前者涉及个人魅力塑造问题，后者涉及政治资源分配问题。自90年代以来无论是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均具有这两个特质。在以直接选举决定领导者的社会中，个人魅力的营造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未来民进党内领袖人物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是陈水扁式的。当然，由于时空的不同，模式会稍有变化，但是大的方面则不会改变。目前民进党年轻世代中比较具有全岛性影响的政治领袖人物，只有蔡英文一人而已。其他年轻世代的政治人物，不能说没有具此特质者，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展示舞台。

民进党世代交替的速度取决于两个方面：（1）“美丽岛律师世代”衰落的速度。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丽岛律师世代”中苏贞昌影响力比较大，谢长廷如果要再起，难度会相当大。苏贞昌能否继续延续政治生命的关键取决于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和2012年的最高领导人选举，如果在这两次选举中苏能代表民进党取得一场胜利，其政治生命会自然延长，否则2012年后就是苏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2）年轻世代自己政治斗争的基本样态。在政治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年轻世代为了抢占有利地位，会展开激烈角逐，这个过程会持续较长时间，直到最后形成几个比较稳定的政治山头，在民进党内形成新的力量平衡。这个过程异常复杂。目前民进党的世代交替工作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现阶段民进党基本态势分析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林　劲

民进党下台回到在野地位至今已有两年，随着台湾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相关的朝野互动，其各方面情况也经历相应的演变。本文就其基本态势作一初步分析。

一、现阶段民进党气势回升状态分析

首先考察民进党下台时的基本状态，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点，这必须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2008 年的败选使民进党回到了 2000 年以前的政坛地位，但是影响力却完全不同以往。2000 年以前的民进党，高举“清廉、勤政、爱乡土”和“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的旗号，俨然是一股改革、上升的力量。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金，民进党的清新形象得到相当部分民众的认同。民进党在一些地方县市执政的成绩，也使许多人对民进党上台执政充满期待。但是，经过 8 年的执政，经济不振、乏善可陈的执政绩效让台湾民众失去期待；不断挑动族群矛盾，使台湾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而贪腐速度之快、程度之严重，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如果说执政之前的民进党昭示着某种“台湾人出头天”希望的话，那么重新在野的民进党其声望则跌至谷底。

另一方面，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台独”理念依旧是部分台湾民众难以改变的政治信仰，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台独”思潮的产生及蔓延，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不管是一种感情倾向，还是一种利益考量，都确实反映相当部分台湾民众的群体意识。“台湾人出头天”是台湾人血脉相传的愿望。虽然民进党失去了执政权，“台独”声浪无法持续高涨，但是“台独”思潮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退。民进党败选在于其执政效能低下和贪腐严重，而不在于统独民意的变化。从选举结果可

以看到，仍然有四成的民众坚定支持民进党，尽管他们并不完全是因为追求“台独”而支持民进党，但是这股民意依然不可忽视。经过8年执政，民进党在党员人数、组织规模、政治能量以及基层经营方面都已今非昔比。同时还应看到，在今后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政党轮替将成为常态，民进党仍然有上台执政的机会。

民进党下台至今的发展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09年“8·8水灾”为界限或者转折点。

第一阶段，在下台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民进党处于士气极为低迷、内部人心涣散的状态，有人甚至断言民进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难以恢复元气，更谈不上东山再起。而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蔡英文成为重新在野后的民进党主席，其学者背景和女性特质，强调对话沟通的行事风格，使台湾社会期待她能率领民进党重回中间路线，但她在民进党的历练太浅（党龄很短），缺乏政党领袖的魄力和号召力，又与民进党“草根”、“暴力”的习气格格不入，所以领导能力受到普遍质疑。同时陈水扁贪腐弊案裹挟部分民进党基层群众，对党中央造成空前压力，严重伤害民进党形象，制约民进党转型。在大陆海协会陈云林会长访问台湾期间，蔡英文发动示威抗议活动，率领群众包围晶华酒店，最终无法掌控局面，而造成抗议群众与警方数度爆发流血冲突，引发台湾舆论的批评。下台后一年多的民进党，一方面，党内各方沟通不畅，高层决策失效混乱，基层民粹主义盛行。另一方面，由于丧失执政地位且历尽四次选举挫败，资源大为减少，中央缺乏经费，地方人心涣散，党内争夺有限权力资源更为激烈，更加不择手段，矛盾更为尖锐。再一方面，陈水扁家族弊案对民进党构成很大的伤害，但是党内却始终不敢与陈水扁切割，部分成员仍然坚定支持陈水扁，这严重伤害该党的社会观感。总之，民进党呈现从未有过的多方面危机。

因此，从各种民调来看，虽然马英九民意支持度骤降，但是民进党民意支持度却没有相应上升。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民进党处于穷于应对危机和难以整合内部的状态。

第二阶段，在2009年发生的“8·8水灾”中，马英九政府的应变和处理能力及行政官员的态度引发社会极大的不满，这似乎给予民进党信心与希望，而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失误和内部问题，作为转机，民进党自始声势有所回升，并且订定“531计划”（即2009年底县市长选举力争5席；2010年底五都选举力争3席；2012年大选力争夺回执政权），有人甚至扬

言，倘若2011年底类似“8·8水灾”的事件重演，不排除民进党有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而后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几次选举，民进党都取得较好的成绩，党内的凝聚力有所恢复，蔡英文的领导能力和风格逐步得到肯定，其地位且谈不上如日中天，不过已经得以稳固，尽管受到某些大佬的挑战，但是连任党主席的可能性很大，可谓“时势造英雄”。不难看出，民进党气势止跌回升，并非自身洗心革面、检讨及调整路线而重新出发的结果，而是马英九执政团队的一再失误及国民党内部问题所造成的。

二、民进党在路线选择和本土论述方面的检讨

前已述及，下台之后的民进党并未调整两岸关系政策，有其主客观原因，但在路线选择及本土论述方面有所检讨，这对于其后的进一步调整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2008年“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连遭挫败后，民进党再次面对路线选择的问题。尽管内部“台独基本教义派”和“务实派”之间围绕路线选择的争议不断，但从整体上看，民进党在政治主张上已经有淡化反体制色彩并向中间路线靠拢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选后的内部检讨中，激进“台独”路线受到强烈的批判；在其后的党主席选举中，与民进党渊源不深、被认为较温和理性的蔡英文击败“台独”基本教义派支持的候选人辜宽敏，而蔡英文上任以后转而强调民进党要证明比国民党有更强的处理政策、议题的能力，从而使得民进党不只是国民党的反对者，更是一个竞争者[①]；此外，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人物陈水扁因为贪腐弊案身陷囹圄，连带地使激进“台独”主张的道德正当性遭到严重削弱。然而，在斗争策略上，民进党似有重拾体制外的群众运动路线的趋势。在2008年的“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在“立法院”已经丧失了原先第一大党的地位，仅占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席次；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民进党更是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面对体制内权力资源急剧萎缩的残酷现实，民进党重返街头的声浪再次高涨，甚至有人主张民进党即使是要走议会路线，也应该是强

① 蔡英文：“坚持‘勤政、清廉、本土’的价值 民进党有更深的责任”，民进党新闻稿。民主进步党网站：http：//www. dpp. org. tw. /。

硬的、不惜瘫痪议事的强硬议会路线[①]。自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民进党已经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活动，特别是在2008年11月初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赴台期间，民进党发动的抗议活动更是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随后，民进党将2009年确定为“社会运动年”，并且在中央党部增设“社会运动部”，以为长期街头抗争做准备[②]。因此，民进党与社运团体再度携手在体制外与国民党抗争，很有可能成为今后台湾政治发展的生态之一。一个时期以来，民进党着力于结合社运界，突出经济、民生、环保等议题，力图掌握社会议题主导权，借以发挥影响力；同时，打着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旗号，进一步拓展中间票源。虽然民进党制造一些小型暴力事件以吸引大众传媒而凸显政党存在，但整体上仍然在体制内依循现行法律进行活动，通过选举获取政治资源，选举路线依然是民进党的主流路线。并且充分利用“立法院”这一平台，把议会路线和群众运动路线相结合，体现制衡能力，紧紧抓住国民党执政缺失不放，争取不满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中间选民，以扩大支持基础。

2008年败选之后，民进党内部开始检讨“本土论述”所存在的问题，时任主席谢长廷在谈到民进党未来的定位时指出，民进党推动的“台湾主体意识”，已经获得社会共识，未来民进党“不再垄断台湾或本土”，而必须和很多“本土政党”竞争进步性[③]。在此，谢长廷实际上承认国民党等政党已是本土政党、今后不能再乱扣“外来政权”帽子的事实。继任主席蔡英文在检讨“本土论述”时承认，“过去在政治攻防中，尤其在选举过程中，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我相信是无意的）把‘本土’窄化成一种排他性的观念。这种窄化的本土诠释忽视了移民社会最需要的包容，跟我们团结成为生命共同体的需要是矛盾的”，因此，民进党需要对其最核心的本土价值“进行重新诠释”，将“‘本土’重新诠释为一个包容性的观念，让这个社会所有的新旧移民不分族群都能共享‘本土’”[④]。这一观点无疑切中以往民进党本土论述的症结所在。然而，这种迥异于以往民进党本土论述的理念是否

① 李彦谋：“群众与议会，民进党的两难”，（台）《新新闻》，第1132期，2008/11.13－11.19。

② “民进党拟增‘社运部’519全面体检马政府”，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8/7/4/2/10087425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74252。

③ 谢长廷：“台湾维新，从民进党开始”，民进党新闻稿，民主进步党网站：http://www.dpp.org.tw/。

④ 蔡英文：“以新本土观捍卫台湾”，（台）《中国时报》，2009.03.22。

真能得到落实，外界不无疑问。一个时期以来，民进党动辄把马英九政府积极推动两岸协商与谈判的作为斥之为“倾中”、“促统”、“卖台”，甚至发动大规模街头抗争行动，再次显示民进党的实际作为仍未摆脱其“本土论述”中根深蒂固的“恐中”与“仇中”思维的束缚。诚然，作为反对党，不能期待民进党公开支持马英九大幅开放两岸交流的一系列政策，总是要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以显示政党的主体性，着力点无非寻找两岸交流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进行上纲上线的攻击，并且显示为中下层代言的姿态。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对大陆疯狂攻讦的同时，也夹带对马英九政府政策的指责；例如，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初期赴台人数和效果不如预期就受到民进党的强烈质疑，大陆援助台湾灾区的组合屋质量问题及捐款到位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两岸商签“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引发的争议，都受到民进党的激烈炒作，根据绿营学者分析，民进党主流意见并不全然反对ECFA，只是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层面尚有疑虑；ECFA签订之后造成的影响，短期内无法立即显现，但在2010年底“五都选举”中，国、民两党都会大打“ECFA牌”，ECFA的利与弊将会是两党各自的选战主轴。洪奇昌认为，ECFA绝对不是一个纯经济性议题，马英九政府未提供完善说明、回避反对党的质疑，使得ECFA议题在台湾内部无法获得有效讨论与共识。民进党对于ECFA的立场不是绝对的反对，而是在疑虑尚未得到解答之下，相对反对ECFA贸然签署。国民党当局把两岸不签订ECFA的危机夸大了，而民进党也把两岸签订ECFA的危害夸大了。赖怡忠认为，民进党领导阶层主流对于ECFA立场，多数主张不是不签，而是延后签。因为民进党对于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仍有三点疑虑：一是质疑其民主程序；二是在台湾的国际经济策略上，国、民两党有本质性的差异；三是ECFA对区域战略形势造成的影响，有不同判断。ECFA对于“五都选举”的影响，赖怡忠预测，尽管国民两党的判断不同，但都会大打ECFA牌：国民党对ECFA效果充满信心，认为有助于五都选情；民进党也会把ECFA带来的负面影响当成主要诉求，因为ECFA不只不利基层的劳工农民，甚至白领阶层也会受害。①

本来民进党最值得注目的发展潜能，表现在于充满高性能的调整能力。但是下台之后的民进党，至今尚未表现出充分的危机意识，并未对路线、政策和组织等方面做出必要调整，原因在于不具有调整的迫切性且具有因为调

① 中评社台北论坛：民进党的因应对策 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2010年5月10日。

整而发生内部分裂的危险性，简言之，调整两岸关系政策对于现阶段的民进党来说：一是不具有迫切性，因为已经下台，不必直接面对两岸关系，而这一阶段的选举都是地方行政首长选举和分区“立委”选举，涉及的主要是地方建设和民生经济等议题；二是不自找麻烦，调整两岸关系政策需要经过党内的讨论和酝酿，势必引发激烈的争议，甚至导致内讧，一动不如一静；三是顾不上，党内的整合及一系列事务尚且难以处理，又面对接踵而来的若干选举。

时至今日，民进党尚未对2008年的两次选举失败进行深刻的检讨，而且有相当部分党内重要人士认为两次失败的原因分别在于制度因素和候选人因素，即“立委”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和当年马英九的气势不可阻挡。最近一个时期，民进党中央正在酝酿和推动似乎为蔡英文量身打造的“十年政纲”，其中如何调整政策路线还有待观察，尽管“十年政纲”目前还停留于建构框架阶段，但是如此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绝对无法回避涉及两岸关系路线及政策等重大问题。当然不论是推动的过程或者最终通过的时机，还是议题讨论及炒作如何与选举的结合，民进党都将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进行精密的算计。

2010年5月2日蔡英文在“十年政纲”对话座谈会上表示，民进党愿“在不预设政治前提下，不排除与中国进行直接实质对话”。意味民进党将对大陆政策进行调整，绿营基本教义派仅有零星异见，迄今未出现具有规模的反对声浪。

这当然与隐晦的论述方式有关，就文字而言并未脱离早期较为开放、走中间路线的两岸政策，改变的是“态度”，民进党策略很明确，要为重新执政做准备。前立委林浊水说，蔡英文采取“稳健台独的方向”，这是绝大多数党员支持，社会接受度也比较高；民进党从不排除与中国接触，做全方位的对话，如果条件成熟，他赞成党主席访问中国。前新系大老洪奇昌则肯定蔡英文论述是“积极且正面”。若干知名的绿营学者专家解读蔡英文讲话的意涵并且探讨民进党与大陆实质对话所需的环境、形式、时机与挑战等问题时认为，蔡英文5月2日说的“不排除在不预设政治前提下，与中国进行直接并实质的对话，精准地传达台湾人民的观点”，是民进党的主流意见，也是一贯立场。尤以“不预设政治前提”至为重要，代表民进党并未公开要求中共放弃一中原则，也不要求中共接受民进党的台独主张。陈淞山相当肯定蔡英文的说法，认为民进党不只为“十年政纲”出炉做准备，也在为重

新执政做准备；民进党展示自信与能力去面对内部的挑战与外部攻击，并破除一般人以为民进党恐共惧共、逢中必反的心理。民进党中央应积极鼓励党公职与县市长参加两岸各领域的论坛和交流，以实际行动传达民进党愿意进行两岸对话的态度。赖怡忠认为蔡英文的讲话有四个重大信息，即对中国大陆表示善意，在国际上表明民进党非逢中必反，在策略面上掌握党内与中共接触的实质主导权，以及重申不预设前提的立场。余莓莓则以“正视现实、期待未来”八个字总结蔡英文谈话，并希望中共也可以搁置争议，双方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展开对话。双方展开对话的形式，就如同蔡提出的“堆积木”方式，从亲近绿营的学者先交往，取得默契，铺陈双方互动基础；从底层开始接触，有助于相互理解、取得共识，也希望大陆求同存异、与时俱进。①

蔡英文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回归民进党原来的主流观点，之所以让人产生“中国政策”调整的观感，与陈水扁执政后期在两岸关系上采取激进路线有关。蔡英文解释说，“胡六点”要求改掉民进党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但党纲强调，2300 万人决定台湾前途，“这是所有台湾人都该坚持的事”；至于“实质谈话”并非“领导人面对领导人”，而是多层次、多面向的对话，民进党智库、学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下和中国交换意见，“不需要一下子就政治程度地坐下来谈”。民进党以往予人逢中必反印象，并且被蓝军贴上“锁国”的标签，这对亟欲重新执政的民进党，是不可承受之重，蔡英文释出较为稳健务实的大陆政策，是期待中间选民看到民进党的态度转变，进而争取认同。

可以认为，蔡英文这一表态显示民进党调整政策的态度变化和思考方向，应当给予肯定。从对台工作的角度考察，似乎应该把握和利用这一契机。通过一个时期以来的观察，在民进党失去执政权、实力下滑、声势处于低迷状态的时段，并非做民进党及绿营民众工作的有利时机，因为在执政的 8 年期间民进党与大陆结下较深的怨恨，这需要一定时间及相关工作予以排解和消除；而另一方面，民进党不少政治人物因为 2008 年两项选举的失败而失去权力和利益，甚至失业，大陆可以成为他们今后发展的空间，当然也有部分民进党人士通过与大陆的交流沟通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源。

① 中评社台北论坛：蔡英文释友善讯息 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10 - 05 - 06

三、现阶段民进党派系的基本格局

民进党的派系与生俱来，逐渐发展成为多元化及共治的局面，运作机制也趋于完善，总体而言，派系多元化及共治的状况是民进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该党的型态、性质、体制及其演变相适应的，事实证明这一方式对于党内生态平衡及总体发展具有的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意义。

民进党内派系结合的基础在各个时期、各个派系都有差异，但总体上脱离不了利益结合这个基本点和共同点。自党的五全大会将“台独”条文列入党纲后，党内路线、意识形态的斗争逐渐平息下来，派系开始出现多元化发展，随着党的转型推动，进入体制，采取选举路线，中间派系崛起，各派都朝务实方向发展，利益结合成为派系结合的根本和基础，对派系的认同就很难以意识形态和理念来进行区分，而反映在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派系利益的争夺与冲突，有时甚至是个人恩怨，

民进党各派系实力历来是以公职人员数量为标准，各个派系的核心人物大都是全台性“民意代表”（“立委”、“国代”等）和各级行政首长，中坚分子也是掌握一定资源的各级公职人员，各级公职人员无疑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党员支持及选民基础。因此各派系实力的衡量以公职人员数量为标准是有一定依据的，也切合实际情况的，其他国家及地区也是以此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一方面反映社会支持基础，另一方面体现该派在政坛的地位。

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主政之后凭借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而成为民进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民进党原来“派系共治”的格局随之逐渐转变为陈水扁“一人独治”的局面，原本操纵民进党的派系退居权力边缘，出现派系淡化的迹象。同时派系发生了重新洗牌，建党初期的两大派系之一——美丽岛系趋于消亡，大部分成员投靠了正义连线；另一派系——新潮流系则继续稳定发展，许多成员占据要津，是最有战斗力的派系，但其实力的强大引发其他派系的危机感，为此组成反新潮流的战略同盟——即所谓的“主流联盟”，不过“主流联盟”因为内部矛盾重重而没有发挥作用；被称为御林军的陈水扁嫡系派系——正义连线则急剧扩张，一度成为拥有“立委”人数最多的派系。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里，主导民进党的派系就是陈水扁的正义连线、新潮流系、谢长廷的福利国连线，其龙头人物把持台湾当局及民进党的重要职务，拥有绝大多数党籍的公职人员，中执委、中常委的

席次基本上呈“三强鼎立”的局面，苏贞昌的势力基本上与新潮流合作。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正义连线和新潮流系实力上升迅速：

正义连线作为陈水扁在党内的嫡系队伍，自然“水涨船高”及应验“西瓜偎大边”效应，得以迅速发展。陈水扁亲信团队中分为两帮：一是夫人帮，即吴淑珍插手推荐的一批人；二是马永成为首的童子军（所谓“罗马”，罗文嘉实际上已淡出陈水扁的执政团队），多数年龄低于马永成，属于陈水扁嫡系的嫡系。正义连线另一龙头人物沈富雄，此人常与陈水扁意见相左，思维敏捷，很有个性，一直被排斥于核心之外；高志鹏为陈水扁心腹，缺乏历练，难以成为领军人物；游锡堃则公开依附于陈水扁及正义连线。

新潮流系依靠自身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团结协作、扎实经营而逐步发展，实力大增。该派系注重内部民主协商，注重培养梯次人才，若干重要人物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占据“国安会”秘书长、党中央秘书长、中央党部部门主管及海基会董事长等要职，引发党内某些人士的公开抨击以及其他派系的警惕和不满。新潮流的发展还在于逐步朝务实、理性的方向调整，在新生代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吸引力。平心而论，该派系的壮大对民进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 新潮流系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有一批理论水平较高、热心党务工作的中青年党工，对民进党的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 新潮流系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一批长期从事社运的工作者，有一批长期为公职人员辅选、助选的人才，有一批为“民意代表”担任助理的青年幕僚，这有利于民进党进一步开拓社会基础，扩大支持力量，尤其是更广泛地争取中下层民众的支持。

3. 新潮流系与台湾各界各阶层青年有较为广泛的接触，聚集大批年轻的支持力量，包括相当数量的外省籍第三、四代，这在中央党部的正副主管以及地方党部都占有一定的分量。

4. 新潮流系曾经是陈水扁、谢长廷以及党内某些无派系背景的重量级人物林义雄、蔡英文等不能不借用及联合的力量，而该派系凭借自身优势，左右逢源，利用各种矛盾及竞争，获取最大的派系利益。

到了陈水扁执政后期，民进党内的派系生态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各派系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趋于激烈化，陈水扁在摆平各派系矛盾冲突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陈水扁政府的施政无能，尤其是连

续爆发一连串贪渎弊案，引起党内以新潮流系为主的部分成员的强烈批判，并引发了各派系之间特别是非新潮流系与新潮流系之间的激烈斗争。2006年，为了改善外界对民进党派系林立的负面观感，同时让非新系的各个派系抒发心中不满，在时任党主席游锡堃的主导下，民进党全代会通过了解散派系的决议，规定未来党内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对外募款，召开会员大会，邀请政务官报告，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退出派系。但是，这一决议丝毫没有改变民进党根深蒂固的派系政治生态，事实证明解散派系不过是一句口号、仅仅少了一块招牌而已，派系活动转入地下，日常运作依然如故。在2008年“总统”大选提名过程中，民进党内逐渐形成以陈水扁和有意竞逐2008年“大选”的游锡堃、谢长廷、苏贞昌等几位天王级重要人物为核心的新政治圈子，外界一般分别称之为“扁系”、“游系”、“苏系”和“谢系”，从而使得民进党派系运作模式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变成主要以特定重要人物为核心，而不是以往那种以特定派系名称来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在2008年的“立委”和“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过程中，民进党派系之间展开激烈恶斗，期间所造成的伤痕至今仍然影响着派系之间的互动。

2008年5月陈水扁下台后，其政治影响力迅速衰退，民进党终于摆脱陈水扁“一人独大”的局面。派系生态再度重新洗牌，尤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于陈水扁下台及其家庭弊案的冲击，扁系有如“树倒猢狲散”，实力大幅削弱；而原新潮流系[①]的实力则相对有所上升，并再次引发其他派系对新潮流“一派独大”的警惕和忧虑[②]。为了在未来的民进党内占据有利的位置，各派系无不竭尽全力展开竞争，在党内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派系运作有可能再度回到以往“共治”的局面。

一个时期以来，民进党客观上存在着若干天王级人物，这些人在党内各有自己的山头和势力，都曾经担任过重要的公职和党职，有着较为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具有一定的声望。尽管他们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似乎阻碍党内的世代交替，并且一直是媒体关注和炒作的重要对象，有损民进党的形

① 2008年9月，原新潮流系进行了改组，并改名为“台湾新社会智库”。参见“民进党新潮流吹熄灯号 告别叱咤风云24年”，中国新闻评论网：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doc/1007/4/2/4/100742479. html？coluid = 7&kindid = 0&docid = 100742479。

② “高志鹏：新潮流一派独大，蔡主席妳错了！”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gb. chinareviewnews. com/doc/1007/0/0/6/100700622. html？coluid = 7&kindid = 0&docid = 100700622。

象，但是他们对于民进党内部的整合及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在涉及党的重大利益或者公职选举时，他们一般都能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力争党的利益的最大化。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民进党大陆政策走向分析

海峡之声厦门站　陈从新

民进党作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代表及主要在野党，其大陆政策势必会对两岸关系深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民进党失去政权后，虽然党内要求检讨其政策路线的声浪不断，但始终未见民进党有实质性的动作。本文将从该党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对两岸交流交往的态度以及两岸政策理念的彰显方式三个层面入手，研究分析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走向，掌握其趋势与规律，同时，因势利导，防范与化解对两岸关系的不利影响，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一、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

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是岛内政党大陆政策的核心，而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又取决于政党的建党理念。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秉持“台湾主权独立”的政治诉求，并把它写入“台独党纲”，视为其“神主牌”。虽然随着形势的发展，民进党对其“台独”主张做了一些调整，但无论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开创台湾经济新局决议文”，还是今年推出的“十年政纲”，都只是为了现实需要做了一些外形的改变，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始终没有摆脱“台独”路线的束缚，这也决定了民进党在两岸“一边一国”关系的政治定位上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民进党制定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未来两年中，为重夺政权，民进党会对其大陆政策进行一定的策略性包装，但进行根本性、战略性转型即放弃“台独党纲”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在可预期的较长时间内，民进党不会软化“台独”立场，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也不会贸然“急独”。

首先，“台独”在岛内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台独”路线是民进党可以继续运用的筹码。在台湾政治变迁过程中，在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各

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在“台独”势力刻意操弄之下，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不断上升，实际上，目前不少反对“台独”的台湾民众，已不再将“台独”视为一种无法接受的政治诉求，而只是担心“台独”会破坏台海和平并危及台湾安全。国民党执政后，两岸关系逐渐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大陆持续强化“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各种惠台措施，但台湾民众统“独”立场并未有实质性改观，甚至“仇中”、“反中”情绪还有所升高，支持“台独”的比例不减反增。台湾《远见》2009 年 11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赞成“台独”的比例较之 2008 年 4 月上升了 8 个百分点，达到了 29.3%，而主张“两岸各方面差不多可以统一”的较之前下降了 5 个百分点，认为“两岸差不多没必要统一”的则上升了 2 个百分点。在此种民意状况下，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恰恰迎合了部分民众所谓当家做主的心理需求。因此，“台独”路线是民进党可以继续运用的筹码而非包袱，这是民进党拒绝进行路线转型的根本原因。

其次，牵制路线转型的激进势力强大，民进党缺乏路线转型的现实基础。当前，激进派或基本教义派在民进党内占据舆论优势，主导着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而且这股势力对于民进党基层群众影响巨大。而当前务实派对民进党路线转型的探讨仅是零星的、试探性的，未形成规模效应，无法对民进党现有权力格局和政策主张形成结构性冲击。在多数民进党人眼中，“台独”是民进党“安身立命”之本，因此没人会也没人敢站出来鼓吹放弃“台独”。蔡英文在回应“胡六点”时便明确拒绝放弃“台独党纲”，由她主导的“十年政纲”也刻意回避两岸定位，表明民进党并未打算进行路线转型。目前，民进党内所谓务实派与教义派的讨论或分歧以及可能会有的政策微调，本质上都只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没有背离“台独”的核心价值。此外，民进党内派系林立，各怀鬼胎、各有盘算，很难形成共识促成民进党大陆政策转型。

第三，蔡英文受本身的立场及性格的局限，尚难有效整合相关力量推动民进党路线转型。蔡英文曾是李登辉炮制“两国论”的重要参与者，还曾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主委”，“台独”思想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台独”立场。从政治性格看，蔡英文并非理念型政治人物，而是典型的务实派，身段柔软，性格内敛，善于以退为进，当上民进党主席以后，不断地根据民进党组织文化调适自己，加强与各派系的沟通，使自己的地位逐渐得到巩固。从“台独”理念看，蔡英文倾向于“务实台独”，即推

动“台独”“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两岸交流“好处照拿、‘坏处’照骂”。在路线转型问题上，由于蔡英文在民进党内资历较浅，而且没有派系资源，为避免引火烧身很可能会向基本教义派作出妥协。蔡英文受本身立场的限制及性格上的局限，又缺少派系的强力支持，很难主导与推动民进党路线转型。

第四，两岸交流交往效果无法立即彰显，为民进党进行民粹操作提供了空间。两岸正常的交流交往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主流民意，但两岸关系层多面广、错综复杂，互动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负面现象。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元素的作用下，两岸经济交流难免对岛内个别领域、个别群体形成一定冲击。例如，两岸签署 ECFA，虽然长期利好值得期待，但短期阵痛几乎不可避免，对岛内弱势企业和弱势群体均会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由于中间环节过多，近年来大陆倾力推出的各种惠台措施，惠及的多数是商家巨贾而非普通百姓。这些因素使民进党有机可乘，为其继续进行民粹操作提供了空间，这是民进党有恃无恐拒绝路线转型的重要原因。

第五，选举的连续胜利与气势的不断回升，降低了民进党路线转型的紧迫感。选举成败是民进党进行路线转型的重要动力。民进党在 2005 年 12 月县市长选举、2008 年 1 月“立委”选举及 2008 年 3 月“总统”选举的接连遭受重创，客观上反映了主流民意对其执政能力、大陆政策的否定。但是，下台近两年来，民进党并没有以党的名义从大陆政策角度作深刻反思。既然没有认定问题出在大陆政策上，因选举考虑而调整大陆政策的紧迫感显然会大大降低。同时，在 2009 年 3 月苗栗县“立委”补选、9 月云林县“立委”补选、12 月县市长选举，以及 2010 年 1 月 9 日“立委”补选、2 月 27 日“立委”补选中接连获胜，反而让民进党人形成“即使不调整大陆政策，仍旧可以打赢选战”的错误认识，无疑会进一步坚定民进党坚持“台独”路线的决心。

二、对两岸交流交往的态度

下台以来，民进党一直对两岸交流交往持排斥态度，动辄指责马英九当局的两岸交流交往是“倾中卖台”，“逢中必反”的情绪较重。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逐渐走出扁家弊案及执政失败的阴霾、整体气势不断回升的情况下，民进党高层认为未来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为争取更多民

众的支持和认可，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加强交流交往是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不排除在不预设政治前提下与大陆展开实质性对话”，也显示民进党内部已意识到，只有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才能使民进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以目前民进党的态度看，虽然短期内不会摒弃“台独”路线，但不排除在“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基础上，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在两岸经贸、人员往来等方面采取更为弹性的策略。原因在于：

1. 面对两岸交流日益扩大的大势，民进党不改变保守政策，会日益边缘化。当前两岸关系快速改善与发展，两岸三通已经实现，两岸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然呈现，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将快速增长并越来越广泛，也就是两岸交往的不断密切，其附加的经济利益自然也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与大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的态势，不希望两岸关系重新回到对抗的时代。面对此种趋势，民进党也意识到，如果不调整对两岸交流的态度，仍“逢中必反”、“逢马必呛”，“为反对而反对”，只能是得不偿失，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机。

2. 民进党突破基本盘，争取中间选民，扩大支持基础的需要。台湾政治生态大致可分为泛蓝、泛绿及中间三大板块，其中泛蓝、泛绿在政党认同光谱上分别倾向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结构相对稳定，中间选民的政党归属感与意识形态则较弱，流动性相对较大。台湾《远见》杂志今年 2 月的民调显示，泛蓝与泛绿民众分别占 36.6%、23%，中间选民则达 37.6%。民进党虽在一系列地方选举中连胜，但也清醒地认识到，民进党下台后并未进行实质性改革，胜选不是因为重获岛内民众认可，而是拜泛蓝民众因对国民党执政不满不参加投票所赐，民进党在几次选举中的得票数始终限于泛绿基本盘即是证明；而民进党要想染指 2012 年“大选”，争取和拉拢中间选民尤显重要。中间选民一般相对务实，更看重政党的形象与治理能力，特别是岛内主流民意关注的焦点逐渐向民生议题转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能推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大陆政策，适应大多数民众的需求，就会把中间选民推向国民党，导致政治版图更严重的萎缩。这是民进党所不愿意看到的。

3. 民进党内部要求检讨大陆政策声音不断浮现，务实派对两岸交流交往越来越理性。民进党长期以“恐中”、“仇中”心态处理两岸关系，反对两岸交流交往的扩大。但两岸交流交往使两岸民众获益颇多，并获得大多数

民众支持。事实表明，民进党排斥两岸交流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正因如此，高雄市长陈菊不顾党内反对，带团到大陆访问。此举对民进党形成不小的冲击，也引发了民进党一些人士的反思。民进党前“立委”李文忠、嘉义县长陈明文、民进党“立院党团书记长”高志鹏等相继提出应该在民进党内重新启动“中国政策大辩论”。虽然这种声音难敌深绿人士的反对无疾而终，但也显示民进党内部对大陆政策持正面意见的大有人在，并且有的已经付诸行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深谙台湾政治生态，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声音不可忽视，迫于深绿势力的压制，虽不能对现行的大陆政策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但必须做出一些策略性的包装以满足务实派的诉求，以达到平衡党内派系的目的。

三、两岸政策理念的彰显方式

两岸政策的彰显方式，是指民进党有关大陆政策的政策理念的表现方式与手段。2008 年岛内政党轮替后，民进党不但失去了政权，无法掌握行政资源，在“立法院”也仅有不到 1/4 的席位，不足以影响任何法案的通过；在地方上，则只掌控了 6 个县市。面对行政资源的严重萎缩及两岸关系快速发展，民进党内“激独”势力实现“台独”的危机感与焦虑感上升。为争取岛内政治话语权，民进党采取议会路线与街头路线相结合的方式，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极力彰显两岸政策主张。如借“奥运牌”、“三鹿奶粉事件”、“达赖牌”恶毒攻击大陆，恶意攻击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暴力抗议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大肆抨击马英九的“积极两岸、消极美台”是错误战略；极力反对“扩大小三通”、“包机直航”和“陆客去台”，认为“大三通”使台湾“主权倒退”；主导民进党重拾街头运动，扬言“会在街头时时见面”、“重回抗争年代”。杯葛议事，以霸占主席台、反锁屋门等方式阻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的通过等。虽不排除在特定时期民进党仍会采取暴力手段，但从长远看，其大陆政策的彰显方式将逐步回归温和、理性。未来民进党将继续采取议会路线与街头路线相结合的方式，更注重体制内抗争，减少暴力方式，特别是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公投”将成为民进党主要运用手段。

首先，台湾民主制度走向成熟让激进、暴力路线没有市场。经历 20 多年的政治转型，台湾民主制度逐渐走向成熟，选民不希望搞民粹式的悲情动

员，也不希望政党非制度性的恶斗。近几次选举结果表明，民进党每逢选举屡试不爽的悲情牌、统“独”牌、族群牌开始失灵，靠攻击大陆，制造“仇中”、“恐中”情绪，捞取选举利益的手段开始失效，采取暴力手段更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指责与唾弃。如果民进党继续搞“暴力抗争”，与台湾人民求和平、求安稳，搞经济、顾民生的主流民意相抵触，只会让民进党的形象更受伤，无法获得岛内民众的认同，更无法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其次，民进党的激进、暴力路线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民进党重拾街头路线，搞“暴力抗争”，“国际观感”差，与美国等西方社会倡导的民主价值背道而驰，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更不符合岛内民众的普遍愿望。

总之，民进党作为岛内最大的在野党，受其政治理念的限制，其大陆政策将呈现出“小讨论、小调整、无转型”的总体特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坚定不移地做好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保持对岛内“台独”势力的心理威慑；要充分利用当前两岸交流交往的大好形势，更加深入地做好争取台湾民心工作，把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塑造成为不可逆转的台湾主流民意；要灵活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有针对性地做好对民进党的分化瓦解工作，减少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阻碍。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马英九就任党主席以来相关言论意图解读

全国台湾研究会　杨立宪

马英九就职已满两年，在国共两党特别是两党领导人胡锦涛与马英九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处于1949年以来最好的状态，堪载史册。但在大好形势下仍存在着隐忧，如两岸政治谈判尚未展开，敌对状态尚未正式解除，军事互信机制尚未建立，和平协议尚未签署，两岸政治互信尚处于低级阶段，两岸在涉外事务方面的龃龉不时发生，和平发展究竟能走多远在许多人心中尚存疑问。鉴此，笔者特将2009年10月马重任党主席以来所发表的涉及两岸关系的重要言论予以整理分析，试图从中找寻答案，以此作为我们判断马大陆政策立场有无变化的参考依据，并作为深入研究之用。

一、马英九主要言论

马英九身兼党政一把手8个月来，有20多次重要讲话或文字报告谈及两岸关系，包括：2009年10月17日在就职党主席记者会上的讲话；10月18日接受路透社专访；11月17日在国民党中山会报上的讲话；12月接受“德国之声”、亚洲《华尔街日报》和德国“国际政治”期刊的专访；12月15日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的谈话；2010年元旦讲话；1月13日在台“外交”部门会议上的讲话；1月19日出席妇女总会活动时的讲话；1月21日接受中视《挑战面对面、唱旺台湾》节目专访；1月26日在旧金山与“百人会”餐叙时的讲话；今年首篇“治国周记”；2月15日在中坜市新春团拜时的讲话；2月17日接见美国众议员单勃纳一行的谈话；3月4日对25县市妇女会干部的讲话；4月6日与哈佛大学师生举行视讯会议时的讲话；4月13日接见巴拉圭外长时的谈话；4月17日在秀朗国小谈ECFA；

4月25日在“双英辩”上的演讲；4月27日接见外宾时的讲话；4月30日在“总统府”财经月报上的讲话；5月5日接受CNN专访；5月上旬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5月12日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5月14日接受台中央社专访，5月19日就职两周年讲话等。

总的来看，马对两岸关系的战略思考不脱两年前520就职演说的框架，但在具体内容及策略层面也有一些新想法，概括如下：

一、两岸互信要点滴、长期积累，和平要循序渐进。两岸关系发展大方向正确，两岸斗争几十年，两方能建立一些互信非常不容易，值得珍惜。两岸交往的正确之道应该是点点滴滴、长期积累互信，说到做到。协议执行得好，互信会更多。两岸关系发展的顺序应是“先推动和解，再走向合作，最后建立和平”。两岸目前要优先处理经贸问题，ECFA只是开头，还有一系列协商会在未来若干年进行。ECFA签署后，双方经贸关系定会更密切，往来会更多，呈现和平繁荣画面，有助于和平延续和后续问题的解决。要争取让同为炎黄子孙的两岸人民，能够在中华民族智慧的导引之下，找出两岸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不是短程可以达到的目标，也不是立刻就要解决，但能够一步一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双方最有利。①

二、经济比“外交”重要，台必须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台湾以外贸立足，必须与国际接轨，不能搞封闭自锁，否则没有生路。“外交孤立还好处理，经济孤立则是要命的事。”台湾地理位置优越，四周被全球第1、第2、第3、第5大经济体包围，存在着作为区域跳板的潜力，两岸直航后潜力更大，但过去未能充分运用这个优势，损失了10年的时间，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因应东协加一，台湾必须积极调整全球布局，以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为起点，让两岸经贸关系制度化，同时寻求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洽签FTA（自由贸易协议），加速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整合，提升台的竞争力，把台建成“全球创新中心、经贸枢纽和全球台商总部”，避免在亚洲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被边缘化。与大陆签署ECFA之后，与其他国家签署FTA会更顺利，并将进一步降低两岸紧张关系。民进党的全球化是没有中国大陆的全球化，所以不现实不可行，国民党将带领台湾开展

① 见2009年10月17日就职党主席后在记者会上的讲话，12月接受德国媒体专访；2010年4月6日与哈佛大学师生举行视讯会议的谈话，5月14日接受台中央社专访，5月19日在就职两周年记者会上的讲话。

黄金10年，重新领先亚洲“四小龙”。①

三、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相辅相成、平衡推动。台的国际参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处理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但不会一厢情愿将台的对外关系完全寄托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会采取平衡原则，让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同步前进。台“外交”政策的核心是重建与所有主要国际伙伴，特别是与美国的互信，让台海由一触即发的热点转变成区域和平繁荣的管道，成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如此一来才能营造更好环境，让过去的敌人成为现在的朋友，让每个国家都是赢家，“让台湾成为在国际社会被尊重的国家，对国际发挥正面影响力。”“外交休兵并非外交休息，更不是外交休克或外交休假，而是双方不再斗争、恶斗，不再为了邦交国而花钱，或为争取邦交牺牲很多价值。”相反，要从事“正派、人道的外交”，让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提高，而且是正面的形象。两岸和解的效应已经超越台湾海峡到了国际社会，可见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已是良性循环，希望“从零和到双赢，继续往前迈进”。②

四、台应以“和平缔造者”姿态开拓新局。台湾已从经济发展走向社会多元、“自由民主”，“越来越成熟”，若能把东亚冲突热点之一的台湾海峡解除紧张，将是“台湾人对区域的最大贡献”。中国大陆近年来快速崛起，但在“民主制度、人权保障、法治水准、创新设计与生活品质”等层面，与台湾仍有一定差距。应对台湾价值与制度充满信心，“让自由民主成为台湾人昂首阔步的精神标志”。当台湾不再是麻烦制造者，透过协商、消除对立来共创两岸双赢，台湾的优势将被加值、放大，并吸引全球资源投入，大家共享“和平红利”，台湾仍是最主要的获利者。新局势一旦形成，将为台湾拓展出许多新空间，例如参加国际组织或签订多边协议，为台湾找出活路、开创新路，让台湾“尊严”与“主权”获得体现。③

---

① 见2009年10月17日就职党主席后在记者会上的讲话，12月接受德国媒体专访，2010年元旦祝词，1月21日接受中视《挑战面对面、唱旺台湾》节目专访，1月26日在旧金山与“百人会”餐叙时的讲话，2月15日参加桃园县中坜市新春团拜时的讲话，3月4日在台南县对25县市妇女会干部的讲话，4月6日与哈佛大学师生举行视讯会议的谈话，4月17日在台北县秀朗国小谈ECFA，4月25日“双英辩”，4月30日在总统府财经月报的讲话。

② 见2009年11月17日在国民党中山会报上的讲话；2010年元旦祝词，1月13日在台“外交”部门会议上的讲话，1月19日出席党务基层社团妇女总会活动时的讲话，1月26日在旧金山出席侨宴时的讲话，1月28日在洪都拉斯举行记者会的讲话，4月6日与哈佛大学师生举行视讯会议的讲话，4月27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

③ 见2010年第1期“治国周记”。

五、台会继续向美军购，但不会要求美国为台湾而战。两岸因实力不同，台湾不会和大陆搞军备竞赛，买武器是汰旧换新，让“国防”达一定水平，同时创新不对称战术，增加安全感与自信，以小搏大。台美坚强稳固的安全关系，对两岸和解环境的促成具有重要相关性，在向美采购必要的防御性武器加强军队实力的同时，台也会努力加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并透过不同管道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争议。台“不会要求美国为台湾而战”，“在我任内不会发生战争!”“无论是已废除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后来的台湾关系法，都不是美国出兵协助台湾的根据。”“讲这些话不但有必要，而且要大声讲，展现身为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自我防卫决心。”“不畏战也不求战，这才是有骨气、勇敢的台湾人!”。①

六、台将坚守“尊严”和“主权”，捍卫“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过程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包括自由民主制度、多元开放社会，都是了不起的成果”。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不只要缅怀过去，也要面对现在，策励将来，必须让人民有信心，让未来比现在更好，展现出真正的台湾精神。台湾实际上现在所执行的是民国35年所制定的“一个中国的宪法”，“1991年修宪至今18年都未变，即使民进党执政8年，也一样尊重这一点。”大陆虽坚持自己的“一个中国原则”，可台湾是采“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目前“宪政运作方式”相对最好，任何变更现状的作法，往往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进步。各界对于要不要“修宪”没有共识，也非当务之急，“修宪”门坎很高，社会成本很大，“将透过修法、大法官解释、建立宪政惯例等方向来推动宪政改革”。②

七、处理两岸问题必须兼顾历史因素、政治现实和台湾人民的感受。台海冲突肇因于国共内战，两岸历经60年分治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标准。中国大陆不论立法或政治主张都不放弃使用武力，在这种情况下不相信两岸能签署和平协议。台坚持“国家主权地位”，愿意与大陆就相关议题展开协商，“但惟有大陆政府尊重台湾的民主体制、不否认台湾的政治现实、放弃预设的政治前提以及撤除针对台湾的导弹，谈判才有可能在对等、

① 见2010年2月17日接见美国众议员单勃纳一行的谈话，4月6日与哈佛大学师生举行视讯会议的谈话，5月1日接受美国CNN卫星连线专访，5月5日的谈话，5月14日接受台中央社专访。

② 见2009年底与记者茶叙时的谈话，2010年4月6日与哈佛大学师生举行视讯会议时的讲话，5月15日在“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5月19日在纪念就职两周年记者会上的讲话。

尊严和互惠的原则下进行”。两岸关系大幅开放才2年，很多扎根工作没做好，经贸关系基本建设阙如，ECFA只是简单实例，希望这些问题处理后再谈政治问题。不排除有朝一日与胡锦涛会面，但必须等双方在重大话题取得共识后，见面才有意义。任何事一定要水到渠成，待足够条件出现，包括许多经贸议题有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解决，气氛变得更好后，也许这种机会才会出现。①

八、台还没有为两岸未来定位找到答案，任内不会与大陆谈统一。两岸未来定位，还需要更多时间让两岸民众，以中国文化作为基础来选择最好的生活方式。两岸能否达成统一得看未来数十年情势的发展，目前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现阶段任何躁进的政治选择，不论急统或急独，都会引起严重的对立与纷扰，没有一方可以获利，周边国家也连同受害。任内不管4年还是8年，都不会与大陆谈任何有关统一的问题。两岸政策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并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虽然台湾有些人对目前的大陆政策有所质疑，但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会“择善固执，持续推动”。两岸已形成“一种可维持的现状”，即大陆在口头上“搁置统一主张”，台湾则“克制‘台独’诉求”，共同致力维护和平。两岸要在政治上找到共同点，还有长路要走，台湾人民“宁可保持现状，并深化双方的互动，把统独问题留给后代决定。”②

九、德国模式对两岸关系有借鉴作用，台湾不可能“芬兰化”。马认为，两德与两岸的条件很不同，“一个德国、两个国家”的原则不适用于两岸，但“德国模式的精神，比方说相互尊重、正视现实和彼此合作”，“努力谋求和平共存之道”，值得两岸借鉴。两德在1972年签订“基础条约”，相互承认对方的领土和统治权，随后分别加入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互不代表对方，不过都以统一为最高目标。另一方面，不存在“台湾快速芬兰化”的情况，将台湾从美国在亚洲盟邦中排除也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③

---

① 见2009年12月接受德国媒体“国际政治”的专访，2010年5月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5月19日在就职两周年记者会上的讲话。

② 见2009年10月18日接受路透社专访；12月9日接受德国媒体专访，12月15日主持中山会报的讲话，12月15日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的谈话，12月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专访，2010年元旦祝词，4月6日与哈佛大学师生举行视讯会议时的讲话，5月8日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5月14日接受台中央社专访，5月19日在就职两周年记者会上的讲话。

③ 见2009年12月接受德国媒体专访，2010年1月2日讲话。

二、马英九言论及意图解读

总的来看，马对两岸关系的宏观长远思考尚不脱“国统纲领”和“520就职演说”的框架，如：认为台现行“宪法”即“一中宪法”，两岸为“特殊关系”——既非一国内部的关系，也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现阶段“不统不独不武”，维持现状；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主张累积互信，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以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主张对外关系与两岸关系平衡，同时下好台湾、大陆、国际社会三盘棋；主张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秉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顺序，寻求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以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作为两岸走向双赢的起点；等等。

但认真比对可知，马目前在两岸政策上的态度，较之前特别是当政以前，有所发展或微调。例如：

马关于两岸互信要长期点滴积累、说到做到，遵循“和解－合作－和平”三步骤的谈话，表明马认为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要坚持“九二共识”，遵循“三先三后”的规律，更要有诚意有耐心，让时间、让后代、让中华民族智慧来解决问题。马提出的三步骤，反映了他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思考。按照这一思路，2005年国共达成五项和平发展愿景就是实现和解，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的两岸互动就是实现合作，两岸合作的结果就是实现和平发展，其途径是通过密切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往来，互利互惠，增进情感，化解敌意，累积、巩固并扩大互信，待条件具备时进入政治谈判阶段，商签和平协议。这一思路实即“过程决定论”，体现了事务发展以量变促质变的发展规律。

马关于台湾地理位置特殊、经济比“外交”重要、必须签署ECFA的系列谈话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金融危机重创台湾经济、祖国大陆经济一枝独秀、两岸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马更深切地意识到，经济是民生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台湾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祖国大陆，只有签订ECFA，才能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生路和出路，才能避免台在亚洲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才能再造台湾发展的黄金10年，并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双赢，同时，这一步也关系着马个人及整个国民党执政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马已将个人的政治赌注押在此案上。

马关于不能把台湾对外关系完全寄托于两岸关系发展的谈话，较之“大选”期间提出的“外交政见”有所微调。马萧“外交政见”称：将“在兼顾尊严前提下，从共同利益出发，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在互不否认的情况下，与对岸展开务实协商，寻求彼此可以双赢的平衡点”。但最近半年多来，台在涉外事务问题上有许多动作事先不与大陆打招呼，表面上不再挑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但实际上并未放弃“入联”的目标，不过在策略上有所调整，改为优先加入事务性功能性的组织，如国际卫生、气象、海事组织等，目的是突显台的“独立主权”，避免对大陆依赖过深，造成被动。这种做法目前虽在可控范围内，但显然并不利于两岸增加互信，也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形势不协调。

马关于要缔造和创造台海和平、以和平立足的系列谈话，将“和平”的价值与“民主自由人权”并驾齐驱，这不啻给台的两岸政策划出了一条底线，即：无论两岸关系多么难处理，都不能以破坏台海和平为代价，必须在维护和平的架构下寻找出路。马自认这是台湾“面对全球竞争最好的、独有的棋路”暨“赢的战略”，将使台湾站在好的制高点上，立于不败之地。换言之，马的两岸政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在确保台湾自主性和维护台海和平的底线之间寻找空间——维护两岸和平但不致伤害台的自主权，维护自主权但不致破坏两岸和平。马自信台在两岸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品质的竞争中仍占有优势，只要树立“和平缔造者、和平创造者”形象，不做“麻烦制造者”，就能赢得世界的同情与尊重，就能在与大陆的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显然是一个新思维。

马首次表明“不会要求美国为台湾而战”，某种意义上等于降低了对美国保护台湾的期待值。此言一出引起民进党及“台独”势力的强烈反弹，马索性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清楚讲明白，无疑给了“台独”势力以当头棒喝，也让台湾民众从中有所醒悟。从逻辑上看，马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马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把话说白说透而已，美国对此并未表示异议，反而肯定马降低两岸紧张关系的努力。[①]

马关于目前“宪政运作状况相对良好”的谈话，主要是对长期以来岛内要求修改或重新制订“新宪”的回应，表达不会大修“宪法”的态度，根本目的应是为了维护两岸和平的政治基础——“一中宪法”，反对“法理

① 中评社台北2010年5月4日：AIT肯定马英九降低两岸紧张努力。

台独”，避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节外生枝、重蹈紧张倒退覆辙。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马在接受德国《国际政治》和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实际提出了处理两岸关系应“三兼顾”和确立“五前提”，较之上世纪90年代国民党当局提出的政治谈判“三前提”（即：承认台是对等政治实体，不打压台的国际空间，放弃对台用武）更为具体，突出强调民主体制、政治现实、大陆撤导等，其中第三条要求大陆“放弃预设的政治前提”（合理怀疑应指大陆制订的反分裂法）显然是高难度要求，不啻于升高了两岸和谈的门槛，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设置了障碍。当然就客观条件而言，在马当局民调数据没有明显提升、年底“五都选举”未能达到预期三赢的目标、第8届“立委”选举国民党不能保持绝对优势、马英九连任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两岸和谈之说亦不现实。

马关于两岸“统独问题”留给后代解决的系列讲话表明，“维持现状、三不”（不统不独不武）说辞已由当初某种权宜之计调整成现阶段的战略方针，马已从“国统纲领”和“两岸终极目标是统一”的立场后退，与民进党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立场接近，有将两岸“分治”现状法制化、正常化、长期化的打算。这固然与形势变迁、台湾主流民意希望维持现状、两岸统一条件尚不成熟、马英九面临竞选连任压力有关，但这种言论无疑会让许多盼望两岸早日统一的大陆同胞和海外华侨感到失望，引起人们对马“位置变了脑袋也变了”的怀疑。美籍华裔教授杨力宇在与马对谈后发表的“马英九对两岸统一似乎非常抗拒”的一番话，不啻佐证了许多人对马“拒统”的担心。

马虽然承认考察德国15次的结果，感到德国模式很难套用于两岸关系，但在内心深处却希望或幻想两岸关系能比照德国模式办理，故而在接受德国重要期刊《国际政治》专访时，详细列出了两德相处之道，特别提出“德国模式的精神，比方说相互尊重、正视现实和彼此合作，努力谋求和平共存之道，值得两岸借鉴”等，对照马2006年访问哈佛大学时提出的“国际参与的暂行架构（MODUSVIVENDI）”的新概念，[①] 这一谈话意涵颇值得玩味和关注。马关于台不可能“芬兰化”的谈话，表明其既不想成为中国大陆的“附庸”，也不想完全受制于美国，而试图在美中台三者之间搞平衡，谋

① 见马英九在哈佛大学发表《台海和平与繁荣新愿景》的演说，2006年3月23日中央日报。

求台湾利益的最大化。

三、小　结

概括而言，马就任台领导人两年来，对两岸关系实力对比逆转及台湾面临的严峻形势，均较前有更多的认识与切身感受，其大陆政策总的来说就是要搞“四大平衡”，即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与美日的关系中找平衡，在维护台湾的“主体性”与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找平衡，在兼顾历史、现实和台湾人民感受当中找平衡，在平衡蓝绿两大对立阵营与争取2012胜选连任中找平衡。平衡点在于：坚持“一中宪法”及“九二共识”，维持两岸“分治”现状，拼经济优先，和平发展至上，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协调发展，循序渐进。目的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陆崛起的新形势，争取两岸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掌握主动权，通过和平发展壮大台湾经济，用两岸和平赢得的时间换取台湾的生存发展空间，确保台湾在两岸乃至全球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至少双赢。台《联合报》在虎年伊始时评价马的两岸战略是：“希望透过两岸和解、美台合作，争取一至两代的和平来发展台湾，既等待中国变化，也争取国际支持；至于统独问题，则交由未来的台湾人决定。”①

按照胡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讲话，目前的两岸关系应是以和平统一为指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两岸同属一中”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以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协商谈判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胡总书记还指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奋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要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理解、信赖、关心台湾同胞，体察他们的意愿，了解他们的诉求，为他们排忧解难，满腔热情为台湾同胞多办好事、多办实事，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最广泛地团结台湾同胞一道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将两岸领导人的讲话放在一起比对可知，双方有分歧也有交集。分歧在

① 联合报2010年1月2日《马英九跳出统独不同李扁》

于：大陆坚持国家统一的方向，台则除了维持现状外无明确方向；大陆反对台向美军购及寻求美国安保，依法抗“独”，台则努力向美军购并寻求美国支持，反对“预设政治前提”；大陆力促政治谈判建立军事互信，台则设置诸多前提条件强调等待时机成熟；大陆主张两岸为命运共同体，要共同奋斗实现民族复兴，台则少谈或避谈“共同论”等。共同点在于：都主张两岸法理统一，反对台湾搞“法理独立”；都主张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都主张面对现实，建立互信，搁置争议，共创双赢；都主张优先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循序渐进。

应该说大陆和马英九之间还是有起码的政治互信和共识的，马执政两年来，两岸关系大体上还是沿着和平发展的轨道稳步向前推进的。双方之间的分歧起因复杂，虽未在马执政后加深，但也不能期待在短短两年内就解决。联系到这两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台独”势力不甘心下台并因两岸关系大幅改善充满危机感而全力打马，加之马执政初期缺少经验小错不断，造成民意支持度大幅下滑面临连任的不确定，大陆对马目前在两岸关系上相对保守的态度应尽量理解包容体谅，给马以折冲的时间，让时间和实践来验证两岸和平发展路线的正确，并进而变成台湾内部支持马连任的动力，再进而推动两岸关系沿着和平发展轨道稳步前进，力争在马第二任内达成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的目标。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马英九上任以来台美关系的发展及其前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　严安林　蒋晓燕

2008 年 5 月国民党的重新执政，对台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大影响。马英九致力于修补被陈水扁破坏的对美关系，重建互信，不仅使台美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在美国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①

一、马英九当局对美政策的目标

“重建台美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是马英九对外重要主张，他认为对美关系是台湾生存最重要的关键，应当以“积极、乐观、审慎”的态度来处理对美工作。对美政策的目标是重建台美政治与安全“盟友”关系。

（一）重建“台美互信”是第一要务

由于陈水扁执政后期一直不断地挑衅两岸关系，操弄美方信任，将台湾的“国际地位”作为内部政治斗争筹码。马英九当局认识到对美关系当务之急是“重建与美国的互信”，并以实际行动证明：其执政团队是一个“和平缔造者”，而非“麻烦制造者”。2008 年 5 月在“就职演说”中，马英九将对美关系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定位美国是台湾“安全盟友及贸易伙伴”，为此，一是表示将“编列合理的国防预算”，向美国“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坚实的国防劲旅”；二是重申“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理念来处理两岸关系，维持台海现状，以迎合美国对台海的维持现状的政策；三是提出希望发展与美国“没有意外”的关系。政党轮替后

① “2008 年的美台关系”，美国《美国之音电台》，2008 年 12 月 18－19 日播发。

被派遣为“驻美代表”的袁健生称，马英九上任后，“台美关系的主轴就是重建互信”。①

为了提升台美互信程度，马英九不断寻找机会向美方展示其与陈水扁不同的“外交”理念与行事风格。2008 年 8 月中旬，马英九出访中南美洲，借“低调过境”美国机会，争取美方好感。台湾媒体认为马英九“低调过境”美国的目的就在于“赢得重建实质外交所需的互信”。②

（二）保证与强化台美军事关系

在马英九当局看来，台美军事关系的巩固与强化，不仅是台美政治上重建互信的需要，加强与巩固台美政治关系需要，也是台湾整个对外政策的战略重点之一，马英九称：台美坚强稳固的“安全”关系，对两岸和解环境的促成，也具有重要相关性。③ 因此，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强调要加强对美军购。马英九在会见美“贺使团”时再次承诺，“新政府”将会维持每年 GDP 的 3% 的“军购”预算，台湾会展现“自我防卫”力量。之后，只要是与美方国会议员或是重量级人士会面，马英九都会强调台美军事关系重要，尤其是对美军购的期待。2008 年 8 月 22 日，马英九在接见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副主席白嘉玲一行时称，在两岸情势缓和之际，台方仍会持续加强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期待美国行政部门尽快把台湾请求采购的七项武器系统通知国会”，让“台湾国防维持有效的自我防卫水平。”④ 2008 年 8 月下旬，台军方送达“立法院”“2009 年度预算书”中，首度以“准同盟军事关系”定位台美关系，提出台军方 2009 年施政目标是着眼于重建“台美互信与巩固双边关系”，强化对美各项军事交流与合作，与美国维持良好“国防”关系，协力建构台海和平稳定机制与环境。⑤

---

① “修法阻美牛，袁健生：美方圣诞节休假都在关切”，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09 - 12 - 30。

② “驻美代表袁健生 7 月上任”，台湾《中国时报》，2008 年 6 月 25 日。

③ “马英九称台美关系对两岸和解有重要相关”，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10 - 02 - 17。

④ “马吁美批准军售，独缺 F—16”，台湾《联合报》，2008 年 8 月 23 日。

⑤ “台军方首度以‘准军事同盟’定位台美关系”，http：//news. ifeng. com/taiwan/5/200809/0902 _2935 _758534. shtml。

（三）加强对美高层沟通

2008 年 5 月 20 日上午，马英九结束“就职仪式”后会见外国访问团，最先会晤的就是由卡德为首的美国“贺使团”。卡德转交小布什给马英九的亲笔信函，马英九也交付卡德一封亲笔信函转给小布什。7 月 22 日，马英九会见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美台商业协会理事主席沃尔福威茨时表示：“台美关系已进入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美国不必再忧虑台湾会做出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① 8 月 22 日，马英九与王金平、苏起、欧鸿炼等讨论强化台美及台日关系，认为台美关系的症结点是双方互信基础不够，美方对台仍有疑虑，决定继“陆委会”主委赖幸媛衔命访美后，再派层级较高的官员访美，特别是与美国国会、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加强沟通与联系，加强互信。②

台美“国安高层对话”的恢复是台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机制始自 1996 年，每半年举行一次，在陈水扁执政的 2006 年中断。2008 年 9 月 1 日苏起率“国安团队”抵达华府，此行的最高战略目标是“重建台美高层互信”。苏起会谈的对象是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吉姆·杰弗里、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韦德宁等美国官员，也与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官员晤谈。③ 马英九称台美“国安高层对话”的恢复强化彼此间互信。④ 11 月 4 日，奥巴马正式当选美国总统后，马英九在第一时间以亲笔信函致贺奥巴马。⑤

二、马英九当局对美政策的特点

（一）对美政策具有平衡两岸政策的考虑

强化与美国关系是马英九当局为平衡两岸和平发展形势而确定的战略目标，对外关系与两岸关系同步发展是其政策的基本准则，即两岸关系向前发

①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版，2008 年 8 月 3 日。

② “加强台美互信，台当局将派高层出访”，http：//news. ifeng. com/taiwan/1/200808/0822 _ 351 _ 738863. shtml。

③ “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极机密访美”，台湾《中国时报》，2008 年 9 月 7 日。

④ “马总统：新两岸政策，美中台三方松口气”，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5 月 29 日。

⑤ “马亲笔致贺，盼台美友谊稳固发展”，台湾《中国时报》，2008 年 11 月 6 日。

展同时，推进台湾与美国关系的发展，甚至在马英九当局战略思维中，把台美关系发展摆在两岸关系前面，是居首位的政策重点。薛瑞福称："我认为我们应避免的情况是，台湾越来越靠近中国大陆，越来越远离美国，这不是个零和或一种交换。台湾应该可以在改善两岸关系的同时，和美国维持强劲的关系。"① 所以，马英九强调，台湾在改善两岸关系与"邦交国"关系的同时，也不会忽略经营与美、日的关系，"希望能在所有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② 主要表现为：一是提出强化与美国"传统盟友"的关系，马英九称"我们要强化与美国这一位安全盟友及贸易伙伴的协作关系"。其考量正如陈一新所言："马英九的国安团队当然明了，无论是战略的规划、武器的采购、市场的进入、世贸组织的议题磋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国际组织的参与、两岸外交休兵的落实，以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监督，不是几乎完全仰赖美国，就是唯美国马首是瞻。"③

二是以"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与美国对台海政策的基本目标相一致，"不独"主张与陈水扁当局推动"极端台独"政策大相径庭，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也符合美国所追求的"两岸维持基本现状"诉求，尤其是"不统"主张，包括马英九曾宣称"在有生之年不会统一"的判断，完全符合美国对台海的政策目标。

三是在马英九当局战略思维中，台美"军购"优先于"两岸军事互信"。2009 年 4 月 22 日，马英九向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为时尚早，继续对台"军购"对台美关系十分重要。马英九清楚地在"台美军购"与"两岸军事互信"间的优先次序做了选择。

四是通过加强台美军事关系来平衡与大陆经济的密切化。马英九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员单勃纳称：64 亿军售是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政府的法律义务，也是保障台湾安全、促进两岸和解对话的重要政策。"美国对台军售建立台湾政府和人民的信心及安全感，以面对与中国大陆进一步的和解"。④ 因此，台湾《中央日报》公开认为，"若是要平衡倾中现象，倾美

① "2008 年的美台关系"，美国《美国之音电台》，2008 年 12 月 18－19 日播发。

② "马：台仍需美安全协助"，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6 月 20 日，A17。

③ 陈一新："稳定两岸，别冷落台美外交"，台湾《联合报》，2008 年 8 月 5 日。

④ "马英九称台美关系对两岸和解有重要相关"，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10－02－17。

无疑是一种选择方案，因为台湾毕竟力量太小，要单独来面对大陆政经压力会非常吃力”。①

（二）寻求美国支持其两岸开放政策

2009 年 2 月 12 日，马英九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美国可以在两岸关系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鼓励两岸维持现状。”② 同年 7 月中旬，“陆委会”主委赖幸媛访美四天，与美方行政部门、国会、智库及媒体多方接触，说明马英九当局对推动两岸和解政策的立场与考虑，寻求美方的理解与支持。苏起并公开提出：马英九当局的对外策略就是要建构“和中、友日、亲美”的格局，台湾和这三个对方关系都是平行的，“没有谁重谁轻的问题”。这是苏起代表马英九团队第一次对于台湾与美国、日本及中国大陆的关系的定位做如此的表述与阐述。他说，“美国是台湾安全最大的支柱，过去台湾最穷困、最危险时，谁支持台湾，当然是美国。”“台湾和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的关系都不能偏废，还得平行进行，对台湾才是永久之道”。③

（三）对美政策要重点兼顾美国利益

台湾与国际社会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从来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马英九团队许多人都是长期留学美国的高材生，对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非常明了，所以，马英九当局对美政策是在追求台湾政经利益基点上，力求与美方取得一致，而不是如陈水扁之流强人所难。其中积极争取对美“军购”便是考虑到美方国防工业集团的切身利益。卜睿哲称，美台双方当局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与战略是相当重要的，“相反，不能兼顾双方利益，双方开会层级有多高都无关紧要。”④

（四）特别重视美国国会议员与智库

2008 年 5 月后，美国联邦众议员先后访台的有施密特、科斯特罗、邓

① “中央日报：反倾中又反倾美，台湾孤立无援”，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10 - 01 - 08。

② “马英九表达对美三期望，称美在两岸扮建设性角色”，http//news. ifeng. com/Taiwan/3/200902/0213 _ 353 _ 1010769. shtml。

③ “苏起：台湾若反中，美日根本不理你！”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09 - 12 - 24。

④ 卜睿哲：“台湾的民主：回顾与展望”，台湾“中央社”，2008 年 11 月 26 日华盛顿电。

肯、欧提兹、霍尔顿、詹森、卡普安诺、布朗、李宾斯基、费伦、安格尔等。马英九在2008年共接见美国客人31批次，有三个特点：一是马英九非常重视同美国国会互动，因为美国会是支持台湾主要力量，美国会议员以及“台湾连线”成员是台方花大力气做工作的对象；二是马英九充分了解美国主要智库在美国社会影响力，因此，只要是美国主流智库来台，只要是在台湾召开学术研讨会，马英九一定会见美方代表；三是马英九非常重视同美国非政府组织交流和沟通，因为这是台湾在目前状况下能比较充分发挥其软实力的领域。

三、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及其特点

美国政府对马英九上任以来表现，包括马英九当局对美政策、两岸政策等基本上是满意的。无论是小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延续了历届美国政府对台海基本政策，即“一个中国”、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尤其是美国对台政策，基本上“以台湾关系法为依归，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大变化”①。薛瑞福称，美国应该在贸易、“军售”与“安全”等议题上继续支持台湾。② 美国对台基本政策要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肯定马英九的两岸和解政策

马英九当选让美国对两岸局势“松了一口气”。美国主流观点认为，台湾2008年3月大选结果——马英九当选，由此结束了陈水扁挑衅两岸的时代，开启了两岸良性互动的新时代，甚至是达成某种协议的好时机。在马英九当选后第一时间，白宫发表布什总统书面声明，祝贺马英九当选，称相信这次选举促使台湾成为更繁荣、安全、更妥善治理社会，相信“这次选举提供两岸一个新的机会来进行接触和往来，以和平化解双边歧见。”③ 美国政府对两岸政治关系趋向缓和表示“乐见”，甚至认为两岸气氛由紧张、僵持走向缓和与和平对美中关系也有帮助。2008年5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考马克在例行记者会上主动表示，美方恭喜台湾的马英九“就职”，

① “司徒文：美台关系不会有惊天动地变化”，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09－10－22。

② “2008年的美台关系”，美国《美国之音电台》，2008年12月18－19日播发。

③ 台湾“中央社”，2008年3月22日台北电。

也欢迎可以降低台海紧张的做法。[①] 2008 年 7 月 9 日，小布什在日本北海道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中称，美方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表示高兴。7 月 16 日，美国太平洋军区司令基廷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场研讨会中称，与 15 个月前相比，台海当下“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发生冲突。7 月 30 日，小布什在白宫与亚洲媒体会面时，主动对两岸关系现状表示“十分满意”，他说：“我承认，是花了不少功夫才能如此”。[②] 8 月 10 日，布什在北京与胡锦涛会面时说，美国对两岸关系获得改善而感到高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在 2008 年年底曾经戏称：过年“终于可以好好休假”了，因为在民进党当政时期，一到过年就担心陈水扁又会搞什么花样，让人“提心吊胆”。[③]

小布什政府是如此，奥巴马政府也持同样观点。2009 年 2 月 12 日，奥巴马政府举行第一场外交政策发表会，新任副国务卿史坦伯格表示，美国为“两岸关系进展而喝彩”，“根据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将尽力鼓励双方和平解决分歧，并进一步加强关系，包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流，这也是两岸领导人近几个月的重要成果。我们赞扬这些努力，也支持两岸对话。”[④] 同日，美国新任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在国会称：台海安全不能仰赖军事力量，而要由两岸达成某种安排。[⑤] 2 月 15 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表示，希望看到台海两岸关系继续改善。[⑥] 5 月 1 日，白宫亚太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在“百人会”年会的活动中表示，两岸和解这件事“在经历八年之久的反向运动之后，终于得以加速，我们乐见紧张情势降低”。他强调，依照《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的安全防卫“有某种义务”，但是美国不希望两岸之间出现紧张，“那不符合美国利益”，如果两岸达成降低紧张的协议，“我想不出美国政府有任何理由亮红灯或黄灯”。[⑦] 10 月 19 日，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坎贝尔在华府演讲时称，美国支持两岸和平对话，鼓励两岸对话在有信心的氛围下进行。2009 年 11 月 16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与青年学

① “欢迎降低台海紧张”，台湾《联合报》，2008 年 5 月 20 日，A6。

② “布什对两岸现况‘十分满意’”，台湾《联合报》，2008 年 8 月 2 日。

③ “马‘总统’重申‘活路外交’，强调‘元首’出访重要性”，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3 月 18 日。

④ “美副卿：为两岸关系进展喝彩”，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2 月 14 日，A11。

⑤ “美情报总监：台海安全在于协商”，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2 月 14 日，A11。

⑥ 台湾《自由时报》，2009 年 2 月 15 日。

⑦ “两岸加强互动，美乐观其成”，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5 月 3 日，A7。

生的对话中表示，美国政府全面支持一个中国政策，非常高兴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与跨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非常希望继续看到两岸关系不断改善。①

（二）乐见两会协商、两岸“三通”

至2009年底，两会已举行四度协商，达成了12项协议与1项共识。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与规范化，尤其是两岸“三通”的实现，不仅促进了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而且让美方也看到了其中的经济利益。2009年3月18日，薄瑞光表示，奥巴马政府乐见台湾马英九当局改善两岸关系措施，此举既符合美国利益，也有助于两岸稳定和避免错估情势，两岸“三通”符合在台美商期盼。② 11月，美国副国务卿史坦伯格在“美国进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也肯定两岸关系的发展，说：“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希望两岸尽可能降低紧张、开展对话、在经济上更密切合作，“这些都是好事，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个趋势”。③

（三）支持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

美国对台湾扩大“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一直持公开支持态度与立场。2008年12月3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在由美国时代基金会举办的“海峡两岸政经关系与美国新政府”座谈会上称，“下一届的美国政府将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会支持台湾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权利。”④ 2009年1月，希拉里在国会声称，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努力，包括在世界卫生大会成为观察员”。2月间，希拉里在访华期间，再次提出中国大陆领导人要更弹性地处理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议题。美方认为，“使台湾的国际空间在台湾人民可接受形式下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台湾声音被国际听见，应是更重要的”。⑤ 由于支持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所以，奥巴马政府并不反对马英九当局与中国大陆协商台湾国际参与问题。因为美国清楚地了解：台湾之所以不能参与国际组织及

---

① “奥巴马：希望继续看到两岸关系改善”，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09－11－16。

② “薄瑞光：美中台关系，马政府处理佳”，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3月19日。

③ “奥巴马维持美中台关系架构”，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11月8日，A2。

④ “美新政府将支持台‘争取国际空间’”，台湾“中央社”，2008年12月3日台北电。

⑤ “卜睿哲看两岸：靠经济交流不够，真正问题还没来”，台湾《中国时报》，2008年12月8日。

国际组织的活动，主因在中国大陆，而台湾要参与，首先要排除中国大陆影响。所以，美方认为，马英九通过承认“九二共识”而与中国大陆协商解决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方向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

（四）持续售台武器，加强美台军事关系

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称，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将加强台湾的军事现代化，“台湾打算在今后几年提升军力，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将有助于台湾的这种努力。”① 2009 年 12 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在国会称，马英九就任后的台海情势是几年来最正面的发展，但美国必须确保两岸都无意采取军事行动，其中关键是在维持两岸的军力平衡，而“《与台湾关系法》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台海平衡”。② 卜睿哲认为，美国之所以要坚定地支持台湾，理由有四：一是依据《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二是美国内部对于台湾的支持与同情，三是维持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有助美国利益，四是为了在东亚地区与全世界保持美国的信誉。他认为“台湾能享有今日的发展成就，美国支持是非常重要因素”。③ 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室主任容安澜提出，美国维持对台基本军售，并与台湾维持其他建设性关系，对两岸关系继续改善有利无弊，因为在获得美国军售后，马英九在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上，将比没有获得军售更能赢得民众坚定支持，从而军售对中国大陆也是有利的。④ 当然，这样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完全是为了合理化对台售武的说辞而已。

美国对台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有：

其一，坚决维护其在台海战略利益。美国对台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其在台海的战略、经济等利益。基本手段则是保持对台海事务的介入，影响两岸，不甘心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被边缘化。而要维持美国在台海事务中影响力，对台军售便是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卜睿哲称，美国不会为了中国而“放弃台湾”，但台湾要维持与美国关系应该做好四件事，一是首先确保拥有一个实用可靠的防卫吓阻力量，足以因应威胁；二是相信美国会是整个东亚地区和平捍卫者；三是在台海两岸关系以及理解北京观点上，与

①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009 年 1 月 30 日。
② “美需助台维持军事平衡”，台湾《自由时报》，2009 年 2 月 14 日，A4。
③ 卜睿哲：“台湾的民主：回顾与展望”，台湾“中央社”2008 年 11 月 16 日华盛顿电。
④ 台湾“中央社”，2009 年 8 月 3 日华盛顿电。

北京建立更广泛的共识；四是与美国保持良好的沟通对话。[①] 卜睿哲意思无非是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地位与影响不可或缺。2008 年 6 月 19 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美台关系本身有相对于两岸关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要提醒大家，美国与台湾之间也有双边关系，我们希望看到台湾拥有真正的国际空间"。赖斯发言无非是要强调：美国重视中美关系与肯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强调也有"美台关系"这一边。这是美国不甘心在两岸和平发展中作用被边缘化的具体表现。

其二，坚持其对台政策两面性。在与中国大陆交往时，往往强调中美三个公报，而在与台方打交道时，刻意抬出《与台湾关系法》。如 2009 年 1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新提名人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团队形成后首次就台海议题表态时说，《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对台关系的法律基础，美国将继续信守之，同时她也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一贯立场。[②] 2009 年 3 月 24 日，在《与台湾关系法》实施 30 周年之际，美国众议院院会通过第 55 号"决议案"，重申《与台湾关系法》各项承诺，并称这些法律是"延续美国与中华民国（台湾）间各种关系之法律基础"，系美国与台湾各项关系的"基石"。[③] 再如，2009 年 11 月中旬奥巴马访问北京后，薄瑞光于 11 月 22 抵台，强调奥巴马访问中国大陆，不论是私下还是公开的声明，都没有改变美国长期对台政策，包括承诺协助保持台湾的自卫能力。针对《中美联合声明》，薄瑞光提出三方面澄清：其一，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或美中先前任何一项联合声明，都没有提到《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将《与台湾关系法》纳入联合声明。其二，联合声明只有一段与台湾有关，即"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信守有关承诺，理解和支持中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在这段后，有"双方重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根本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薄瑞光称这"完全是针对西藏与新疆议题"。他强调："谈判记录清楚地显示，这一段不是针对台湾，美国方面肯定是这样理解的"。其三，这些年来，许多美国官员促进两岸协商与两岸关系进展不遗余力，因此，声明中"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

① 卜睿哲："台湾的民主：回顾与展望"，台湾"中央社"2008 年 11 月 16 日华盛顿电。

② "希拉里：信守台湾关系法"，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1 月 16 日。

③ "美众院重申台湾关系法承诺"，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3 月 26 日，A2。

动”，不应被视为有任何特别意涵，也不能诠释为向台湾施压。[①] 在向马英九简报时，薄瑞光强调《与台湾关系法》依然是台美关系“核心文件”，称对于台湾的主权及领土问题，美国立场并没有改变，完全是依据1972年的美中《上海联合公报》；美方对于中国大陆的要求，始终以“认知”来处理。陈一新对此认为这等于是美方对台湾提出“战略再保证”。[②]

薄瑞光在台北说辞当然只是其一面之辞，只是对台方而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核心就是台湾问题，既然中美双方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双方重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根本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那么，怎么能够说这段话“只是针对西藏与新疆议题”的呢！《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及美国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表述当然适用于台湾问题，2009年11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重申了这一点。所以，薄瑞光的说法只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已，或者是有意模糊中美签署正式文件所表达的意涵，玩弄自我理解、自我表述两手策略。

其三，“美主台从”的台美关系基本格局。陈水扁当局两岸“冲突”路线，冲击与破坏台美关系，“不仅严重、直接地干扰了小布什在共同反恐的基础上，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发展美中合作的对华政策，而且一再冲击了美主台从的美台关系基本模式”，打破了过去50年来美国“以台制华”政策所确立“美主台从”的关系格局，所以，美国不满甚至批评陈水扁当局政策。马英九的对美政策以不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基本利益为考量来推动与发展台美关系，便是顾及了“美主台从”基本格局，所以，马英九当局政策获得了美方的肯定与支持。

其四，美国对台政策基本服从于对华政策，但也有制约与牵制作用。在美国对台海政策中，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是居主导地位的，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相对处于次要地位，并且是越来越处于比较次要地位，这是由国际政治的现实所决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乃至于今后比较长时间内，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基本策略。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葛瑞格森称：美台关系的基础，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项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奥巴

① “美国的两岸政策并无变化”——专访“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参考消息》，2009年12月22日，第9版。

② 陈一新：“薄瑞光也让台湾听到想听的话”，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1-27。

马政府坚定支持并执行这些承诺”，他强调，美台关系的基础建立在远超过这些法律的规范，“我们的承诺基于至深至坚的友谊，共享的安全利益，深远的经济关系，以及共同的民主理想和价值”[①]。

四、台湾与美国关系的新发展

在2009年5月，在马英九上任一周年之际，美国多位众议员肯定马英九“过去一年在强化台美互信、增进两岸对话与交流各方面的成就”。[②] 2010年1月马英九以“方向正确、互信稳固、互动频繁”12字来形容台美关系。[③]

（一）互信关系开始建立

马英九上任后台美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彼此间互信已经建立，奥巴马在布什政府对台政策与关系的基础上推进美台关系。2009年3月18日，薄瑞光在与马英九见面时，使用“温暖的感觉”、“高度的尊重”等词汇来形容台美关系，向外界“传达台美恢复互信的重要讯号”。[④] 11月5日马英九也表示，“台湾与美国高层的互信，其实非常好”。11月17日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央中山会报时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当着胡锦涛的面重申美国是基于三项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政策来支持两岸进一步发展关系，这是继2003年之后，6年来再次有这样的说法，显示“美台高层互信已完全恢复”。马英九4趟8次“过境”美国礼遇的提高就是表示了台美之间逐渐有了互信，甚至在2010年1月30日马英九提前2小时获知美方军售决定。所以，马英九说“这笔军售案并非意外，对台湾而言，这当然是台美关系很好的发展”。[⑤]

（二）AIT新馆，美在台创首例

2009年6月22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内湖新馆举行揭示典礼。台

---

① “美台关系基础远超一法三公报”，台湾《联合报》，2009年9月30日，A9。

② “美众议员连署声明，贺马‘总统’就职周年”，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5月22日。

③ “马英九：两岸关系和解，外交零和变三赢”，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1-30。

④ “薄瑞光：美中台关系，马政府处理佳”，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3月19日。

⑤ “美对台军售，马英九提前2小时获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1-30。

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称筹建新馆代表台美关系更加紧密，王金平认为这“象征台美关系进入崭新的一页”。由于这是美国第一次在非“邦交国”兴建永久馆址，苏起认为这代表台美关系已经“走过低潮，迈向稳定”。①

香港《中国评论》通讯社的社论是这样评论的：“看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则知道，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决心牢牢抓住台湾的战略利益，必须干预台湾前途与命运，决不放松！内湖新馆是美国的决心与意志的表现，岂止是一栋大楼这么简单！”② 美国在台协会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产物，所以，卜睿哲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授权成立 AIT 以与台湾维系实质关系，对台美得以提升共同利益至关重要，这是《与台湾关系法》最成功而从来没有人谈过的部分。新任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也认为：“这栋建筑，代表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③

（三）人员互访频繁

2008 年 5 月 20 日，美国总统布什派前白宫幕僚长卡德率领的 5 人庆贺团抵台北恭贺，参加马英九“就职典礼”。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罗大为、白乐崎、卜睿哲、布朗以及前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包道格等都到台湾参加庆祝活动。2009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台方派出了 20 人的庆贺团。从 520 执政之日起，马英九就开始频繁外事活动，据马英九办公室公布材料，马英九接见最多的就是来自美国代表团、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智库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等。通过接见，马英九向美国方面传递如下信息：台美关系已超过半个世纪，弥足珍贵，期盼美国扮演关键性力量，在既有互动良好关系下，进一步推展双方合作事宜；台湾将是“和平缔造者”而非“麻烦制造者”，他将以维护台湾自主性与尊严为基础，尽力改善两岸关系，创造对等沟通与和平协调平台。

（四）“引渡协定”现曙光

2009 年 5 月 27 日，马英九再度提出台美签署“引渡协定”后，28 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方了解台湾希望透过“驻美代表处”与 AIT 洽商

① “AIT 新馆揭示，美在台创首例”，台湾《联合报》，2009 年 6 月 23 日，A4。

② “马英九背后的美国影子”，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09 - 06 - 25。

③ 卜睿哲：“《台湾关系法》卅年”，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4 月 9 日，A14；10 月 23 日，A4。

引渡协定，“这件事，我们正在考虑中”，称美国与台湾执法部门长期合作，透过代表处与 AIT 数年前签署“司法互助协定”（MUAA），分享资讯与证据，但此协定不包括“引渡”。依照美国法律，“引渡”涉及两个主权国家，必须依据条约为之，但美台间并无此条约，只能用“协定”。[①] 在台方积极游说与推动下，超过 4 成美国各州最高检察长曾联名致函美国国务卿，希望希拉里向国会提出法律修正案，让“引渡”可以根据“协定”为之，而不是仅限于“条约”。尤其是美国务院官员的公开回应马英九呼吁，显示该协定的解决应该为时不远了。

（五）台美军事关系的新发展

马英九上任后，台美军事关系依然向前发展。一是美军赴台救灾，这是 1979 年中美建交后首次动用直升机进入台湾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台方人士称之为“台美重大外交事件”，马英九称是“台美双方恢复互信很重要的信号与象征。”[②] 2009 年 12 月 14 日，台军方秘密邀请“八八水灾”期间参与救灾美军官兵代表 10 余人到台湾，颁赠“八八水灾救灾纪念章”约 600 枚给美军官兵，这也是 1979 年台当局与美“断交”30 年后首度颁赠纪念章给美军。[③] 二是 2010 年 1 月台湾军方运输机到海地救灾“过境”美军基地，这是美自 1979 年与台当局“断交”以来首次允许台军机“过境”加油，台军机首度飞经美国本土，且获得美军后勤支援，“反映双边关系有所改善”。[④] 三是台美军方实质性接触、交流与情报交换等持续推进，2009 年 6 月 4 日杨苏棣在离任时公开承认：多年来，台美双方已在不具有正式“外交”关系情况下，“双方在军事上已经有非常良好的沟通机制”，“特别是高敏感的军事领域”，双方已有非常好的沟通与合作模式。[⑤] 四是美国对台军售，它既是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重要手段，也是维系美台军事关系基本工具，是台美军事关系发展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以台制华”的战略目标的体现。2008 年 10 月 3 日，布什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 64.63 亿元武器。2010 年 1 月 30 日，奥巴马政府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总额达到 63.92 亿美元。

---

① “与台协商引渡，美‘考虑中’”，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5 月 29 日，A2。

② 台湾《联合报》，2009 年 8 月 17 日。

③ “断交 30 年，台军首颁纪念章给美军”，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10 - 12 - 15。

④ “马访中美洲，美同意过境美西”，台湾《中国时报》，2010 年 1 月 24 日，A4。

⑤ “杨苏棣：ECFA 与 TIFA 相似”，台湾《联合报》，2009 年 6 月 5 日。

（六）马英九“过境”美国

自2008年5月马英九正式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至2010年3月，在近2年的时间里，马英九先后出访中南美洲4次，也因此在美国的有关城市“过境”了8次。马英九基本上遵循了“单纯”、“自然”等低调的“过境就是过境”的原则，但也不可否认的是，马英九的4回8次“过境”，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隆重”，活动也是一回比一回安排得多，“过境”美国层次也在不断地得到提高。

五、台湾与美国未来关系的走向

（一）台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1. 台美政治关系持续平稳发展。吴钊燮于2008年8月2日在离开美国前曾表示，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对美关系应定位在最高的位阶，“外交大战略应把美国摆在首位，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①] 吴钊燮谈话意在批评马英九团队“重两岸、轻美日”。由于政治立场所然，吴钊燮的观点不免偏颇。其实，综合观察马英九上任以来整个对外关系，对美工作一直是摆在首位重点。薄瑞光就肯定马英九处理美国、台湾与中国大陆三边关系政策，称马英九团队“务实与重建互信的态度，让美方对美台合作极为乐观。”[②] 因此，可以预料，在奥巴马政府四年期间，美台在高层互信、军事关系、一定层次官员互访及若干双边交往方面都将有一定程度进展。

2. 美台军售还是美国手中一张“牌”。美台商会会长韩儒伯在2010年1月1日2009年年终报告中提出了商会将着力促请美国政府对台实现四大优先议题：一是在不设定条件下，完全恢复美台TIFA谈判；二是终止军售包裹式通知国会的做法，改为分项随时通知；三是接受台湾购买66架F-16C/D型战机的申请书；四是恢复内阁级官员访台。[③] 美国未来对台军售因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未必完全按照韩儒伯设定方向走，但对台军售作为美国应对台海两岸关系一张“牌”的主动权，是美方不愿意放弃的。美国国

① “吴钊燮别华府：外交，美国优先”，台湾《联合报》，2008年8月4日。

② “薄瑞光：美中台关系，马政府处理佳”，台湾《中国时报》，2009年3月19日。

③ “美台商会：应加速对台军售”，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月3日，A4。

防部助理部长葛瑞格森公开声称：两岸关系改善本身是好事，美国与中国互动良好也是好事，但这与美国是否出售武器给台湾没有直接关系。[①] 试图把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与台美关系中的军售作适度切割，其深层意图无非是要凸显台美军售中美方的主导权。

3. 台美高层人员互访有可能突破。台湾当局一直在谋求台美高层互访有所突破。华府人士称，美方也希望与台方高层建立对话机制，奥巴马政府正寻求新模式，要与台湾进行高层次、定期对话。[②] 作为第一步，美方倾向于将在陈水扁当政时期中断的美国政府负责贸易、农业、交通与能源的内阁官员恢复访问台湾。

4. 台湾民众免签证访美现“曙光”。2009 年 2 月 12 日，马英九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提出，希望美国能比照英国，让台湾旅客可以免签证入境。“免签证访美计划”（Visa Waiver Program，简称 VWP）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的一项对待访客的政策，享受 VWP 待遇的对象，必须符合美国所定的反恐标准，美国是以此作为落实反恐的措施之一。目前全球有 27 个国家与地区的人民享有免签证入境美国的待遇，主要是西欧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亚太地区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与新加坡。台方于 2008 年初正式与美方协商民众访美免签证事宜。美国做法是如果先能够列入“观察名单”，然后才可能再获得免签证待遇。[③]

（二）若干因素影响台湾与美国关系发展

1. 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战略格局的变化。在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三角关系中，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更加重要，据主导性地位，这是由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与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离不开中国大陆的配合与支持分不开的，因为“在多极化的世界里，美国可以承认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而不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事实是，今天的问题，包括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气候变化及全球经济复苏等问题，在没有中国的参与下，很少能成功地解决。”[④] 台湾学者认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改变，是因为世界变了，尤其是中国变了，中国变富变强了，因此美国不得不变。”李侃

① “美表态将履行对台军售承诺”，台湾“中央社”2009 年 9 月 28 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电。
② “美寻求与台高层建立对话新机制”，台湾《中国时报》，2009 年 4 月 24 日，A14。
③ “今年若列观察名单，明年有希望”，台湾《联合报》，2009 年 2 月 7 日。
④ “奥巴马承认中国的实力是正确之举”，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 年 11 月 17 日。

如称："这次奥巴马与胡锦涛讨论的议题，与过去美中两国领袖所讨论的议题有很大不同：过去是讨论两国之间的问题，但今天所讨论的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确实是不得不把中国视为共同管理全球议题的伙伴。"① 为此，奥巴马公开表示，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美国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人不应当惧怕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们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的责任也在增大。"②

2. 台湾对美政策受到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影响与制约。美国寻求与中国加强战略合作，因为"美国并没有受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威胁，而将在保持与日本等传统盟友紧密关系的同时，寻求增强与中国的关系。"③ 主因在于美中经济合作已达到十分重要、十分紧密程度，美中已成为毫无疑问的经济战略伙伴，进一步强化美中经济合作，对于实现奥巴马执政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扩大美国对中国出口、加强美中金融合作等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从而"对台湾而言，美国的台海政策实质上已经改变了。这不是一般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有没有提到台湾关系法的问题，而是美国总体全球战略的根本思想转变的问题。台湾已经不再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国家利益所在。"④ 在此情形下，无论是马英九当局对美政策还是台方对美工作，都受到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战略框架的影响与制约。台美关系中"美主台从"基本格局决定了马英九当局对美政策必然受制于美国对台政策。

3. 台美间既有与未来产生的问题。台湾社会民粹主义盛行，民进党为"反对而反对"的政策导向，以及选票至上的选举文化，对台美关系都将产生不小的影响，如本来根本不是问题的美牛进口案就是因为选举而成为一个问题，甚至影响到台美间的互信与经贸关系进程。台湾政坛政治恶斗与蓝绿两极化对立现象，都是对台美关系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对此卜睿哲公开撰文点出了"台湾民主的品质将攸关美台关系的发展"的论点，他"希望台湾的民主不会成为美台安全伙伴关系的紧张与冲突来源"，"若台湾可以改善民主政治体制，就比较不会从事一些可能引发与美国冲突的政策"。⑤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① 周奕成："美国变了"，台湾《新新闻周刊》，2009年11月19－15日，总第1185期，第8页。
② 美联社2009年11月14日东京电。
③ 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11月14日。
④ 周奕成："美国变了"，台湾《新新闻周刊》，2009年11月19－15日，总第1185期，第8页。
⑤ 卜睿哲："台湾的民主：回顾与展望"，台湾"中央社"2008年11月16日华盛顿电。

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期的美国对台政策

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　孔小惠

一、美国学界围绕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期美国对台政策的争论

马英九上任后积极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两岸通过国共交流平台、两会协商，以及两岸经贸文化、产业合作、民间交流等多种渠道，两岸关系步入了和平发展时期。两岸对话和往来频繁，交流交往层次提高，相互关系步入良性互动轨道。

在两岸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华盛顿应该扮演何种角色”[①] 这个问题得到了美国学界广泛的关注。美国学界围绕是否有必要检讨及调整美国对台政策，产生了一些争论。这里把它们分为调整派和维持现状派。

（一）调整派

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时期后，美国国内出现了不少要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的声音。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多次提出美国要重新检讨对台政策，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其2009年3月5日的发表的文章中，他声称，美国虽然鼓励 海峡两岸当前的和解，但中国对台影响力快速增长，已使美国长期“维持 区域平衡”目标无法实行，美国须全面检讨政策。他指出，台海现况为美国这个目标带来广泛的挑战，“根据美国政府接触的政策专家们的意见以及最近的发展现况，显示当前中国拥有对台湾前所未见的影响力，而美国长期以来支持的‘台海平衡’这项概念，

① Kerry Dumbaugh, “Taiwan – U. S.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 Order Code RL 34683, September 25, p. 5.

难再实现。”①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创立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s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2009 年 12 月发表报告。研究员阿拉伯罕·丹麦（Abraham M. Denmark）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题为《台湾的赌博：两岸拉近关系对美国政策的影响》（Taiwan's Gamble: The Cross-Strait Rapproch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的报告中在对两岸新形势评估后说：“现在到了美国调整两岸政策以适应变化中的两岸环境的时候了。当台北和北京时间的关系改变了美国一直以来对它们的假定，华盛顿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以鼓励对两岸关系进行负责任的管理。”②

上述调整派的观点主要是倡导美国继续加强对两岸事务的介入，根据两岸环境的新变化调整对台政策，以维护美国台海战略目标与利益。而在调整派中，还有人提出美国应退出台海事务，曾经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波。美国学者季礼（Bruce Gilley）声称台湾正在“芬兰化”，呼吁美国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在 2010 年一/二月号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季礼在其题为《不太危急的海峡：台湾“芬兰化”如何有益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论文中指出，马政府上台后对大陆采取的和解政策，已使台湾一步步走向“芬兰化”的道路。他指出，自 1949 年以来，在稳定两岸局势方面，美国扮演过重要角色，今天，这个历史任务差不多走到尽头，美国应该在战略和外交上作出调整，以配合台湾走向“芬兰化”。例如：美国今后在扩大对台官式接触前，须先咨询北京政府；要重新制订与盟国之间的军事计划，剔除台湾的参与；在外交上公开支持两岸和平发展；减少向台湾转移敏感技术以免泄漏予大陆；最重要的是——重拾 1982 年对北京作出的承诺，大幅减少对台军售。作者最后说，美国撤手台海事务，也意味着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尊重，有助和缓中美关系，并减速大陆的军事发展，从而增加中国达致“和平崛起”

① Robert Sutter, “Cross - Strait Moder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olicy Adjustments Needed”, *Pacific Forum CSIS*, March 5, 2009.

② Abraham M. Denmark and Richard Fontaine , “Taiwan's Gamble: The Cross - Strait Rapproch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http: //www. cnas. 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Taiwan _ Denmark _ Dec2009 _ code502 _ policybrief2. pdf. p. 1.

(peacefully rising) 的机会。现在，正是华府作出历史性转向的时机。①

(二) 维持现状派

维持现状派认为当前美国对台政策无需进行调整，其主要代表有卜睿哲(Richard Bush)、容安澜 (Alan D. Romberg) 等人。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针对罗伯特·萨特的文章，特地撰文进行了批驳。卜睿哲不认为奥巴马政府会进行类似 1993 - 1994 年的正式对台政策检讨。他指出，美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包括和平解决两岸歧见。维持台海平衡是手段而非目标。其他的还有外交及鼓励两岸合作等手段。对大陆进行安抚有其风险性，但也有降低战争可能性的好处，而且给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两岸关系奠定了基础，这不仅是美国而且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目标。②

华盛顿智库亨利·史汀生中心 (Stimson Center) 资深研究员容安澜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会继续维持对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政策，他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对政策进行检讨。容安澜认为：“美国会继续维持对两岸关系和对台湾的政策，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对政策进行检讨。即便真的这么做了，也不会对中美关系有特别的帮助。……我认为，一致性和持续性才是美国对台政策中最重要的。”③

二、争论的背景：美国学者对美国对台政策战略环境变化的评估

这场争论产生的背景在于，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环境产生了重要变化。在他们的评估中，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环境产生了如下一些变化：

---

① Bruce Gilley, “Not So Des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 S.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0, Vol. 89,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index=0&did=1933411671&SrchMode=1&sid=1&Fmt=3&VInst=PROD&VType=PQD&RQT=309&VName=PQD&TS=1264858789&clientId=41483

② Richard C. Bush III “‘Cross - Strait Moder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 Response to Robert Sutter”,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9/0312_cross_strait_relations_bush.aspx

③ 马毅达，“奥巴马没必要检讨对台政策，也不会做两岸调停者”，《东方早报》，2009 年 11 月 5 日，第 A19 版。

（一）两岸关系缓和是美国对台政策面临的最大战略环境变化

很明显，两岸关系缓和是美国对台政策面临的最大战略环境变化。美国学者从两个方面来评估这一变化给美国国家利益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两岸关系缓和带来了一些有利美国战略利益的变化：

首先，两岸关系的平稳和更大范围的地区稳定。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朝向积极的方向发展，这符合美国保持台海局势稳定的利益。美国减轻了“台独”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困扰，并降低了对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疑虑。2008 年 7 月，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头衔访台的美国前驻台代表包道格（Douglas H. Paal）在与马英九会见时公开表示，华府“对目前的两岸关系是持欢迎态度，希望彼此能朝向正面方向持续发展，相信这不仅有助消弭亚太紧张局势、维持区域和平与安全，并有益于台湾的经济发展。”① 2009 年 2 月，美国全国情报总监布莱尔（Dennis Blair）在国会表示，马英九当选后的两岸关系发展，是美国近年所见“最正面的发展”②。

其次，相比较上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马英九更为可靠，利于恢复美台互信。陈水扁执政后，由于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不断挑战美国，给美国出难题。从“终统”到“入联公投”，让美国对陈水扁这个“麻烦制造者”非常不满。美国认为陈水扁不值得信任，他不再是美国的“忠实盟友”。

作为哈佛法学院校友，马英九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及美国外交事务机构保持着良好的联系。美国人认为他值得信赖，认为他的理性态度能够确保美台关系的平稳顺利发展，用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的话说就是：“陈水扁难以捉摸，而马英九可以期待”③。同时，马英九的“三不论”（不统、不独、不武），与美国两岸分治的一贯立场相吻合。因此，美国对马英九本人及“新政府”表示出“欢迎”与“祝贺”。2009 年 3 月马英九在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时，后者用“温暖感觉”（warm feelings）和“高度尊重”（high regard）等词形容美台之间的互动。

① “台海和平稳定架构影响巨大”，《澳门日报》，2008 年 7 月 31 日。

② “美情报总监布莱尔‘为两岸鼓掌’”，中评社台北 2009 年 2 月 14 日电。

③ “美对台海最新局势表示满意 担忧在亚洲遭排斥”，凤凰资讯专稿，http://phtv.ifeng.com/program/zhtfl/200807/0703_1687_632048.shtml

台湾方面称之为“这就是台美恢复互信的重要讯号”①。

另一方面，两岸接近也从某些方面可能对美国战略利益造成挑战：

首先，两岸关系的过度密切，造成台湾日益倾向大陆，甚至迈向两岸和平统一的方向。在两岸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台湾有可能偏离美国所设定的轨道，在战略上逐渐靠向中国大陆。这样的可能发展，在美国战略家看来，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2008 年 4 月，美国国会研究处发表了《台湾 2008 总统大选》的报告，该报告由外交、国防暨贸易部门的亚洲事务专家邓凯丽（Kerry B. Dumbaugh）执笔。报告指出，美国一些观察家关注于美国，可能低估了 2005 国民党高级官员访问对中国大陆、国民党两岸思维带来的重大变化。从这种观点看，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可能会在国民党给台湾未来带来的全新的、不同的选择中存在着倾中带来的利益。有人担心，面对经济动力和台湾企业界的要求，国民党会与对岸和解，最终损害美国的区域利益。② 基于这种忧虑，“在美国政府支持两岸关系改善的同时，它对两岸和解的速度、深度和程度却保持沉默。”③

其次，美国对台军售的经济利益可能被损害。《台湾 2008 总统大选》警告说，台湾可能会抵制美要其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国民党的两岸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以更坚定的立场面对美国压力或利益”。因此，“当美国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时，台湾可能抗拒美国此一压力”，理由是花费太大、与对岸太过对立、对改善两岸关系没有助益。④

再次，两岸经济交往使得大陆可能运用经济政策作为遏制台湾的非军事手段。中国大陆目前是台湾最大的伙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依赖度高达 40%，双向投资业在不断增加。紧密的两岸经贸关系，会导致台湾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大陆，这将带来挑战：“通过减少贸易和投资、限制大陆赴台旅游

① “薄瑞光：台美关系 温暖又尊重”，《联合报》，2009 年 3 月 19 日。

② 参见 Kerry Dumbaugh，“Taiwan's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CRS Report for Congress，April 10，2008，http：//www. fas. org/sgp/crs/row/RS22853. pdf

③ Kerry Dumbaugh，“Taiwan – U. S. Relations：Recent Development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RL 34683，September 25，p. 19.

④ Kerry Dumbaugh，“Taiwan's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CRS Report for Congress，April 10，2008，http：//www. fas. org/sgp/crs/row/RS22853. pdf

的游客数量，或者减少两岸航班，北京能够有效地击垮台湾经济”。①

（二）美国对台政策战略环境的其他变化

在美国学界对美国对台政策战略环境的评估中，其他重要变化有：

两岸军力平衡向中国大陆方向倾斜。在马英九当选前的一个月，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卜大年（Dan Blumenthal）与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all Schiver）在其共同撰写的报告《巩固亚洲民主—21 世纪的美台伙伴关系议题》中声称：“中国日益强大的势力使北京有能力改变两岸军力的平衡，让五十年来维系台海稳定，避免爆发严重冲突的动态平衡岌岌可危。”②

2008 年 6 月 25 日，美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在国会山就中国军力发展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辛恩（James J. Shinn）作证时表示，两岸军力平衡在朝着有利于大陆方面倾斜，“我们继续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增加针对台湾的军事优势。我们在鼓励北京与台湾正面接触降低紧张局势的同时，也会密切监控是否采取进一步措施，让台海的军事优势不会更倾向北京”③。

2009 年 3 月 25 日，美国国防部发表 2009 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声称自 2000 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一直在朝着有利于大陆的方向演变，大陆军力的发展已经对台湾的安全构成新的挑战，称 2008 年台海关系的缓和并没有使大陆放慢针对台湾的军事现代化步伐，其对台湾的威胁还在增加。④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增加。从中美关系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年，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军力也大大增强。无论是金融

---

① Abraham M. Denmark and Richard Fontaine，“Taiwan's Gamble：The Cross－Strait Rapproch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http：//www. cnas. 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Taiwan _ Denmark _ Dec2009 _ code502 _ policybrief2. pdf. p. 1.

② Dan Blumenthal，Randall Schriver，“Freedom in Asia：A twenty First Century Agenda for The U. S. －Taiwan Partnership”，来自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网站，p. 1.

③ James J. Shinn，“China：Recent Security Developments”，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 Committee，June 25，2008，p. 7. http：//armedservices. house. gov/pdfs/FC062508/Shinn _ Breedlove _ Testimony062508. pdf

④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9，http：//www. defenselink. mil/pubs/pdfs/China _ Military _ Power _ Report _ 2009. pdf

危机问题上、伊朗和朝核问题上，还是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上，减缓全球暖化，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S. Glaser）女士表示，《与台湾关系法》制定三十年后的今天，“美中台关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她指出：“不可讳言，在某些层面上，这已造成美国在国际间领导地位的改变，也对美国形成压力，尤其是美国爆发经济与金融危机之后”。①

三、当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

尽管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环境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但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对台政策来看，当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

第一，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框架并未改变。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对台政策，延续了美国历届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

一方面，奥巴马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2009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奥巴马访华，在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声称：“美方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方欢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② 自奥巴马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开始，以及 2009 年 4 月与胡锦涛的会谈，都声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而另一方面，也始终没有放弃《与台湾关系法》。奥巴马在访华过程中，在与胡锦涛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对中国和台湾在缓和紧张局势和建立台海两岸联系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根据美中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基础，美国的政策支持这些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些联系符合双方的利益和其他更广大地区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③

2009 年是《与台湾关系法》实施 30 周年，美国国内高调对其进行了纪

① “台湾关系法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台湾《中央日报》，2009 年 4 月 19 日。

②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

③ “奥巴马重提 台湾关系法 美促两岸积极对话”，联合早报网，2009 年 11 月 18 日。

念，强调其重要性。2009 年 3 月 24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第 55 号决议案，纪念美国国会制订《与台湾关系法》30 周年，重申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不变承诺。

美国学者和官员明确地表达了对《与台湾关系法》的肯定与支持。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东亚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强调《与台湾关系法》的延续性，不需要调整，“因为《与台湾关系法》满足了而不是挑战了美国政策利益，它的有效性在转变中的美中台动态中没有受到实质的影响。”① 美国前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德（Winston Lord）指出：“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所制订的《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有效以及最持久的法律，因为此法律维护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同时对台湾的安全、繁荣与民主发展亦相当重要。”②

第二，美国无意放弃对台湾的影响力。正如两岸问题专家郭震远指出的，只要大陆和台湾没有统一，只要还存在两岸关系，美国就一定会努力争取和保持对两岸关系的介入和影响。这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决定的，具体说就是美国具有突出双重性的对华政策决定的。③

美国维护其对台影响力的战略方式主要有提升美台关系、对台军售和支持台湾扩展其“国际空间”等。美国仍在各个层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在经贸关系层面上，奥巴马政府在考虑美国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尤其是如果两岸签署 ECFA，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措施加强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容安澜在分析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期的美台关系时指出，“当我们向前看，我相信美台关系将继续巩固，即使还是保持这种非官方的特点”④。在他看来，“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础上的美台密切关系将成为台湾成功促进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福利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把美台关系的基调定位是“上升的”（upbeat）。⑤

对台军售是美台实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维护对台湾影响力的

① Bonnie S. Glaser, “The Relevance of the TRA at a time of Changing US – China – Taiwan Relations”, http: //csis. org/files/media/csis/pubs/090430 _ tra _ anniversary. pdf

② “台湾关系法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台湾《中央日报》，2009 年 4 月 19 日。

③ 郭震远，“新手奥巴马 如何介入两岸关系”，《中国评论》，2009 年第 1 期。

④ Alan Romberg, “US – Taiwan Relations: Looking Forward”, Presentation at CSIS conference, at http: //www. stimson. org/pubpreview. cfm? ID = 780

⑤ Ibid.

重要方式。2010 年 1 月 30 日，不顾中国政府多次提出严正交涉，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国会向台湾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扫雷艇等总额 64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对台湾扩展其“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持支持态度，多次向中国大陆呼吁，认为台湾参与某些国际组织及其相关活动有助于台湾增加自信及改善两岸关系。罗德在台湾出席《与台湾关系法》30 周年研讨会时表示，希望大陆未来能够“更加积极”，让台湾在更多方面拥有“与地位和尊严相符的空间”。2009 年 5 月 27 日，薄瑞光在欢迎马英九过境洛杉矶时表示，美国乐见台湾开拓更多的“国际空间”。

第三，美国智库的政策提议多是要求提升美台关系。上述美国智库对美国对台政策环境的评估，多数都是用来作为要求美国提升美台关系、加强对美国影响的论据。2008 年 2 月，华府智库“企业研究院（AEI）－台湾政策小组”共同主席薛瑞福（Randy Schriver）和卜大年（Dan Blumenthal）在《巩固亚洲民主——二十一世纪的美台伙伴关系议题》报告花大篇幅介绍台湾对于美国在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利益的重要性，抱怨“台湾的困境也来自于国会渐渐不了解其重要性”①。报告的中心议题即是劝导美国政府提升美台关系，加强安全、经济、军事、民主议程等方面的合作，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把美台关系置于美中关系的框架下。美台关系应该有单独的议程”②。

阿拉伯罕·丹麦和理查德·方丹在上述报告结尾对美国对台政策提出三点意见：扩大与台湾的贸易关系，对同样与台湾扩大贸易关系的国家（例如东盟）进行外交支持；继续对台军售，并帮助分析它在变化中的军事和外交环境中的防御地位，作为台湾四年防务报告的部分；安排适当的高层访问，并表达政治支持。③

在两岸步入和平发展时期，美国对台政策根本上并未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美国多年来希望两岸保持“不统不独不武”的“维持现状”（status quo）政策具有延续性，美国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的基本战略思维

---

① Dan Blumenthal, Randall Schriver, “Freedom in Asia: A twenty First Century Agenda for The U. S. – Taiwan Partnership”, p. 4.

② Ibid, p. 18.

③ Abraham M. Denmark and Richard Fontaine , “Taiwan's Gamble: The Cross – Strait Rapproch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http: //www. cnas. 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Taiwan _ Denmark _ Dec2009 _ code502 _ policybrief2. pdf. pp5 – 6.

没有改变。2010 年伊始，中美关系中出现了美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经贸冲突、谷歌事件等问题，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而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性战略思维。二是当前两岸关系虽然得到缓和，但离台湾脱离美国战略轨道走向与大陆统一还远，“两岸关系的发展现状并未挑战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底线”①。三是在两岸政治互信、军事互信建立之前，台湾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给美国传统的“以台制华”战略提供了发挥的空间。马英九声称“海峡的军事现状现在很不平衡。因此，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毫不犹豫地继续提供如‘台湾关系法’所规定的必要的防御性武器给我们”②。四是尽管中国实力在上升，但与美国国家实力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在美国对台军售等问题上，中国的反制手段有限。

总的来说，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美国对台政策具有其稳定性。只要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对华战略中还存在战略价值，两岸关系中还存在美国介入的空间，美国对台政策还会保持其延续性。除非在未来三十年内，中美两个大国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中国在综合实力上已经完全压倒美国，否则美国对台政策不会发生变化。美国将继续提升美台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对台军售和支持台湾扩展其国际空间。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的介入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难度。当前美国对两岸和平发展进程的干预，仍有可能对两岸关系产生若干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6 月 25 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① 王公龙，“马英九上台后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09 年第 4 期，第 10 页。

② 参见 2009 年 4 月 22 日马英九在出席“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台湾关系法 30 周年研讨会”视频会议上的致词，CSIS 网站，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090422_ma_speech.pdf，p. 7.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模式演进、影响因素与推动策略

福建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单玉丽

与世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不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是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社会制度下进行的由小到大，由一次产业到三次产业，由间接单向向直接双向逐渐推进的过程。由于制约两岸经济合作的因素远较其他区域经济合作复杂，近30年来，两岸经济合作虽然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但始终停留在以要素禀赋差异为特征的功能性合作阶段，未能实现制度性安排的突破，以致两岸经济合作长期处于不平衡、不对称、不平等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合作的深化。随着两岸ECFA签订在即，以及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快速扩张，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从功能性向制度性合作转变，构建两岸合作新模式、新机制，已成为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紧迫任务。本文拟在总结两岸经济合作模式及其演进基础上，分析影响两岸经济合作模式转换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若干思路，供商榷。

一、两岸合作的主要模式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两岸发展经贸交流与合作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经济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合作模式也日益丰富，形成了两岸合作模式的一些特点。但由于两岸关系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较大，加之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世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多样化、快速化等相比，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目前两岸业已形成的合作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力量的推动及大陆方面的引导形成的一种初级的、多样性的经济合作模式。主要有：

（一）贸易合作模式

贸易合作模式是建立在市场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商品交易活动。国际贸易

形态（模式）一般分为2种：一是产业间贸易，二是产业内贸易。两岸贸易合作最初是从产业间贸易开始的。在两岸经济合作初期（1980年代中以前），两岸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商品交流的唯一形式是以“调剂余缺”为目的的海上小额贸易，其特点是隐蔽式、小规模的民间自发行为，从以物易物到货币交易。1987年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开放两岸民间往来，两岸民间贸易化暗为明，以资源互补为特征的产业间贸易经香港转口而迅速发展，并在投资带动下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投资性贸易成为两岸贸易的主渠道。1990年以后，由于台商投资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增加，投资性贸易大幅度增长，由此造成两岸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到2006年两岸仅电子电机设备及其零组件的贸易总额就达423.2亿美元，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357.76亿美元，占84.5%，而台湾从大陆进口仅占15.5%。这是两岸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产业合作模式

国际间产业分工合作模式一般有3种，即垂直型产业合作模式、水平型产业合作模式和混合型产业合作模式。两岸产业合作主要是以台商对大陆的单向投资形式体现的。随着台商投资领域的不断扩大，两岸产业合作模式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再到混合分工演进的态势。1980年代初，两岸产业发展水平落差较大，台商投资以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产业合作以资源互补为导向，呈现垂直分工的状态。农业合作分工主要是台商自带优良品种和技术到大陆租地种植，利用大陆廉价地租和劳动力，产品出口或在大陆内销。工业投资主要是传统加工业，基本模式是“两头在外”，产业的上游在台湾母厂，中下游生产出货在大陆，即所谓的“台湾接单，大陆生产，产品外销”，形成垂直分工关系。

1990年代以后，大陆制造业快速发展，两岸产业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产业分工逐步从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台商农业投资延伸到农产品加工或进行土地成片开发，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生产体系，一些台资企业外接国际市场，内联基地和农户，形成了“引进一个品种，建立一片基地，致富一方百姓”的产业发展模式。工业投资方面，由于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一部分技术密集度较低的制造业开始整体性向大陆转移；与此同时，大陆的浦东开发及珠三角、长三角台商投资区的崛起，也为台商上、中、下游产业链配套投资提供了机遇、拓宽了合作空间，

两岸工业合作的水平分工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入21世纪，台湾投资环境恶化，岛内产业加快外移，台商投资进一步向关联化、在地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两岸产业合作领域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延伸，合作技术层次从资本、技术密集型向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转变，在大陆台商集中区形成一批集管理、研发、制造、财务运作、市场营销于一体的混合型分工模式。

（三）园区型合作模式

园区型模式是大陆政府为推动两岸经济合作而设计的一种有效方式。为落实中央政府“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对台政策，为台商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大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及一些地方政府在特定地区设立不同级别或不同功能的两岸经济合作园区，形成两岸经济合作的一种独特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1）单边政府主导，经祖国大陆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受大陆法律保护；（2）园区土地面积较大，通常以乡（镇、区）为单位，一般不超过县（市、区）的范围，有明确的园区边界；（3）由政府出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三通一平”或“五通一平”），制定引进台资的包括地租、税收、投融资、项目审批等在内的优惠政策；（4）成立有别于园外的管理机构。

两岸园区型合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类型：一是台商投资区；二是台湾农民创业园。台商投资区是两岸工业合作的平台，如经国务院批准于1989年在福建厦门海沧、集美、杏林和福州马尾设立的台商投资区，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每个投资区都设立独立的管理委员会，实施租金、增值税、消费税减免和项目开发资助等优惠政策。经过20年建设，台商投资区已发展成为福建省重要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如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至2006年集中台资69家，形成电子、石化、机械三大主导产业，90%以上企业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充分肯定。此外，还有一种由台资企业独立兴建和管理的台商投资区，如山东烟台的鸿富泰科技园区，投资1.14亿美元，是台湾鸿海精密企业集团在渤海湾的重要生产基地。

台湾农民创业园是两岸农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的成功模式。第一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于1997年在福建漳浦诞生，该园核心区面积1.5万亩，设花卉、果树、茶叶、农产品加工4个功能区和科技服务及创业孵化2个中

心，总投资8100万元，目前已有55家台资企业入园。2006年10月在博鳌举办的第二届国共经贸论坛上，两岸就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作为两岸农业合作平台达成共识，并建议新增若干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目前大陆已有福建漳浦、漳平、清流、仙游，山东栖霞，四川新津、攀枝花，重庆北碚，安徽巢湖，江苏无锡、江宁、淮安、淮阴，广东珠海今湾，湖北武汉黄陂等15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园区型合作模式除上述两种类型外，各地还设立了一批由地方政府主持、名称各异、规模和运作方式相似的两岸经济合作基地、合作园区，如福建东山台湾水产品加工基地、惠安绿谷台商高科技产业基地、福州青口东南汽车制造基地等。有些基地由台商承租后自主管理、自主招商、自负盈亏。

（四）地区性合作模式

此类模式的性质和管理与园区型模式相似，都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批准设立，不同之处是其合作的地域面积大，范围从一个市到一个省。两岸农业合作方面，如1997年经国台办、农业部、商业部批准成立的海峡两岸（福州）农业试验区、海峡两岸（漳州）农业合作试验区。两个试验区都在福建省海峡办领导下分别设立管委会，在审批办证、通关验收、投资领域、用地方式、产业扶持、税收减免等方面为台商提供优惠，建立试验区项目联合审批、口岸联检、统一收费、统一受理投诉等一条龙服务。在此基础上，2005年国务院“两部一办”批准把两个试验区扩大到全省，建立海峡两岸（福建）农业合作试验区。

到目前为止，经国务院“两部一办”批准的两岸地区性农业合作模式已遍及大陆各地，如黑龙江的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大庆，山东平渡，陕西杨凌，江苏昆山、扬州，广东佛山、湛江，上海郊区，广西玉林及海南省等。

在工业领域合作方面，地区性合作模式主要体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其典型代表是“东莞模式”和“昆山模式”。前者主要依托香港、深圳区位优势，由台商自发形成的以电子与电脑硬件为主的产业聚集区，以“两头在外”加工出口为特征，地方政府引导与优惠政策的扶持作用并不显著。“昆山模式”则是依托上海浦东开发和长三角崛起优势，在地方政府强力主导下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台商投资合作开发形成的，重点发展以笔记本电脑为主的高科技电子产业。

（五）服务平台合作模式

此类模式是大陆政府或民间为台商企业提供设备、资金、技术、信息、培训等服务的合作形式。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基础条件服务平台、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和创业公共服务平台三大类。基础条件服务平台是通过共用、共享提供研发需要的软件和硬件设备，为台资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而建立的服务平台。包括大型仪器、中试平台、测试手段、技术手段、科技文献、信息等，平台运作主要通过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基地、试验区里的科研条件保障机构，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设立的服务中心、科技文献机构等体现的。

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以应用技术的产业化为目标，通过两地科技人员的合作，研究开发产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着力于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开发，加速产业升级换代。

创业公共服务平台是由一系列包括人财物相互关联的资源，经过整合而形成的集成保障服务。平台形式体现在政府及高校、科研机构、各类社团组织为促进两岸合作而提供的各种有型和无型的科技创业公共服务。此种模式通常通过互联网完成，因而又称“虚拟模式”，是信息社会条件下两岸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

（六）对口合作模式

对口交流合作模式以两岸相关单位对口链接为特征，包括市对市、县对县、学校对学校、科研单位对科研单位等，这种模式通常是双向的，并签订一定的协议。如福州保税港口与台湾基隆自由贸易港保税区签订的《两区对接协议》，就两区对接达到资源共享，实现通关便利等作了明确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1）鉴于两岸经济合作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系统，涉及多主体、多目标、多影响因素及多变的经营方式，其模式的界定比较困难。上述6种模式除贸易合作外，主要是结合实际情况，以合作的对象、内容和载体为主要依据，如此界定可能有利于执行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地考察、研究和推动；（2）从发展角度看，如此界定的经济合作模式的演替，与两岸经济合作发展的阶段基本相吻合，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体模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两岸经济合作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3）任何模式都是相对的，不同模式常常是相互交叉存在的，如服务平台模式存在于园区之中，

而园区型模式又是地区型模式的组成部分，不同模式之间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4）尽管一些模式是在祖国大陆政府主导下形成的，但只是单边的政府行为，单向的资源流动，没有两岸公权力协议的约束，因而，无论当前两岸经济合作规模有多大、模式有多少，都只能是功能性合作，离制度性合作还有一定距离。

二、影响两岸合作模式演进的主要因素

（一）政治及政策因素

政治与政策因素是影响两岸合作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上世纪80～90年代，台湾当局在两岸交流与合作上实行“戒急用忍”政策，两岸在贸易上形成了以“小额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在投资上以“台湾接单，大陆生产，海外销售”的合作模式见长。2000年以来，在民间推动下，台湾当局在2001年底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开放包括笔记型电脑、通讯产品和消费性电子三大类产品赴大陆投资，使得台商对大陆投资的电子产业飞速增长，并很快在珠三角形成聚落，推动了两岸产业链合作模式的成长。2005年以来大陆在推动两岸农业合作上连续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动了两岸农业合作模式的创新，如台湾农民创业园。

2008年，台湾实现新的政党轮替，马英九当局为重振台湾经济，进一步放宽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限制，核准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金额上限提高到40%，不久又放宽到60%；在投资领域上也不断松绑，使台商投资大陆出现新一波投资热潮。2009年6月30日台湾公布“陆资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开放制造业、服务业和公共建设三大类100项产业，允许陆资进入台湾岛，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岸投资单向、不对等的格局，使两岸投资模式出现新的形态。

近年来，两岸政党的政治接触初见成效，影响两岸合作发展的最大障碍性因素出现转机，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北京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及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2009年以来，台湾当局积极推动两岸ECFA，2010年1月，两岸就ECFA在

北京签订意向协议，协议的基本内容包括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原产地规则、早期收获计划、贸易救济、争端解决、投资和经济合作等，使两岸合作向制度性方向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官方的促进成为推进两岸合作模式从功能性向制度性发展的最积极因素。目前，两岸正式签订 ECFA 在即，再次凸显政治与政策因素在两岸经贸合作模式中的关键作用。

（二）两岸经贸交流不对称的影响

交流与合作的不对称既是影响两岸经济发展水平缩小的因素，也是制约两岸合作模式发展的因素。根据相互依存理论，开放条件下的各经济体，一般会因各自特定的经济发展条件和政策，在彼此交流合作中形成一定态势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影响到彼此经贸政策与制度性合作的进一步安排。在两岸关系发展的 30 年历程中，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虽然在贸易、投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形成了垂直与水平交叉并存，动态演变的多元化分工关系，展现了功能性一体化的态势，但在两岸经济相互依存性方面，却呈现出不对称的特征。

从两岸资本流向看，由于台湾当局长期实行限制性的大陆经贸政策，两岸资本投资往来关系主要表现为台商投资大陆的单向资本流动现象，据台湾官方统计，1980～2009 年台商投资大陆实际金额累计达 749.52 亿美元，台商投资大陆金额占台湾对外投资比重从 9.52% 上升到 67.46%，最高年份达到 71%，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地。而同期，大陆台资占大陆外资比重从 10.68% 下降到 6%，目前台资仅占大陆累计实际使用外部投资总额的 7.9%（见表 1）。

表 1　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祖国大陆统计资料		台湾官方核准资料	
	实际到资	占大陆外资比重	协议金额	占台湾对外投资比重
1980—1991	8.65	10.7	1.74	9.52
1992—1995	107.41	9.9	54.70	36.10
1996—2000	145.67	6.8	108.54	33.04
2001—2005	156.04	6.4	301.50	61.90
2006—2009	76.90	6.0	283.04*	67.46*
累计或平均	494.67	7.90	749.52	41.6

资料来源：根据《两岸经贸统计月报》第 151 期及台湾《2009 年经济年鉴》整理。* 为 2008 年数据。

从两岸贸易分析，30 年来两岸贸易总体上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但同样表现出不对称性。1990 – 2009 年两岸贸易总额从 40.4 亿美元上升到 1062.3 亿美元，增加 52 倍，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从 32.8 亿美元上升到 857.2 亿美元，增加 26 倍；大陆对台湾出口从 11.3 亿美元上升到 205.1 亿美元，仅增加 18 倍。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从 1990 年的 25 亿美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652 亿美元。1980 至 2008 年台湾从两岸贸易中净得资本 6191 亿美元。两岸贸易不平衡的结果造成了两岸贸易依存度的畸形发展。1990 – 2008 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从 4.23% 上升到 26.03%，其中进口依存度从 1.4% 上升到 13.05%，出口依存度从 6.54% 上升到 40.42%（见图 1）。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已由“相对依存”到部分产业大大超过“绝对依存”（国际上公认的贸易依存度有两条线：超过 15% 为相对依存，大于 30% 则形成绝对依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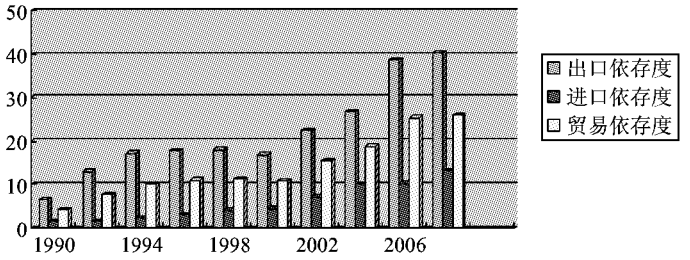


图 1　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

两岸投资与贸易的不对称、不平衡状态，有悖于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常理，有悖于互利双赢的基本原则，不利于两岸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势互补，不利于两岸经济合作模式的发展和机制的建立。

（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目前，两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是影响两岸经贸合作模式多元化及演进的不可忽视的要素。改革开放 30 年来，大陆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轨道，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外汇存底高居世界之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水涨船高，但大陆地域广阔，且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地区差

① 李友华：当前两岸建立经济合作机制的症结及对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还较大，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台湾还有较大差距。2008 年人均 GDP 仅为 3315 美元，台湾 17040 美元，世界人均 GDP 平均为 9900 美元。大陆人均 GDP 不及台湾的 20%，也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3。在大陆各省市人均 GDP 排名中，台湾以 110663 元人民币居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列第四位，福建以 30255 元居第 14 位。同年台湾 GDP 总量为 27110 亿元，福建为 10863 亿元，福建 GDP 是台湾的 40%。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水平落差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着两岸经济合作模式的演进。

（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人类社会史研究表明，一个地区如果长期与母国分离，便很容易产生新的本土意识，随着世代交替，这种本土意识将会上升为族群认同，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对政治乃至主权的诉求。

台湾地区 400 年来先后经历了荷兰、西班牙、郑成功、清朝、日本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近代独特而悲惨的历史经历造就了今日台湾民众的独特心态，形成了强烈的“台湾情结”“台湾意识”。特别是日本 50 年的“皇民化”教育和国民党 50 年的反共灌输，加上李登辉、陈水扁近 10 年的“去中国化”，导致两岸社会交流和文化互动的不足，使双方在社会心理、意识心态、文化生活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差异和矛盾，使两岸政治与经济发展呈现相悖的不正常状态。因此，尽管近 30 年来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不断深化；祖国大陆再三对台湾释出善意，作出让步；两岸经济合作也给台湾经济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但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真正改变台湾民众固有的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心态和文化认同。

实践证明，在短期内，经济上的实惠并不足以改变台湾民众政治上的立场，时至今日，在“统”、“独”问题上选择“维持现状”的台湾民众仍然高居 6 成以上。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对两岸经济合作及其模式的演进影响是深刻的。

三、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模式从功能性向制度性方向发展

影响区域合作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还有文化和宗教等。推动两岸合作模式向制度性方向发展，必须考虑两岸关系的特

殊性，要充分认识到两岸合作机制的建立必将牵涉法律、制度乃至政治层面的问题，仅靠经济手段无法解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合作机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两岸合作的制度化进程，但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一体化。受制于多重因素影响，两岸合作模式的发展和完善还有待多方努力。

（一）进一步加强两岸政治互信和经济互信

随着两岸关系发展，台湾逐步放宽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两岸合作单向、间接的合作模式，逐步向双向、直接合作模式的方向发展，但远远不能满足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发展和完善两岸合作模式的过程中，海峡两岸要继续互释善意，这是建立政治互信、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基本前提，也是转变合作模式的重要前提。

两岸政治的互信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和选举制度。因此，要继续推动两岸政党的交流与互动，不仅要与执政党在宏观层面建立战略性合作机制，也要推动与台湾在野党的交流与沟通。除了建立两岸政治互信外，还必须累积经济互信，不至于因政治互信弱化而影响经济互信，这就要求在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中更多地按市场规律办事，尽量避免把经济活动与政治动机、安全问题甚至军事意图联系起来，按经济规律办事，应成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长久之计。

（二）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合作的机制化

要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规范化、稳定化，不仅要消除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种政治障碍，也要构建稳定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因为目前，尽管两岸的经济合作已十分紧密，模式众多，但归根结底是一种“功能性合作”，随着两岸经贸的深入发展，“功能性合作”提升到“制度性合作”是大势所趋。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官方强力主导下的制度性合作模式，是两岸经济合作长期稳定之架构，通过 ECFA 将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合理配置资源，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规模，提高合作层次。显然，这一模式有利于兼顾各方利益，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对两岸合作模式从功能性向制度性转变具有标志性意义。

纵观世界区域合作模式的发展，都是从功能性合作模式向制度性合作模式演变，即从经贸（贸易、投资）、人员往来便利化向制度性安排合作的方

向发展，而且基本上是由国家或地区公权力主导、自上而下的推动，ECFA机制的建立，为两岸合作模式的制度化创造了条件。应抓住这一机遇，遵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不断发展完善所共同遵循的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选择大陆部分区域作为ECFA的试验区，建立ECFA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先行区，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从功能性向制度性方向发展。如可考虑利用闽台特殊的区位优势，选择福建某个区域为主体与台湾或台湾离岛建立闽台区域经济合作先行区，先行实施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条款和政策，在ECFA框架下签署更具体的合作协议，开展全方位的体制与机制的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两岸经济合作新模式、新机制，寻找两岸全面合作制度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以此作为试点，为两岸合作机制化积累经验。

（三）加强两岸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

目前，随着“大三通”的实现，两岸人员的交流往来发展迅速，2009年，台湾居民来大陆448万人次，同比增加2.66%；大陆居民赴台93万人次，同比增长235.65%，但交往密度和规模还远远不够，这也是为什么两岸经济联系虽然密切，但经济合作机制化程度不高；文化上虽然同根同源，但在价值观上又有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

按照社会自由主义观点，不同社会人民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关系要比政府间的关系更具有合作性倾向，一个具有大量跨国关系网络的世界将会更加和平。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不同社会之间高度的跨界联系不仅会带来和平的关系，而且会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出现。多伊奇强调安全共同体形成的条件包括：日益增加的社会沟通、相互交流和交往范围的多样化、更多的人员流动、坚固的经济联系、基本价值观的相容性等。按照多伊奇关于安全共同体的界定标准，目前海峡两岸远未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因此，尽管目前两岸已经实现“三通”，但政治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形下，要建立高度制度化的“两岸共同市场”合作模式，路途还很遥远。但从“异质”到“同质”，从“功能一体化”到“制度一体化”是两岸合作的必由之路。为促进两岸民间进一步交流，改变以往两岸交流合作不对称的状况，应通过“三通”促进两岸人民往来，通过经贸、文化交流重新整合两岸关系，逐步建立两岸各领域稳固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加强投资与贸易的往来与保障，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化解两岸分歧，加强相互认同感，并探索多层

次多领域的制度化交流框架和合作模式，推动两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以及两岸制度性合作进程。

主要参考文献

1. 房乐宪：欧洲一体化经验对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启发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1
2. 李友华：当前两岸建立经济合作机制的症结及对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3. 唐永红：两岸经济互相依存性发展态势的定量考察，《台湾研究》2007：2
4. 孙光慧、王建民：关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问题的几点看法，《市场营销导刊》2007：2
5. 温思美、郑晶：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模式的绩效及其前景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6：11
6. 罗秀娟、孙凯：两岸“IT”产业合作的利基取向变化及模式选择研究，《企业经济》2009：4
7. 庄荣良：海峡两岸产业分工的发展阶段、模式演进和发展机遇，《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
8. 王鹏：海峡两岸高科技产业竞争力比较及分工合作模式，《国际经贸探索》2005：2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6 月 25 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两化”进程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刘　红　王森森

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经济两化”），已经成为现阶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目标。ECFA 的推进，为两岸解决“经济两化”问题打开了新的大门。

一、“经济两化”与 ECFA

（一）“经济两化”的必然性

两岸深化经济合作，实现“经济两化”，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两岸“经济两化”可以充分整合和利用两岸较强的经济互补性，有助于两岸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谋求各自最大化利益的需要，提高各自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抗风险能力。二是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区域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把中国变为了自己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为此加快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开启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 2010 年元旦启动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情况下，台湾经济边缘化的危机进一步加大，只有通过两岸“经济两化”，才能帮助台湾尽快融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三是大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台湾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从两岸经贸发展的历程来看，大陆经济实力越强，对台湾的吸引力就越大，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动力越强。四是台湾经济自身发展的要

求。从本质上讲台湾经济属于一种外向出口、“浅碟形”经济[①]，面对金融危机冲击，“内需提振乏力，消费和投资意愿下降；外需市场萎缩，对外贸易由盛转衰；服务业增长停滞，制造业面临严重产能过剩”[②]。因此，加快实现两岸“经济两化”，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台湾经济再次起飞的重要起点。

在上述大背景下，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加之两岸经贸制度化协商的进行，特别是ECFA的工作商谈的展开，两岸经贸将逐步回稳和继续扩大，将成为“经济两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经济两化”的实现更有利于两岸经贸的发展。两岸经贸的发展，表明两岸经济互补互利关系的存在，两岸“经济两化”有利于两岸经济互补性的增加。经济互补性的增加，有利于台湾和两岸产业调整，“经济两化”则是产业调整的最佳途径。总之，“经济两化”有助于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中，两岸经济界通过更高层次的制度设计和战略规划，利用两岸之间行业的互补性，拓宽两岸经贸合作领域，提升两岸经贸合作层次，形成两岸共有的“合力”，更好的推进两岸经贸协调、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二）“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的提出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在功能整合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如何以某种制度化、机制化的安排，为两岸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被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2008年台湾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重新上台执政的国民党反对“台独”主张，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因此有了政治基础。马英九早在竞选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过程中，就提出签署两岸经济合作协议的设想，就职后多次提出希望与大陆签署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CECA）[③]。按马英九的想法，CECA是介于FTA（自由贸易协定）与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间的第三条路，既可避免“国与国”争议，也不会有“台湾主权”被矮化之联想。

---

① 李非：《台湾研究25年精粹—两岸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6月，第174－175页。

② 李非、吴凤娇：“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台湾经济形势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2月，第53页。

③ 肖扬：“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成为岛内热议焦点”，《两岸关系》，2009年3月，第15页。

CECA 的提出得到了大陆的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六点意见”中指出，我们期待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两岸可以为此签定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以最大限度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①] 大陆主张通过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一是经济合作实现直接、双向、全面，在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可以自由流通。二是两岸经济合作基本实现“制度化”安排，使原先自发、松散、不稳定的经贸交流，逐步发展成机制化的经济合作关系，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从自发转向自觉。三是投资实现双向化，两岸产业布局将出现结构性调整，两岸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两岸共同利益将进一步增加。四是两岸经贸合作、优势互补，将使“大中华经济圈”的实力倍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更加雄厚。

（三）ECFA 的推进

自 2009 年初起，两岸就“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开始具体准备时，台湾内部对此出现严重对立。泛绿阵营声称：“一是感觉 CECA 在名称上与大陆同香港签署的 CEPA 相似，担心被矮化；二是臆测开放大陆产品后会严重冲击台湾中小企业及传统产业，加剧失业；三是担忧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程度加深，成为附庸；四是抱怨执政党没有与在野党充分沟通取得共识，缺乏监督制约。”[②] 为此，为了减少阻力，国民党方面将协议名称定调为“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

在台湾内部为 ECFA 争论激烈时，2009 年 11 月 15 日，“两岸金融监理合作了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签署，象征两岸金融交流正式迈向正常化，也意味着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跨出关键性的一大步。在 12 月举行的台中四度“陈江会”上，江丙坤表示，“推动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架构（ECFA），确实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陈云林指出，“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大陆将努力去做，并且争取把它做好，态度一向是积极的。”[③]

2010 年 1 月和 3 月，“两会”举行两次“经济合作架构（框架）协议”（ECFA）专家工作商谈。会议成果主要有，一是确认中文名称为《海峡两

①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 年 1 月 1 日。

② 朱磊：“两岸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前景”，《两岸关系》，2009 年 4 月，第 34 页。

③ 王珏磊：“四度陈江会，聚焦 ECFA”，《时代周报》，2009 年 12 月 29 日。

岸经济合作架构（框架）协议》，英文用 ECFA。二是确定协议内容涵盖两岸间主要的经济活动。三是交换了双方税则及有关经贸管理规定和统计数据。四是各自拟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早期收获清单，双方就此口头交换意见。关于制造业，台湾方面锁定 500 项为底线。五是确定按业务议题继续进行协商，台湾方面希望在 2010 年 5 月份完成沟通，6 月五度“陈江会”时可以签署。

（四）ECFA 效应

ECFA 协议的签署，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台湾角度看，签署 ECFA 有利于台湾摆脱当前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台湾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马英九在谈及签署 ECFA 的目的是，曾归纳出三大功能：一是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二是避免台湾经济“边缘化”；三是促进台湾经济“国际化”①。特别是在台湾经济现况不容乐观情况下，ECFA 的签署将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增长。据台湾经济研究院估算，两岸签署 ECFA 对台湾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至少在 0.5 个百分点以上，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估算台湾经济增长可因此提高 0.9 个百分点，台湾政治大学的估算则高达 3.3 个百分点。马英九则认为可以让台湾达到 GDP 提高 1.6% 至 1.7% 的效果②。

2010 年 1 月 1 日，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 +1）正式启动。“10 +1”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双方约有 7000 种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待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也就是说，双方 90% 的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而且，贸易区从 2012 年开始要扩大，东盟要启动“10 +3”（东盟 10 国加上中国、韩国、日本）。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估算，“10 +1”建成后将导致台湾经济增长率下降 0.15%，经济损失 12.4 亿美元。如果“10 +3”成局，台湾经济增长率下降 0.7%，岛内就业需求减少 11.4 万人。③ 在这一形势下，台湾经济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只有通过签署 ECFA，为台湾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台湾经济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发展空间。

---

① 马英九会见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第十一届理监事时的讲话，台湾《联合报》，2009 年 7 月 10 日。

② “马英九接受日媒专访称洽谈 ECFA 是当前最重要课题”，2010 -05 -13 10：2 中国台湾网。http：//www. chinataiwan. org/taiwan/tw _ PoliticsNews/201005/t20100513 _ 1368395. htm。

③ 签 CECA“实质比名称重要”http：//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09 -02 -23 15：13：43。

从大陆角度看，大陆反复强调将“充分考虑到两岸经济规模和市场条件的不同，充分照顾台湾中小企业和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到让利，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兄弟。”① ECFA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两岸“经济两化”，建立两岸关系新模式，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局面，既帮助台湾经济顺利复苏，又可加快台湾的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

二、积极推进两岸“经济两化”进程

ECFA 协商正在正常进行，第一阶段性协议签署也要在 6 月完成，但要想全面落实 ECFA 精神，还要积极做好相关方面的工作。

（一）减少签署 ECFA 的不利因素

在签署 ECFA 问题上，在两岸实现“经济两化”进程中，前景光明，困难不少，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一是改变两岸经贸交流中的不对称、不平衡的格局。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大陆实行歧视性待遇。就商品贸易而言，大陆对台湾地区商品全面开放，台湾仍禁止大陆农产品 834 种、工业品 1360 种输入岛内，占台湾进口商品总数的 20.3%。就两岸经贸看，截止到 2009 年，在两岸累计 9636.2 亿美元贸易额中，台湾方面的顺差高达 6189.7 亿美元，占 64.2%，严重不平衡。在投资方面，与大陆长期以来鼓励和保护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不同，台湾直到 2009 年 6 月起才开放陆资入台，但在投资领域和操作上设有许多限制。在两岸人员往来方面，大陆基本处于开放状态，但是台湾方面对大陆人员赴台依然设置种种障碍，即使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旅游也没有实现。由此可见，两岸在人员交流与往来方面的不对称状态还是极为明显的。总之，虽然马英九上台后放宽了两岸经贸交流的限制，但短期内两岸经贸不对称、不平衡格局依然难以扭转，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是消除岛内政治因素对两岸“经济两化”的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推动 ECFA 的进程，招来岛内绿营的强烈反对，甚至发动流血抗争事

① 温总理在新华网、中国政府网与广大网友的交流，2010 年 2 月 27 日。

件。绿营在对其“泛政治化”的同时[①]，宣扬“台湾劳工没头路、农民害了了、传统产业死了了、冲垮321万白领、台湾香港化和薪资大陆化、矮化台湾主权、为‘一中市场’铺路”等“十大谎言”[②]，阻碍ECFA的协商和签署。泛绿阵营还在发动ECFA“公投”，一方面反对两岸经济合作，一方面以此作为内部进行政治动员、赢得年底“五都选举”的主打议题。绿营的做法干扰了两岸“经济两化”的进程，但无法阻挡两岸“经济两化”的潮流。

三是解除部分台湾民众对ECFA的疑虑。对于“经济两化”，台湾工商企业界一直是支持两岸“经济两化”的主要力量，但是还有部分群体存有疑虑。部分纺织日用品、制鞋、纸业、陶瓷、皮革等弱势传统产业者，担心受到大陆产品的冲击。部分台湾南部农民，在一些政客的刻意误导下，对大陆惠台政策的不甚了解，甚至抵制两岸经贸的开放。部分学者和媒体，他们声称当前两岸夸大了“经济两化”所带来的效应。针对岛内的种种疑虑，大陆方面多次释出善意，强调“在商谈ECFA时，我们会充分考虑台湾农民兄弟的利益”[③]，大陆商签ECFA的立场是“可以让利”[④]，都表现出了大陆在两岸“经济两化”上的极大诚意。当然消除疑虑需要时间，更需要“经济两化”的效益显示。

对于上述问题，台湾当局也表示，ECFA若能达到60%民众支持，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心里才较踏实，还要再加油[⑤]。台“陆委会”在ECFA两次工作商谈后民调显示，58.9%的民众认为ECFA有助于台湾的经济发展；53.1%的民众支持与大陆协商签订ECFA[⑥]。这一结果，与近一时期来的相关民调结果基本一致。应该说，签署ECFA已是大势所趋，

① “ECFA只是政治议题？——解析争议中的盲点”，中国台湾网，2010年1月26日。

② “双英辩论登场前 蓝戳破民进党十大谎言”，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4－23 11：48：21。

③ “胡锦涛春节前夕看望台湾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间（2010.02.12）。来源新华网 http：//www.chinataiwan.org/wxzl/zhyyl/hjt/201002/t20100221_1258881.htm。

④ “温总理：因为两岸是兄弟所以让利 依然想去宝岛”。时间：2010－03－14 15：28。来源：中国台湾网。http：//www.chinataiwan.org/wxzl/zhyyl/wjb/201003/t20100317_1287902.htm。

⑤ “吴敦义：60%民众支持签ECFA心里才踏实 要再加油”。时间：2010－05－07 07：48。来源：中国台湾网。http：//www.chinataiwan.org/taiwan/tw_PoliticsNews/201005/t20100507_1360619.htm。

⑥ “台湾最新民调：过半民众支持两岸商签ECFA”。时间：2010－05－08 10：11。来源：新华网。http：//www.chinataiwan.org/taiwan/tw_PoliticsNews/201005/t20100508_1362263.htm。

民心所向，不利因素正在逐步消除。

（二）积极推进“经济两化”

两岸在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全面实现“经济两化”的基础，实现这一目标是两岸共同的责任和利益所在。

一是继续为两岸实现“经济两化”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目前处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期，应按照大陆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①、“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密切合作，携手并进”②、“先易后难，求同化异，循序渐进，积极稳妥”③ 等原则、方针，全面推进两岸交流和合作。从马英九当局来看，在赞同两岸“经济两化”的同时，对于绿营宣扬 ECFA 是“倾中卖台”、“牺牲台湾主权”的攻击分外小心，因而在两岸“经济两化”问题上缺乏果断和气魄。从绿营来看，一方面出于“台独意识形态”，他们就不愿与大陆经济交往过密；一方面希望借 ECFA议题，打击马英九的两岸经贸政策，赢得部分选民支持，重夺政权。然而，两岸“经济两化”已是大势所趋，各类政治力量应摒弃“戒恐心理”，以更加积极、开放、务实的心态来看待两岸“经济两化”。

二是创新经贸交流机制。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两岸的经贸交流和协商，始终处于一种以民间直接、官方间接的状态。如两岸经贸交流“戴白手套”的协商机制，海协会和海基会作为两岸当局授权处理两岸各项交流具体事宜、沟通协商两岸交流中的各种问题的民间社团，是当前主要经贸协商机制。在具体协商时，根据需要已有主管部门官员上桌谈判。如两岸官方默许或授权的行业性交流机制，在两岸官方不能直接商谈的情况下，此类谈判早就进行。MOU、2009 年 11 月签署的两岸食品产业与科技合作文件、2010 年 5 月互设旅游办事处，就是属于此种类型，作为在两岸关系特殊发展时期的成功选择。如地区性交流协商机制，大陆各省区或重大企业，与台湾相关部门进行直接商谈，签订协议。此类商谈越来越多。创新两岸经贸交

---

① 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的谈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 年 4 月 30 日。

② 温家宝总理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 年 4 月 23 日。

③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首次专家工作商谈取得多项共识”。时间：2010 - 01 - 28 12：05。来源：新华网 http：//www. chinataiwan. org/flfg/dt/201002/t20100201 _ 1242791. htm。

流机制，是推动两岸“经济两化”实现的重要途径。

三是继续扩大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正面效应。“三通”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要加强进一步合作，继续扩大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正面效应。关于两岸通邮，主要任务是挖掘两岸邮政潜力，发挥互补优势，提升两岸邮政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关于两岸通航，主要任务是要根据两岸市场的需求，及时增加两岸通航的线路和班次，以满足两岸人民的需要。同时建立完善的通航管理机制，推进两岸直航技术标准的对接，并利用两岸直航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推动旅游、货运、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关于两岸通商，主要任务是改变两岸在通商方面形成的不对称和不平衡，一方面大陆方面应继续给台湾“让利”，一方面台湾方面应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循序渐进地推动大陆企业来台投资，拓宽产业合作领域，提高产业合作的层次，从而达到两岸“双赢”的目的。

四是加快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是指对两岸经济活动予以规范，制定双方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正常化是解除不合时宜的政策限制的过程，制度化则是建立符合双方利益需要的行事规范的过程。”[①] 而在实际协商过程中，两岸经贸正常化和制度化协商往往会交织在一起，双轨同进。如两年来两会签订 12 个协议和达成的 2 个共识中，关于“三通”、“陆客赴台”本身的协议，包括“正常展开”和“如何进行”的制度规定。两会就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协助协议、渔业劳务合作、农产品检验、两岸标准与检测合作协议等议题达成协议，以及专业领域就 MOU、2010 年 5 月互设旅游办事处等文件，则主要是为“三通”的“顺利进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目前，要加快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首先需要签署 ECFA，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6 月 25 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① 朱磊：“对两岸经济合作路线图的思考”，中国台湾网，2010 年 1 月 25 日。

对大陆惠台政策效应的评析与思考

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　盛九元

自2005年连战、宋楚瑜相继到大陆访问及国共论坛平台建立以来，为进一步加强对岛内民意的影响、密切与泛蓝势力的互动、深化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大陆借助国共平台出台一系列的惠台政策，迄今总计约92项，内容涵盖产业合作、农产品便捷及优惠关税措施、渔业合作、金融合作、专业人士的职业资格认证及执照考试、开放直航、旅游观光、台生入学及就业、农业合作（投资及个体创业）、投资便利化、服务业合作、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等，此外还有赴台大规模采购（2009年达150亿美元，2010年应不少于150亿美元，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4%，出口的9%）等。这些措施的频频出台，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亮点，也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大陆对台政策中最积极与活跃的因素。

但对于相关惠台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均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与评估意见。因此，本文试图对于其实际效用进行扼要的评析。

一、大陆惠台政策措施的目标与对象分析

大陆惠台政策就其本质与脉络而言，由来已久。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考虑，先后通过不同途径向台湾方面提出相应的协商政策，以期实现两岸的统一问题。随着1979年“叶九条”的发布，类似的政策与举措更是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的主基调。

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大陆有意识地主动释出惠台政策是与建立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紧密相关，正是由于和平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推动着两岸关系发展从简单的“目的”深化发展为“过程”与“目标”相互衔接的明晰战略，由此出发，大陆的惠台政策从政治性的宣示演化为具体的政策与

举措，并对两岸关系发展与岛内情势的演变产生直接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对于政策目标与对象的分析就具有更加明确的意义。

从大陆惠台政策的目标看，其核心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政策实施，具体体现和平发展框架所蕴涵的善意，向岛内民众与国际社会显示大陆维护台海和平以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的决心与努力；二是以国共平台为基础，通过对泛蓝势力的支持，推动型塑岛内反对“台独”力量的发展，并进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架构的形成；三是通过惠台方式的深化，进一步密切两岸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两岸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合作，为两岸最终实现统一奠定物质与共同价值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不能以是否有利于统一进程来对惠台政策的效果进行衡量，而应以是否实践了和平发展理论、是否有利于推进两岸善意互动、是否有利于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凡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事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的指示精神，如果超越了这一标准而进行评判与指摘，事实上就是超越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反而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持续改善，无助于巩固台海和平，也无法切实有效地推进统一的进程。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展现政策措施的目标相对容易，而确定政策目标实施对象并产生预期的效果，则难度较大。因此，在对大陆惠台政策措施进行效果评估的过程中，需要紧扣三大核心，以便更加清晰地对惠台政策措施进行有效的反思与调整。

二、大陆惠台政策措施的实际效应分析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前，首先必须对政策本身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的定位，从理论上看，政策就是指国家（含执行机关）、政党和社会政治团体为实现自身所代表的群体利益与意志，以权威方式规定一段时期内要实现的目标、行动的准则和任务以及所应遵循的一般步骤、具体措施。政策具有四大特征：一是群体性或阶级性，任何政策只能代表特定群体、集团、阶级的利益与意志，从不代表社会全体成员、所有人的意志；二是观念性，任何政策都必须体现出本群体、集团和阶级的基本理念与目标，很难以单一的是非标准衡量其正误；三是时效性，任何政策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与环境下实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四是表述性，政策均非具体的物质实体，而是外化的观念与信息，必须用准确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述，但其效果往往具

有很强的实用性。

根据上述定义，从宏观角度看，自2005年以来，大陆惠台政策的实施总体而言不仅有效地活跃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氛围，使台湾工商企业界及对两岸关系发展持赞成态度的民众对大陆的善意与经济动能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而且在一定程度与区域内也有助于提升泛蓝势力在岛内的话语权，进一步推进了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力量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的稳定与良性的互动所证明。

根据台湾“陆委会”2009年12月17日的民调，60%的台湾民众赞成进行制度化协商，较2008年同期的数据上升11%；而《中国时报》2009年12月30日的民调数据表明，在被调查的12项指标中，68%的民众认为2009年的两岸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同比上升9%，也显示出台湾民众对大陆观感的向好趋势。上述民调的变化与动向与大陆和平发展战略的（包括惠台政策）实施密切相关。从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架构）协议”的发展态势看，在2008年年底，台湾当局为避免引发岛内民意的反弹，从CECA到ECFA，遮遮掩掩，政策反复，担心两岸问题反成“软肋”；而到2009年年底，在这一问题上，根据《天下》的民调，台湾民众的赞成比例已上升到60%，虽然其中有马当局强化宣导的作用，但大陆和平发展战略和惠台政策实施所发挥的功效亦不容低估。

然而，从政策本身的特点及所实施的实际效应看，存在着与一般预期的落差，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政策效应优于政治效应、经济效应优于社会效应、舆论效应优于实际效应”，需要指出的是，三者之间并非逻辑因果关系，而是并行的比较关系。具体而言，三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出以下的特征：

1. 所谓“政策效应”优于“政治效应”，是指惠台政策的实施的对象看，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应对泛蓝势力和政治团体的要求，强调效应发挥的及时性和针对性，注重短期影响，惠台政策属于具体的优惠措施（尽管其中有些政策从内容上看是属于长期性的政策，如专业人士的执业证照考试、加强两岸文教交流、强化产业合作、开放台生就业等，但由于是在政党平台上协商达成的，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因此，仍被视为短期影响明显的政策举措），时效性强，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其政策效应的凸显；

而政治效应的发挥所强调的是对相关政治团体与政党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并进而导致其出现有利于我的变化，这种影响的发挥具有长期性或者突

变性（外部环境发展重大变化）。现阶段，在岛内政局相对稳定、泛蓝势力依然保持优势的情况下，惠台政策所产生的政治效应还很难得到明显的体现。尽管从发展角度看，惠台政策也能够具有长期性的影响，但这取决于政策的延续性和实际效果，非短期所能够直接取得成效的，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我们认为目前惠台政策的“政策效应”是大于“政治效应”的。

2. 所谓“经济效应”优于“社会效应”，是指从政策的性质及类型看，一般而言，优惠政策的意涵就是单方面的开放与让利，而不要求对方给予相应的回报。就此来看，大陆的惠台政策基本上体现了上述的原则；而从优惠政策类型看，政策的类型可以分为针对“人、事、物”三类，即针对特定人群（证照考试、医生执业、台生就业等）的优惠与开放政策，针对具体问题（两岸金融合作、产业合作、文教交流、新闻交流等）的优惠与开放，针对具体部门与产品（部分农产品的免检免税、农业合作、产品采购等）的优惠与开放。

从时效上看，针对人与事的政策发挥实际效应需要较长的周期，而且还需要克服法规环境、社会发展程度、推动进程、认知差异、受众满意度等方面的问题，如台生就业，至今尚无好的案例，因此，这两方面的政策实非短期内可以奏效的；而针对于物的政策则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也是短期可以发挥具体效应的，且由于其可感知、可触及的特点，受外部因素干扰较小，因此，发挥的作用较为明显。从台湾民众的一般反应情况看，大多数人将惠台政策看作是大陆在经济给台湾的“好处”就已经表明，采取单方面优惠政策出发点必须具有直接感知的效果才能够使受众方有所触动。就这一意义而言，现阶段的惠台政策总体而言是“经济效应”大于“社会效应”。

3. 所谓“舆论效应”优于“实际效应”，是指从政策所发挥的影响力看，首先是能否构成焦点和提高民众的关注度，其次是延续性，再次是互动性。就惠台政策本身而言，由于基本是借助国共平台实施的，这就使其具有鲜明的新闻性与轰动性特征，易引起民众的关注。而从政策出台到发挥实际效应如果周期过长，则其延续性往往难以吸引民众和舆论的长期关注，再加上政策本身的单向性特点，使得互动性有所缺失，因此，从台湾社会各阶层的反馈情况看，在惠台政策发布后，往往体现为舆论的轰动效应较大，但缺乏持续性与互动性，且实际效应多不为舆论和民众所关注。从这种情形看，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舆论效应”大于“实际效应”特征。

上述三方面的特征并非显示惠台政策实际效应的缺失，而是表明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周期与效果的差异，导致实际效应与预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在政策设计过程需要注意克服与解决的问题。

三、大陆惠台政策措施中的盲点及产生的原因

根据目前两岸关系发展态势分析，尽管两岸的善意互动、高层的密切沟通与两会之间的制度化协商格局已基本形成，但由于对台工作的涉及面广、对象差异大、区域分布不均衡，因此，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对象的差异化政策的实施已成为“做台湾人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配套与补充，只有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政策手段的协调推进，才能够将对台工作更深入、更精准的做好做实。据此分析，当前相关惠台政策推出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必须的。但在具体政策推迟过程中需要克服四方面的盲点：

1. 就政策本身而言，都存在着指向性，不可能涵盖社会各层面，因此，在对台宣传方面要注意把握分寸与节奏，针对具体群体和团体进行宣导（如照顾台湾农民的权益、照顾到台湾传统手工业者的权益、照顾台湾专业人士的权益），避免空泛，这一点有必要在政策实施中加以落实；同时，也要注意工作的持续性，保证工作重点的落实，不应简单地随岛内民意而改变。

2. 在政策的推出过程中，既需要借助国共论坛的主平台，也可以利用其他各种平台时机，而关键是把握好政策对象的特点，使受众能够切实感受到被重视、被关切，避免政策推出渠道的单一性；从另一方面看，任何政策的推出在惠及部分人群与集团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感受，这也是政策设计的基本内涵和目标，因此，必须能够通过政策的实施得到具体的体现，但需要在宣传上把握好度，避免出现明显的分化目的，从而使政策的执行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

3. 在政策设计过程中注意“长期与短期、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的有机结合，这在大陆惠台政策中已有明显的体现，而在今后相关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更需要把握好这种结合的度，从而使惠台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得到持续性的推动，以更好地应对对台工作长期性、复杂性的局面；针对台湾的“三中群体”（中南部农民、中下阶层劳工、中青年人士）的政策要更具有针对性，突出重点，避免“一刀切”。

4. 优惠政策的推出本身就具有利益让渡的特点，因此，可以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与获益程度，将惠台政策与地方发展结合起来，从而使惠台政策的实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惠台政策提出与推进与两岸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不要因为 ECFA 的签署就认为可以在协议框架内解决相关所有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惠台政策提出弥补 ECFA 的不足与无法兼顾的领域，避免使对台工作完全陷入对等化、机制化、规范化的状况，而惠台政策的实施则是保持对台工作的灵活性与弹性的重要手段，因此，惠台政策的推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需要巩固和坚持。

四、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在当前的两岸关系格局与发展的总体态势下，惠台政策的实施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其名称可以再进行斟酌以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但对其功效的评估需要根据政策本身的特点、效力与对象进行更加准确的分类，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正面影响，减少负面影响。由此，我们建议，可以从六方面对相关惠台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补充：

1. 惠台政策实施在总体发挥了积极的效应，但在具体政策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目标的不同、针对不同的对象而进行更加周密的考虑，以使之产生更大的政经效果。例如，在惠台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在台湾大陆民众的利益，尤其是在台湾长期工作生活的大陆民众利益，突出重点，如针对“三中群体”，应提出针对农民和青年的相关惠台政策，因为，这两大群体相对明确，可以做到政策效果的惠及；而中下层劳工，除非进行更细的分类，如手工业者、零售业等，否则很难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向；只有政策指向明确具体，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策的互动性、人性化、直接惠及的特点与效果。

2. 惠台政策中具有长期效应的政策举措需要与两岸机制化平台的构建相结合，既可以作为 ECFA 等相关协议的补充，同时也形成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机制化联系，弱化相关争议，同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与弹性，保持工作的主动性与主导性。

3. 惠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紧扣“政策性、让利性和舆论效应”三者的密切结合，既需要形成对岛内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的正面影响，更需要切实落实部分协议的实际效果，形成焦点性与轰动性，构成政策主动性与主

导性，同时也避免由于政策的落实性不足而成为岛内舆论质疑的对象。

4. 将惠台政策举措与各区域（海西经济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成渝经济区等综合实验区域）的具体的相关优惠政策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优势的多层次优惠举措，以适应台湾多方面的实际需求。

5. 进一步推进两岸合作的机制化（ECFA）建设，在机制化平台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落实惠台政策，使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由于协议的落实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逆转性，再加上两岸均为 WTO 成员方，协议签署会受到一定的条件制约，因此，通过惠台政策实施正好可以进行有效的补充。

6. 惠台政策的实施就现阶段而言是对和平发展理论的有效实践，因此，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在和平发展的总体框架下，型塑两岸的共同价值观，从而为实现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6 月 25 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ECFA 框架下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展望

华侨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　郭　丽

一、前　言

2008 年以来，台湾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两岸“三通”的实现，推动两岸关系出现可喜局面，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在两岸往来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局势下，ECFA 议题成为当前两岸同时关注的一个热点。2010 年 1 月和 3 月，两岸就 ECFA 分别在大陆和台湾进行了两次工作商谈，已经就多项议题达成了协议，正式协议的签署已经是指日可待。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趋势，海峡两岸的经济整合势在必行。在未来的 ECFA 框架下，两岸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必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两岸双方都在努力谋求一个共赢的新局。两岸的产业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ECFA 协议正式签署后，会在更好的环境下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不断深化产业合作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

海峡两岸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经贸依存度不断提高，产业合作也正逐渐向更高层次演进。

两岸贸易额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额已经由 1989 年的 34.8 亿美元，增至 2009 的 1062.3 亿美元；大陆实际利用台资由 1989 年的 1.55 亿美元，增至 2009 年的 18.8 亿美元[①]（参见表 1 ）。大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目的地。两岸产业合作层次不断提高，台湾对大陆的投资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业；20 世纪 90 年代，

① 资料来源：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www. gwytb. gov. cn.

台资项目开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进入 21 世纪，台湾电子、IT 等高科技企业开始向大陆转移。

表 1　历年台商投资大陆统计①

年份	大陆批准台资企业（个）	同比增长（%）	实际利用台资（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88 年前	437		0.22	
1989	540	23.57	1.55	600
1990	1103	104.26	2.22	44.16
1991	1735	57.30	4.66	109.91
1992	6430	270.61	10.50	125.32
1993	10948	70.27	31.39	198.95
1994	6247	-42.94	33.91	8.03
1995	4847	-22.40	31.61	-6.80
1996	3184	-34.30	34.74	10.19
1997	3014	-5.30	32.89	-5.54
1998	2970	-2.55	29.15	-7.43
1999	2499	-14.10	25.99	-13.82
2000	3108	22.16	22.96	-9.39
2001	4214	36.15	29.80	32.82
2002	4853	15.20	39.70	33.20
2003	4495	-7.38	33.77	-14.94
2004	4002	-10.97	31.17	-7.69
2005	3907	-2.40	21.50	-31.00
2006	3752	-4.00	21.40	-0.70
2007	3299	-12.10	17.70	-20.40
2008	2360	-28.50	19.00	7.00
2009	2555	8.30	18.8	-0.01
累计	80061		495.40	

两岸产业合作不断拓展，是双方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台湾地区是大陆重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地，2009 年台湾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以 65.63 亿美元居第二位。在带来资本投入的同时，台资企业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台湾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追随者，创造了许多产品制造的世界纪录，

①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公布数据整理。

支撑着其经济持续发展。台湾拥有技术、管理、营销、服务等产业优势，大陆企业在与台湾产业合作过程中，可以从中借鉴先进成果和经验，以提升自身的产业创造力。

两岸产业合作对台湾经济发展和产业层次提升的意义更加重大。在全球经济快速的结构变迁中，台湾也需要不断调整经济发展。但是，台湾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遇到一些瓶颈因素的制约，如自然资源匮乏、国际发展空间有限、岛内市场狭小、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台湾岛内部分产业开始向岛外转移。由于大陆与台湾共处于一个 WTO 框架之内，生产要素具有互补性，又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资源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因此，大陆成为台湾产业外移的首选地，表 2 中 2001～2005 年台湾地区对外投资区域分布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

表 2　台湾地区对外投资主要区域（2001～2005）①　　单位：%

年份	中国大陆	美国	香港	越南	泰国	马来	西欧
2001	74.71	16.49	9.11	5.97	5.60	6.65	3.93
2002	72.90	17.14	7.74	4.93	4.42	5.44	4.29
2003	77.75	15.93	8.26	4.97	4.75	4.75	3.56
2004	67.24	5.40	1.35	0.92	0.08	0.34	0.60
2005	71.05	3.72	1.27	1.11	0.24	0.33	3.54

三、两岸产业合作继续深化的制约因素

不断深化产业合作是两岸双方的共同要求，但是，由于两岸历史存在的政治等因素的制约，妨碍着两岸产业合作的继续深化。

1. 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量的限制政策阻碍两岸产业合作的深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经贸关系一直受到政治因素的困扰。台湾当局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对大陆商品和投资历来执行严格限制政策，使两岸的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长期难以实现双向对等的正常状态。以两岸贸易额统计，大陆对台湾贸易始终处于逆差，截至 2006 年，双方贸易总额累计 6036.9 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额为 1025 亿美元，大陆自台湾进口额为 5012.4

① 资料来源：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经济与趋势研究中心．《2015 年台湾产业发展愿景与策略》。

亿美元，累计逆差 3987.6 亿美元[①]。对陆资入台，台湾当局控制更加严格。直到最近 2 年，金融危机给台湾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压力，政策才有所松动。而批准入台的产业范围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规模也十分有限。2009 年 7 月～12 月，台湾当局核准大陆投资项目仅 23 项，投资金额总计 3749 万美元[②]。

2. 两岸金融合作滞后影响产业合作

产业发展与金融服务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两岸产业合作一直保持良好势头，相比较而言，金融合作相对滞后。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但是，台湾当局对赴大陆投资有严格的规模限制，两岸金融领域间信息又不通畅，使大部分投资大陆的台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两地的融资都遇到障碍，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使两岸双方产业合作的深入进行遇到瓶颈制约。2009 年 4 月 26 日，两岸签订了《两岸金融合作协议》，2009 年 11 月 16 日，两岸又签订了两岸金融监管谅解备忘录（MOU），使两岸金融合作看到了曙光，使在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困难可望借由两岸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而得到解决。

3. 金融危机冲击了两岸的产业合作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两岸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不同程度冲击，较之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上半年，大陆和台湾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下滑。受金融危机影响，两岸双边贸易和产业合作也出现了出现了下降趋势。2008 年 1～12 月，两岸贸易额 1292.2 亿美元，同比上升 3.8%，远远低于 2007 年 15.4% 的增速。同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2360 个，同比下降 28.5%；实际使用台资 19 亿美元，同比上升 7%。2009 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2555 个，同比增长 8.3%；实际使用台资 18.8 亿美元，同比下降 0.01%。虽然说两岸双边贸易和投资趋缓的主要原因，既有来自台湾岛内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因素和台湾产品出口竞争力不断弱化的原因，也有来自大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造成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波及，使两岸产业合作受到冲击。

4. 大陆与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使台湾经济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存的一大趋势，目前全球大约有近

① 资料来源：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www.gwytb.gov.cn.

② 转自：熊俊莉．国际金钱后两岸经济合作的成果与前景，台湾研究，2010（1）.

250 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在亚洲，目前仅有台湾地区和朝鲜未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中国大陆在加入 WTO 之后，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对台湾经济及两岸经济往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特别是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伙伴架构协议》，已于 2010 年开始生效，相关产品由于免除关税而使贸易更加畅通。而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必将使台湾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台湾经济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

四、ECFA 的由来及其涵义

海峡两岸同根同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资源、经济也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经济的进一步整合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是推动两岸经济整合的重要机制。

ECFA 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的英文缩写，由最早台湾提出的 CECA 更名而来。

在两岸相继加入 WTO 之后，大陆就提出了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台湾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成为 WTO 成员，在享受大陆给予到台商优惠待遇的同时，必须兼顾 WTO 规则。根据 WTO 规则，大陆在给予台湾关税优惠、服务业开放等优惠待遇，需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临时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出于遵守 WTO 规则和促进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两个愿望，大陆在 2002 年就提出了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

台湾方面在马英九竞选时，就提出了推动两岸签订互惠的经贸协定的议题。2008 年 10 月，由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首次正式提出两岸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简称 CECA 的建议，并于年底由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拿出了初步的方案，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可行性论证。2009 年 2 月，为缓和岛内反对势力比照 CEPA（《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质疑，避免台湾被政治“矮化”的嫌疑，台湾当局宣布将 CECA 更名为 ECFA，并提出在 2010 年初步完成框架协议的签署。

对于台湾的 ECFA 提议，大陆方面释放出了极大的诚意，愿意充分考虑台湾同胞的愿望和要求。2009 年 5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指出，在有利于两岸共同发展及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经济合作的前提

下，ECFA 可以在 2009 年启动。2010 年 1 月 26 日，两岸在北京就 ECFA 举行了第一次工作商谈，2010 年 4 月 1 日，第二次工作商谈在台湾桃园圆满结束。通过两次正式工作磋商，两岸就 ECFA 议题取得多项共识，都同意加速推动正式协议的商签。

ECFA 是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的经济合作安排，是在 WTO 框架下签署的类似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框架协议，但是，ECFA 又比 FTA 涉及的范围更广泛，不仅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而且还包括有规划指导、有政策支持、有产学研共同参与的新型产业合作与经济合作。根据两次工作商谈的结果，ECFA 协议主要包括序言及总则、贸易与投资、经济合作、早期收获清单及其他等 5 个章节，条文约 20 条，具体的关税减让条款和早期收获清单等协议内容，还需要双方进一步协商。ECFA 正式签署后，大陆和台湾可望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届时对两岸经济合作会产生积极影响。

五、ECFA 对两岸产业合作的影响

ECFA 的正式签署即将成为现实，对两岸双方的经济合作和各自的产业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产业层面上，ECFA 签署生效后，将使两岸双方形成更好的良性互动关系，符合两岸产业发展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对于台湾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避免由于产业外移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都有积极的影响。

1. 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产业竞争力

大陆和台湾产业发展各具优势，又存在一定的层次落差，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台湾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已经十分成熟，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台湾的石化工业、电子工业、精密机械等领域居世界前列，其企业的研发能力强、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高、资金较为充足、现代服务业相对发达，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经验丰富。大陆处于工业化中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相当比重，与台湾存在着产业层次上的级差。但是，大陆拥有丰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这些正是台湾产业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制约。两岸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产业链上的互补优势，对提升双方在国际上的产业竞争力都是有益的。

ECFA 框架下，两岸双方必然互相开放市场，而且要配套以相关的产业

政策和统一的产业标准等其他合作内容，这为双方进一步加强产业层面的沟通、实现优势互补建立了更好的机制。现在的两岸产业合作，以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单向交流为主，大陆到台湾的投资较少。在未来的 ECFA 框架下，对投资的开放是双向的，大陆的企业可以更多地获得到台湾投资的机会，从而能够学习台湾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ECFA 的签署对台湾产业的发展意义更大。在 ECFA 商谈过程中，大陆方面本着“平等协商、互利双赢、让利台湾”的原则，提出要充分考虑和满足台湾同胞的愿望和要求，在关税减让和早期收获的项目中，可能对台湾的让利更多一些，台湾的一些产业将从中获益。2010 年 1 月，中国和东盟协议已经生效，如果台湾和中国不签署 ECFA，那么台湾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会比东盟国家产品进入大陆市场高出 6% 的关税，这会大大降低台湾产品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力。虽然说 ECFA 框架下，台湾部分产业会受到冲击，但受益的产业远远多于受损的产业，石化、机械、纺织、汽车零部件等产业首先受益。而对于成衣、内衣、制鞋等处于劣势的产业，在两次 ECFA 商谈中并未列入早期收获清单，而且台湾当局也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拯救措施。同时，对于这些弱势传统产业，通过这次调整的机会，在政府的帮助下，可以加速其产业升级的步伐，实现产业转型，寻求新的产业定位，这对于提升台湾岛内产业结构层次也是一次良机。

2. 抓住机遇，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打击，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将会出现变化，全球产业布局会按照新的秩序进行优化。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加速了其产业与技术的外移。两岸经济和产业发展在金融危机中都遭受危机，但是，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也为两岸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促进各自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历史的机遇。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庞大经济体，已于 2009 年下半年带头逐渐从危机中复苏，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台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较强，而中国大陆又是其最大的产品出口地。两岸的经济整合和产业合作，对于台湾和大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以及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无疑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目前，两岸“三通”已经基本实现，这为两岸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ECFA 正式签署生效后，两岸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合作将变得更为通畅，海峡两岸的经济整合和产业合作将使

两岸在世界产业布局中成为最强大的区域之一。这对两岸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重振经济有积极作用。2009 年，台湾受金融危机冲击，GDP 下降了 1.3%。2009 年 9 月，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所公布的《ECFA 影响评估报告》指出，签署 ECFA 后，台湾经济增长率大约可提升 1.65 ~ 1.72 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可增加 25.7 ~ 26.3 万人。

3. 抑制台湾产业外移，避免产业“空洞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台湾经济的下滑，台湾的制造业比重也在不断下降，许多制造业迫于成本和市场的压力，纷纷外移到大陆、东南亚等地，使台湾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向。2010 年 1 月，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东盟国家 90% 的产品可以免税进入大陆市场，但是，台湾相同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却平均要缴纳 6% 的关税。这会给台湾的石化、机械加工、纺织、汽车零部件等产业带来严重冲击。中国和东南亚是台湾最重要的产品出品地，他们之间的产品互免关税，直接提高了台湾产品的出口成本，抑制了相关产品的出口。为避免损失，台湾岛内的相关产业必然会不断向外转移，这会导致台湾产业“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加剧岛内经济的恶化。

如果台湾和大陆签署了 ECFA，那么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随着 ECFA 协议的生效和两岸经济合作的推进，台湾岛内产业的技术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市场营销优势、地理环境优势，将使台湾成为最重要的亚太营运总部，从而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而且，借由与大陆签署的 ECFA，台湾还可以融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从而分享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谋求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

4. 合作研发，创造世界品牌

2008 年，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提出了促进两岸产业合作的“产业搭桥计划”，确定了中草药、纺织、通讯、LED 等 15 项产业合作项目，目前这个计划已经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09 年，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又推出了六大新兴产业规划，将生物科技、观光旅游、绿色能源、医疗照护、精致农业和文化创意六大产业作为台湾产业调整和发展的新方向。这个规划也为两岸的产业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方向，规划的实施需要借助大陆的市场和与大陆的产业合作。

ECFA 框架协议，不仅包括贸易和投资条款，而且还包括有规划指导、有政策支持、有产学研共同参与的产业合作，这将使两岸双方的产业合作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下展开更高层次的合作。在世界产业体系中，两岸所处的产

业层次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需要继续努力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台湾的一些产业发展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领先地位，但是，台湾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在规模上明显不足，这制约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品牌行销能力的提高。而且，台湾的制造业大多以“代工”模式为主导，缺乏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较低，且以贴牌生产为主，缺少自主品牌，这使台湾产业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缓慢，制约着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大陆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发能力比较强，而且许多跨国公司都在大陆设立了研发机构，在太阳能、基因技术、中草药研制等方面的研发都有一定优势。在 ECFA 框架下，两岸的科研力量和企业可以实现资源整合，共同打造具有世界水平的品牌，提升产业层次。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6 月 25 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建构两岸人民和谐共处的生活共同体：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

福建省委党校闽台关系研究中心　严志兰

大陆台商群体是一个在两岸特殊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特殊群体。伴随经济交流的扩大与深化，两岸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沟通也日益热络，台商群体则是其中最能与大陆社会发生深度接触与持续稳定互动的社会群体。本文运用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福建台商的社会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并结合质性和定量方法，从移民社会学角度对在闽台商的社会适应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试图从社会政策视角提出促进在大陆台商社会适应的思路和若干政策建议。

一、在闽台商社会适应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2008 年 10 月至今，笔者围绕台商社会适应问题进行了 1 年多的田野调查，对在闽台商的工作、家庭生活、休闲娱乐、社团与宗教活动等各层面进行了参与观察，并在此过程中对台商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截止 2009 年 12 月，笔者共采访了 43 位受访者（包括台商、涉台政府工作人员和台企陆干），其中深入访谈的台商有 32 位，收集到调查问卷 125 份。在对上述实证调查资料进行文本和 spss 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在闽台商的社会适应情况得出如下结论：

1. 根据流动动机，在闽台商跨界流动可以划分为工具性流动和情感性流动两种类型。其中工具性流动包括追逐市场型、个人发展型、朋友介绍型、招商引资型和公司委派型五种；情感性流动包括回报家乡型、夫唱妇随型和改变生活方式型三种。

2. 在闽台商的社会适应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在经济层面，在闽

台商经济上普遍能够获得稳定发展，受经济危机影响程度较小。

在日常生活层面，居住形式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台干多住在市外/厂区，在福建生活多年的台商（包括台干）多在生活设施比较完备的社区买房或租房居住。物质消费基本没有问题，业余文化生活相对单调枯燥。生活重心在大陆，但仍保持与台湾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孩子留台接受教育、经常关注台湾媒体信息。自己与家人的医疗保健和人身财产安全是他们困扰最大的两个问题，深入当地社会生活后感受到两岸人文素养的差异和差距，有心理优越感。有比较明显的在大陆长期发展的倾向，但退休后不一定会留在大陆。

在社会层面，人际交往上工作圈子以大陆人为主，朋友圈子以台湾人为主。社会支持网也以家人和来自台湾的朋友为主。在社交倾向上，对与自己工作和生活直接相关的社会交往与参与更有积极性。

在心理和文化层面，普遍感觉能够被当地社会所接纳，不会与当地社会产生太大的文化摩擦或冲突。更倾向于台湾认同，如情感上更信任来自群体内部的台湾人，更倾向于保留台湾的语言习惯，并坚持按照在台商社会中习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处理问题，情感依恋的对象仍然是台湾（主要体现为在台湾过春节，家在台湾，理想的工作和生活地点是台湾）。

总体上，台商普遍表示能够适应在福建的生活，同时表示台湾和福建两边的生活都能够完全接受。但在闽台商经济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高于其他层面的融入，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社会支持、心理和文化认同方面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还比较松散，要实现在福建安居乐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在闽台商并非铁板一块，存在一定的职业和阶层分化。本研究将台商区分为企业主、个体户、台干和台太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台商呈现出不同的流动和适应特征。

在闽台商群体内部跨界流动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台商企业主流动的主要原因是追逐市场；一代台商创业成功及寻找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带动了在闽“二代台商”群体的流动和成长；五缘关系对台商个体户的流动有着特殊意义；台干的流动从被动安排到主动要求，家庭因素是台干流动抉择的最重要考量因素；台太基本上出于家庭完整和孩子教育的考量被动流动。

不安全感、增长中的发展压力和未明说的优越感是在闽台商的普遍心态。虽说适应首先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并也不能完全说在大陆居住的时间长了，习惯了，就适应了。

台商群体内部社会适应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台商企业主的社会接触面比台干广，要面对适应问题也比台干多；二代台商有较好的事业发展基础，学习提高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台商个体户以灵活的经营方式见长，社会交往草根化；台干的人员构成与社会生活相对比较单纯；台太大多是随丈夫迁移，要承受更多的压力，照顾家庭与孩子教育是台太主要的生活内容，同时台太也并非完全被动流动，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她们也会以创业的方式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方式。

4. 在闽台商的社会适应的策略：首先，持续性在两岸间往返流动，形成跨界流动的生活方式，建构起跨界的社会空间；其次，在认同上表现出双向性和情境性特征，以重建内在心理秩序，化解身份模糊引起的心理落差和尴尬情境；最后，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是最主要的关系类型，建构两岸婚姻是成为一种特殊的适应策略，通过相互交织的“大圈子”和“小圈子”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从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全面嵌入当地社会，为台商在当地社会正常生活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

二、在闽台商社会适应的一般特征

影响台商社会适应的因素既包括个人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既包括内部因素，也包括外部因素。台商个体的性格和适应态度是影响台商社会适应的主要内因，到大陆来投资、工作的台商大部分比待在原籍的人更具流动性格，主动了解当地社会、主动与当地社会沟通的台商能更快地适应和融入到当地社会。大陆社会对台商的接纳程度是影响台商社会适应的主要外因，包括大陆政府的对台政策（制度性接纳）和当地居民对台商的态度（社会性接纳）两个方面。从这两方面看，在闽台商社会适应表现出如下一般性特征：

一方面，台商主动适应大陆社会，全面参与大陆社会生活，产生正向的迁移外溢效应。从个人微观层面看，台商从熟悉的生活环境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语言、衣食住行各面的生活习惯到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都要经历一个冲突、调整到适应，乃至融入的长期过程。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台商与大陆当地社会的联系从经济层面的互动走向日常生活、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的全面互动。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2000 年以后台资企业本土化经营趋势日益明显，从最初的采购、生产、人才的本土化逐步发展到市场与营

销、研究开发、利润与融资等各方面的本土化。目前两岸产业对接成为双方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也预示着台商经济上融入到大陆社会的强劲趋势。本土化的经营策略，不仅拉近了台企与大陆消费者的距离，而且促进了台企与大陆当地政府的关系协调，增强了台企与大陆本土企业的联系。进而推动台商在日常生活层面与大陆当地社会的接触、交往，在双方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增进对对方的认知和理解，一些打上台湾社会地域文化烙印的台商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也逐渐为当地社会认知、了解、熟悉，甚至被接受。概言之，台商以本土化的经营策略夯实了社会适应的基础，以趋向本土化的社会交往增加了社会适应的广度，以广泛的文化交流拓展了社会适应的深度。

对大陆台商及其家庭而言，主动适应产生积极的迁移“外溢”效应。迁移“外溢”效应是指台商跨界迁移后获得了比迁移目的本身更多的积极结果。首先，不少台干太太在大陆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利用台湾在商品、服务和理念方面的互补优势，自行创业，为台干家庭拓展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正在创业或已经创业成功的台干/台商家庭，为其第二代到大陆来就业和创业开辟了新的可能，福建二代台商群体的数量逐年增长。再次，大陆为台商家庭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台商家庭成员逐渐渗透到大陆日常生活中，他们接触到了比台湾广阔得多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空间，这些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另一方面，大陆社会积极接纳台商，与台商群体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台商的社会适应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应该从台商群体与当地社会和政府的双向互动中去理解台商的社会适应问题。有学者指出，如今的移民社会融合应当是移民群体、移入国（地区）社会乃至移民原居国（地区）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过程[①]。移入国（地区）社会的移民政策和移民管理制度是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台商大量移居大陆，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应对不断变化中的人口流动情况，帮助台商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敏感性，大陆政府极为重视对台工作，对来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更是以等同外资的方式进行管理，对台商则以高于国民待遇的方式礼遇之。

① 李明欢：《国际移民与发展：相互依存三方共赢——联合国2006年系列报告述评》［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3）：66－74.

表 1　福建省与台商相关政策法规

领域	政策法规名称	颁布时间	颁发部门
经济	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	1994 年 12 月	福建省政府
	鼓励和支持海峡西岸（福建）农业合作试验区建设的暂行规定	2006 年 5 月	福建省政府
	关于实施福建省“十一五”闽台产业对接专项规划的若干意见	2006 年 8 月	福建省政府
	关于扶持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8 年 8 月	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新台币现钞兑换业务管理试行办法	2003 年 7 月	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对台小额贸易外汇管理办法	2005 年 3 月	福建省政府
	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马祖、澎湖间海上直接通航运输管理暂行规定	2006 年 8 月	福建省交通厅
	福州海关进一步支持和服务闽台农业合作的工作措施	2006 年 2 月	福州市海关
	福建海事局关于加强闽台海事交流写作，服务两岸“三通”的工作意见	2006 年 10 月	福建省海事局
	福建检验检疫局促进闽台经贸发展和人员往来措施	2006 年 10 月	福建省检验检疫局
	福建省检验检疫局进一步支持海峡西岸（福建）农业合作试验区建设有关措施	2006 年 11 月	福建省检验检疫局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支持台湾同胞投资的优惠政策	2008 年 5 月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社会	省教育厅、省台办、省财政厅、省团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台商子女在闽就读的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7 年 10 月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对台湾居民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管理办法（实行）	2008 年 1 月	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省人事厅、省经贸委、省台办关于开展在闽台湾地区居民经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评审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8 年 6 月	福建省人事厅
	省人事厅、省经贸委、省台办关于开展在闽台湾地区居民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评审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8 年 6 月	福建省人事厅
	省人事厅、省经贸委、省台办关于开展在闽台湾地区居民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评审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8 年 6 月	福建省人事厅
	省卫生厅、省台办关于做好台湾同胞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	2008 年 8 月	福建省卫生厅

来源：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福建省鼓励台湾同胞投资政策法规选编，2008 年 12 月。

福建省是台商最早到大陆投资的区域之一，针对台商在福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福建省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政策、法规，有序引导和保障台商在福建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权益（见表1）。这些政策、法规涉及台商在福建的投资权益保护、闽台农业合作、台资中小企业发展、货币兑换、海事合作、通关检疫检验等各个方面，台商在福建的社会权益保护方面则包括台湾同胞在福建就业时的职业技能鉴定、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台商子女在闽就读服务和台湾同胞医疗服务等方面。对台经贸工作是福建省对台工作的首要工作，2008年以来，省台办围绕投资软环境建设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积极宣传和落实中央各项惠台措施。如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国台办王毅主任宣布的十项惠台政策措施、《国台办支持和帮助台资企业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工作措施》等。第二，帮助台资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在台资企业融资、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都有针对性的落实、解决；邀请两岸专业人士对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进行专项服务；落实国台办王毅主任在第四届经贸文化论坛上宣布的总额达1600亿人民币的台资企业专项融资支持等。第三，切实维护台商合法权益。除了为台资企业产业升级、节能减排、市场开发等方面加强服务，提供政策咨询，简化办事手续以外，省政府还为台商的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便利条件。建立了专门的台商权益保障工作机制，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相关部门以“诉求有门、办事有效”为工作导向保障台商合法权益。尤其重视重大台商投诉大案、要案、积案的调处，确保台商投诉案件得到妥善处理[①]。

大陆实施招商引资政策，积极接纳台商，产生了积极的经济、社会、文化效应。首先，台商为大陆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台商投资大陆积极效应是主要的，具体表现为：台商投资是大陆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推动大陆技术革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扩大了大陆进出口贸易，改善了大陆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台商投资大陆还使得两岸贸易依存度提高，推动了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信息交流以及两岸航运的发展。随着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的不断增加，海峡两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更加紧密。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如果当期台商直接投资增长一个百分点，长期会带动福建省内总值增长

① 福建省台办：福建省对台经贸工作情况汇报，2009年4月。

0.038 个百分点[①]。总之，台商在两岸交流中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为推动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升温做出了重要贡献[②]。

其次，台商将他们独特的地域文化传播到大陆，推动了两岸的文化沟通与交流，丰富了当地文化，促进了文化多元化发展。有研究者认为，资源和资本的流动会促使文化形式的激增[③]。一方面，台商带到大陆的商品同时也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比如，台商将婚纱摄影服务带到大陆，同时也带来了大陆社会婚嫁消费文化的变化，催生了两岸婚嫁市场的发展。台湾在大陆影响较大的餐饮文化、自行车文化等都是通过台商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带来的。另外，台企的企业经营管理文化也对大陆企业文化产生影响。台商在大陆能够稳步成长，依靠的是灵活的经营模式、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独特的产品、服务，这些优势都集中体现为台商的企业文化。不少大陆员工在与台湾老板和台籍干部共事的过程中，感受到台湾人做工作的勤奋、认真、细致，这是他们对台商认同最高的一个特质。

另一方面，台商在原生环境中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都对大陆当地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有一位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来到大陆的台商曾自豪地对我讲，20 年前他到餐馆吃饭打包被别人笑“小气”，可是现在吃不完打包再正常不过了。不少台商热衷于慈善事业，笔者在台湾慈济功德会福州联络处做田野调查时就了解到，早在 10 多年前福州就有了慈济的台商志工。2008 年民政部批准慈济功德会在大陆成立基金会，福州慈济志工的规模有了显著成长。目前在福州区有 6 位负责慈济会务推广和传承慈济文化的授证志工（蓝天白云），他们全部是在福州工作的台商，见习 2 年的授证志工（灰天白云）人数达到 40 位，这 40 位灰天志工有台商，但更多的是在福州工作、生活的大陆人。2010 年福州慈济会的“岁末祝福”晚会到会人数达到 900 多位，为历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台湾慈济会所倡导的慈善文化逐渐为当地社会所认识和接纳。

---

① 吴德进：《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 亚太经济，2008（6）：97－100。

② 邢章萍：《台商，两岸经贸交流的桥梁——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胡石青》［J］. 经济，2009（11）：104－105。

③ 黄宗仪：《全球都会区域的弹性身份想象：以台北与上海为例》［J］. 文化研究，2007（4）：9－40。

三、促进大陆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的社会政策思考

两岸由于长久的隔绝，彼此的陌生感不太可能只凭借目前的交流方式，也就是握握手、聊聊天、做做生意等，就可以化解。因此，两岸的和解更多的是在经济等物质层面的和解，而在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两岸其实仍在分的格局与趋势之中。但是，两岸自2008年以来所出现的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更密切的文化往来，更频繁的人员交流，更坦诚的对话与谈判，更多的相互参与的大好局面将是两岸民众重建信任与合作的历史机遇，这就需要转过去“危机管理”为现在“机遇管理”的思维模式①，创新做台湾人民工作的方式、方法，建立相互依存与相互认同的两岸关系新关系。加强大陆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是“做台湾人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促进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的意义：建构两岸人民和谐共处的生活共同体

促进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最首要的意义在于建构两岸人民和谐共处的生活共同体。台商是两岸社会融合的先锋队。规模不断扩大的大陆台商群体在两岸民间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台商与大陆社会的交流、交往涉及从宏观到微观的两岸关系的各个层次，台商群体的存在和壮大缩短了两岸的空间距离，使两岸交流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台商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使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是两岸社会融合的先锋队。

台商融入到当地社会有利于两岸人民和谐共处生活共同体的建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13亿大陆人民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②。因为两岸过去长时间的隔绝、内战状态的未完全结束和当前两岸间复杂的情势，使得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变

① 章念驰：对和平发展勿抱肤浅认识［EB/OL］.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1/8/6/101118696_2.html?coluid=33&kindid=541&docid=101118696&mdate=1125100822，2009-11-24.

② 1992年李登辉曾借用彭明敏的“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一说，意在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和现实联系的纽带，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参见杨丹伟．解析台湾的大陆政策［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231.）

化，但已经有裂痕有损伤，而“如何去修复去弥补，是不能忽视的问题。”[①] 不断拓宽、加深两岸沟通、交流的渠道和领域，增进两岸在各个领域的理解与共识，是修复和巩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形成和平发展的强劲势头，在宏观层面上，两岸交往机制化、制度化进程有序推进；在微观层面上，以两岸基层民众为主体的民间交流稳步扩大。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建设两岸生活共同体是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所谓生活共同体是指两岸人民在同一个物质空间和地理区域中生活，维持着形成社会实体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互动。两岸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交流是生活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内容。台商在大陆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是台商社会适应的基础，离融入当地社会还有一段距离，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感情的融合，这主要体现为台商与当地社会民众能够平等交往、和谐共处，建立深厚的同胞情谊，把当地社会当成第二故乡。台商思想感情上融入到当地社会才真正意味着两岸人民生活共同体的建立。

（二）促进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的思路

如何通过社会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强大陆台商的社会融合？国际移民管理经验和两岸关系现状是两个重要参考因素，据此笔者先提出制定移民适应政策的思路，然后提出相应的促进移民社会适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要认清当今世界相关国家移民政策取向的大趋势。积极促进移民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但如何真正有效地促进具有异文化背景的移民融入本国（地区）社会，仍然是困扰相关国家政界、学界的重要问题。在移民政策的制定上，各国都争相加大吸引专业人才的力度，许多国家政府意识到，智力不流动的结果有可能是“智力浪费”（brain waste），适当流动却可能带来较高层次的“智力获得”（brain gain）；同时，鼓励移民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其原居住国[②]。

其次，要了解移民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移民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启首先要解决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交往认清“你是

① 王茹：《两岸命运共同体与两岸公共生活的建构——以两岸民众的沟通为中心》［J］. 台湾研究集刊，2006（3）：1。

② 李明欢：《国际移民与发展：相互依存三方共赢——联合国 2006 年系列报告述评》［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3）：66－74。

谁”的问题，并经过不断磨合打破身份的界限，实现身份的转移，解决不了认同问题就解决不了移民的融合问题，同时要认识到融合不能和同化划等号。因此，从本质上讲，移民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认同问题。对移入国（地区）政府来说，移民政策的导向应该不是要把移民变成自己国家的公民，而是使移民和当地社会居民一道拥有共同生存、平等发展的途径和机会。无论是将移民边缘化还是给移民高于国民的待遇都不利于移民在当地社会的真正融合。

第三，建立文化认同的统合机制，促进两岸社会融合。认同具有多个维度和面相，上述身份认同只是移民认同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多元化使得移民个体的社会认同在一些维度和面相上趋同，在另一些维度和面相上分化加剧。对移民社会融合最具实质意义的是文化的认同。对两岸社会来说，中华文化是两岸的公约数，是建立两岸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两岸不少学者就提出构建两岸文化共同体，增进两岸对共有的中华文化的认同。通过某种制度上的安排，以藉制度性的推动力，创造彼此合作互动的新模式是实现两岸文化认同的现实选择。两岸社会在文化认同上存在一些分歧，有必要通过文化认同的统合机制，促进社会融合。文化认同的统合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树立文化自省或文化自觉意识，即通过认识自己及其社群和民族文化的特质和规则，建立本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是建立文化交流机制，通过人们的交流实践来达到不同文化或持有不同价值认同的人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在交流实践中调整自己对其他文化的态度、调节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实现多样文化的和平共处[①]。大陆台商群体应是上述文化认同统合实践的先锋队。

第四，运用公共政策消除群际刻板印象，促进群际和谐。两岸民众有着共同的血缘和文化，表面看来，相互之间交往应该不成问题。但现实是，由于长期疏离和隔膜，以及政治体制、教育背景、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双方不时发生摩擦，甚至出现同一民族才会有的亲近憎恶感，双方民众鲜有文化身份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2009 年 6 月 30 日，台湾《远见》杂志的民调结果显示过去六十年的民间单向交流，让两岸民众的私人关系结构也出现不平衡现象，台湾受访民众认为大陆民众是“生意伙

① 两岸文化共同体 台湾可借此摆脱孤立［EB/OL］.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1/9/9/101119926.html? coluid=0&kindid=0&docid=101119926，2009-11-23.

伴”，大陆民众则当台湾民众是他们的家人与亲戚[①]。大陆台商群体和当地社会居民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群际刻板印象，如何消除这种群际刻板印象应该纳入公共政策视野。许多研究发现改变人们对所真正遇到的特定外群体成员的态度并不太难；更难的是转变他们对整个外群的态度和刻板印象[②]。有学者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接触假设理论[③]，提出“操纵社会范畴化”来消除群际刻板印象[④]，其具体内容包括：首先群际交往的“个体化”。在群际接触期间使群际边界模糊，并使所有的互动都在人际水平上发生，那么逻辑上，群际歧视可能会降低。其次，重建共同内群认同模式，即通过重新描绘群际边界，使以前的外群体成员成为同伴内群成员，那逻辑上，群际歧视也会降低。第三，建立独特社会认同模式，即在接触情境中，如果内群和外群成员的角色是独特而互补的，那么，在合作的框架下，两个群体都能保持其特异性，并能促进群际和谐。这一观点或许能解释大陆台商的某些社会适应现象，同时为台商社会融合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第五，区分可流动性移民和永久性移民，确立不同的公共政策取向。一方面，当可流动性移民在体制上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作为一个本地人生存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资源与条件，他们基本都具备，其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也全部都融入了本地社会，他们伴随经济的波动离开这个地区和城市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时候可流动性移民就会转变为永久性移民。另一方面，对于永久性移民和本地社会居民也要赋予其更多的流动自由，为其自由流动创造提供便利条件，这不但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管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有利于留住优秀人才，吸引更多的投资，增加社会发展的活力。概言之，对于可流动性移民，要通过社会融合政策引导其向永久性移民转变；对于永久性移民，要赋予其自由流动的机会和权力，提升其可流动性，引导人口和

---

① 董会峰，刘舒凌：联合民调显示两岸民众一致看好未来两岸关系［EB/OL］. http：//www.chinanews.com.cn/tw/tw-ztjz/news/2009/06-30/1755561.shtml，2009-06-30。

② ［英］布朗：《群体过程》［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224。

③ 1954 年戈登·奥尔波特提出接触假设（contact hypothesis），并据此提供一些公共政策建议消除群际偏见，促进群际和谐。李等学者把接触假设拓展为公共暴露假设（public exposure hypothesis），其基本含义是只要特定群体成员公开暴露在与其他群体成员有关的条件下，敌意的群际态度就会改变。李指出了公共暴露的四种类别：信息，指第三方所披露的外群体的信息，如新闻报道和讲演等；观察是指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直接观察；互动亦即是面对面的基础；而群体资格是指内群体成员自己、其家人或朋友曾经或现在属于外群体。（参见 Lee，B. A. et al. “Revisiting the Contact Hypothesis：The Case of Public Exposure to Homelessness”. A. S. R.，Vol. 60，2004：40-63.）

④ 方文著：《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6-88。

资源的合理流动。对于大陆台商群体来说，政策导向是将其转化为永久性移民。

（三）促进在闽台商社会适应与融合的社会政策建议

大陆台商群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流动人群，在两岸社会的交往、交流中，没有哪一个群体能像台商群体这样与两岸社会同时保持密切、深入、持久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群体像台商群体这样处于两岸社会的夹缝之中，遭遇身份认同的模糊与尴尬。大陆在制定和完善台商政策的同时，也要对台商群体特征有所把握，将促进台商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纳入政策制定视野，探索出一条两岸社会对接与融合的可行路径。结合实证调查发现，根据以上政策制定思路，笔者提出以下具体政策建议：

首先，将制定针对台商的社会政策上升到与针对台商的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的高度来认识。大陆对台商投资历来都是旗帜鲜明地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的态度。台商在政治上不是外商，但在政策上却是货真价实的外商，并享有比外商更优惠的待遇，甚至其享受的优惠政策也不低于大陆本土企业。台商在大陆除享受外商投资的所有政策优惠外，中央政府还根据具体情形制定了一些政策，以鼓励台商到大陆投资或经商，如“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对台商投资采行“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区别对待政策”。各地为了鼓励、吸引台商投资，纷纷出台了一些地方立法、政策与措施，除了给予台商政策上的优惠外，还采用特殊措施以保护台商的权益，如建立台商投资区，设立台商投资投诉中心或调解中心，在能源与基础设施上给予台商以特殊的优惠等。大陆在台商政策上一贯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与影响两岸经贸合作或台商投资，即不论两岸关系如何变化，大陆一如既往的鼓励、支持与保护台商投资。

大陆台商政策要适应台商在大陆投资形势和工作、生活方式的变化，着眼于两岸社会的大融合，提出台商政策的新思路。近两年，两岸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也得到两岸各界的高度重视，闽台之间的交往、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入，突然拉近的距离也带来了因为以往沟通不充分而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因此可以考虑淡化以往以经济优惠政策为主的鼓励保护措施，加强针对台商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将以后台商政策的重点放在解决台商投资、生活的基本需求和突出问题上来，比如在涉及台商在闽

的吃、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推出更多政策。

其次，创新对台工作管理体制是台商政策制定、完善与贯彻落实的前提条件。目前比较集中做对台工作的是各级台办系统（正式组织系统）和台协会系统（非正式组织系统），在实际组织运作、职能分工和组织效能上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不能适应对台工作（包括对台商工作）的发展需要。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通过组织架构和资源重组实现对台工作方面的事权统一。具体来说，就是提高涉台工作主管部门的行政层级，理顺对台工作中的部门交叉关系，厘清对台千条万绪工作的脉络，实现工作资源的整合，使对台工作责任与权力一致，提高对台工作的效率。

再次，遵循全面开放和国民待遇原则，在台商社会政策制定方面先行先试。所谓全面开放是指除涉及国家安全以外的大陆所有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面向台湾籍居民开放，让台湾籍居民有资格与大陆居民同等竞争，参与大陆各类工作岗位的公开招考。所谓国民待遇是指改变经济政策上的同等优先政策导向，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让所有台湾籍居民享受与大陆居民同等的待遇，不歧视，也不刻意优待以免造成大陆当地民众的误会。

针对在闽台商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当前台商社会政策需要着重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1. 台商政策思路从“招商引资”向“招商引智”转移。两岸不仅在产业方面有很大的对接空间，在人才和服务上同样有对接的民间需求。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带动下，台湾的人才资源和人才优势不仅容易在福建找到用武之地，福建与台湾近在咫尺的地理距离、相似的语言、饮食、气候和风俗习惯，将极大地减少了台湾人才适应大陆环境的时间和精力。因此，福建应该着力引进台湾有明显优势的专业人才，将福建建设成为台湾人才到大陆伸展能力、服务社会的桥头堡。比如，两岸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配置比重上明显不同，台湾企业中研发人员比重最大，呈橄榄形分布，而大陆正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挑战，对研发人员有潜在的强大市场需求。再如，根据台湾网路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语言、金融财会、进出口贸易、涉外法律、经营、旅游与高科技技术人才，是大陆目前人力的真空地带；另外，市政管理、广告创意、行销公关，都是过去大陆计划经济培养不出的人力需求。因此，可以考虑让除安全部门以外的政府公务员岗位和各类企事业单位向台湾籍居民全面开放，为有志于来大陆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台湾籍同胞尤其是重点专业人才提供不低于内地人才引进的各种便利条件。

台湾社会自主创业的就业人口也比较多，近年来受岛内经济衰退和市场容量的限制，有意愿到大陆从事个体经营的台湾居民人数不在少数。台湾在个体经营中所体现的服务理念、管理方式上都有值得大陆社会借鉴之处，可以考虑沿用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台湾同胞到大陆自主创业搞个体经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大陆第三产业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也有利于为台商在福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2. 系统规划、制定与台商有关的民生政策。与台商有关的民生政策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平面和网络媒体消费、文化娱乐等。在住房方面，主要问题不在台商的住房购买力方面，而在于大陆的房地产开发与台商的住房消费习惯有差距，可以考虑两岸建筑业合作开发楼盘。

医疗和台商子女教育问题作为台商投资的配套政策一直受到大陆政府的关注，但问题仍然存在。台商在医疗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台商对大陆医疗机构服务环境不满意，服务质量不信任。福建各地也制定了一些相应对策加以缓解，比如在厦门开设了长庚医院，设立台胞定点医疗机构等。笔者认为除了在医疗领域贯彻国民待遇原则，还可考虑逐步放开台湾医疗行业在大陆的经营权，鼓励台湾籍居民在台商比较集中的地方开设门诊；在各类医疗机构中引进台湾籍医师，为在闽台商提供他们熟悉的医疗服务。台商子女教育方面，一方面鼓励台商子女尽量在大陆学校就读，另一方面继续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所有中小学向台商子女开放，不鼓励大陆优质教育资源向台商子女倾斜，但要为台商子女就学提供方便。

台商在福建的休闲娱乐生活相对单调，可以考虑从台资企业税收中拨款，设立专项经费组织台商与当地社会组织和群体的联谊活动。设立专门管道收集信息，并定期向台商通报他们商喜闻乐见的各类演出活动和文化信息。对于台商喜欢阅读的台湾报刊、杂志和网站要尽可能给予支持，让他们能自由获取资讯。

3. 重视涉台教育，搭建台商与大陆社会了解、沟通、接触的平台。目前，台商群体和大陆当地社会的了解都相对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群际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根据前述接触假设理论，可以考虑从教育入手，增加群际沟通的渠道与机会，逐步消除群际刻板印象。

将涉台教育纳入相关干部培训内容中。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对台无小事”，这说明大陆政府部门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对台工作。而对于直接跟台湾（特别是台商）打交道的一线工作人员来说，还有

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因此，对涉台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直接与台商打交道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涉台教育，使他们对宏观层面的台湾问题、中观层面的台商政策、微观层面的台商群体特征能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了解，避免因为对台商群体的刻板印象而造成的误会和工作失误。

将涉台教育纳入社区建设中。涉台教育不仅要纳入干部培训内容，还要纳入社区建设中。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鼓励台商在街道社区层面加强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为了促进新移民尽快融入，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由政府、私人企业及民间组织等20名代表组成的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促进各社会群体间的相互信任。社区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层面，社区日常文体娱乐活动、节日庆典活动成为社会群体互动、沟通的平台，为此，政府专门设立基金，为组织此类活动的组织和社团提供多达80%津贴资助①。此外，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主要形式，可以考虑鼓励台商参与其所居住的社区管理。

将涉台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学校涉台教育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生动活泼。新加坡为了促进新移民融合，实施了一项“在家吃饭”（Meals@ Home）计划，就是鼓励本地学生、新移民和外国学生互邀回家吃饭，让他们在校外的场合加深对彼此饮食和风俗习惯的认识。通过学校涉台教育为闽台两地的学生提供日常交往平台，是学校涉台教育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最后是在媒体层面倡导群际沟通和群际融合。新加坡在这方面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新加坡国民融合理事会定期主办研讨会和对话会，邀请新移民分享自己融入新加坡的心路历程；支持平面媒体报道国民融合课题，如联合早报每周一的《新汇点》；它同时也希望其他如电视和电台，以及新媒体如博客和网上电视也能加入一起传达国民融合信息；社青体部欢迎公众针对他们的建议，通过民情联系组、Facebook或推特（Twitter）提出意见。台商的社会融合是涉台工作中一项更为细致和深入人心的工作，各类媒体既是群际沟通的平台，也是群际沟通的工具。媒体参与台商社会融合工作的意义在于以身边的台湾人为切入点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做对台工作，汇聚民间智慧倡导和推动群际融合。

---

① 林佩碧：《1000万元基金津贴社团协助新移民融入 政府民间“三开”促进国民融合》[EB/OL]. http://www.zaobao.com/xhd/pages/xhd090917.shtml，2009-09-17。

台商政策从以经济政策为主向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三重意义。通过鼓励大陆台商的流动，扩大大陆从移民流动中的“智力获得”，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台商作为两岸社会融合的先锋队，做好台商的社会适应与融合将对两岸和平与统一具有重大意义。通过社会政策促进台商社会融合途径是架构各类群际接触与互动的平台，消除群际偏见，加深台商对大陆的情感与文化认同，鼓励台商从可流动性的移民转变为永久性移民，实现台商在大陆的真正融合。这将为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探索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积累鲜活的经验。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从维系到整合：文化对稳固两岸命运共同体之意涵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李　鹏

近年来，“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大陆对台政策中，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他在2008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论述。国台办负责人也曾表示说，经由十几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同胞已经结成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大陆也不断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随着两岸关系呈现出和平发展前景，两岸命运共同体也在不断稳固之中。笔者认为，文化对稳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意涵，不仅要看到其维系两岸同胞情感的一面，更应该发挥其促进两岸民间社会一体化的整合功能。

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涵

对于什么是两岸命运共同体，两岸学者已经有过一些讨论。但是，由于对“命运共同体”基本概念理解上的不同，不少讨论还只是停留在一种感性的认知，如何从理论上进行界定，从理性的层面进行分析，尚有一定的深入研究空间。“共同体”这个词已经出现被“泛用”的趋势，欧洲建立的叫“欧洲共同体”，日本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东盟希望建立“安全共同体”；李登辉曾提出台湾人民是“生命共同体”，后来又表示台湾和日本是“生命共同体”；在企业界、学术界，也有不少某某“企业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提法。“共同体”一次的泛用为我们厘清“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意涵带来了困扰。

笔者认为，对“共同体”的理解还是要首先回归到词义学，然后将其

放入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诠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共同体”的解释是：（1）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2）由若干国家在某一方面组成的集体组织。英文的共同体是“community”，从它的词源和构词法来看，是由 Common（普通的，公共的）加上 Unity（联合）而构成的，带有“共同联合体”之意。由此可见，共同体的概念强调“共同”、“联合”、“集体”与“组织”。将共同体的概念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类群体的存在形式都可以被看做是某种共同体，但就狭义来说，人类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目的和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活动和共同交往，并由此结成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稳定性关系的人的共在共处的组织化形式，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基本方式。[①] 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在当今时代，共同体之结合更注重建立在共同分享的基础或共同追求的目的上，并关注于内部构成分子之间的有机关联、沟通与分享、认同和参与。[②]

当今世界人们在使用“共同体”这个词时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强调区域性，如“东亚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等；第二种强调领域性，如“经济共同体”、“金融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这两种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结合的，如“欧洲经济共同体”、“东亚安全共同体”等。还有一种提法则带有感性的色彩，如“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既模糊又综合的概念。两岸命运共同体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非常感性地描述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它像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外面，在街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当我们出门时，要观察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和与我们搭讪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惕和紧张之中。可是在“家”的里面，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

① 胡群英：《共同体：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及其现代意义》，《甘肃理论学刊》，2010 年第 1 期，第 73 页。

② 江宜桦：《政治社群与生命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若干启示》，转引自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版，第 128 页。

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①] 大陆学者王茹认为，当我们说到命运共同体，便有着命运相连、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涵义。[②] 笔者认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营造“两岸一家”的感觉，凸显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经济互赖的历史传承和现实联结，在此基础上来扩大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创造破解政治难题的条件，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早日建立。

在围绕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还有一个重点是，两岸是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还是说两岸现在并不是一个共同体，或者是一个残缺的共同体，需要去构筑或构建一个完整的命运共同体。一些学者提出两岸要通过建构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来实现两岸的最终“统合”或“整合”，其逻辑前提明显是两岸还没有建立起“共同体”。两岸“命运共同体”就与上述这些“共同体”的论述存在着明显差异。从前者来说，它比较侧重两岸趋同的方面，强调两岸本来就是或已经形成命运共同体，它不需要去重新建构和塑造，而是要被大家所认知、所理解、所接受、所珍惜。大陆对台政策中的表述明显倾向于这一种。而后者则更多看到的是两岸差异的一面，强调要如何整合这些差异，要建立某种组织形式上的共同体。其实，如果从辩证统一的角度来理解，这两种提法并没有必然的矛盾。从血缘、文化、历史和情感上说，两岸的确早已是命运共同体，但在现实的两岸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中，两岸的融合似乎还不尽如人意，台湾部分民众也存在着一些疑虑或抵触，两岸命运共同体似乎也没有组织形式上的保障。因此，笔者提出，稳固两岸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最为贴切的描述，即两岸命运共同体已然成型，但尚不稳定，也缺乏制度性和形式上的保障，还需要不断夯实和加固。而文化不但有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情感的功能，更有整合的功能，可以为稳固两岸命运共同体发挥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文化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维系功能

两岸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来维

① 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② 王茹：《两岸命运共同体与两岸公共生活的建构》，《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3期，第2页。

系，而文化是维系两岸命运共同体最为基础性的因素。所谓“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制度规范、价值观念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之所以有维系情感的功能，主要是因为文化往往与认同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认同是人与人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共同习俗、共同理念、共同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的一种确认，是对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及其正当性的一种确认。根据建构主义“文化—规范—认同”的范式可以知道，文化因素对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内部成员的行为可以产生规范效应，而普通和被广泛接受的社会规范又有助于建构对国家或民族的认同。美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起始和结果，更是民族主义的核心。① 台湾学者江宜桦也将文化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三个主要层面之一。②

两岸之间的文化认同直接关系到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维系。如前所述，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和维系需要共同的基础和需要，包括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利益追求等。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共享中华文化，就是两岸命运共同体最为坚实的基础。共同的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的源泉。与两岸之间的经济利益和其他联系相比，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更为深刻。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可以说是维系两岸命运共同体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有大陆学者就认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实质上能够反映出对“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③余光中先生也认为，两岸的文化本来就同源同种，在基本层面是一样的，两岸文化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分裂。但两岸分离这么长时间，现在两岸迫切需要文化上的交流，在没有太大交流障碍的情况下，强调“文化认同”会好些，我们需要文化认同来增进人们的亲近感。④

如果两岸之间没有中华文化作为联结，在1987年两岸开放之时，分隔了近40年的两岸民众感情不会那么快就融洽起来。如果没有对中华文化的

①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1991, p. 52, p. 74.

②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页。

③ 赵森、李义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载周志怀主编：《新时期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华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10页。

④ 《余光中：两岸文化没实质分裂 只需互相认同》，中评社北京2009年6月30日电。

认同，就没有两岸开放至今以来热络的探亲、寻根和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的热潮。如果没有两岸共同的文化渊源，两岸的经贸合作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添枝在分析为什么台商投资向大陆倾斜时，就认为第一原因就是语言和文化上的接近，因为文献显示“心理距离”是对外投资地点的重要决定因素，厂商在投资时除了考量各种投资的环境条件外，对“地主国”的亲和感影响投资也极为重大。① 另一位台湾学者蔡学仪也表示，两岸皆源于中华文化，拥有共同的历史及传统，甚至语言和生活习惯都非常类似，这对两岸的经济整合形成相当有利的基础。② 同样，中华文化中“中庸”、“和谐”、“和而不同”等等传统思想精华，也比较会对两岸更有智慧地破解政治难题产生帮助。

但是，由于两岸在历史上几十年的隔阂，加上李登辉和陈水扁当政时期在“本土化”、“去中国化”、“文化台独”等问题上的一系列政治操弄，使得部分淳朴善良的台湾民众在中华文化认同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模糊的认知，学界还出现了某些诸如“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已经呈现完全不同面貌”，“各自成为两个有相关却日渐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等各种谬论。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的上述做法，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影响台湾民众政治上的“国家认同”。台湾学者李允杰就指出，“去中国化”运动是企图以台湾本土文化对抗中国现代文化，强调两岸政治文化的差异和不相容。③ 台湾学者刘文斌也认为，“去中国化”就是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中对于传统中国在制度面、文化面和族群面的认同祛除，转而以台湾文化、族群及制度作为认同主体，在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主政下，就具有全面彻底的追求“台湾独立”的意涵。④

值得欣慰的是，李登辉和民进党当局的操弄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并不否认两岸文化的血脉联系，也承认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核心要素，文化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维系功能依然强劲。当前，两岸领导人都看到了文化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胡

① 陈添枝：《全球化与两岸经济关系》，台湾《经济论文丛刊》，2003 年第 3 期，第 336 页。

② 蔡学仪：《两岸经贸之政治经济分析》，台北：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版，第 73 页。

③ 李允杰：《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7 年版，第 6 页。

④ 刘文斌：《台湾“国家认同”变迁下的两岸关系》，台北问津唐书局，2005 年版，第 219 页。

锦涛总书记多次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马英九也表示，要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①] 这些都为文化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文化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整合功能

如果说维系更多强调的是维持“不分”的状态，是一种略带消极的描述，那么整合强调的就是要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如何进行“加固”的问题。文化不仅仅只有维系情感的功能，更有整合社会价值、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文化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整合功能首先表现为文化自身的整合功能。大陆社会学家司马云杰认为，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当有不同文化的族群杂居在一起时，他们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②] 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的文化整合是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次文化整合，而非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整合。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是同质性的文化，其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根基和核心，台湾文化传承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并非是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朱双一认为，尽管台湾文化呈现出比较繁杂的多元包容性以及自己的地方文化特色，但并没有逸出中华文化的范畴之外，而是中华文化整体中的一种地方文化形态，这是由文化核心要素或“民族性格”的根本属性决定的。[③]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台湾历史的特殊性也造就了台湾文化的特殊性，当代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文化上的明显差异，只讲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的一致性是片面的，同样，只讲台湾文化的特殊性也是片面的。[④] 正是因为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差异性，才导致两岸在进行社会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些民众对对方

① 《马英九：打造具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中评社台北 2009 年 10 月 10 日电。
②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4 页。
③ 朱双一：《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 页。
④ 陈孔立：《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台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35、226 页。

的某些与自己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不理解、不认同、不接受，才产生了一些需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问题。当然，这种差异性并不是根本性和核心性的，也不能以此认为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化，更不能以此否定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该认真思考两岸文化差异的接轨和整合问题。如果两岸在文化领域都无法实现整合，就可能导致两岸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在交流交往中更加凸显，无法消弭两岸人民长期不了解所带来的隔阂和误解，甚至可能产生越交流误解越深的状况。

两岸文化的整合对巩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整合是建立两岸民众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途径，也可以影响和导正台湾部分民众在中华文化问题上的一些误解。两岸有共同的中华文化基础，两岸民众在某些问题的认知价值上即使有差异，也是正常现象，关键是双方能否将心比心，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试着去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合理想法和诉求。文化整合可以扮演这样的沟通和桥梁角色，透过文化整合的过程，两岸民众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接触和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减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上的冲突，并逐渐向趋同的方向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所提的对台湾同胞要“理解他们、信赖他们、尊重他们”，其实就是鼓励一种包容的文化价值。只要两岸在文化上相通融合，协商签署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协议，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文化共同体”，都是顺理成章之势。

第二，文化的整合可以为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人文环境，可以促使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继续向纵深发展。两岸过去20多年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拉近了两岸差异文化的距离，两岸经济交流和互赖深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整合的过程，两岸经济活动所带动的不仅仅是资金流、货物流，带还动了人员的频繁往来和观念的碰撞，有助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和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认同。但经济的整合并不能取代文化的整合，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文化的整合势必要提到日程上。有评论就此提出，“两岸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现在就是开始文化整合的时机”，两岸已经开始“尝试从经济利益的交换进入文化整合的开端”。[①] 同样，两岸的文化整合可以使两岸发展经贸关系的人文环境更加优化，使两岸

①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6月17日，2009年7月13日。

投资经商者的心理距离更为接近，从而创造更多的商机和利益，促进两岸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最终形成正常化和机制化的两岸经贸关系，或称之为某种形式“经济共同体”。

第三，文化的整合可以为两岸达成政治共识营造良好的氛围。笔者曾提出，政治共识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支柱之一，所谓的“政治共识”就是两岸之间需要对政治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有起码的认知交汇。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问题、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台湾方面的安全顾虑问题、两岸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等问题。这些是两岸关系中分歧或对立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些是涉及核心或重要利益，解决起来难度比较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解决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凸显分歧、激化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考虑暂时搁置，但这些问题无法长期回避。两岸之间需要通过接触、协商、谈判创造解决问题的氛围，争取达成一定的共识，才能够有利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两岸文化的整合无法完全取代两岸针对政治难题的协商，但至少可以为破解政治难题营造良好的氛围，创造一定的条件。

结　语

文化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文化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文化的维系与整合功能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起到“维稳”的作用，一个起到“加固”的功效，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以中华文化的传统来维系两岸同胞的情感，以文化的整合来巩固两岸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已有的成果，推动它们向“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发展。只有这样，两岸命运共同体才不仅仅只是一种“家的感觉”，更是实实在在承载两岸人民情感和利益的实体。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大陆对台文化政策的演进及特点

上海东亚研究所　陈颖华

随着两岸关系不断向前推进，文化交流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两岸双方都认识到，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交流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共通的语言、文字、习俗、符号认同、历史记忆、情感倾向、价值取向，使两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①] 这才是维系两岸关系最稳定的基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提高，促使大陆对台文化政策也不断地发展、充实和丰富。过去大陆对台政策的研究多偏重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相对较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的范畴较难界定，广义的文化涵盖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多个领域，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二是就大陆对台文化政策来看，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政策从战略和全局上把握两岸文化交流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微观政策指对某一具体问题出台政策或制订规定。因此，要全面梳理大陆对台文化政策比较困难，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研究大陆对台文化政策的演进和特点，并与马英九当局的文化政策做一简单对比，以期更好地把握新时期中央对台文化政策的内涵。

一、大陆对台文化政策的演进

大陆对台文化政策是大陆整体发展战略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演进与两岸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承载着不同的任务。

① 刘国深：《试论两岸关系的张力与极限》，《台湾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16 - 17 页。

1. 两岸关系紧张对峙期（1949—1979 年）

1949 年国民党战败退踞台湾，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中共中央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之后由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和平的曙光，中共中央及时调整对台政策，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严重干扰了祖国统一的进程，国共两党始终隔海对峙，“一弯浅浅的海峡”不仅阻隔了两岸的亲情，也阻断了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在当时隔绝、敌对和对抗的历史环境中，两岸没有开展文化交流的基本条件。

2. 两岸关系民间接触期（1979—1992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缓和并发展两岸关系，打破政治僵局，争取台湾民心，大陆对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呼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① 1987 年，国民党中常会在民间的压力下，通过了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方案。探亲潮的兴起，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打开了突破口，民间性质的文化交流迅速发展起来。为保障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规范两岸文化交流行为，大陆先后出台了《关于举办港台版图书展销的几项规定》、《关于台湾电视从业人员来大陆摄制节目的暂行管理办法》等多项规定。

3. 两岸关系和平交流期（1992—2008 年）

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对十几年来两岸同胞在人员往来以及科技、文化、学术、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所取得的成绩予以了肯定，并对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提出新的主张：“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② 这一论述提升了两岸文化交流的高度和层次，也丰富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内涵。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国力的迅速提升，两岸的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台独”势力不得不加紧分裂步伐，两岸政治陷入僵局，

① 《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1 日。

② 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人民日报》1995 年 1 月 31 日。

但在文化交流上仍十分热络，呈现出“政治冷、经济文化热”、“官方冷、民间热”以及“朝冷野热”的态势。中共中央一方面加快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努力为两岸同胞加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各项交流提供更多方便；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两岸文化血缘关系，粉碎“台独”分子企图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分裂祖国的图谋。

4.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2008 年至今）

2008 年台湾政坛完成二次政党轮替，两岸重新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各方面的共识，两岸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两岸海运直航等四项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以通航、通商、通邮”为目标的“小三通”基本实现，两岸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大三通”时代，营造出两岸文化进入发展新阶段的时代氛围。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新时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清晰地勾勒出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战略方向，其中在文化上他强调两岸要“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①] 2009 年 7 月 11 日，两岸在长沙第一次以“文化”为主题举办了论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并讲话，对两岸在和平发展新时期“大力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精神家园”作出更详尽的政策阐释。

二、大陆对台文化政策的特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两岸关系过去 30 年的实践经验时指出，“我们制定和实施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把握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体现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人民愿望的实事求是精神，反映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②] 大陆对台文化政策这些年的演进过程，既是对两岸客观现实的尊重，也是对文化自身规律的尊

①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 年 1 月 1 日。

② 同上。

重，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立足造福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发展两岸文化交流

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在参加“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上说，“眼界决定境界、思路决定出路”。大陆对台文化政策从一开始就站得高、看得远，把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与发展中华文化统一起来，很好地处理了几对矛盾关系。第一，正确处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台湾文化”不是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另一支，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属于两岸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①。“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②第二，将“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区分开来。民进党惯用民粹操作将“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混为一谈，大陆对台理论则用文化的概念将二者作一清楚区分，指出“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③，“台湾文化的母体和核心是中华文化。‘台独’势力企图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进而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④第三，明确了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聚合力、亲和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第四，用和而不同的思想处理目前两岸在文化领域的分歧。文化交流的最大作用在于，扫除双方隔阂，促进两岸人民充分了解，促进社会一体化的步伐。利用文化的力量可以促使两岸超越政治之争，尤其是意识形态之争、制度之争，让两岸文化“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⑤。

2. 在发展中不断赋予两岸文化交流新的时代含义

1979—2008 年，是两岸文化交流从打破隔绝到逐步形成民间性、自发性交流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大陆对台文化政策主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进行。“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

① 钱其琛：《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发展》，《2002 年重要文件选编》，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2003 年编，第 53、54 页。

②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 年 1 月 1 日。

③ 同②。

④ 同①。

⑤ 《温家宝总理哈佛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人民网 2003 年 12 月 11 日。

交流与合作，加速实现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继续加强两岸人民往来和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①，作为中心工作之一，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2005 年胡锦涛与连战会谈时也表示，我们将努力为两岸同胞加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各项交流提供更多方便。② 另一方面要保护处于起步阶段的两岸文化交流不受政治因素干扰。中共中央做出正确的形势判断，“台湾当局不断在台湾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台湾正名’、‘去中国化’等渐进式台独活动，蓄意挑起两岸对立，竭力破坏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现状”，如不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势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断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③ 在这个背景下，2005 年 3 月 14 日《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其中一条是“鼓励和推动两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④，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提供坚实的法律保护。

2008 年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期，两岸文化交流也从简单的交流交往走向纵深发展，无论是形式、层次、范围还是内容都需要更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携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⑤ 是这个历史时期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目标。贾庆林主席在“两岸文化论坛”的演讲中，对实现这个目标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第一，要继承，“共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第二，要兼容并蓄，“共同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第三，要创新和发展，“提升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聚合力、亲和力”；第四，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⑥

3. 重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开展和机制化建设

文化交流工作涉及的范围广泛，涉台文化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的放矢、突出重点。青少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只有增进相互间的认知和了解，

① 《人民日报》1997 年 9 月 13 日。
② 《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连战时的欢迎辞》，新华社 2005 年 4 月 29 日电。
③ 《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新华社 2005 年 3 月 4 日电。
④ 《反分裂国家法》，《人民日报》2005 年 3 月 15 日。
⑤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贾庆林就交流提五点意见》，新华网 2009 年 7 月 11 日。
⑥ 同⑤。

重新凝聚起两岸青年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与情感，两岸关系才能迎来更美好的春天。早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双方就曾对“积极促进青少年互访”达成共识。进入和平发展期后，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更被提升到“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要作用”的战略高度。胡锦涛总书记在新时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六点意见中强调，“尤其要加强两岸青少年交流，不断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蓬勃活力。”① 而建立起长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机制，既是对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活动的保证和深化，也是对两岸形成合力共同用制度机制来规范和保障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有益尝试，是未来两岸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具体可遵循的步骤是，“两岸双方可以组织人员先就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进行研究和规划，就其具体内容、形式、步骤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如时机成熟，可将商签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纳入协商议题。”②

三、两岸文化政策的比较

马英九执政后，对民进党的文化政策路线作出重大调整，停止了文化上“去中国化”的政治操作，回归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上。两岸虽然在“全面开放两岸文化交流“上取得了共识，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政策的实质性差异和分歧。

1. 战略目标不同

文化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不是孤立存在和运作的，它必须服务服从于整体发展战略和目标。大陆的对台文化政策作为大陆对台政策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其目标一直十分明确，即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马英九的文化政策则重于强调“台湾优先”和保持“台湾文化的主体性”。根据前《中国论坛》总编辑蔡诗萍的定义：“所谓的‘文化主体性’指称的是以‘台湾’这块岛屿作为认同地域，而在意识上明显区别‘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不同，企图在这两者殊异的认知上

①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1月1日。

②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贾庆林就交流提五点意见》，新华网2009年7月11日。

寻求建立‘台湾’的文化主体性”。[①] 倡导“台湾文化主体性”的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蔓延，之后成为民进党“台独”论述的基础。民进党掌握着“爱台湾”和“台湾我群”的“政治切割刀”，强迫国民党“拿香跟拜”。国民党日益“本土化”，“终极统一”的战略目标也逐渐模糊。马英九的各种政策都强调要“以台湾为主”，自然在文化政策上也难以提出超越“台湾优先”、着眼于整个大中国发展的政策主张。

2. 对“台湾文化”的认识不同

大陆对台文化政策尊重“台湾文化”在过去经历两岸“四百年疏离、一百年隔绝、五十年对抗”的漫长发展形成地方特色的客观事实，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两者的内涵都是中华文化的继承、延伸与发展，并没有先进和后进之分。马英九则认为台湾文化有其自身优势，台湾的教育水准、人民素质、公民社会、艺文创新，明显地领先于华人世界，是台湾的最大资产；认为台湾的文艺、思想具有灯塔效应，台湾应输出先进价值促进大陆社会进步，台湾的正体字才是中华文化优良的传统与资产，大陆要传承中华文化，应该学会正体字等。比较两岸对“台湾文化”的认识，大陆方面强调两岸文化之同，台湾方面突出两岸文化之异。

3. 政策方向不同

两岸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和平发展期，大陆对台文化政策的阶段目标是经由文化交流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通过文化精神的互动和核心价值的沟通达到“社会—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而马英九的文化政策方向有二：一是着力于“艺文、思想、公民社会价值发挥灯塔效应”，“台湾输出公民社会经验与价值，诚挚协助促进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以互信互利维护台海和平”；[②] 二是希望以文化突围，创造台湾新形象，用“文化外交”补强“传统外交”，多元经营实质关系，重开“国际友邦”，[③] 创造所谓的“和平红利”。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指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

① 蔡诗萍：《“台湾文化主体性”辩》，台湾《中国论坛》第359期，第2页。

② 《马英九、萧万长文化政策》，www. ma19. net. 。

③ 同②。

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①] 站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高度，两岸的文化交流任重而道远，大陆对台文化政策也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和必要。待到两岸精神家园建成之日，方是两岸统一水到渠成之时。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① 《温家宝总理：文化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人民网2010年3月5日。

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　彭付芝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孕育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①]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需要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做支撑。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促使笔者思考最多的不是这些交流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而是交流过程中两岸同胞在相互了解中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的情况。笔者已经写过一些文章论述两岸文化交流中的认同差异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阐述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中华文化认同问题，从认同的意义、认同的主要内容和今后的整合建构方面进行一些论述。

一、中华文化认同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意义

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就是所有中国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共同的约定。一个民族或群体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千百年来在同一文化空间里形成的传统文化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他们所特有的语言和习惯，是保持其独特性的基础。这就是在不同地区彼此互异的文化圈里，面对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②] 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的形成，是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变、兴旺同步发展起来的。

① 贾庆林：《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精神家园》，《人民日报》2009 年 7 月 12 日，第 002 版。

② 陈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补议》，《博览群书》，2002（4）。

因此，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有利于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实际上表现在彼此有更多的认同，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更是进一步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的渠道和手段，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的载体。

毕竟两岸之间若涉及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就容易形成交流上的困难，双方在政治价值观上有所差异，但两岸有相同的语言与文字，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音乐艺术及民俗传统。透过两岸人民对共同文化的认同，两岸之间能够建立起凝聚力，彼此才能够设身处地互相体谅，才能够相互理解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而这样的凝聚力便是奠定在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之上。因此，两岸文化交流能增进两岸人民之间的情感，使两岸关系朝向和平的道路前进。

我们从2010年以来的两岸文化交流所取得成果中可以找到例证。6月19日至25日在福建举办的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论坛”上，举行了包括妈祖文化活动周、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漳州开漳圣王及部属后裔回漳谒祖等系列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全面展现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闽台地域文化在两岸传承发展的盛景，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加深入。在大陆举行的各种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活动中，如陕西的中华儿女公祭轩辕黄帝大典、河南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台湾各界人士都积极参与，两岸同胞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保护民族文化瑰宝方面，两岸也展开越来越多的合作，如两岸文化界合作在京举办“两岸汉字文化节”、力促《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出，引发了两岸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持续关注。[①] 总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海峡两岸中国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超越政治分歧，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2. 有利于扩大文化共识，化解两岸的冲突

马英九执政之后，两岸本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顺序进行协商谈判，并在两岸“三通”、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共同打击犯罪、金融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了两岸关系的改善。但是，随着两岸协商谈判走向深

① 金鹤、吴师、李杨：《和平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上半年两岸关系形势述评》，《两岸关系》，2010年（7）。

入，两岸间面临的诸多政治性议题逐渐浮上台面，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现在需要为政治性议题的协商创造良好的氛围，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强化两岸文化交流，全面开放交流渠道，消除人为障碍，增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化解长久以来的误解，进而争取岛内民众支持两岸的政治性议题谈判。加强两岸文化合作，增进互信合作，扩大文化共识，提高文化交流层次，逐步实现两岸文化交流经常化制度化。

两岸的文化交流作为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能使两岸找到政治分歧的缓冲地带，有利于化解两岸的冲突与加强两岸的危机管理。当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规范化的时候，中华文化血脉相通，认同感与日俱增的时候，也就是两岸政治关系和解的时候。

3. 有利于建设两岸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两岸和平统一提供精神动力

国民党重新主政后，大陆方面就展开两岸政治协商、确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等提出建议，但台湾方面由于内部政治分歧较大，特别是绿营的“逢中必反”的思维和做法，使两岸在这些问题上向前发展的难度加大。两岸在经济方面已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签订了 ECFA，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需要新的精神动力。

由于两岸的文化差异并不如政治、经济等方面大，而且文化交流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因此两岸首先在文化方面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感，建设两岸共同的精神家园，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4. 有利于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反映中国原始社会晚期迄今社会经济、政治、民族素质、民族特点的科学知识、价值观念的物化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有机整体，是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和其内在特质的凝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开放性、时代性和历史传承性。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面对压力和威胁而能不屈不挠的强大动力。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西方文明的挑战，中华文化以其深厚的力度、独具魅力的潜质和博大的兼容性，日益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中华文化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精神支柱。

海峡两岸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现实差异。但是，两岸文化都包含着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理念，有利于两岸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两岸文化中有实现交流合作的现实基因，无论

在经济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上，还是在文学艺术、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文化上，都有优势互补之处。通过交流与合作，可以达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繁荣民族文化和增强民族体质的目的。海峡两岸中国人有理由、有责任共同精心研究、总结并薪火相传，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二、两岸文化交流中对中华文化所认同的主要内容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两岸中国人有着同一部历史，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脐带和精神支柱。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滋润和培育着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使之以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地域的不同，海峡两岸形成了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台湾文化和福建等地的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区域性体现，这是由台湾移民社会形成的历史所决定的。但不管是大陆文化还是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但在有些台湾同胞的心目中，认为台湾文化来源于中华文化但已经形成了自主的台湾文化，或者说跟中华文化已经没有关系。毋庸讳言，台湾民众大部分使用闽南语交流，并且进行乡土教育，研究乡土文化，进行本土化，这是台湾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台湾在历史上经历过荷兰、日本等殖民主义的统治，多多少少受到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1949 年国民党政权退台后，台湾民众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文化是“相对独立”的，是台湾移民文化在其新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发展出一些与母体文化不尽相同的新特征。但这些从自己母体文化发展逻辑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特征，并不能改变自己从属于母体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和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才有今日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因此从根本上讲，台湾文化并没有生成一种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存在着本质差别的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

两岸有着共同的传统价值观念，有着共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在于民进党执政后，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宣传

“台湾文化主体性”，从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文化虽然与中华文化颇有渊源，但是经过几百年的进展，已经产生了一种新而自主的台湾文化”。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对立起来。出现这样的认知偏差后果十分可怕，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实际上就使两岸文化交流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就认为两岸所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这对构建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十分不利而且十分有害，对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带来困难，对两岸的文化融合形成阻力，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的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峡两岸要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同，既要对认同的中华文化进行正确的梳理和认识，深入研究海峡两岸中国人所共同推崇和认同的中华文化的具体内涵，同时还要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所体现的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马英九在2009年“双十讲话”中概括了台湾文化的6项核心价值：“正直、善良、勤奋、诚信、进取跟包容。”① 但马英九也承认“这些精神在中华文化里都有，……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② 马英九在就职两周年的讲话中声称：“台湾文化是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其核心价值是‘开放进取、善良勤奋与诚信包容。”笔者认为，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台湾特色的优秀文化很好地丰富了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精神，民本理念，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大一统”的中华文化价值观等，完全可以成为两岸共同性的价值理想。

1. 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追求一种人之自我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之间的普遍和谐。在中华先民的眼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宇宙不是趋向于失衡和分裂，而是趋向于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调节、相互成就的“太和”状态。这种普遍的和谐不是不承认现实的差异与矛盾，而是把现实的差异与矛盾控制在非对抗状态。追求和谐

① 《中国时报》，2009年10月10日。

② 《中国时报》，2009年10月10日。

的过程就是不断产生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这一价值取向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精神资源，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价值取向。

2. 注重精神境界的提升

在“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重“义”、“理”而轻“利”“、欲”。当道义与利益、德性精神与感性欲求发生冲突时，君子理当超越利益的纠结与感性的欲求而致力于对道义与德性的追求，并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自由。由此，超越物欲与私利的诱惑，成就以德性精神为依归的理想人格，就成为中华先民精神追求的重要理想目标。在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要想有效地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通过提升境界而筑起精神的堤防，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3. 极大的吸纳性、融合性、包容性和继承性

中华文化是具有极大的吸纳性、融合性、包容性和继承性的文化，它是在对历史上一切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的继承，以及对现实中一切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的吸收中发展自己的。中华文化不仅仅包含了祖国大陆的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还包含了港澳台的优秀文化。台湾同胞的文化、语言、民俗、血统、信仰渊源于祖国大陆，海峡两岸存在着文化、语言、民俗、血统、信仰的共同性，两岸文化在表现形式上也有很多的一致性。因此，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可以弥补两岸在社会意识和时空上的一些差异性，凸现出两岸文化的一脉传承性，通过海峡两岸以及世界华人在文化上的认同感来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

4. “大一统”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中华民族的统一精神蕴藏在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之中。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中华文化最优质的成分。在中国的历史上，战乱和分裂格局的历史也是存在的，然而历史始终是沿着“分久必合”的轨迹发展，其原因就是根深于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中的“大一统”的思想，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精髓。“大一统”观念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使得追求统一成为各民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

5. 胸怀天下、追求统一的爱国情怀

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核心。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秦时代，就已出现爱国的观念和爱国思想。中国人可以说是认祖不认神，神仙只不过是神化了的人，崇拜祖先是中国人的传统宗教信仰之一。由对祖宗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家族乡里的敬，再扩展到对国家社稷的忠，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国”一体观念。在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华民族不仅出现了无数爱国英雄人物，而且从爱国实践中升华出砺志报国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的巨大推动力，它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侵略，推动祖国进步和繁荣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台湾同胞在日据时期的抗日斗争就是这种爱国情怀的表现。

6.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体现了对立统一。一是承认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从形而上层面来说，和合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多元、多样，差分冲突又和谐融合而成新事物、新方略。“和”强调的是异质因素之间的平等共处，“合”强调的是异质因素之间的融会贯通，“和合”则是人与自然、社会及人类不同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互相冲突、融合，与再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诸多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对于两岸关系来讲，“和”强调的是台湾和大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平等共处，“合”强调的是海峡两岸之间的相互融合、融会贯通，和平发展。

“和而不同”是和合文化的精要。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这是从处理人际关系角度讲的。用在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上，也包含着允许不同、协调冲突、化解矛盾，以达至和谐的深刻思想。而“和”则可以使不同的方面，甚至对立的双方，相互沟通、感应、接近，寻找共同点，缩小差别，化解冲突，回避对抗，彼此和解，以求得共生，并一起开创新局面，达到大家都新生的和谐的新境界。所以，自古就有“和实生物”。[②] 的著名说法。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是在贯彻“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精要，允许两岸有不同。从根本上说，任何事物都是“同中存异”，有不同才能创生新的同一，有差异才能造成多种多样的和

① 《论语·子路》。

② 《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

谐。但“和”可以使两岸的不同方面、甚至对立的方面，通过协调、沟通、接近等，寻找共同点，缓解冲突、回避对抗，以求共生，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总之，和合文化在中国文明的进化中屡屡作用，使中华文明成为一个博采众长且具有强大同化力的民族。儒家文化从人际关系的和谐推及国家关系，主张“协和万邦”，反对“以邻为壑”，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文化是诸子百家再加上域外文明大融合的产物，是多样化的统一体，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同化力和持久性，这种超越差别的统合，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

7. 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

中华民族自古就讲是非、善恶、荣辱，把个人“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在中华文化这个精神宝库中，有“舍生取义”的气节操守，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凛然正气，有“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有“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有“言必行，行必果”的处世准则。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持自立自尊的精神源泉，也使得中国能够始终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扬名于世。

8. 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自强精神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蕴含着一股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品格，是我们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汉代到清代，历时两千年，《易传》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点，为全社会所接受。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期起过巨大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数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鞠躬尽瘁，不息奋争。“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① 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为民族和国家的进步而努力奋斗。

① 彭付芝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66 页。

三、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中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整合建构

1. 强化对中华文化认同内容的研究与教育

两岸多年的隔绝并没有割断两岸同胞的血肉联系，并没有隔绝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海峡两岸人民都在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继承和发扬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从目前台湾文化领域的情形来看，台湾的学术、文学、音乐及戏剧、电影、电视艺术等都有某些独特的成就，但就其内容而言，仍以表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为主，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近些年来，台湾当局的某些领导人和“台独”势力的某些头面人物，置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台湾的历史以及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地缘、血缘、文化关系于不顾，在文化观上抛出一些荒诞不经的谬论，并利用修改教科书等手段企图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割裂二者的必然联系，片面强调“台湾文化”的特殊性，否定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从历史上、文化上把台湾与中华大家庭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抹杀二者的共同性，以凸现“台湾文化”，淡化“中华文化”，目的是为他们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制造理论依据。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人类个体或族群因此产生归属意识。文化认同不仅影响到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定、社会群体的角色，还影响到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持、国家意识形态维持与强化、不同的宗教与文明形态之间的理解，甚至当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因此，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们要加强对中华文化认同内容的研究与教育，加大我们的论述、学术和宣传优势，使海峡两岸中国人都认识到，汉族和原住民人民一起创造了台湾文化，台湾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集合的一个区域文化，是中华文化长河中的一个支流。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两岸人民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

2. 加强两岸特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

两岸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益繁荣，为加强两岸特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奠

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两岸完全可以携手合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一方面，共同开发利用具有两岸特色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共同在文物管理、文化典籍整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好工作。

“在中国，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既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它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及政权稳定的需要，也是各族人民生存安居的需要”。[①] 因此，两岸特色文化的保护与挖掘，目的都是为了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最终的目的是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3.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构建两岸文化交流机制

建立两岸文化交流制度性渠道，实现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在两岸文化领域建立起更为密切、经常性和规范性的联系与往来机制，不会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产业合作，海峡两岸文化企业界发挥各自优势，整合两岸资源、创意、资金、人才、市场，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对接，构筑两岸中华文化产业；拓展交流的广度、深度，两岸可以在鼓励学者进行中长期合作研究、共同合作出版、交换教授及学生、共同编写学生参考书等方面展开有意义的合作；两岸共同设置中华文化大奖，鼓励两岸中国人共同参与。

建立由两岸官方主导，以专门的交流合作平台为路径，实现两岸民间组织机构和文化领域各行各业对口交流的常态化。但构建两岸文化交流机制，最终需要两岸在时机成熟时签订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协议。

4. 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两岸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建设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之一，是经济建设全面推进的表现。经济建设离不开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两岸在文艺领域、教育领域、出版领域、旅游领域等，均有强大的合作潜力。海峡两岸在 20 多年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产业的合作与发展，并且发展的态势日趋扩大，收益越来越明显，为两岸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两岸经济合作项目中的不可替代的环节。

5. 构建两岸共同的价值体系

基于两岸共同的文化基础，两岸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民

① 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5 页。

俗习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两岸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资源、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姓氏文化、共同的精神支柱。因此，构建两岸共同的价值体系是可以做到而且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总之，两岸的文化交流方兴未艾，两岸文化交流的方向、目的和归宿一定要明确。笔者认为：两岸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都需要不断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欣赏甚至学习彼此文化中的特色；都要往重建文化与精神纽带、重建感情的方向前行；都要往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国的国家认同目的靠拢；都要以最终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为两岸社会价值整体性共识努力。当然，这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两岸中国人要有极大的耐心、信心、勇气和智慧。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8月31日主办的“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

两岸文化交流与共同身份认同建构

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　于海峰

一、国族认同问题

“认同”（identity）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national identity 一词可以视为民族认同、国族认同或国家认同，其内容也可以包括对现有生活制度的认同。事实上，当前学界讨论国族认同的文献，多半与“民族”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有关。“国家”的狭义用法是专指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当我们以“民族国家”为“国家”的同义词，要了解国族认同自然就得先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起源与确定意义。

按照台湾学者江宜桦[①]的分析，所谓民族与民族国家大致具有以下三个特性：首先，民族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即现代民族与民族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族认同是 18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渐形成的。第二，国族意识问题。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民族，而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塑造出一个民族，与民族主义此种意识形态之运用有关。换言之，民族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观点建构的结果。第三，由于民族事实上出于建构（或重新建构），它不必然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血缘等相对客观的因素有关，而与特定国家的政治教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其中，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定义，虽说迄今学界仍莫衷一是，但是，所谓“认同”是建构与选择的，而非从血缘遗传或先天的，人民的认同会随着小区、国内与国际等不同的总体层次而改变。换言之，认同是涉及群体意识觉醒的过程，此一过程不仅使一个人得以将自己定位在特定的社会团体当中，亦整合入特定社会团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当中，甚至因而行诸集体行动以达成团体的目标。因而若把“国族认同”当做一种自我认知

① 江宜桦：《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http：//www. chinese-thought. org/jz/004336. htm。

的信念，认为自己是属于某特定国家的一分子，则当国族认同于一个国家的成员内部被创造出来，亦等于在文化上为这个国家划定了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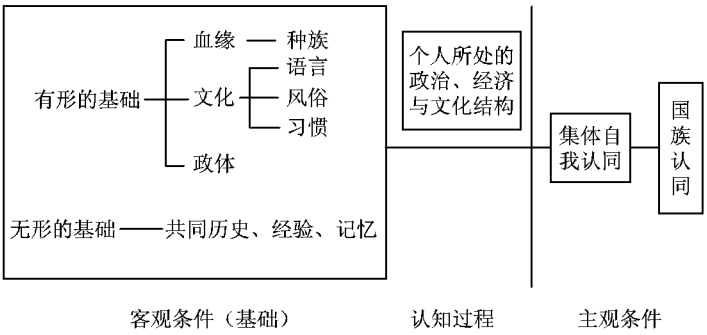


图 1　国族认同的形成与内涵①

所谓国族认同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同步进行的观念建构。正如图 1 所示，所谓国族认同，可以被看做是在某一共同地域，有着一定血缘联系、相近的文化、共同的政体的一群行为体在共同历史、经验和记忆的影响下，通过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建构一种集体自我认同，即所谓国族认同。所谓国族认同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认知两个部分，这样的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关联。但是，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所谓国族认同是任何一个国家构建不可或缺的基础，“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它是民族与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形成决定性内在价值的基础，且是控制动员一个人群或一大部分人口的政治意志”。②

二、台湾地区人民国族认同分析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往的加深与相互了解的增进，台湾地区人民的国族认同差异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台湾人民的国族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我是中国人”到“我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再到“我是台湾人”的转变。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 1992 年起所进行的“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分析，2008 年 6 月开始，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① 吴由美：《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http：//www. tisanet. org/activity/20060610/2th/wu _1. htm。
② 同①。

的比例，开始有明显凌越“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现象。2009 年 6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回答“中国人”者为 4.4%，回答“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者为 39.2%，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者，则占了大多数，为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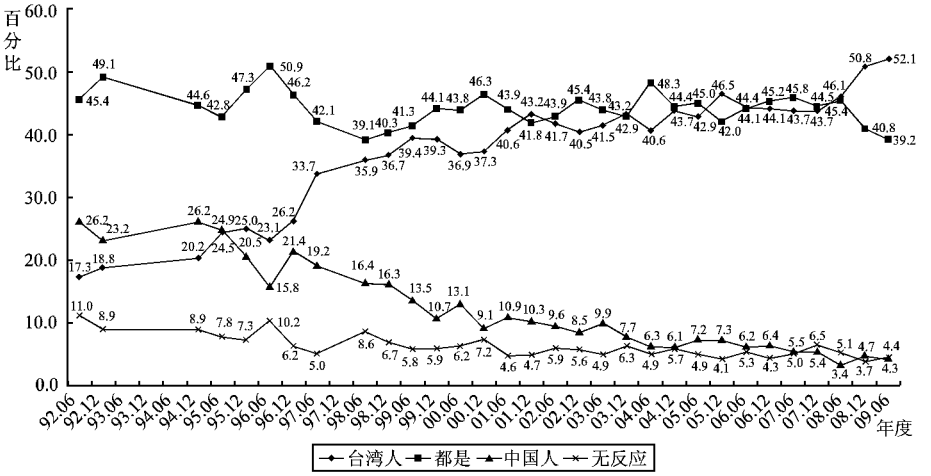


图 2　台湾地区民众国族认同趋势分析图

数据来源：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①

而同一时期远见民调中心的一个类似调查（见图 3）则显示，“自认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民众在 2008 年 6 月时为 77.2%，2009 年 7 月则为 80.2%，“认同两岸民众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民众分别为 59.7%（2008 年 6 月）和 57.6%（2009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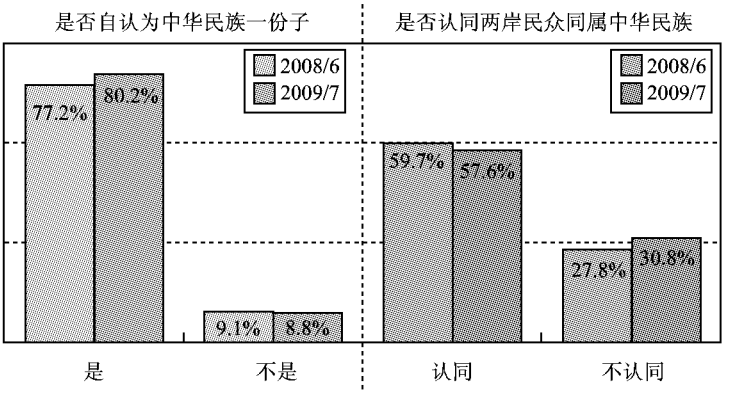


图 3　2009 年 6 月远见民调中心国族认同调查

① http：//esc. nccu. edu. tw/newchinese/data/TaiwanChineseID. htm。

仔细比较两份民调，一份在文字上使用“认为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一份则采用“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排除抽样本身产生巨幅误差的可能性，关键就在于“中华民族”与“中国”在文字上的差异。为何理应会有类似调查结果的两国族名词，却有相当不同的民调结果？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台湾民众在国族认同问题上，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冲突的情况。按照一些台湾学者的观点，国族认同问题在台湾的复杂性不仅来自于特殊的历史经验，也来自于现实政治实践。在台湾民众国族认同冲突问题上，除了理性的“国家未来状态的选择”（统独）考虑，还有情感、文化、历史的感性成分，以及正统政权之争、意识形态相左等因素在作怪。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台湾的认同冲突问题并非一开始就发生在政治领域里，一开始是起源自1970年代中期以后的乡土文学、艺术或音乐（亦即台湾意识或台湾情结）与大中国意识或中国情结的对抗，这与当时台湾退出联合国，蒋经国权力接班等都有关联。然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改革，族群认同冲突问题逐渐进入各种政治或社会运动的抗争中，提出“台湾住民自决”、“台湾生命共同体”等政治口号，一直到1991年台湾第二届国大代表全面改选时，民进党更进一步提出“台独党纲”，明确表达台湾独立的立场。而1990年代开始的政党政治竞争的过程中，台湾民众政治情感的焦点被推到“中国大陆－台湾”这一统独问题上。这样“中国大陆－台湾”的政治分歧又涉及更深层的“国族认同”基本问题。这一议题成为了分辨民众政治情感与情绪的刺激源，并于每次选举与政策议题间发酵，在政党与政治精英认同论述的带领下，甚至形成族群对立的紧张局面。①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国族认同问题上的冲突，恐怕与李登辉以及陈水扁时代所推行的渐进式“台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时代，刻意将“中国”扭曲等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使然。因此，近年来针对台湾民众进行是否为“中国人”的民调结果，其实相当程度反映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而非真正认同自己是否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的民意趋向。

① 张佑宗、王奕婷：《台湾国家认同的差异与民主巩固：一个个体层次的经验分析》。

三、两岸国族认同差异分析

以上分析了台湾民众中因历史与现实原因所出现的国族认同冲突问题。目前两岸实现和平发展，加强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这些交流障碍或多或少造成了两岸民众的认同差异。

两岸民众对国族建构问题有着不同的倾向，大陆民众通常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而言，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可以不认同大陆地区目前的体制，但是不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然而台湾民众却对“中国”概念有着多种理解，将之分解为国家、民族和制度等多个方面。

按照张亚中先生的分析，在两岸关系上，“认同”问题包括“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制度认同”三种认同。“国家认同”指的是对国家宪政、国号的认同；“民族认同”指的是民族面的认同；“制度认同”指对现有宪政体制的认同。在两岸国族认同问题上，有着两种认同方式，即“水平性重叠认同”（horizontal overlapping identity）与“垂直性重叠认同”（vertical overlapping identity）两个概念。“水平性重叠认同”指的是现有多个主体间对彼此相互并存的认同。“垂直性重叠认同”则特别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主体对其历史的纵贯认同，或作为分裂国家的一方对其未分裂前原有母国的认同。

在这三种认同中，在国家认同上，两岸之间目前不存在着对国家的“水平性重叠认同”，双方政府不允许人民同时拥有两岸的国籍。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首先，两岸民众都认同同属中华民族，即在民族认同面，两岸存在着“水平性重叠（相互）认同”。不过，由于民族认同往往与国家认同混在一起，成为国族认同，因此，从民意调查中有时很难区分回答的是民族认同还是国族认同。

两岸在制度认同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北京也是充分明了到两岸制度方面的差异，因而在化解“制度认同”对“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障碍时，“一国两制”的主张，同意给予台湾高度的自治权。

总之，两岸在“国家认同”上完全没有交集；民族认同的交集很大，但是当与“国家认同”合流为国族认同时，分歧就开始出现；制度认同的交集很小。

这种国族认同上的差异，首先是由于两岸长期分离的历史经验造成的。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开始了长达 50 年的日据时期，直到 1945 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但是台湾与中国政治联结在一起只有短短的四年，1949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迁台，两岸又开始断裂。1980 年代末两岸民间开始有了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并没有强化彼此的认同，反而在接触后感受到彼此已有的巨大不同。到今天，两岸分隔长达百多年，时间与距离总会在人与民族的记忆中扮演若干角色，它们可以让彼此更加团结，也可以让彼此渐行渐远。长达百年的两岸分离，在蒋经国过世以后，台湾的领导人选择了分离主义，而长达百年的分隔事实，给了他们可以操弄的足够土壤。

其次，来源于两岸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念和表达形式，它有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的倾向。两岸的共同认同始终很难走出意识形态的阴霾。

第三，台湾与大陆相比，无论是人口、面积、资源等各方面，都相形见绌。无论在人口、土地面积，台湾较之中国大陆都小很多。1990 年代起，中国大陆经济快速起飞，政治力量亦相对重要。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中，台湾将只是中国大陆宪法中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因此，中国大陆经济与政治力量愈大，台湾愈感受到可能被统一的恐惧。在“台独”眼中，北京任何的惠台政策，也有可能被诠释为贿台政策，而被视为是经济统战，目的在把台湾完全吸收消化。ECFA 在台湾遭到质疑与反对，正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反射。

四、文化交流与共同身份建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少认同，两岸会愈走愈远。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认同”作为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判定，从正面来看，“认同”可以凝聚人民共识，风雨同舟、共度艰难；从负面来看，“我群”与“他群”的“分别心”，也很容易将仇恨插入人民的生活，使得民族或国家内部、民族或国家之间发生悲剧性的灾难。我们应该如何在两岸认同上趋同化异？特别是如何强化“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民族认同比率，如何将“国家认同”转化为“宪政认同”，如何在“制度认同”上也可以建立共同的认同？

某种程度上，欧盟在处理文化交流与建构共同身份问题上的经验对发展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方面，加强相互依存。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推动两岸共同体可以从简到难，逐步进行。根据新功能主义理论，行为者会逐渐政治化。开始时各行为者会在若干技术性或不会引起争论的范畴内进行合作，但日后他们逐渐发现，唯有将较多的权威让与集体决策机构，或向其他相关功能领域扩大其合作范围，才能达到他们所想要设定的目标。所以当合作范围日益扩大，在国家主权与超国家决策之间的选择日益明显时，原始的合作也就逐渐向具争议性的部门进行。这种行为者“逐渐政治化”的发展，使得原来只是在经济部门的一体化，提升到政治方面的一体化。一体化经由学习、外溢（spill-over）与效忠转移（loyalty transferring）三个阶段。在一体化的过程方面，功能的“外溢”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观念。这种“扩溢”的效果就是功能合作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精英分子经过学习过程，了解功能合作的益处，修正了观念与行为；另一方面是功能合作使得资源与利益重新得到了分配。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逐步在迫切需要的事务上建立共同体，例如“农业共同体”、“旅游共同体”、“社会安全共同体”（处理两岸走私、犯罪）和“危机管理共同体”（共享天气预报、危机情况的警报及共同处理危机）等。

另一方面，增加文化认同。首先，两岸合作，努力实现文字的统一。正是由于一套相同的汉字，中华民族能够在各种历史的风雨中，始终凝聚而不坠。因此，尽管两岸语言相通，但无可否认的，两岸这些年来文字书写上的差异，已然成为了两岸人民一个区分我群与他者的重要标记。所以只要两岸文字仍有“简繁”之别，即使这差别并不算大，繁简字体也越发成了拉开两岸认同的触媒。目前，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所呼吁的两岸共同推动“两岸文字趋同化”作为文化一体化的首要重点工作正是出于这一考量。其次，推行共同身份认证。基于历史因素，两岸目前各有其政治上的身份归属。即使大陆对台核发台胞证，也是等于同意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不同，一种“他者”的认知随着不同归属而日渐强化。为了建构共同身份认同，一个可行的方法即为建立一个两岸（甚至可以推广到港澳地区）共同承认的“身份认证”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是与两岸现行身份认证不同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系统；或者也可以是某种类似欧盟内部免签系统。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两岸政治文化的分歧与融和

上海台湾研究所　陈鸿惠

政治文化作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概念，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从个人角度看，政治文化包括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评价取向三个层次；从功能角度看，政治文化包括体系文化、过程文化、政策文化三个层面；从类型角度看，政治文化可以分为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原型。①

海峡两岸人民同源同种、同文同宗，然而由于日本殖民统治以及我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两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与之相应，两岸政治文化也存在着显著分歧并导致政治行为的较大差异。本文拟借用上述政治文化相关概念，结合两岸学界先进现有研究成果，就两岸政治文化的源流、分歧、交集、融和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两岸政治文化的源流

两岸政治文化的源流与属性，诚如陈孔立教授所言②：大陆文化基本上由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三个部分构成；在政治文化方面，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传统的、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仍然存在并发生一定的影响。台湾文化基本上由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草根性的地方文化）、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三个部分构成；在政治文化方面，以西方政治文化为主导，传统的和日本的政治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两岸社会制度的本质差别所致，大陆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类型，而台湾则

① （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陈孔立：《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第1－2页。

属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类型。

二、两岸政治文化的分歧

当前两岸政治文化的分歧，在认知取向体现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变迁，在情感取向上体现为“省籍情节与统‘独’倾向”的影响；在评价取向则体现为“选举政治与民粹主义”的纠结。

1. 认知取向：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

台湾地区作为一个中国政治亚文化区域，台湾汉族移民的政治认知背景及其代际传播方式历来与祖国大陆民众基本相同。即使在日据时期，中国传统政治认知也以闽南文化的方式在台湾民间社会顽强地保留下来，多数台湾人对于台湾与祖国大陆政治关系的历史认知仍然清晰。但是，1945 年台湾光复后因国民党当局治理不当而爆发“2·28 事件”，加之日据时期“皇民化教育”的余毒，使许多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政治认知受到极大误导。1949 年以后因国共内战而形成的政治对立与社会隔离，使得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与祖国大陆民众的政治认知出现了严重落差，即使台湾社会内部也逐渐形成一个个界限依稀可见的政治认知差异群体。[①]“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取向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取向变迁大致走过以下四个阶段[②]：一是日据时期的“亚细亚的孤儿”议题；二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台湾与大陆争夺正统性议题；三是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台湾优先”抑或“中国优先”的优先议题；四是“政治革新”与“解严”后的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的认同冲突议题。

当代台湾的政治认同冲突包括“去中国化”与“反去中国化”的文化认同冲突、“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冲突、“台湾主体性”与“中国主体性”的价值认同冲突、台湾政治体制与大陆政治体制的制度认同冲突四个层面。如今，“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主流意识，

① 刘国深等著：《台湾政治概论》，九州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7 页。

② 邹振东：《台湾政治文化的符号变迁研究——光复以来台湾的舆论议题演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

“中国意识”则成为非主流意识[①]。据台湾《天下杂志》近期所刊民调结果，62%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自认“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有22%，自认是“中国人”的仅8%；其中，18到29岁的年轻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高达75%，15%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不到10%认为自己是“中国人”。[②]

2. 情感取向：省籍情节与统“独”倾向

由于“政治革新”以来的台湾政治环境变迁以及政治认知结构的变化，使得台湾社会的政治情感取向出现了与大陆社会不同程度的变化。台湾内部群体间多样化的政治情感结构包括“抗拒威权心理”、“悲情意识”、“恐共心理”、“崇美心理”、“媚日情愫”等，[③]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省籍情节与统“独”倾向。

省籍情节是台湾地区所谓“本省人”（1945年光复之前迁台定居的汉族移民）与“外省人”（1945年光复之后迁台定居的汉族移民）之间互相猜忌、互相对立的心理矛盾。“2·28事件”是省籍情节产生和累计的最直接原因[④]。在李登辉的操控下，“2·28事件”的内涵不再是还原于民主与专制对抗的真实悲剧，而是指向“国民党外来政权（=外省人=中国人）武力镇压台湾人民”[⑤] 的“省籍悲情”，从而将国民党的原罪转化为外省人的原罪。如今，尽管“省籍情节”在台湾日常社会生活并非大行其道，但是在重大政治选举中往往成为“保台/卖台”政治舆论操作的有力武器。由“省籍情节”催发而生的“悲情意识”，逐渐成为影响台湾社会“统‘独’倾向”的重要潜在因素。如前述《天下》杂志近期民调结果，受访民众被问到希望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独立、统一或维持现状时，主张尽快独立者达11%，尽快统一为2%，维持现状者则高达78%，进一步追问发现，希望永远维持现状、未来逐步走向统一，或未来逐步走向独立，各有35%、10%和33%。[⑥]

---

① 王建民：《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12月第32页。

② 台湾《天下》杂志第436期，2009年12月14日-21日。

③ 刘国深等著：《台湾政治概论》，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页。

④ 邹振东：《台湾政治文化的符号变迁研究——光复以来台湾的舆论议题演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⑤ 作家陈映真语，引自曾健民《新二二八史像》，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⑥ 台湾《天下》杂志第436期，2009年12月14日-21日。

3. 评价取向：选举政治与民粹主义

由于公职人员选举在台湾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台湾民众常常称台湾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或自由社会，而从台湾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参与来看，美国式自由民主思想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但是从当前台湾的实际政治来看，台湾仍然是一个民粹式的民主政治。原因在于：解严以前所谓党外人士虽然高喊民主，但是他们在行动上主要是以争取自由号召群众；而解严以后的民进党，重视的不是自由而是民主，而且民主的意涵是由李登辉阐释的民粹式的民主。李登辉用一句“民之所欲，长在我心”解读民主，从此台湾政治人物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就是“迎合选民就是民主”。于是，民进党从原来捍卫人权、自由的角色转变成以追求“台湾独立”作为诉求的政党，因为“台湾独立”对特定选民具有吸引力，而且这个口号容易引发台湾人民的自我意识和尊严感。所以，“住民自决”、“一边一国”、“公投”、“本土化”、“制宪”等一连串撕裂族群、制造社会两极对立、激化两岸关系的作为，全部都可以用“选票考量”得到充分的解释。①

三、两岸政治文化的交集

两岸政治文化的交集主要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和当今两岸政治心理趋势两个层面：

1.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

虽然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中，主要体现于六个方面②：一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二是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三是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四是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五是法古思想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意识；六是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上的大众政治文化。

对于两岸而言，民主政治都是一种外来政治。而台湾长期以来仍然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教化主轴的社会，政治人物急功近利，大多数都不如孙中山

① 林火旺：《从2004年选举论台湾的政治文化》，中国网，2004年9月10日。

② 陈孔立：《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第2页。

先生认真研读民主政治背后的一些理论依据和价值观，所以解严以后的台湾，台湾人民对“民主”的认知都是政治人物沿街叫卖的产物，至于政治人物对民主观念的认识，几乎都是“想当然耳”。因此只有“民主”这个价值受到强化，自由主义所重视的其他价值：和谐、多元容忍、合理性、公共精神等都被束之高阁。[①] 如果肯定“民主”是两岸政治发展不可替代的方向，那么就更应深刻理解西方民主产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进而反省中国自己政治文化的属性，创造中西方深层以及多层对话的可能性，才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平顺之途。[②]

2. 当今两岸政治心理趋势

在当今台湾社会，就两岸关系政策的开放与管制而言，开放意识是主流意识，管制是非主流意识；就和平与敌对、战争而言，和平是岛内的主流意识，敌对、冲突是非主流意识；就岛内政治、社会的和解与对抗而言，和解是主流意识，对抗是非主流意识；就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发展而言；“台湾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主流意识，“中国意识”是非主流意识。[③]

回溯台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政治心理总图式，可以概括为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求和平、求安定；另一个趋势是求尊严、求发展。这两个趋势既是对全球化过程中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现实链接，也是与大陆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道路的客观契合。

两岸政治心理趋势的交汇点，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四、两岸政治文化的融合

两岸政治文化的融合，既是一种历史的自觉，又是一种文化的自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1. 凝聚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

通过全方位开展两岸文化交流特别是加强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两岸可

① 林火旺：《从2004年选举论台湾的政治文化》，中国网，2004年9月10日。

② 杨开煌语，引自《魏镛教授逝世周年纪念会——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开展成果报告》，（2005年3月）第5页。

③ 王建民：《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12月第32页。

以重温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重温抵御外侮、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共同抗战的革命记忆，并携手共同创造新的集体记忆，增强彼此的熟悉感、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对祖国大家庭的向心力。

2. 夯实两岸理性、务实的文化土壤[①]

要创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时俱进的民主、文明、理性、科学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利于两岸同胞之间、两岸政党、社会团体之间互信、共识的培植，有利于两岸执政者、两岸同胞务实面对两岸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有利于两岸良性互动，互释善意，理性相待，共谋双赢。

3. 形塑两岸共同价值[②]

两岸新文化、新价值的创造主体，必定是两岸同胞及其海内外华夏子孙。可以设立两岸共同发展委员会与两岸新文化推动委员会，分别邀请两岸有影响力的各界人士，并筹组两岸共同发展基金与两岸新文化发展基金，为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新文化的构建提供人力、财力保障。

两岸期盼共同精神家园的建构，透过两岸经济合作、人员交流往来，促成两岸语言、潮流、价值的趋同化、同步化，形成共同的生活圈、生活方式，形塑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财富、人文精神将是两岸精神的核心要素，现代人文价值、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等将融汇到两岸新的核心价值中来。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① 倪永杰：《两岸和平路径探索：培植共同利益、形塑共同价值》，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7月。

② 同①。

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之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刘国奋

自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在“九二共识”下双方关系发展迅速，并在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两岸关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基本形成。但另一方面，由于两岸存在结构性矛盾，某些消极因素多少影响两岸关系向深层次方向发展。为深化两岸关系，大陆官方曾多次提出展开两岸政治协商、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终止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等建议。尽管两岸关系的本质是政治问题，两岸政治协商最终不可回避，但是就目前两岸关系、岛内政局和两岸所处的国际环境来讲，在短期内，两岸难以消除双方的政治分歧与矛盾，就上述相关议题进行协商的可能性不高。笔者以为，为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两岸从扩大和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着手，有助于突破目前两岸关系所面临的瓶颈，为两岸关系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本文拟就对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再认识、两岸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契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的内涵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如何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提出一些建议。

一、对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再认识

本文所指的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范畴是广义的，它包括语言、文学、教育、民俗、宗教、影视、媒体、文化创意等多个方面。只有通过这些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载体，两岸关系才会被注入更多的活力，两岸关系所面临的政治瓶颈亦有可能被突破。

（一）从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入手突破两岸关系瓶颈

近年来，大陆方面对于展开两岸政治谈判、确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等提出建议，但得不到台湾方面的正面回应。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台湾内部政治分歧较大，民进党及其他绿营人士至今仍采取“逢中必反”的不理性立场，牵制了马英九当局大陆政策向更进一步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美国的因素对马英九当局的大陆政策也有一定的制约。美国虽“乐见两岸关系改善”，但不希望两岸关系走得太快、太近，以免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①]。在此背景下，马英九当局在短期内不会就两岸政治、军事等高敏感度的问题与大陆展开谈判。

自2008年两岸两会恢复协商以来，通过两岸两会领导人的四次会谈，两岸已达成12项协议和2项共识。这些协议和共识大多属于经贸范畴，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即将签订，此后为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两岸需要寻找下一个交流合作的重点。而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政治敏感度相对较低，易于被台湾方面接受，是马英九当局较放心而为之的领域。

经贸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尤其在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今天，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将对两岸经贸文化、民众思想情感等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两岸经贸关系已取得较多进展的形势下，两岸有必要大力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可以肯定地说，在经贸、文化这两条腿行走之下，两岸有可能突破某些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障碍，让两岸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从多视角认知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意义

首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台湾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其丰富深厚的文化资产内涵，即使是以往“台独”分子竭力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切割开来，也难以做到。台湾文化是深深地浸润在中华文化之中的，从本质上讲，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如果将两者切割开来，无疑是将台湾文化的根刨掉，最终台湾文化也将失去生命力。这其实也是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原因所在。

其次，经由两岸民众共同参与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必将有助于加深两岸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创新内涵。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扩大和深化，两岸民众的情感将会进一步拉近，互信基础会得到加强。

再次，全面、有序地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将使中华文化和两岸关系发展出一个新的内涵。两岸通过扩大和深化文化交流合作，必将增强中华文

① 刘国奋：《近年来台美关系政策目标之分析》，《台湾研究》2009年第3期。

化的创造力与凝聚力，扩大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这对于台湾民众在心理上融入中华民族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两岸面临的某些政治难题将有可能逐步得到化解，从而使中华文化和两岸关系展现出新的面貌。

二、两岸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契机

从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现况来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有丰富的中华文化作薪火，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和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做东风，两岸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将暂时避开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而发展出一条新的共同道路，对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新的两岸文化价值观，进而拉近两岸民众的情感、缩小两岸民众的认同差异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形成，为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提供较好的时机

近两年来，两岸在“九二共识”下，秉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按照“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在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中，两岸双方对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合作有极高意愿。

大陆方面，胡锦涛主席2008年12月31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六点意见，其中第三点即是“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胡锦涛主席表示，“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愿意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①]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拓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2010年3月中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在会见“2010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成员时表示，相对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文教交流还显得滞后，需要向前推进[②]。

①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月1日。

② 《大陆认为两岸文教交流相对滞后》，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3月16日。

台湾方面，马英九竞选时曾表示，一旦当选，“一定会以中华文化本位没有折扣可打”①。2010 年初，台湾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后，马英九表示要成立“文化部”，显示马英九当局对文化问题的重视②。而台湾文化总会年初推举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担任会长，这是该会于 1967 年成立以来，首度由非台湾地区领导人担任会长。台湾舆论认为，此举是让文化总会往纯民间组织靠，未来也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加速推动两岸文化与文创交流合作。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于 5 月间访问大陆时表示，今后文化总会愿作两岸文化交流平台，为两岸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协助，也盼国台办提供相关协助。③

总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形势下，通过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两岸文化产业的优势互补，共同做强、做大中华民族文化产业，大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已逐渐成为两岸双方的共识。

（二）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已累积相当经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助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向更深广的层次发展

自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两岸交流交往在断绝数十年之后又开始了接续工作。30 多年来，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扩大，累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结出了一些实际成果。仅以福建为例，近几年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步伐加快，将海西区建设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是中央和福建省的工作重点之一，并已取得一些成果，如设立闽台缘博物馆，建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推动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并在共同深化对“根、祖、脉”的认同中，不断密切两岸同胞的情感。总体而言，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也同经贸层面一样，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地区展开。经过多年的努力实践，2009 年第 5 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就深化两岸文教交流达成了 29 项共同建议，这是两岸在文化交流合作上迈出的重大一步。

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绿色、低碳的理念

① 《去中国化　马：中华文化不打折》，台湾《联合报》2008 年 3 月 4 日。

② 《“总统”：推出文创法配套措施　做到“文化立国”》，台湾《中国时报》2010 年 1 月 23 日。

③ 《刘兆玄接手文总打造两岸文化平台》，台湾《中国时报》2010 年 1 月 15 日；《刘兆玄大陆行不涉政治 旨在文化交流》，台湾《中国时报》2010 年 5 月 16 日。

下，为两岸扩大和深化文化交流合作提供新的契机。一方面，上海世博会台湾馆以其独特的造型与先进的理念，将台湾民众的文化艺术创新能力做了一次新的诠释。另一方面，台湾以上海世博会为舞台，积极融入大陆文化创意产业，台湾民众不仅看到了大陆文化创意市场的巨大，而且也更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对竭力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作切割的“台独”分子不啻是当头一棒。可以预见，通过参与上海世博会，台湾民众文化创新能力将进一步得到大陆民众的肯定，其参与大陆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情会更高，由此他们对中华文化也将有新的认识，并将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三）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各具优势的两岸文化产业在深化交流合作中将大有作为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其创造出的经济价值之大，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难以忽视的新兴行业。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台湾“行政院”曾定义为：“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成与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潜力，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行业。”并将文化创意产业范畴归为13项，即视觉艺术产业、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文化展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电影产业、出版产业、广告产业、设计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建筑设产业、创意生活产业、数位休闲娱乐产业等[①]。2004年，大陆有关部门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②]。因此，从大陆和联合国的定义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包含的范围较广，它应是文化与经济结合创意的产业，而不仅仅是台湾方面所列的13个产业。

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两岸文化政策的焦点。近年来两岸对文化创意产业都相当重视，通过相关政策法规将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事关战略地位与竞争实力的高度。2009年国务院公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之一。2010年1月，台湾也通过了《文

① 《奖励文化创意产业　拟订新方案》，台湾《联合报》2003年2月12日。

② 《北经人》电子版，第52期，2007年3月15日，http：//www. tangedu. cn/yb/52/3/1. htm。

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将多元的文化资产作为台湾的竞争力之一。由于两岸官方均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两岸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快，并且各具特色。比如，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既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又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呈现多元化的特色，台湾在文化创意产业起步比大陆早，有一批素质较好的文化创意人才等。大陆文化创意产业虽比台湾起步晚，但大陆有巨大的市场作后盾，为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近几年来，大陆各地的文化产业博览会方兴未艾，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都在搞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创意园区也在各地纷纷建立，这对于扩大和提升大陆文化创意产业有积极的助推作用，其发展后劲很足。

由于两岸文化同源，大陆的市场又较大，吸引了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士积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2010 年 5 月，两岸 6 所大学合组两岸创意产业研究联盟，并举办了“全球华人文化创意高峰论坛”，对于推动两岸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合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两岸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合作的目的是相互学习、各取所长，相互提携、力争做强。因此，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合作展现能力的舞台除了大陆市场外，还应放眼世界市场，有中华文化丰厚的底蕴，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界携手进军国际市场必定是大有作为。

三、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的内涵

总体而言，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基本处在松散的、不规范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态化的状态。要使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并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要建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亦即两岸通过制定或采用某些活动的程序、规则或组织制度来调节和规范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机制应建立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双方共享价值观念和共同利益基础上，是为了实现两岸互利双赢的目标。为此，两岸可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或机构，共同确立并遵守一系列双方文化交流合作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体系，等等。

经过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自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通过两岸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已大致确立，两岸将签订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一协议将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提供借鉴，并将有助于两岸关系从经济领域扩大

到文化领域，其意义非同一般。比较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是强调官方主导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建立配套的推动计划、相应的政策法规与法律保障体系，甚至是设置经费和奖励金制度，是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必不可少的措施。

二是设立专门的交流合作平台是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路径。在两会会谈机制下，除了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两岸有必要设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台湾文化总会有意成为两岸交流合作平台，大陆也需要有相应组织机构来承担这一角色。

三是实现两岸民间组织机构和文化领域各行各业对口交流合作的常态化是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必要前提。两岸交流交往 30 余年，至今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仍有较多禁区，要扫除文化交流合作障碍，实现文化领域各行业对口交流的常态化是十分必要的。

四是时机成熟时商议签订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可为使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迈入制度化和规范化阶段。与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一样，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扩大和深化亦有必要签订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协议，以实现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与长期化。

具有政党交流背景的民间性“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已举办多次，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由该论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取得了某些制度性成果。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长远利益考虑，两岸有必要就签订文化交流合作协议进行协商。

四、几点建议

（一）尊重台湾同胞的文化创新精神。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要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大陆对他们的尊重。大陆在经济上搞“让利”，虽对台湾同胞有利，但在心理上，一部分台湾同胞未必领情，认为大陆这种做法有居高临下的“恩赐”意味。而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则不同，以共享中华传统文化、共推中华文化的光大发扬、共创两岸新文化为内容，台湾同胞的文化创新精神会得到极大发挥。一些台湾同胞期待成为“大中华文化推手”，这一愿望会在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得到实现。

（二）重构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两岸相互隔绝数十年，加之在李登

辉、陈水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政策下，台湾同胞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趋于淡化。为此，两岸应共同确立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如共写戏曲、共编教科书、共建两岸文化博物馆、共同保护文化遗产与共同申遗、共推民俗文化繁荣、共设宗教联合会、共办孔子学院，等等，使两岸人民在文化交流合作中有共同参与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经历，如此，两岸人民必将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中建构共同的文化记忆。

（三）以人文精神为基础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迈向新台阶。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最大的特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追求人的和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协调，这是中华文化独特而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近几年来，大陆强调以人为本，在经济上提倡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上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两岸关系上提出和平发展，这些无不包含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内涵。因此，在扩大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提倡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6月25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文化在推动两岸政治沟通和整合中的作用分析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廖中武

文化是什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文化的理解就不一样，本文所指的文化，主要包括一个民族或国家人民从总体上体现出来的情感、风貌、气质、精神以及其表现形式，如个性、文学、艺术、宗教、习俗等。

一、台湾文化和中华文化根源与内核的一致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灵魂，体现着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影响着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整合功能，是维系民族团结、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也是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

1. 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相同或相近

文化以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性等内容和形式存在和体现着。台湾居民以移民为主，历史上大陆几次大规模的居民移入台湾造成了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相通性，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性等文化形式大都与大陆相同或相近。在台湾使用最多的语言是闽南话和客家话，台湾现有2300多万人口，说闽南话者至少1600万人。在国民党政权恢复对台治理后，普通话（即国语）在台湾得到推广和普及。随着在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国学教育也相应在台湾得到普及。在宗教信仰方面，台湾民间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它们传入台湾的过程正如大陆人移民台湾的历史轨迹一样，由中原到闽、粤南部，再由闽、粤渡海去台湾。因此，在台湾，到处都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如来佛、观世音菩萨、妈祖、灶王爷、土地公等多神信仰，关公也是家喻户晓，这些信仰和大陆几

无不同，即使是祭拜仪式也是一样的。据台湾“内政部”统计，截止到2008年年底，台湾登记在案的寺庙、教堂共计14993座，其中道教占78.4%，佛教占19.5%，这两教寺庙占全台湾寺庙、教堂总数的97.9%，其他宗教信仰就显得非常少了。[①] 更有广大的信徒信仰妈祖，每年都有大批的善男信女到台湾各地妈祖庙和湄洲岛妈祖祖庙朝觐祭拜。在台湾，无论岁时令节、喜庆婚丧，还是传统信仰、祭天敬祖，无不处处表现闽粤风尚，彰显中华传统文化色彩。中华传统节日大体上被保留在今日的台湾社会生活中，并对台湾人的个人心理和社会风尚等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台湾与大陆密不可分的又一佐证。

2. 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核是一致的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内核是什么？笔者认为是经过从古至今数千年来生活、生产等社会实践积淀下来的“和”与“仁”的思想，这是悠悠数千年在中国广袤大地上休养生息的不同种族、民族互相交流、碰撞、摩擦、融合的结果，经由思想家归纳出来，反过来又教育、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众。“和”不仅仅是指人与人之间、也指人与“天”（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这种“和”是以“不同”的存在与共处作为前提的。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这种“和”是一种真性的“和”、现实的“和”，也是一种高尚的“和”，因为允许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的存在，也就是说，允许多元的观念和利益的存在，而不是剪除异己，实行思想文化专制，而这也是中华文化包容四海、生生不绝的最重要原因。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经过多次摧残、打击，纵然备受曲折但仍然延绵不息，反而将侵入的外族融合、归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仁”是“和”的思想的同胞，正是有了“和”，“仁”的思想也得以存在和发扬，“仁”是一种爱的思想，这种爱不仅仅是一种本性的爱，也是一种大爱、真爱。文化学家在比较了中华民族与其他族群的特性时得出一种结论是中国人本性纯朴宽容、具有仁爱之德。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华民族少向外实施武力侵犯的原因之一吧。“和”与“仁”相容相辅，共同存在于中华文化的内部，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底蕴。其他的忠、孝、悌、廉、礼、义等都是这两种文化本核的延伸。

① 来源：http：//taiwan. huanqiu. com/opinion/2009 - 10/599326 _2. html 环球网．台海．海峡时评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特性，台湾文化的根本仍然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在日据时期、在与大陆隔绝对立时期，仍然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保存下来，某些方面甚至保存得比大陆还要完整和地道。也正是这种文化特性，经过多年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两岸人民仍能很容易地在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语境里找到共同点。

二、两岸在保存和发展中华文化方面的努力与双向交流

中华传统文化显性传入台湾可以溯及郑氏集团藩台时，在其军师陈永华主持下，积极推广传播大陆的中华传统文化，建孔庙设学校开科举，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制度化而成为显性文化，而此前的大陆文化是以民间文化的形式（如语言、习俗、信仰等）在台湾存在和发展的。清代统治者为了开发和管理台湾，开始系统地实施文化、伦理教育，力倡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台湾得到广泛传播。清朝统治台湾的二百余年，台湾奠定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基础。

日据时期，台湾各界人士为保卫中华传统文化，抵制日本占领当局的“皇民化”作了不懈的努力。国民党统治台湾后，台湾当局为了巩固统治基础，整肃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统一岛内思想文化，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包括：开展全面性“国语”推行工作，于1946年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以增强不同群体之间的语言沟通，消除日本“皇民化”影响；阐扬传统伦理道德，强调民族观念，培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发展与传承，对于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恢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自1949年以后，两岸中国人展开了两种方向不同的社会建设进程，但不管是采取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其实都是对原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改造，带着一些反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时，台湾为了反制大陆的“破四旧”，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运动的宗旨与目标是以中华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运动渗透进当时台湾教育传播的各角落，在中小学生生活教育中都贯之以伦理道德。可以说台湾从学校的社会化开始就注重给学生灌输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正是因为未有经历过大陆对“四旧”的破坏，台湾文化中的中华文化因子和形式保存得比大陆还要完备

和全面。

在海峡两岸打破隔阂开始人员往来后，两岸的文化交流呈现逐年增多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至2008年底，仅大陆方面应邀赴台的文化交流项目就达4500多项、44000多人次。截至2008年底，大陆298所高校与台湾108所高校签署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协议，约有2万名台湾学生来大陆高校就读。[①] 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呈现良好势头，这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创新，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理解和感情，特别是在两岸青少年之间架起了心灵沟通的桥梁。

2009年两岸文化交流呈现出比以往更加活跃、更加全面的状况。无论是京剧、昆曲还是歌仔戏、布袋戏，无论是绘画、雕塑、陶艺还是音乐、话剧、电影，也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两岸艺术家频频同台交流切磋。两岸携手举办“两马同春闹元宵”、“天下妈祖回娘家”、“七夕牵手”会、郑成功文化节、开漳圣王文化节、海峡客家文化节、福建文化宝岛行等活动，互动往来，产生强烈共鸣。

两岸文化的交流合作增进了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两岸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对共同繁荣文化市场、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起到重要作用。曾任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杨渡十分看重两岸文化交流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两岸文化交流有助于两岸增加对彼此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了解，“只有在彼此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了解彼此的想法，并进一步促进两岸的沟通和交流”[②]。

三、两岸文化交流对推动两岸政治沟通和整合的作用分析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作为一种无形的财富，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分享的记忆与感情，也因为文化像阳光、空气、水一样自然，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吴伯雄认为中华之

① 来源：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1/9/2/101019291.html?coluid=141&kindid=5010&docid=101019291 中国评论新闻网 2009-7-11

② 来源：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mzmj/2010-01-18/493466.shtml 台海网 2010-1-18

本，就是文化之本，中华子孙都不能忘了文化的重要性。①

1. 加强文化交流，消除两岸民众心理隔阂和障碍，淡化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操弄

目前两岸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不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存在差异，导致两岸民众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看到文化的特殊作用，利用文化隔绝和对立的方式来炒作“台独”，以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李登辉主政时期，就借故操弄文化议题，于1990年公开声称“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加快了“文化台独”的步伐，导致“文化台独”出现恶性蔓延的势头。陈水扁执政后，更是在历史、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全面推行“文化台独”路线，例如，修改历史教科书，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弱化普通话在台湾的影响，利用各种考试推行“去中国化”政策等。“文化台独”通过欺瞒手段骗取台湾民众的支持，误导台湾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台独”理念，在岛内形成有利于“台独”势力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是“台独”势力企图从文化层面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精神、心理联系，抹去台湾人民心中的中国记忆，其实质是“台独”主张在文化领域的延伸，目的是造成两岸人民文化观念上的隔阂和敌对，因而也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应对“文化台独”最好的方法仍然是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岸人民由于文化传承、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媒介和方式不同，难免会产生差异，要消除这种文化心理差异，需要的是双方长期、持久、互动的沟通和交流。现在两岸交流遵循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的思路，其实为了更好地消除两岸人民心理芥蒂，应该把文化层面的交流和合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相对经济交流、政治协商而言，两岸文化交流表现得平和、自然，没有政治谈判和协商那样敏感，也不像经济交流那么顾及成本和利益，形式可以多样化，内涵相当丰富，因而文化交流起来更加便宜，可操作性更强。开展两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的沟通和理解，在积累到一定的量变的基础上，可以率先实行文化层面的统一，继而逐渐达到政治层面的融合。

2. 重视文化交流，拉近两岸民众政治心理、增进民族情感

由于两岸这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发展路程确实存在不同，在这大的历史背景下，两岸民众的心理难免存在差异。尽管清末有志之士为反对割台

① 来源：http：//tw. people. com. cn/GB/14810/9636170. html 人民网．台湾频道 2009－7－11

而呼号奔走，台湾人民对入侵的日寇进行了殊死战斗，有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悲涕、有余光中“那道浅浅的海湾”带来的忧伤，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老一辈台湾民众的故土情结和中国情结随着老一辈人的凋零而淡去，而新一代成长起来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历史经历，他们对大陆的印象正在形成之中。他们得到的中国记忆和印象部分地来自上一代人传承的言教，更多的是来自学校、社会的教育以及各种活动形成的感观。因此，通过文化交流和合作可以引起他们的文化感应，寻找文化上的认同，拉近两岸民众政治心理，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大陆人士通过到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了解台湾民众的政治诉求和真实感受，减少对台湾的误解。中华文化作为一贴黏合剂，将有效地拉近两岸民众政治心理，并增进两岸民众的民族情感。

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也引起了两岸政治高层的高度关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六点意见”中将“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提到新的历史高度，高度肯定中华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作用，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文化在维护、发展两岸关系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马英九上台后，淡化了“文化台独”的做法，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大打“台湾文化”牌，认为“文化是台湾的关键实力。……是台湾最大的资产”、“经由‘软实力’达到与增加‘国防经费’相同或更大效果”。马英九进而提出“万马奔腾计划”，4年内提供3万个名额，用作岛内外学生交流，强调扩大开放大陆学生赴台湾高校学习。[①]这充分表明弘扬中华文化对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举足轻重，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3. 保存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给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文化精神层面的支撑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找到很多范例，比如，犹太民族尽管散居世界各地，与其他种族人群混合，但其显著的文化价值观念仍然起着心灵和情感联系的纽带作用，认同着本民族。中国传统文化里原本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在猛然间有了现代国家的意识。在台湾脱离祖国被日本统治期间，台湾人民自觉行动起来，采用各种方式维护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延续，创造了诸多文艺作品，表达对祖国的思念、对回归祖

① 来源：中华文化、台湾文化与和平统一［J］. 中国评论.2009，(9)：11.

国怀抱的期望。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后，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无形中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培养了文化的土壤。有人认为台湾文化受日本“皇民化”运动和西方文化输入的影响，具有了西方文化的特征。笔者认为，尽管两岸文化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势头，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些变化，但其核心价值和总体内容还是不变的。往来于两岸的人们可以发现，两岸的民风习俗、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乃至行为规范总是那么相通相近，中庸、平和、谦虚、内敛的中华民族心理特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两岸都为保留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作过努力，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道德并未出现历史的断层。笔者认为，这就是文化的同质性在起重要作用，在现代国际生活的体系下，这种文化基因的一致是牵系和区分人群、种群的一个标志。“家和万事兴”，“和”的思想观念和努力，在解决两岸事务中一直存在着，斗则两伤，和则两利。“仁在通达”，两岸在“斗”和“争”的过程中，日益认识到“和”与“仁”的思想内涵和重要意义。大陆在和平发展、和平共处的思想指导下，两岸和解仍然是主基调和主色彩。虽然生活和社会发展会对文化提出新的要求，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会给予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文化精神层面的支撑。

四、结　语

自 1987 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以来，尽管两岸关系跌宕起伏，文化交流的规模却在不断扩大，成为两岸交流中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两岸文化交流已经深入到两岸民众生活之中，满足着两岸人民渴望接近、渴望沟通的急切心情，满足着两岸人民彼此寻根问祖、找回骨肉亲情的美好愿景。

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不能仅仅依赖物质利益层面的互利，经贸交流可以很快地让两岸同胞互相受惠、获得实际利益，但它却不能够替代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沟通。文化教育交流是深层次的，可以沟通两岸同胞的心灵，增加彼此了解，拉近距离，加深情感，有利于推动政治层面的交流和沟通，消除政治隔阂，增进民众情感，让政治方面的整合更为顺畅。

参考文献

[1] 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吕良弼、汪毅夫著：《台湾文化概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3] 郑晓云著：《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张春英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5] 杨开煌著：《新局：对胡六点之解读》，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
[6] 周天柱：《中华文化、台湾文化与和平统一》，中国评论 . 2009，(9)：8 ~ 11.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3 月 24 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简论文化在两岸和平统一中的重要性

军事科学院台海军事研究中心　张　露

“一个分离和对峙的民族是一个残缺和悲伤的民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此十分敏感，一直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反映这种分离造成的痛苦，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团结。”

——陈映真（台湾）

文化是民族凝聚、国家认同的基础。正是因为文化的发展，才使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累积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新的政治思维，从而影响到处于这种政治思维下的社会众生的认知和相应的政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发生发展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当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治又会反作用于文化。为稳固统治地位，当政者往往会在既有文化的基础上，有意塑造于己有利的文化体系，这是一种文化的人为塑造过程，通过这种塑造而来的文化必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在一定的时期内为当政者提供了便利和政治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海峡两岸会存在着国家认同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此种差异将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极大障碍。为此，本文拟从文化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入手，分析台湾岛内国家认同异化的原因，继而在此基础上，探讨对从文化角度重新塑造两岸国家认同的几点看法。

一、文化、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文化，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人类学、哲家、社会学、考古学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就曾列举了欧美等国给予文化的160多种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

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① 就西方而言，目前对文化已经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它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作为机制（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在汉语中，关于文化的意识最早可以追溯至东周。② 而从词源角度而言，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则是最早使用“文化”一词的古代典籍，在这篇文章中，刘向用“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语句，从这个古老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国最早的“文化”带有“文治”和“教化”的意思。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于礼”。后随着西学东进，特别是日本对于西方文化概念的译介，促使中国逐渐改变了对“文化”的认知，开始将文化置于一定的生活方式之上。

而文化认同是基于文化而来的概念，指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认同（Identity）就本意而言指的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一个人或群体对这种不同特征的自觉意识就成为所谓认同。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交织融合，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

① 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pXVI，引自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② 《论语·八佾》中，孔子极力推崇周朝典章制度时曾说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的“文”已经有文化的原始意涵。

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通过认同，明确自己身处的世界究竟为何，同时也确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来说，认同是一种建立在彼此相同的认知以及起源，而和一些个人或团体分享属于彼此的共有特性及理念的过程，而凭借着这种基础，团结感及自然的亲近感和对认同目标的忠实得以建立。

正是因为有这种基于文化的认同的存在，人们才有可能以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历史记忆维护人们对国家的共同理解，形成国家认同。

所谓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国家认同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族群等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共同体。国家成其为国家正是通过文化、心理的认同而构成的，这种以符号方式存在的历史记忆，时刻提醒着当事方对共同国家的认可与尊重。只有保持并不断强化这种文化认同，才有可能捍卫国家内各行为体的共同认同。而一旦文化认同缺失，则有可能导致国家认同的偏差，甚至因此导致形势恶化和内部各行为体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二、台湾的国家认同异化及其文化根源

如前所述，共同的“文化认同”构成两岸对国家、民族认同的基础。这种共同文化认同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历史经历的共同记忆；二是对共同族群的美好情感。通过这种持续存在的文化认同，两岸虽然存在“治权”上的分歧，但回顾整个台湾史，几乎在99%的时间里[①]，台湾民众都自然地将中华民族和中国作为自己的民族归属和国家归属。

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随着台湾岛内政治民主化的开启，一股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势力开始在岛内以合法身份出现，这一问题才开始有所显现，但这时的“台独”还仅仅是一种不具有主导性影响的思想观念，并没有进入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2000年，随着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国家认同异化现象才开始迅速升温。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其政治诉求集中体现在

① 将台湾历史从三国时期算起。

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民主”思想和追求“台湾独立”的“台独”思想两个方面，这两方面随着民进党的发展壮大不断地调整完善，逐渐形成“反对外来政权，认同本土政权，追求台湾独立”的所谓“国家认同”模式，其核心内容就是“追求台湾独立”。民进党正是打着这个政治旗号上台的。

国民党在台执政51年间，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弊端，形成了压制民主的不利形象，民进党正是从塑造“民主”形象的角度打造自己的政党，用民众喜欢的“民主外衣”包装自己，同时，借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将这种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上升为本省与外省人间的矛盾，将“台湾意识”上升为一种带有自我主体性的独立意识，喊出“住民自决”的口号。可以说，民主观念与“主体意识”的上升，是冷战即将结束时期一种时代趋势，也是台湾民众在经历了多年的国民党专制统治后的一种民主意识的觉醒。民进党内的部分人士较早看到了这种趋势的巨大的影响力，于是将之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用民意打造自己的形象。

为证明其所提出的“台独”理念的正确性，陈水扁上台后，挟执政之势，从文化、教育、宣传等多个角度，潜移默化地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其中，由认同中华文化转为认同“台湾文化”，这是陈水扁主政下“国家认同”转变的主轴。在2000年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陈水扁一反过去领导人把“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将“台湾文化”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并力求“台湾文化”的自行发展。

为加强这种新的认同，同时破除旧有认同对于普通台湾民众的影响。一方面，刻意强化“本土观念”，加强“本土化”教育。在台南师范学院、花莲师范学院等高校设立“乡土文化研究所”，进一步落实“台湾文化”认同；制定相关的文化建设政策，以“行政院”所属的“文化建设委员会”为主体着力推动“台湾文化”认同；筹组“台湾文化资产中心”、“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美术馆”、“台湾民族音乐中心”、“台湾文学馆”等有形机构，藉以推动台湾各地文化传承、加强台湾历史教育、制造台湾文字等工作、落实推动“文化台独”；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大幅缩减《中国史》内容，把台湾文化教育变成“台独”思想教育，向年轻一代灌输“台独”思想理念和所谓的历史知识，改变台湾青年一代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加紧推动“正名”活动。民进党执政后，即开始为未来“台湾独立”作全面准备。当政之初，受制于陈水扁“四不一没有”的承诺，民进党当局一时无法推动激进的“台独”活动，便采取了相对柔性的“去中国

化”政策，一步步消除含有“中国”、“中华”概念的符号、文字、历史与文化，企图造成事实上的“台湾国”，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联系。“正名”活动中，取消了带有“中国”政治象征的符号、文字、标语，为带有“中国”或“中华”字样的公营企业、财团法人机构与公立学校“正名”，并以“去蒋化”为名，行“去中国化”之实。

除在文化观念上给台湾普通民众进行政治洗脑外，民进党还利用国民党政权主体来自于台湾以外的特征，刻意制造“本省”与“外省”的差异性，不断利用各种机会以本省人“爱台”、外省人“卖台”这一简单的省籍标签煽风点火，操弄“台湾人 VS 中国人”的认同议题，宣扬“台湾人当家做主”、“台湾人选台湾总统”的“台湾意识”，强调对中国情感的排斥，鼓吹所谓的“台湾民族”，并通过一系列举措进行“台湾民族”认同的建构。在民进党当局的操弄之下，族群认同在台湾民众中逐渐浮现出“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矛盾冲突，使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的概念成为模糊区，从而从民族情感上弱化并不断拉开两岸自古就已经存在的族群认同，破坏彼此间的信任与理解，培养怀疑与敌对情绪。这种台湾族群认同的升高，代表着“台湾民族主义”的逐渐强盛，代表着“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两个不同民族的认知已逐渐被部分台湾民众所接受。这种人为制造的概念虽然比较牵强，但对于民进党的选择战略而言，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号召力。

正是经过 4 年的准备，在文化认同上不断蚕食旧的认同理念、消除旧的影响、刻意制造两岸种种不同的基础上，2005 年 6 月 25 日，陈水扁在“台湾法学会”举办的一场名为“主权、宪法与台湾的未来”的研讨会上，最终抛出其破坏国家认同的杀手锏，提出“宪改”主张，要从根本上与“中华民国”划清界限，图谋通过“宪政改造”实现“法理台独”，彻底去除台湾现有“宪法”和法律架构中的“一个中国”表述，即台湾法律体系中的“法理一中”，建构新的“国家认同”。

虽然，民进党高调指出“宪政改造”排除“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及统独的议题”，但其试图从政治上、以法律形式正式去除民众“大中国意识形态”，将台湾与中国主权相剥离的分裂图谋十分明显。这种以民众意愿为幌子，通过政治资源，挟持民意，通过对民众传统文化认同的破除与改造，最终达到引导新的具有明确“台独”意识的国家认同的过程是十分危险的。

任何民族、国家、社会都需要有承载其历史记忆的符号，正是依赖这些历史记忆符号，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才会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从而保留其

民族本色。集体记忆是通过塑造历史、左右政治趋向的方式达成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认同开始形成并不断固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进党时期对于台湾岛内民众的集体记忆改造是极其阴险的，它从根本上威胁到了岛内民众的政治观，造成了客观上的混乱与力量分化，极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与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虽然就目前岛内的情况来看，民进党阴险的政治用心并没有完全实现，并没有能够真正从法理上废除“一中”，但这种不良举动的开启及一系列对民众正统观的破坏，还是对民众心目中神圣的民族观念与历史记忆构成了严重的冲击，诱发其怀疑意识，这对于将来的岛内民意发展及两岸间交流将是极为不利的。

三、从心构筑桥梁：两岸间重塑文化认同应有的关注点

面对历史的演进，特别是冷战后台湾岛内客观上出现的“破除文化共性”、“割裂国家认同”的一系列恶劣行径，海峡两岸心向中华民族统一的有识之士，应充分认识到这些行径的极端危害性。应当从文化认同之于国家认同的关系入手，重新构筑起两岸间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进而巩固两岸共属于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

从世界上类似情况的处置过程来看，这不仅要追溯两岸间的历史认同感，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具有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的历史经验中得出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元素，引导两岸民众重新认识我们伟大的文化和同样伟大的民族。同时，基于历史上的值得两岸所有中华同胞共同自豪的文化圣迹，谋求在新的起点上，共同塑造今天的政治认同感，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后人开辟新的历史文化认同，以证明海峡两岸间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进而有效地在民族群体之间形成相互认同。

在具体的重塑文化认同、同创历史文化轨迹的过程中，宜从两岸民众的心理感知入手，充分考虑到个体的人的心理感受，真正从人心着手思考对策，具体而言，宜关注以下几点。

（一）宜从两岸共同的历史关切中寻找切入点，突出共同性

文化交流的着力点不宜过于泛化，应充分考虑到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现实情况，选择能够在两岸民众中引起广泛影响的历史文化焦点，通过共同回顾

这些历史胜迹，缅怀历史的同时，通过历史引导今天的人们认识到两岸本是同根生，兄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此，应从带有全局性影响的、两岸都在延续的历史文化事件中选取带有典型性意义的文化焦点。

如两岸共同开展的祭扫黄帝陵，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1994 年清明节，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祭扫陕西黄帝陵，并在讲话中指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是中华儿女朝拜的圣地。古往今来，祭祀不绝。黄帝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祭祀黄帝体现着广大华夏儿女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对民族团结和睦的企盼，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祭祀全民族共同始祖的活动，在民族成员之间架起了一座座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中华民族屡经磨难而不衰，几临厄运而不散，一个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有着这种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同一个祖先面前，不论有多大的分歧都可以搁置，不论有什么样的恩怨都可以化解，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所有华夏儿女都可以携起手来，万众一心，形成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境下，历史文化记忆都已经成为表达民族认同诉求的象征符号。所以，纳日碧力戈先生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民族符号动员、社会记忆与民间信仰同时作用的过程，民族符号动员要借助于启动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中又有相当比重的民间信仰。”①

2011 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海峡两岸都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新篇章。与祭祀黄帝陵相类似，两岸在这一点上有着许多共同性与合作的可能性，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有可能带动两岸中国人重温历史，共同巩固相同的文化记忆。

（二）宜从小事件中寻找历史的大记忆，突出亲民性

海峡两岸隔绝了 60 载，虽然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在生活的细节与历史的记忆上却有着看似相似实则不同的特点，对于这些，两岸同胞都急于了解。这些历史的碎片，在大历史中已经有了太多的描述，然而大历史往往较多的表现的是两岸的对抗与对立和伟人在关键时刻的举措。这种历史记忆固然值得我们回味，也是提醒我们不要再犯类似错误的警钟。但在历史的进程中，普通人永远是主体，普通民众才是历史记忆的直接参与者，是

①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0 页。

文化认同的直接体验者。可以说，普通人才是两岸交流的主体，两岸间的文化认同重塑说到底要靠这些小人物。

在小人物的文化关切中，最直接的是对对方的了解。于是当年的一部《八千里路云和月》，让许多没有到过大陆的人看到什么是江山如画，什么是气势磅礴，从心里真正摸到了“祖国”两个字。而时下的一部《我们台湾这些年》，也让我们通过一个普通人廖信忠的目光，看到了台湾的变迁。或许来自台湾的朋友会说廖信忠没有写出什么，他所说的事我都知道。但这就是大陆的同胞们所不知道的，他用自己的笔把自己经历的事、听过的事写了下来，让我们一下子对台湾同胞的生活有了最直观的了解。

这两部作品在海峡两岸都具有极高的支持率，但在当地人看来却似乎没什么，这就是一个理解与定位的问题。虽然历史在关键时刻往往会闪现出伟人的身影，但真正创造历史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你我一样的小人物，小人物的生活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这才是两岸加深了解的根本。

正是一部《海角七号》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一下日据时期的台湾众生相，用一种小人物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与单纯的提及日据时期会有绝对不同的感受。要了解对方，就应该从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入手，真正了解对方的生活。笔者认为，这应当是未来两岸文化交流中关注的一个方向。

（三）宜逐步消除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突出互动性

长期的隔绝，不可避免地在两岸遗留下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虽然今天已经不是双方剑拔弩张的年代，但在两岸普通民众中，仍然有一部分人怀着敌对情绪，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目光看待两岸的交流与合作，总是有太多的担心，担心在交流交往中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交往的多了，而是因为交往的还不够。只有充分了解对方，才有可能作出与事实相接近、既能满足对方的利益关切也能满足己方合理要求的决定。

目前，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渠道已经打开，来大陆参加各种各样文化活动的台湾同胞越来越多，面对这些同胞，我们绝不应该还戴着有色眼镜。这方面，台湾文艺界已经作出了比较好的表率。由大陆方面投资拍摄的《集结号》、《风声》相继在台湾获奖，特别是描写解放军题材的影片获奖，可以看出台湾方面在文化交流领域中的开放态度和正视历史的豁达胸襟。

未来，两岸完全可以就类似的情况进行合作，甚至可以从军事文学角度，对两岸历史上的战例进行交流，将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卓绝精神的作品搬上双方的银幕，或在学术研讨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将来不仅台湾的学者可在大陆高校执教，大陆的学者也应该多去台湾交流，以在合作中相互了解，彼此促进。

（四）宜进一步扩大青少年的交往交流，突出前瞻性

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特别是在马英九先生当选为台湾地方领导人后，两岸互动性更为明显，各领域交流不断加强。仅以教育领域为例，据2009年教育部统计，截止2009年，共有6755名台湾学生在大陆求学，这些学生分布在187所高校，足迹遍及大陆。

仍以交流学生为例，据台湾《远见》杂志进行的“两岸交流学生意见调查”显示，无论是台湾赴大陆就读学生还是大陆赴台湾就读的学生，其赴异地求学的首要目的都是要累积生活与学习经验。此外，在两岸交流热潮下，“建立人脉”也是双方异地求学的考虑重点之一。[①] 比较而言，在“建立人脉”方面，台湾学生关切度甚至要远高于大陆学生。从这份调查可见，两岸年轻一代已经认识到未来两岸联系将更加紧密，为此，都已经在做好前期准备。

为了两岸关系长期发展和良性发展的需要，两岸未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宜在现有两岸青少年交往交流的基础上，拓展各种机制化或非机制化形式，扩大两岸青少年赴对岸参观、交流的机会，加强双方的了解，从小建立起“海峡两岸是一家”的观念，巩固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为未来两岸通过和平发展最终走向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2008年5月之后，海峡两岸进入了和平发展新阶段。在这个两岸互动频繁，双方领导人均希望维护台海和平、创造两岸双赢的大背景下，纠正因陈水扁“去中国化”而导致的岛内国家认同异化与文化认同迷失成为了可

① 林奇伯：《两岸教育交流大调查》，载《远见》杂志2010年3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年3月16日第11版。

能。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一定会超越困境，再次走向辉煌。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
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军事科学院台海军事研究中心　白光炜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海峡两岸存在着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经历了长期的分隔与对峙，使得两岸文化在发展形态上出现了若干差异，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两岸文化同源共本的性质。

一、两岸文化交流已进入大合作大发展时代

自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伴随着两岸关系发展的脚步，两岸文化交流从无到有、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按时间和交流进程可将两岸文化交流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87年间接交流阶段。这一阶段，两岸关系开始缓和，两岸交流以文化为先导，以第三地为中继，台胞及文化学术界人士、台湾的音乐、影视、文学作品以及民间宗教交流突破重重阻力，零星进入大陆，开启两岸文化交流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为1987年至1990年单向交流阶段。这一阶段，随着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台湾掀起回祖国大陆探亲、旅游高潮，有计划有组织地赴大陆的文化交流接踵而来，据统计，仅1990年进入大陆进行文化交流的项目就有130项，人数达900余人，几乎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①]，

① 《文化亲缘与两岸关系：以闽台为中心的考察》第309页，刘登翰主编，九州出版社，2003年出版。

但仅限于台湾进入大陆的单向交流，两岸文化交流仍处于初级阶段。

第三阶段是1990年至2008年双向交流阶段。这一阶段是两岸文化交流茁壮成长阶段。大陆文化学术界人士开始赴台交流，1990年大陆音乐工作者[①]应台湾有关机构邀请，赴台进行南音艺术的学术交流，开启了两岸文化界双向交流的先河，实现了“零”的突破。期间，尽管李登辉、陈水扁大肆推行文化上的“去中国化”，为两岸文化交流设限，对两岸关系负面影响巨大，但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数量与质量、速度和幅度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都跃上了新台阶。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至2007年底，仅经文化部同意的两岸文化交流项目就达5000多项，5万多人次。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已遍及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曲艺、杂技、文物、民俗、艺术教育、图书馆、文化管理等各个领域[②]。

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进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两岸经贸关系日趋密切，两岸关系呈现良性互动，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驱动力日益突显。据统计2009年，经文化部批准的两岸文化交流项目多达千余项，与2008年相比增长40%，突破1万余人次，同比增长70%[③]。2009年7月，一改以往仅仅从属、服务于经济议题，第一次将两岸文化交流正式列为国共论坛的首要议题，这标志两岸把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放到极其重要位置，发挥其为经济与政治搭桥的作用，丰富了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内涵，论坛就两岸文教交流达成了6个方面共29项“共同建议”，两岸文化交流进入到了枝繁叶茂阶段。

从两岸文化交流的历程可以看出，两岸文化交流始终是“两岸交流中最活跃、最富于影响的一个方面”[④]。即使两岸政治关系紧张时期，两岸文化交流也没有停止过。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走向深入，两岸文化交流领域稳步拓宽，交流层级不断提升，交流规模日益扩大，交流成效逐步显现，两岸文化交流良性互动模式已经建立。

---

①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耀华和福建群众艺术馆研究员刘春曙。见《文化亲缘与两岸关系：以闽台为中心的考察》第309页，刘登翰主编，九州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② 新华网：《文化部：两岸文化交流20年来不断深化发展》，2008年5月19日。

③ 中广网：《文化部盘点今年两岸文化交流：项目逾千、人次破万》，2009年12月31日。

④ 华夏经纬网：孙亚夫在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05年10月13日。

二、两岸文化交流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两岸文化交流是拉近两岸认知距离消除隔阂的推手，是沟通两岸子孙民族感情的纽带和桥梁[①]。但由于两岸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加上长期分离与对峙，导致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对台湾知之甚少，台湾对大陆也不甚了解，误解分歧由此产生，虽“文化传统有相通的一面[②]”，但彼此的认知与各自定位相去甚远，“造成‘大陆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对立[③]”。

1. 两岸文化的认知与定位

大陆方面一直以来，以身处中华文化发源地为荣，视大陆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唯一代表，对台湾文化的认识则停留在其是大陆文化南移台湾的分支的范畴。2008 年底，胡锦涛总书记“12·31”讲话指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这一论述明确界定了台湾文化的定位，表明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一样同属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台湾文化对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台湾文化才是中华文化唯一传承，认为大陆历经“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华文化的精髓摧残殆尽。经过李登辉、陈水扁近 20 年推动“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岛内强调台湾文化的本土性和多元性，认为中华文化只是其所谓“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马英九上台后，既坚持台湾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同时也强调两岸对中华文化的共同传承。2009 年 6 月，马英九在台湾创意产业圆桌论坛闭幕时指出：“我们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它融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有非常多值得大陆借鉴的地方。而大陆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新兴的文化艺术市场，也是值得台湾去开拓的新天地”。

2. 两岸文化交流政策与实践的互动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演变与两岸文化交流政策呈现互动关系。大陆方面

① 中国网：《从文化交流角度思考两岸之前瞻》，黄筱芗，2001 年 8 月 10 日。
② 同①。
③ 同①。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目标出发，自1979年起主动调整对台政策，积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一直以来，积极主张进行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情感和共识，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与时俱进地繁荣和发展中华文化，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软实力。

为应对两岸日益热络的民间文化交流，台湾方面不得不逐步松动文化交流政策，使得台湾方面的两岸文化交流政策主张呈现被动性和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在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促进下，开放两岸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在交流中始终受到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影响，甚至坚持敌对立场，阻碍、割裂两岸文化联系与交流。

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后，两岸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两岸共同积极推动的新阶段，并达成多项共识，两岸文化交流政策呈现良性互动局面。

3. 两岸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尽管两岸文化交流取得丰硕成果，但与两岸人民对文化交流的现实需求及其发展潜力相比，仍有相当距离。除了两岸文化观存在差异外，实际交流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交流的内容和交流合作渠道仍受到岛内政治的影响而未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双向畅通，大陆学生入岛内学习、大陆学历的承认问题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尚未建立，不利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有序发展；两岸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如汉字辨识的繁简之分，用词表述上的不同含义等等给两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增添了诸多不便。

这些问题与差异的形成，有两岸长期政治对立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也不乏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人为割裂，这需要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以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为核心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两岸文化交流发展势不可挡。两岸的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两岸认识彼此过去历史、成长的社会背景、社会生活习俗，而且有益于了解彼此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只有在彼此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真诚沟通与交流，才能有助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1.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与发展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核心

两岸文化交流进入到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阶段后，交流的内容和范围已经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两岸社会的各个角落，两岸文化交流越来越受到两岸社会的高度重视。从交流的内容上看，中华文化作为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家园，发挥着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重要纽带的作用，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始终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核心。胡锦涛总书记在“12·31”讲话中指出：“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马英九先生在2010年元旦讲话中也提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分享与传承共同的血缘、语文、历史与文化，但海峡两岸隔海分治迄今已经60年，期间各自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经验有很大的不同，确实需要一段长时间的交往来相互了解。”两岸高层对于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和发展形成的共识，为两岸推动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政策引领，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谊则是两岸文化交流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历史实践证明，不管两岸政治关系如何起伏，两岸文化亲缘无法磨灭，两岸文化交流无法中断，它不会受到种种外部环境和人为因素而改变，这不仅体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更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巨大的包容性，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为了共同维系和发展中华文化的血脉，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两岸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反对“文化台独”；二是充分利用两岸文化互补性，两岸共同继承、弘扬传统中华文化；三是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两岸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创新；四是深入开发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两岸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

2. 两岸青年要做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生力军

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不仅需要两岸经贸合作，更要搭建两岸文化交流这一条“沟通的桥”，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使命，需要“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智慧、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毅力、共同的努力”①。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弘扬，两岸青年责无旁贷。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胡锦涛总书记在“12·31”讲话中强

① 海峡之声网：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在北京接受“海峡之声”记者采访。

调："尤其要加强两岸青少年交流，不断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蓬勃活力。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愿意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新形势下，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潜力，也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时也指出："发扬中华文化是两岸的共同责任，双方应该以此为基础，在教育、学术、科技、体育、艺术、青少年等各领域，推进交流整合的深度和广度。两岸各界可就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展开探讨，建立共识。"未来，两岸青年应当发挥自身优势，作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充当两岸文化交流的使者，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增进彼此了解和认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3. 大力推动两岸文化交流迈向机制化

两岸文化交流要取得成果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化不仅是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日益深化的两岸交流合作大势所趋。实现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进程后，两岸文化交流机制的构建将提上议事日程。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在第五届经贸文化论坛上提出5点意见[①]，其中最后一点"建立两岸文化教育合作机制"最重要，也最具关键意义。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机制化，两岸当局要达成文化交流的共识，签署文化交流协议，克服浅层次、随遇性的交流，提升两岸文化交流的品质与层次；推动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建立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秩序，实现两岸文化交流正常化。所谓文化交流制度化就是要推动两岸建立更为密切、经常性和规范性的联系与往来机制[②]。为此，一是加强两岸文化单位的互动合作，举办系列性、品牌性文化交流活动；二是有组织地开展两岸地方性文化交流，体现中华文化的地域特色；三是开展两岸学术研究机构、文化资产保护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四是推动两岸文化团体、文化经纪机构建立固定的合作关系，有规划地开展两岸表演艺术交流；五是开展两岸文化

① 维护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传承，加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推进和演化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增强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增添两岸关系的活力；协商签订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建立两岸文化教育合作机制。

② 中广网：《构建两岸文化交流新格局》，萧夏勇，2009年7月10日。

产业的互补合作，共同丰富中华文化内涵。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和思路之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英津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议题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以及两岸和平架构的建立，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议题都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而制度层面的东西属于硬性的，其背后尚要靠理念、文化、思想等软机制来支撑，否则，硬制度难以建立，即使硬制度建立起来了，也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所以，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注重文化因素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如1905年至1945年日本对“台湾”的文化统治，二战期间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和文化统治。只有在深层次的思想上、文化上所建立起来的统治或联系，才是最稳固的、最永久的统治或联系。因此说，两岸文化交流是着眼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长远规划的基础性工程。

一、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

（一）增进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的重要渠道

以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的交流为个案。目前，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互派学生。自2005年至2009年，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交流学生共20人，他们初来大陆时的印象和离开大陆时的印象明显不同，离开大陆前，绝大多数都认为“台独”不可能，对以前被妖魔化的大陆有了新的认识，进而赞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些表明，两岸文化交流在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重要途径

李登辉执政12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陈水扁执政的8年，对整个一代

台湾人推行“台独化”教育。目前这一代人成长为台湾的新生代力量，需要我们通过两岸的文化交流来慢慢化解隔阂。这便决定了两岸文化交流可谓任重而道远，现在仅仅是交流的开始。两岸文化交流担负着纠正台湾年轻人对大陆所抱偏见的任务。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乃至最后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大陆方面不能到台湾去进行教育，只能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逐步进行。

（三）培养两岸人民感情的重要方式

有台湾学者说，马英九的大陆政策是：“只同居，不结婚”。对于我们来讲，不管台湾当局现在是否要与大陆结婚，先同居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选择。通过同居，培养感情，把“生米做成熟饭”，最后再结婚。同居阶段，是两岸感情的培养阶段；感情的培养不能靠硬性手段，而是要靠思想、文化、价值、意识的交流和融合等软性手段。所以，两岸的文化交流在当前两岸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任务。

（四）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两岸统一来说，文化交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两岸隔阂半个多世纪，造成了两岸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很大；但两岸文化的差异和观念的差异，需要时间和沟通来抹平。承认而不是无视这些差异，是今后两岸进一步融合的基础。差异呼唤沟通，隔阂需要理解。两岸文化交流是促进两岸统一的手段和重要方式，是联系两岸的纽带。

二、扩大两岸文化交流的思路

2009 年 12 月中下旬陈云林访台时，青天白日旗被悬挂得漫天飞。事实上，绿营人士平日很讨厌该旗帜，但在这个时候也支持悬挂青天白日旗，其隐含的政治意义是：面对台湾当局“主权式微”的现象，他们要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主体性”。可见，蓝、绿两大阵营在这个问题上有合流的可能性。为防止其所谓的“主权”遭到侵蚀，台湾方面或许会用一些政治符号来增强其“主权国家”的形象，或许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来抵制两岸的文化交流。

对于大陆来说，怎么能不受干扰地、持续地推进两岸文化交流，是一个

大问题。但是，大陆方面对于如何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也似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如何进一步扩大两岸的文化交流，结合两岸的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政治家的眼光审视两岸文化交流

考察历史上西德在面对东德所极力推动的分离主义“划界政策”，西德不断地加强和推进双方人民的各项互动与交流，以维护两德人民对于德意志民族的认同。为了维护两德在社会文化上的密切互动交流，西德政府与人民甚至不惜牺牲经济上的利益，以换取东德政府的合作与支持。例如，从1987年9月1日起，把发给每个到西德旅行、探亲的东德人的“欢迎金”由30马克提高到100马克，东德人在西德乘火车减价50%，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出文娱场所，不是免费就是优惠。东德虽担心扩大人员往来会给它带来消极影响，但又希望从西德尽可能获得经济好处，因此在人员往来问题上总的是不断有所放松，如1982年2月颁布“在紧急家庭事务情况下”到西德旅行的条例，1989年4月起又允许夫妻可以同往西德探访旁系亲属。从1982年到1987年的五年间，由西德到东德探亲访友的人总计达2000多万，由东德到西德观光游览的人也达1200多万，体现出两德关系的“特殊性”。[①] 两德在社会文化上这种密切的互动交流方式，不仅解决了分裂双方人民之间人道上的问题，而且增进了双方人民的了解，更有力地维护了两德人民对于整个德意志民族情感的认同，为日后德国的统一奠定了最深层的基础。[②] 德国统一前，西德对东德付出的高昂代价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付出经济代价总比战争的代价要小得多。

政治家不应过分考虑交流费用。政治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就像我国的西部大开发，经济学家们普遍反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西部大开发不划算；但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不这么看，这是政治问题，不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其效益的。其效益也不一定在当前，或许“利在后世”、“功在千秋”。这才是政治家的风范。

① 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5页。

② 参见张五岳著：《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378页。

（二）交流的渠道需要拓宽

目前两岸的文化交流主要停留在两岸智囊和学生交换项目上，前者主要起着沟通、传递信息的作用；后者主要起到扩大学生视野的作用。目前缺乏青年学者和高年级博士层次的交流，今后需要建立这样的交流项目。可以考虑设立“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对于有两岸交流的学校和项目予以经费支持和资助。并且要建立专款专用制度，以防止主管领导将交流款项挪作他用。这些事务的解决需要大陆官方出面协调；否则，单靠民间推动，则力度不够。

（三）交流的人员需要扩大

从中国人民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的交流来看，来往人员大致是固定的，总是这么些人在两岸之间来回访问，其他人很难参与进来。这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应在这一种交流管道的基础上，如何想办法使那些没有来过大陆的人，来大陆看看，使他们对大陆有新的认识，这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与最终的和平统一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适度的糊涂或许更聪明

目前两岸关系在表面上是维持现状，但事实上是在向统一的方向上发展。当这个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台湾方面会采取抵制的态度，但这是本能的、不自觉的抵抗，即使目前也有台湾人士对于“主权式微”现象表示出过分的忧虑，认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种判断和认知反映到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态度上，认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是大陆实施文化统一的重要方式，于是对两岸文化交流采取消极的态度和做法。对此，我们不要作出一一对应式的反应，适度“糊涂”可能更聪明。台湾当局有时触及一些敏感话题，或许是对岛内有所交代而为。例如，马英九在公开场合谈到两岸关系问题时，通常是泛泛而谈，并不直接指名道姓，却让人一眼就看出是意有所指。这种“春秋笔法”不至于让大陆感到不快，又表达了台湾方面想说的话，也让马英九对岛内有所交代而减轻些压力。否则，人们又开始骂他“马区长”了。如果因此而使他丧失了选票，对大陆也是不利的。联想到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对于人权问题的谈话也是这样。不提，没法向国内民众交代，所以，奥巴马在公开场合谈到人权问题时，总是泛泛而谈。这

既不让中国感到不快，也表达了美方想说的话，也让奥巴马回国后有所交代。

因此，我们不必太在意台湾当局的有些反应，有时“糊涂”一点，实质上是更聪明的表现。不要因为马英九说了一句什么话，就开始琢磨他的大陆政策是否要有变化？有时，太敏感了反而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当然，我们的糊涂应有原则、有底线，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糊涂的事宜我们应该作出灵敏的反应。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对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几点看法

全国台湾研究会　严　峻

自2009年7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首次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作为论坛主题以来，两岸各界尤其是文化界人士对此展开热烈讨论。那么，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意义何在，应该如何推动，笔者就此略抒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意义，依笔者观点，可以从由低而高三个层次看：

从第一层次看，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两岸开放交往30年来，经贸交流合作无疑是两岸各项交流合作活动的主流，其对两岸关系发展作用显著。这段时间，两岸也进行过相关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但相比而言，规模和影响都较小。究其原因，除了过去岛内“台独”主政者刻意阻挠两岸文化交流外，两岸确也有些人曾存在这样的思维误区，他们认为两岸进行经贸交流合作才是实在的，文化交流较虚，偶尔做做可以，但大力推动似乎不值，认为这对改善民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其实不然，两岸经贸交流合作这些年来之所以发展较顺利，除了两岸经济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外，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到大陆经商没有什么语言、文化障碍，他们能准较确地理解大陆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这对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助益甚多。而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有助于台商进一步了解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化的大陆人文环境和商业文化，这对台资企业在大陆做大做深不无裨益。随着台湾方面对陆资入岛的逐步开放，大陆企业也需要进一步了解台湾的社会人文环境。再者，文化合作本身就能产生商机，本身就能成为一个产业。以首届“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会”为例，会

上共达成69个签约项目，金额高达58亿元人民币。可以说，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已经逐步拓展到文化旅游、影视产业、出版发行、网络动漫等各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潜藏着可观的经济增长点。

从更高一个层次看，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大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离不开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但仅靠经济纽带，两岸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不可能永远不遇波折，况且，既便两岸经济合作关系势头良好，也不能保证两岸关系大局就一定朝良性方向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一些民调数据值得警觉：为什么台湾从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中获利颇丰，岛内民众在统“独”倾向上却没有朝统的方向靠拢？这里面原因众多，但两岸交流相对重物质轻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台湾学者张亚中认为“两岸关系物质化固然有助于两岸良性互动，但是并不必然能够加强两岸认同的巩固，有时可能反而会加深两岸认同的分歧”。而两岸关系要和平发展，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民众心理认同。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最起码能起到三个作用：一是能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两岸开放交往已有经年，但互动较多的主要集中在商界人士及特定的学者专家，基层民众对对岸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大力开展两岸文化交流，用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扩大彼此了解，有利于消除一些人原有的误解与敌意；二是能加深两岸人民的情感，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中国人重人情，尚礼仪，形式多样的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又何尝不是两岸间亲情温情的一次次递送？三是能增强两岸人民的民族认同。两岸本是同根生，相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将因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不断推动被放大，进而相融。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有利于增强两岸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若站在再高一点的层次展望未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有利于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12月31日讲话中指出“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而且以较快速度继续增长。然而中国的软实力有待加强，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诚如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所言“中华文化曾造就一个泱泱大国”，现在“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我们只有让世界真正了解并赞赏中华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大陆与台湾是世界华人最主要的两个聚集区，两岸有责任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为民族复兴共同

献力。

二

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十分重要，那么，如何推动？笔者认为：

其一，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在态度上既要有包容性，求同存异，又要强调、突出中华文化这一主干。要交流，是因为有所不同；要合作，是因为存在互补。所以，承认两岸文化有差异是正常的，没什么大惊小怪。关键是两岸对这种差异要彼此包容。一方面，大陆应体认台湾自1895年后暂离祖国母体的现实，看到台湾文化有异于大陆的特色；另一方面，台湾方面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化制度“现代”、“民主”自诩，对大陆的制度文化动辄斥之以“落伍”等蔑视性语言。马英九有一段话讲得较中肯，“我们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它融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有非常多值得大陆借鉴的地方。而大陆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新兴的文化艺术市场，也是值得台湾去开拓的新天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岛内有些人认为，台湾文化除了包含中华文化，还包含日本文化、马来文化，甚至还有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文化因素，中华文化在其中并不占主体地位。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应该说，台湾文化的主体就是中华文化。两岸在文化交流中，应该突出中华文化在两岸文化领域的主体地位和主干作用。

其二，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在方式、内容上要丰富多样，贴近民众生活。首先，两岸既要多举办宏观性的相对务虚的论坛、研讨会，也要多开展各式各样操作性强的具体合作项目。务虚研讨能从一个高度宏观规划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发展方向，挖掘一些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合作理论，对培植两岸成熟、理性的人文素养十分重要；而一些具体合作项目，如两岸共同进行影视作品制作、编撰中华文化词典等，由于其社会现实性强，更能为两岸民众认知、感受。其次，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学、曲艺等传统的文化概念，而应不断扩展两岸文化合作的内涵、范畴。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出来的各种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文学宗教艺术是文化，科学技术也是文化。两岸可以在知识产权（台湾称为智慧产权）领域扩大交流与合作，将相关文明成果尽快服务于两岸民众。最后，要鼓励两岸各行业多层次地参与文化交流合作。两岸有关方面对两岸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要进一步放宽

限制，相关审批手续应进一步简化，以鼓励更多两岸的社团及个人参与到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中。

其三，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要有一个长远、整体规划。两岸应就文化交流合作的长远目标作整体性思考与协商。笔者个人以为，这种目标应该是两岸共同建设一个融古典中国文化与现在中国文明为一体、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兼容并包世界各先进文明成果的“新中华文化”，建立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新精神家园”。这种新文化、新精神不仅应有中国传统“仁义”、“兼爱”、“和谐”、“济世”思想，也要有现代“和平”、“民主”、“理性”、“绿色”内涵。为此，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要从临时性、偶发性逐步走向机制化、规范化，最终在两岸建成一个独具东方理性魅力的公民社会。

三

笔者想重点谈谈正视台湾中南部的文化特点，大力加强闽台文化交流。台湾中南部民众以闽南移民的后代居多，其文化带有鲜明的福佬（闽南）特色。其语言与目前两岸的“官话”（大陆称“普通话”，台湾称“国语”）在发音上乃至一些词语用法上存在差异，其民俗也与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文化表征容易让台湾一些“本省人”在心理上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产生隔阂，加上有些基层民众对两岸文化历史的知识不一定掌握全面，他们易产生“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错觉。这种文化心理也成为岛内“台独”势力存在的重要社会基础。

事实上，福佬文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这不仅见诸史书记载，而且活的证据比比皆是。笔者童年在闽南古城漳州度过，长大后发现，我所遇到的台湾“本省人”的发音，与漳州话几乎一样，可以说，作为漳州人的我听台湾人讲闽南语，比听同是闽南人的泉州人讲话还省劲。再一细想，更发现自己日常讲的闽南语竟是中国古语的活化石。例如我们至今还称大的锅为“鼎”；再如，“行走”在古汉语中，“行”表示一般的走路，“走”表示“快步跑”，这与现代汉语含义不同，但闽南语“行”、“走”的意涵与古汉语完全相同；还有，一些唐诗用现代汉语读已经无法押韵，但用闽南语读则完全押韵……笔者举这些例子，只是希望台湾中南部的民众，尤其是从未到过大陆的民众到闽南来走走，他们会发现，这里的语言、风俗是何等熟悉！“宾至如归”、“家的感觉”将完全呈现！笔者认为，这种实地考察的闽台文

化交流，对台湾中南部民众心理的影响将远胜过任何抽象的文宣。

“台独”是两岸和平发展最大的威胁，所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则是“台独”势力用以破坏两岸和平发展最大的借口。闽台文化交流合作的开展及深入，将使越来越多的台湾基层民众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与对岸那群讲着同样的话，过着同样的民俗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自己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比现在多数中国人保留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中国人。这种“两岸一家亲”的感觉的获得，不需要对高深理论知识的接受，也不存在对影视作品表现场景的怀疑，一切只需要亲身感受。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追求永久和平，是理性的最高目标，也是一种道德义务”。而理性的培养、道德的树立，都不离开文化教育的浇灌。润物无声，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也许不像两岸政治对话那么轰动，也不像两岸经贸往来那样收效快速，但它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两岸人民的心田，这正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所在。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两岸文化交流面临历史机遇

全国台湾研究会　赵会可

在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时期，两岸文化交流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切实推进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一、时代赋予两岸文化交流新的使命

60年来，文化交流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前30年（1949至1979年），文化交流是联络两岸的精神纽带。当时处于军事对峙与相互隔绝状态，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少之又少，但文学、文字、艺术、考古、文博等领域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流。当时还没有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分野，更多的是强调中华文化，两岸当局竞相声称是中华文化的唯一代表者。台湾各种贯以“中华文化”的协会空前繁荣，反映的就是当局争取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心态。在这段时期，中华文化传薪续火，是隔绝和对峙状态下联络两岸不走向完全分裂的重要精神纽带。

第二阶段（1979至1991年），文化交流是突破政治阻隔的重要力量。其时国际和两岸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大陆对台政策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变为主张和平统一，推动“三通四流”。大陆出国人员能够与台湾留学人员直接交流，拥有海外国籍的台湾人可以自由访问大陆，通过讲学、座谈、考察、参观等形式了解两岸情况，成为担纲两岸交流的使者。岛内知识界、普通民众特别是大陆籍老兵军眷出现了“思乡热”、“思亲热”和“寻根热”，给台当局造成了很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首先解禁政治敏感性不强的文化交流，促成两岸文学、艺术、宗教、音乐等方面的自由传播。1986年10月，台当局宣布自1987年底起，允许台湾居民经第三

地赴大陆探亲，两岸各项人员和文化交流在更大范围内全面展开。1989 年 5 月，台湾宜兰县南方澳南天宫组织 240 人搭乘 20 艘渔船，直航湄洲岛进香，成为两岸隔绝之后第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民间直航。台湾当局被迫开放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宗教直航”，这为后来的“小三通”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1992 年至今），文化交流发挥着遏制“文化台独”的作用。“国统纲领”出台后，李登辉露出另一张嘴脸，开始推行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的“文化台独”政策，阻挠两岸关系发展。陈水扁更是变本加厉，拓展“台湾主体意识”，建立一整套“台独”论述，形塑所谓的台湾“国家认同”，妄图割断两岸民众的精神纽带。上述活动受到岛内有识之士的抵制和批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深植于两岸人民心中，渗透在日常生活之内，激发了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成为驱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文化台独”、遏制“法理台独”的精神支柱。

在新形势下，文化交流的作用与功能也应该与时俱进。笔者认为，除前述遏制“文化台独”之外，文化交流的新使命还应该包括：彻底清除“台独”思潮的文化和心理土壤，重塑两岸共同的文化价值、国家认同和民族观念，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共同的精神家园，实现两岸水乳交融、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景。

二、两岸文化交流跃上新的高度

两岸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和规模，可从 2009 年重大文化事件来管窥。2009 年 2 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到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访，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回访，两岸故宫院长实现历史性互访。10 月，系出同源的两岸故宫首次合办“雍正文物大展”，来自两岸故宫的藏品实现了相隔 60 载的重聚。曾经颠沛流离的故宫文物，记载了国家、民族一段历史往事，经受了海峡两岸一甲子的隔离，也见证了两岸悲欢离合的历史。正因此，这次期盼已久的团聚受到了两岸同胞乃至世界文化圈的高度关注。

7 月，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携新作《陪我看电视》登上台北舞台。这部几乎全部起用大陆演员、反映大陆 30 年社会沧桑巨变的话剧，受到了台湾观众的欢迎和文艺界的好评。“讲大陆的故事给台湾人听，讲台湾的故事给大陆人听，可以一样的轰动。”赖声川说，“如果说之前是‘你来

我往’，那么现在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形容两岸文化交流，一点也不为过。”

11月，第4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大陆演员李冰冰凭借在《风声》中的优异表现，获得最佳女主角奖，而该片的导演有两位，分别是来自台北的陈国富和来自大陆的高群书。这部票房一路飚红的影片，还集合两岸其他优秀演员。在金马奖评选中，另一部由大陆导演执导、有多位台湾演员参演的《疯狂的赛车》，也和《风声》一样获得多项提名并摘取奖项。在去年的金马奖上，张涵予凭借《集结号》荣获金马奖影帝，而该片描述的是国共内战中的惨烈景象。金马奖，以金门、马祖两个对台前线命名的奖项，却突出这么多的大陆元素和两岸元素，这在过去从未出现过。

其他标志性文化交流事件，还包括：两岸共同举办的“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成为两岸交流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两岸城市交流和文化机构合作日益深入，上海与台北首次在对方城市相互举办“城市艺术节”；两岸美术馆首次联合举办“海峡两岸双年展”；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大型舞蹈《千手观音》在台北听障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出，向遭遇“八八水灾”的台湾民众传递了大陆同胞的爱心和祝福。“情系”系列两岸文化联谊活动、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两岸文博会、海峡两岸合唱节、“妈祖之光”大型综艺晚会等活动精彩纷呈。两岸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以及青少年文化交流也更为活跃。两岸大学校长论坛、两岸青年联欢节、沪台中学生迎世博千人歌会、京鲁台万名师生祭孔大典、大陆体操奥运金牌选手赴台表演、首次航行台湾海峡的第一届帆船赛、首次厦金海域横渡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谱写新的和谐乐章。

总结起来，两岸文化交流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快速发展，空前浩大。据统计，2009年仅文化部批准的两岸文化交流项目即多达1000余项，与上一年相比增长达四成，人员突破10000人次，同比增长达七成。两岸文化交流规模扩大、层次提高，影响空前广泛。

二是双向流动，大陆渐居主导地位。30年前，大陆所谓的流行乐坛，其实就是港台乐坛。20年前，台湾在影视剧领域对大陆长期保持顺差，琼瑶剧在大陆电视八点档占据绝对优势，但现在已难见台产电视剧的身影，大陆产电视节目已攻城略地，占据台湾电视八点档。电影领域，大陆（含港澳）已成霸主，在演员、资金、基地、市场、营销方面享有绝对优势。台

湾电影江河日下，只是在导演方面尚存一席之地。流行音乐领域，台湾艺人仍是大陆演唱会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大陆艺人已占有绝对优势，一些公司的“造星”能力甚至超过了港台公司，比如超女、快男。

三是思想渐趋开放，已能突破一定政治禁忌。大陆歌手、现役军人陈思思突破民进党的阻挠，成功登陆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民进党打出“解放军公然登台美女牌突破我防线”的旗号，但无法阻挠；与日据时期经历有关的《海角七号》，也在大陆公开上演。这表明两岸当局对文化交流的政治接受度都在提高。

三、两岸文化交流面临历史机遇

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代，文化交流也面临着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一是文化交流受到两岸的政策支持。大陆方面，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12月31日发表的关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中指出：“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主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台湾方面，马英九2009年1月在“文化创意产业圆桌论坛”上表示，在经济不景气之际，两岸未来若能有更多文化交流，将是两岸迈向和平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6月，马又明确指示，未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将会纳入两岸交流的议题。“现在，两岸的开放，让华文市场逐步成形，台湾文化因此有更大的开展空间。如果大陆逐步开放影视出版等文化市场，让两岸与亚洲华人形成一个‘大华语市场’，台湾的文化创意，就有更大的腹地，来养成更好的作家、艺术家、文化人与创意家。”“我们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保留了完整而丰富的中华文化传统，从人文精神到生活美学，它融合古老的涵养与现代的创新，有非常多值得大陆借鉴的地方。而大陆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新兴的文化艺术市场，也是值得台湾去开拓的新天地”。争议多年的采认大陆学历和陆生赴台政策已经上路，教育、出版、学术方面的交流合作范围将更为广阔。

二是大陆文化产业进入井喷时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市场条件。随着大陆人均GDP的提高，人民对于文化的需求进入新的水平。以电影产业为例，在全球文化市场哀鸿遍野的大环境下，大陆2009年电影市场形势喜人，全

年电影票房高达62亿元人民币，10部影片票房过亿，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大文化市场之一。连美国影片《2012》，也以让大陆制造诺亚方舟的情节安排向大陆电影市场致敬示好。一些文化创意的品牌产品开始享有国际声誉和票房号召力，其所带来的“造星功能”成为大陆文化市场的主要吸引力（譬如张艺谋之与“谋女郎”、央视春晚之与刘谦）。大陆文化市场“捧谁谁红”的巨大影响力、对台湾文化界人士的吸引力，成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大陆对来自台湾的文化产品、偶像会天然的捧场、喜爱，对台湾的某些文化交流项目（如故宫、阿里山、日月潭等），有着特别的感情。春晚“小虎队”的高支持率即是这种喜爱的表现。这些都为更多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三是大陆一系列节庆盛事成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打造中华文化盛宴的绝佳时机。2008年的奥运会，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盛大展台。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更是让世人了解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绝好契机。台湾已铁定参加世博会，世博搭台、文化唱戏，两岸文化大交流、大发展、大合作，必然是今年两岸之间的重大文化事件之一。随着大陆国际影响力的提高，这类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的重大机会将愈来愈多。

四是大陆人员赴台、驻台将为两岸文化交流带上一个新的层次。以前大陆赴台人员少，驻台人员更是少之又少。随着两岸两会12个协议的签署，大陆人民赴台旅游、投资、求学、研究、依亲长驻甚至长期生活将会越来越多。这为大陆入岛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契机和人员条件。随着更多大陆企业集团布局台湾，一些长期关注文化的大企业如保利集团、民生银行等，将会把中华文化带入岛内，成为推动文化交流的先锋。

四、增进两岸文化交流实效的几点建议

一是明确根本目标。两岸文化交流不是为交流而交流，而是要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塑造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氛围和共同的国家民族意识，强化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交流中的纽带作用，逐步消除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文化政策的恶劣影响，使岛内民众逐步由文化认同过渡到民族和国家认同。与此目标相悖的交流，譬如宣扬皇民意识、宣扬台湾文化独特性的文化产品，不应该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纳入两岸官方交流之列。

二是建立文化交流的基地和平台。平台可以是论坛、艺术节、文化产业

博览会，也可以是旅游节、寻根节、民俗节、宗教活动节，还可以是文化旅游风景区、历史人文景区，最重要的是创出品牌、形成特色、提高知名度，使其能够辐射全国、带动两岸，吸引台湾人民参会、参展、参与，并使之规模化、规范化、效益化、长期化、可持续。福建省在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建设中先行一步，尝试建设海峡论坛、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莆田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等系列交流平台，但存在规模小、分散、以一省之力主办的不足。下一步应建立全国性的对台文化交流基地和平台，使之成为文化交流的龙头。

三是要培养文化交流的巨匠大腕。在文化产品极大丰富的时代，大腕所代表的是动员力和号召力。两岸文化能不能为对方人民所接受，与文化界大腕的影响力有极强的相关性。一个赵本山不但带起了一个本山传媒，而且让极具东北地方特色的二人转逐渐走向全国。如果没有杨丽萍，那么“七彩云南”也不会像现在那么火，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文化可能要多年之后才为国人所熟悉。同样，如果没有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可能昆曲将继续被列入涉危剧种。增进文化交流，需要的就是这种能把两岸百姓带进文化的大腕巨匠，而培养这样的文化巨匠，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另一方面，大腕也是票房保证。再好的文化交流项目，仅靠政策支持或政府拨款，是不能长久办下去的。大腕可以打造品牌，保证盈利，让交流项目在市场竞争中活下去，可持续、长期地增进两岸文化交流。

四是文化交流要向南移、向下沉。对台文化交流既要涵盖北部都会区人群，更要瞄准中南部、中低收入者、中老年，使其充分感受悠久中华文化的无比魅力，服膺、认同中华文化特有的价值观、民族观和国家观。

五是充分发掘文化中的两岸因素。上世纪 40 年代末的大迁徙是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牵动着数百万个家庭的命运。宏大的叙事背景、复杂的家国情怀、政府的强制隔离、家庭的悲欢离合、个人命运的急剧变迁和几十年挣扎沉浮等，都是文艺创作的最好题材，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资源，外国人很难理解，更不可能阐释和演绎，只有两岸中国人才能发掘和运用，并产生共鸣共振。近几年的电影和书籍已开始触及这类题材，并取得相当好的效果。比如描写乱世之中个人命运的电影《云水谣》、老兵家世和思根寻亲的《团圆》，以及从普通民众视角介绍台湾及两岸异同的《我们台湾这些年》、反思历史大迁徙给个人家国沧桑巨变的《大江大河一九四九》，都能够触动两岸人民心中最敏感的神经，也最能引起共鸣。文化交流中有要意识地发掘

这种中国人独有的资源，增进两岸人民的理解，拉近彼此距离。

参考文献

1. 杨毅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台声杂志，2009 年第 7 期。
2. 黄筱芗：从文化交流角度思考两岸之前瞻，中国网，2001 年 8 月 10 日。
3. 辛旗：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华夏网，2009 年 9 月 4 日。
4. 赵博、陈键兴：红杏枝头春意闹——2009 两岸文化交流回顾，新华网，2009 年 12 月 30 日。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3 月 24 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　杨为华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也强调，要“拓展文化教育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两岸文化交流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一、开展两岸文化交流的历史性机遇

国民党在岛内重新执政后，两岸在政治上有基本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趋势、大框架得以确定。在“九二共识”下，通过和平谈判、共同发展、共同遏制“台独”等开创两岸关系的新局面，是两岸的共同追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对两岸文化交流而言，是一种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岸文化交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即是国民党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同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与熏陶，都承载着振兴中华文化的重任。这是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本质区别。二是包括文化在内的两岸社会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两岸社会、经贸、人员往来等各方面交流的全面展开，带动了两岸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这既给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各种机会，也为我突破过去种种限制和困扰，全面推进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三是国民党利用“公权力”停止“去中国化”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中华文化传统教育。这些积极作为，也为两岸深化文化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二、中华文化对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1、中华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保证两岸人民密切相联的重要纽带。1949 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两岸开始进入军事对峙和人为隔离状态。但两岸 30 多年的隔绝并没有阻断两岸的联系，一旦两岸关系走向开放交流，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即迅速恢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不因一时一地的变化而变化。应该说，中华文化是联结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中国人的精神桥梁和纽带，这也就是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演变，两岸民众的中国认同、民族认同始终难以改变的根本原因。

2、中华文化蕴含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丰富智慧。一是文化交流作为联系两岸关系的重要纽带，成为推动台湾当局开放两岸交流的重要力量。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转移工作重心，并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倡议两岸尽早结束敌对状态，实现“三通”和开放各种交流；岛内知识界和民众也出现了“思乡热”、“思亲热”和“寻根热”。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首先在政治敏感性不强的文化领域进行开放，尤其是两岸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两岸推广。以此为开端，两岸各项交流全面展开。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这个“仁”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有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万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行而不相害”，也就是民胞物与的意识。中华文化也因此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给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3、中华文化及文化交流奠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两岸虽然经历了近 60 年的隔离，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不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成为两岸的共同认知。陈水扁执政 8 年，尽管采取各种方式限制两岸关系发展，并大肆推行“去中国化”和“台独”活动，但并没有取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已持久深藏于两岸人民心中，渗透在日常生活里，“台独”分子的扭曲和破坏根本无法得逞。而随着两岸经贸等各项交流尤其是社会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华文化将成为超越两岸政治之争尤其是意识形态之争、制度之争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和重要共识，并逐步固定下

来，未来即使民进党卷土重来，也难以改变。

三、两岸文化交流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1、文化认同与国家民族认同的统一问题。由于两岸长期分离，西方思潮冲击，特别是李登辉、陈水扁执政近20年的“台独化”教育影响，台湾社会逐步向西方靠拢，文化与国家民族认同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和混乱。一方面，“民主”、“自由”、“人权”成为岛内民众的核心价值，“竞选”、“投票”成为参政形式，“政党轮替”成为社会常态。另一方面，岛内民众的“本土意识”和“台湾主体意识”迅速上升，中华民族认同感不断下降。民调显示，2009年底，中国人认同比例已降到不足8%，赞成统一的仅为9.6%（包括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统一的），而支持“独立”的则上升到23.7%。同时，受陈水扁8年执政腐败无能的影响，岛内民众思想日趋现实，发展经济成为主流民意，对国家民族认同、两岸统一、中华民族复兴等重大政治问题的关注下降。而岛内民众文化认同与国家民族认同的严重分离倾向，使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迅速“新加坡化”。同时，岛内民众的“本土意识”、“台湾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相互交织在一起，又使这些意识与以追求统一为指向的中国意识形成对立与分歧。

2、国民党“本土化”与统一目标的模糊化问题。台湾社会在国民党执政下，“法理台独”、“文化台独”、“去中国化”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国民党对两岸统一目标的追求日趋模糊化。现在的国民党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国民党，他们思想上迎合“台湾主体意识”，回避统一，组织上基本完成了“本土化”改造。马英九所主张的“九二共识”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如出一辙，所坚持的“中华民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国”，而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所推行的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政策，目的是为了让台湾从大陆获利，谋求两岸长期“和平分立”。国民党两岸政策目标指向的模糊与混乱，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也影响了文化交流在促进两岸最终走向统一方面作用的发挥。

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几点建议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笔者认为，应以目标指向为牵引，来规划两岸文化交流的形式、内容和方法等。

1、用中华文化传统重塑台湾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要通过组织两岸人民共同祭祖，文化寻根，共度传统节日，申请世界非物质遗产，开展历史文化研讨会，共同开发历史文化景点，合拍历史文化体裁的影视作品等形式，营造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氛围和共同的国家民族意识，强化中华文化在两岸交流中的纽带作用，逐步消除民进党8年“去中国化”的恶劣影响。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共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岛内民众逐步由文化认同过渡到民族、国家认同。

2、规划两岸共同的文化愿景。规划的依据是胡主席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在依循并切实落实2005年“胡连会”“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基础上进行。目的是在超越两岸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基础上，通过共同的文化继承和塑造，来逐步弥合两岸在政治、经济、法制、民主等现实层面的分歧，最终实现两岸的文化统一，用中华文化统一中华、振兴中华。

3、实现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规范化。要在以往民间交流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两会”的功能，力争形成一些制度化、规范化的文化交流模式。确保未来无论岛内政局如何演变，文化交流都能持续发展。

4、采取各种方式推动两岸文化交流“遍地开花”。一是要不断创新推动文化交流的方式方法，通过官方推动和民间组织相结合，在两岸文化交流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全面铺开两岸文化交流；二是整合大陆各种资源，形成整体合力；三是对一些重点项目、重点课题，要全力推动，给予特殊政策、特殊支持。

5、加强两岸教育交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靠两岸的年轻人，而对年轻人的教育就显得异常重要。陈水扁执政时期通过教改，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大搞“去中国化”，给岛内年轻人的思想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因此，当前加强两岸教育交流应该首先推动共同编写教科书。基本考虑是：第一步，两岸教育界组织学者就历史、文化、语言、人文等课题进行交流研讨，出一批成果，形成共识。第二步，在

此基础上，就两岸现行教科书进行修订，对民进党上台以来扭曲历史、文化的做法进行修正，制止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第三步，时机成熟后，借用两岸相互承认学籍学历的机会，两岸共同编写教科书。

另外，还要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和建设，包括开展文化交流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加强从事涉台文化交流的干部素质培养，切实提高对台文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略论新台湾意识与两岸文化交流

——从新台湾意识的形成谈起

浙江台湾研究会　陈凌雄

新台湾意识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是台湾民众“中国认同”弱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两岸经济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但没有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中华文化是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创造的，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的重要载体。更好地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融合台湾民众中国情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认同淡化”源自两岸经济快速融合与民众心理距离落差的扩大

台湾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中华文化的共性，但同时又有其特殊性，如原住民文化、兼具移民特征的闽南与客家文化、包含殖民烙印的日本文化等。因国民党退台后长达50年的两岸隔离，造成两岸同胞的对立和敌意，也造就台湾民众特殊的“台湾意识”，这种意识在李登辉、陈水扁近20年刻意操弄炒作下，逐渐演化成“台独意识”，在影响两岸关系和台海稳定的同时，也造成“中国认同”的淡化。

经过30年两岸同胞的交流交往，两岸经济互补往来已是十分的广泛和深入。2005年后，大陆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有利于岛内民众福祉的政策，尤其是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三通”的全面实现，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然而，两岸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和人员的往来的进一步扩大，并没有缩小台湾民众对大陆、对中国认同感的差距，从几乎所有的民调结果或近几次国民党选举结果分析，甚至出现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仍在减弱的趋势，间接影响到大陆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效果，影响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笔者认为，产生此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交流通常从经济规律出发，企业以“逐利”为最优先考虑，较少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效应，经贸交流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主要集中在企业家和部分产业的员工，广大的中小企业、中南部民众和中等收入阶层并没有直接受益。相反，产业对接后部分产业上中下游企业都来大陆投资设厂，确实导致在台产业的萎缩，有些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失败的案例也被媒体扩大，成为舆论炒作的焦点，影响民众的感受。由此可见，经贸交流拉近了两岸的直接距离，虽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并不能影响到深层次的认同感和族群融合。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文化交流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过去几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大多以两岸经贸作为唯一重点，2009 年 7 月长沙论坛时，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成为了重点之一，这反映两岸同胞推动两岸关系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客观必然趋势。两岸经贸关系的深化和人员往来的频繁，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提供坚实的基础，其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同样是未来推进两岸文化交流难得而宝贵的养分。只有真正掌握台湾民众的心态，以文化交流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展开文化复兴和民族融合工程，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才有稳固坚实的基础。

二、新台湾意识形成的原因分析

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加剧了台湾民众对中国的疏离。在台湾，两蒋时期推行去共产党化，李登辉和陈水扁执行“去中国化”路线，即使到今天，仍有学者认为马英九实质推行脱离中国化政策，而大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在台湾客观存在的“中华民国治权”没有合理的对待，这些做法客观上让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产生模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演变出新的台湾意识。

新台湾意识的形成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条脉络去分析。文化渊源上，台湾文化既有 5 千年中华文化的基础，又受日本殖民文化和战后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原住民文化的沉淀；政治体制上，经历了 50 年代的威权高压统治后，台湾逐渐走上地方自治，反对运动随之高涨，直至解严、组党到全面直选，出现政党轮替，民众普遍感到人权、民主、法制和自由等价值的不断进步和实现；宗教信仰上，承袭中华民族宗教包容的优良传统，

既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一贯道，也有名目繁多的民间信仰，如观音、妈祖、土地爷、保生大帝等，可谓多元宗教并存，互相尊重，各自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产阶级出现后，很容易转化为一股社会公益行为，如慈济功德会等，成为民众引以为豪的中间力量；社会生活上，过去较为严重的族群、省籍矛盾，经过时间的洗礼和不断的通婚、语言同化及教育、就业机会的相对均等，逐渐融合，社会整体较为和谐；经济发展上，经历战后的贫困，较早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目前仍是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但与大陆的对比发生的根本逆转，从开始的看不起大陆，逐渐演变为惊讶于大陆的经济发展表现，感受到大陆经济发展带来竞争的压力，直至现在高度依赖于大陆经济的不甘与焦虑；国际空间方面，从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列为世界“五强”到被逐出联合国，“邦交国”更是逐渐减少，剩下20多个小国，经历了从荣耀到“屈辱”的衰落过程。以上几方面是台湾意识形成的基本脉络，这种心路历程所产生的综合效应非常复杂，整体来说，台湾民众对于“政治民主”、社会生活自在、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既感自豪，但对经济高度依赖大陆和国际空间狭小等深感委曲、愤怒、自卑和无奈，也对大陆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方式、教育文化素质及民主、法制的发展与台湾的不同而深感不适，这也是两岸经济和人员交流扩大与认同、统一之间产生落差的深层原因。

三、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能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在维系人类群体中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这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早已超越那种以生理本能为主要基础的生存状态，进入到一个以文化创造为生存基础的现代社会。因此，特定的文化作为凝聚社会族群的纽带，在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日常交往中都在发挥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海峡两岸同根同种，原无文化认同问题，生活在岛内的各族群同胞，都是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一分子。只是近几十年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认同淡化和新台湾意识的形成，企图将原本作为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很有特色的台湾文化人为地剥离出去，因此，

必须从中华文化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富多元的构成形态指出其荒谬性，这对于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有着重要意义。

这种意义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充分运用文化上的认同感、亲近感，不断增加共同语言，用文化上的悠久历史增进“存大同”，去消弭两岸过去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所造成的隔阂，从中华民族五千年岁月来看，两岸几十年的分治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从文化的高度着手，就能够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二是弘扬中华文化作为促进两岸关系的重要抓手，应该注意对于这几十年来文化发展的新成果的关注。肯定台湾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中所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拉近彼此距离。三是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关系的积极稳定发展，首先要争取那些坚守中华文化的智者贤哲，为他们从事文化交流提供各种便利，更好的发挥他们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但是，同时要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争取那些对于中华文化曾经有过错误认识，有过错误言行的人，促使他们转变文化立场，引导他们加入到弘扬中华文化的行列中来。四是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学者应该积极引导两岸民众学会相互肯定、相互欣赏，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只有树立这样的心态，两岸的心理距离才能不断拉近，各种隔阂才能逐步消除。

弘扬中华文化，通过两岸同胞的坚忍刻苦的努力，在文化的融合与集成之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为灿烂的文化，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发展做出我们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几点思考

（一）积极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六点意见”的精神，将两岸文化交流纳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战略中，即文化交流不仅为统一服务，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需要，立足长远，不拘近期成效。

（二）推动文化交流制度化，扩大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促进良性发展。文化交流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要产生实际效果，需要克服浅层次、随意性、功利性的问题，两岸当局要对两岸文化交流作出制度性安排，双方各成立高层级的文化交流委员会，统筹各项事务。

（三）以点带面，对口交流。台湾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而以大陆为主

体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同样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积淀，这是开展两岸文化交流的最佳条件。台湾文化组成中的闽南、客家、佛、道、儒、一贯道等都师源于大陆，基督、天主、伊斯兰等宗教及其他文化形式在大陆都有较广泛的基础，又如台湾的眷村文化所形成的独特魅力，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很有特色、很有意义的例子，如果两岸文化交流从点开始，以点带面，佛对佛、道对道，地方对地方，各个领域、层面、部门、民族都应积极参与，开展全方位的对口交流，同经济交流一样，两岸文化交流同样需要“积微成大，陟遐自迩”，从小处入手，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产生明显成效。

（四）加深了解，求同存异，互相吸取文化发展中的精华，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和养分。大陆应该高度重视台湾在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中获得的新质。这里既有荷兰、日本等国侵略的屈辱历史中夹带的外来文化合理内核的遗存，也有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明中进步因素的积累，更有大陆各地迁徙者带到到台湾的中华文明的沉淀，尤其是台湾文化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热情传播，这对于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冲击下对中华文化造成的损害，既是一个功莫大焉的补救，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承继和发展，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对中华文化的有益补充。而大陆在这30多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台湾的文化学者和广大台胞所不能忽视的，两岸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论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异化及其回归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胡文生

台湾本土化运动无疑是当代台湾社会文化变革的核心问题，它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但为何当代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会以否定和削弱作为台湾社会文化根基的中华文化传统为前提呢？这种违背会对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发展前景造成何种影响？如何化解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内在矛盾？这些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异化

本土化“localization”是一个在当代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它有着十分复杂的内涵。基本而言，可以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来进行界定。从文化层面而言是指被外来势力统治的社会或地域，要摆脱外来文化（主要指西方文化）的控制而确立本土社会在文化、精神等领域的独立地位。就政治层面而言则指此一社会或地域摆脱外来政治势力控制而在政治、行政、经济等方面实现自主的努力。另外，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开展，本土化还具有与“全球化”相对立的意义。

结合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有人根据台湾在近代独特的历史遭遇而将其本土化运动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日据时期（反日）——战后（反西化）——当代（反中国）（参见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学》月刊，1995 年 2 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与日据时期的本土化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在于“反日”的本土化运动是符合本土化运动的本质属性的、正面的运动，而“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则是异化的、不符合本土化运动本质属性的伪本土化

运动。其根本分歧点在于，台湾相对于日本诚然是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但台湾和中国则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台湾文化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事实不能改变，因此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本土化运动。当然，将台湾本土化运动划分为这么三个阶段，我们认为大致是合理的。下面我们结合台湾在近现代的特殊历史经历，叙述台湾本土化运动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

早期的台湾本土化运动肇始于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日本强行割占台湾，台湾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乙未反割台”斗争，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其中体现了台湾人民心中强烈的大中华意识。这种意识支持着台湾人民在整个日据时期继续进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这些斗争包括文化、政治、生活习俗等各个层面。总体而言，日据时期的台湾本土化运动是以反抗异族统治为核心的本土化运动，因此具有正面而积极的意义。

台湾光复后，台湾本土化运动有新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内台湾乡土文学的兴起。台湾乡土文学的兴起主要是对国民党忽略甚至压制台湾文化的特殊性的一种反动，它具有反威权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台湾乡土文学并不否认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事实。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在1964年4月创办了《台湾文艺》，他谈到他兴办《台湾文艺》的意图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他在《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一文中明确指出：“台湾文艺要根据台湾的特殊环境而产生一个个性，这个性又要合于中国的普遍性，同时具有世界的普遍性，才有价值可言”。可见，台湾乡土文学是在承认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共性的前提下，企图寻找台湾文学的个性，二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本质上说台湾乡土文学是一种乡土意识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台湾乡土文学获得了部分外省籍知识分子如徐复观等人的支持。

70年代末，随着乡土文学论战的白热化，台湾意识开始从中国意识中分裂出来，本省籍作家“几乎一夜之间就转向‘台独’那边”，著名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中国统一联盟发起人陈映真先生对于台湾文学领域的这种变化极为痛心。他说：“台湾的文学界转变成‘台独’的比例，连我都出乎意料”，“在70年代末期，有一场乡土文学论争，当时还信誓旦旦地说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一些台籍作家，也是一夕之间，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完全都站到‘台独’那一边。这是投机，是机会主义。”他认为，今天台湾的本土主义就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反中国主义”。（以上参见陈映

真《台湾的文化人需要反省》，载《南方周末》2004 年 3 月 18 日。）可见，70 年代台湾的本土化运动由于受到“台独”思潮的诱导，已经逐步转化为“台独”运动的组成部分。到了 80 年代后期，乡土文学论战逐步演化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论战。在这里，“台湾意识”已经由原先纯粹的乡土意识而转变为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政治认同了，“台湾意识”成为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一个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概念。至此，台湾本土化运动已经发生严重异化。

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异化发展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环境的复杂变迁息息相关。20 世纪 70 年代初，台湾遭受了退出联合国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风雨飘摇。为了重建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正当性，蒋经国启动了台湾本土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但随着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启动，岛内的反对势力趁势而起，而盘踞在美日等地的海外“台独”势力也蠢蠢欲动，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权。“美丽岛事件”爆发后，国民党与党外势力的矛盾空前激化。此后，本土化运动脱离国民党当局的控制而向“台独”运动急剧发展。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由于受到“台独”思潮的侵袭而发生严重异化，本土化运动被“台独”运动绑架，而成为落实“台独”实践的一个工具。

二、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内在矛盾

台湾本土化运动的这种异化发展，虽然一度喧嚣尘上，但却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层面上，台湾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台独”分裂主张的内在矛盾冲突。“台独”运动虽然寄生于台湾本土化运动之中而获得发展，但由于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本质属性难以改变，因此台湾本土化运动从逻辑上而言只能是强化其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回归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即是“中国化”的过程，这与“台独”理论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而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于台湾文化本质上是中国文化，因此彻底的“去中国化”既不可能，而且有害，很难想象彻底“去中国化”后的台湾文化还能剩下什么。这就决定任何文化领域鲁莽的“去中国化”只能是一种精神自戕，除了造成自身的精神分裂和痛苦之外终将一无所获。

其二，是意识形态层面上，“台湾意识”中“文化认同”和“政治认

同”分裂的内在矛盾与中华文化历史传统相违背。被政治异化后的“台湾意识”其实具有某种“国族认同”的意涵，但这个“台湾意识”无法克服其内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分裂的矛盾。“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大抵相当于中国历史上所谓“政统”和“道统”之别。在中国历史上，“政统”和“道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统一的，但也有相分离的时候，最为典型的就是明末清初。明清易代，满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大部分传统士人而言，“政统”与“道统”发生分裂，因此在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如明末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莫不以遗民自居，不愿身仕清朝。

这种“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分离而产生的痛苦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人身上同样有十分明显的反映。由于日本强行割占台湾，台湾人在政治认同上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转向日本，而在文化认同上他们仍然坚持中华文化，这种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断裂“引起台湾人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随着台湾的光复也即宣告解除。

但奇怪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兴起的“台湾意识”又企图将二者分裂，以达到“台独建国”的目的。但这除了造成台湾人民身份认同的混乱与痛苦之外，并不能有任何实际的效果。无论如何，台湾文化的根基和主体仍然是中华文化，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台独”势力为了其政治目的而企图虚构一个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文化”，并以此为基础确立“台独”的政治认同，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第三，是在政治层面上，“台独”分裂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存在着矛盾冲突。“台独”势力企图利用台湾历史上的悲情意识和“台湾人出头天”意识，来构建台湾的所谓主体性，并最终达到独立建国的目的。这一政治企图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相冲突的，对正在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是绝对难以容忍的。

因此，“台独”活动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历史层面都不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同情和体认。二者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无法调和的。就当今的世界形势而言，“台独”运动要突破现有的国际格局而获得独立无疑是不现实的。国际政治的现实及大陆反“台独”的坚定决心注定“台独”运动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总有坍塌的一天。

三、中华文化传统与当代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理性回归

以上所述当代台湾本土化所包含的三组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这是“台独”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台湾还在明郑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中华文化在岛上的主体地位，经过清代200多年的发展，中华文化更是在岛上生根开花，枝繁叶茂，台湾文化即中华文化，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日据时期，虽然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处心积虑地要改变台湾文化的本质属性，但遭到台湾人民的自觉抵制与反抗，并最终没有得逞。可见，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是无法改变的。

不仅如此，自晚明以来，台湾对于中华文化还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在明清易代之际，郑成功坚持抗清，并最终收复台湾，以台湾为抗清基地。在政治上，这是郑氏政权与清之间的对抗，其是非曲直可以探讨。但在文化上，郑成功吸引了一大批不愿受异族统治的明遗民纷纷归附，由于满清入关之初强迫汉人变易衣冠发式，被传统士人视为奇耻大辱。因此，郑成功抗清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当然，满清统治者后来也宣布接受汉人文化，郑成功抗清的文化意义也就有所淡化）。

在近代，台湾虽然沦为异族之手，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仍然很好的保存在台湾社会之中，并且是台湾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重要资源。台湾光复后，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两岸形成了长期的对峙分裂。在文化上，两岸也各自分途发展。中国近代三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一枝独秀，而台湾则为自由主义和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大陆经历文革等政治运动而对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台湾则由于避免了类似政治运动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保存更为完善。从这可以看出台湾对于保护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值得台湾人民加以珍视的。

可惜的是，在“台独”思潮的冲击下，台湾正在自我毁灭这种宝贵的文化价值。“台独”势力把中华文化看作是外来文化，看作所谓“本土文化”的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既是台湾的不幸，也是中华文化的不幸。台湾有其文化使命，台湾不仅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全中华民族的台湾。台湾的价值必须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去体现，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必须要

回归到其作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本质属性上来，而异化的台湾本土化只会造成台湾社会发展的灾难。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两岸军旅文化交流及路径探析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叶世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既需要两岸政党的努力和推动，也需要两岸人民的支持和促进，更需要两岸军队的协力维护和共同捍卫。结束两岸间的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共同建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是进一步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内容。对两岸关系而言，不管经济上交流有多么热，不管政治上接触多么频繁，只要军事上不能互信，就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善。军事是一个敏感的领域，两岸军事交流一旦启动，必将为两岸关系注入新的元素，从而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定坚实而可靠的基础。军事互信是两岸间一大难题，目前尚在探索之中，建立两岸互信机制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积累共识开始。两岸60年来的军旅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先生早期缔造黄埔军校重要思想形成的延伸。本文认为两岸的军旅文化交流敏感度相对较低，军旅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两岸军方交流，可以为两岸军事互信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两岸可以军旅文化方面交流为开端，由易入难，这既是推动两岸文化全面交流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有利导向。鉴于此，本文探讨了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的现状，及从其与建立军事互信的关系阐述军旅文化交流的意义以及实现军旅文化交流的路径选择。

一、现　状

两岸军旅文化一直处于隔绝状态。但时代在变，我们应当从两岸和平的角度来考虑两岸军旅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军旅文化交流应该也必须成为两岸共同的话题。陈水扁主政期间，由于其顽固推行“台独”，两岸军事交流因缺乏基础而难有进展。马英九上台后，为两岸军旅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提，也创造了氛围。由于两岸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不断减弱

两岸军事对峙态势，两岸关系有了很大缓和改善。在此种情况下，两岸加强军旅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近年来，两岸军旅文化交流增多，如海峡两岸百名将军书画展在深圳开办，两岸老将军共展出了两百余幅书画作品，书画展的主题是“赞和平、创和谐、促发展”。大陆方面作品超过了150幅，台湾将军作品达到了50多幅，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由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与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9月举行的海峡两岸老将军共同创作的《中华盛世和平图》，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60周年献上了一份代表全体中华儿女祈祷和平的时代厚礼。2008年4月上旬，两岸近百名退役将领，聚集轩辕黄帝故里——河南新郑，参加祭拜大典，联手挥毫颂和平、烛香赞统一，亲身体验炎黄子孙对共同始祖的崇敬之情。自2009年两岸37位退役将军在厦门参加了第一届“黄埔情·中评杯”高尔夫球邀请赛。2010年5月下旬，第二届“黄埔情·中评杯”高尔夫联谊又将举行。这种以球会友的联谊，延伸到更广泛层面，相信对两岸交流发展会起到更深远的意义。再如连续8年的“百名将军书画展”活动，动情融意，催人奋发，大大激发了中华儿女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有利地促进了两岸民间和平与合作的务实进程。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两岸退役将军交流逐步深入，军旅将领们高度的爱国意愿，深厚的民族情怀，凝聚了两岸将领的丰厚文化蕴含和非凡政治智慧。受到了两岸同胞的充分赞誉与大力支持。再有，陈思思2009年10月底在台北“国父剧场”举行的这场“美丽之路”台北演唱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她开启了军旅歌手赴台开唱的先河，将大陆的新民歌文化首次带入台湾市场，促进了两岸艺术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并为今后两岸的文化交流活动搭建起了一座艺术之桥。2010年4月初，台湾原“总政战部”主任许历农率23位退役将领访问北京，国防大学施以隆重仪队军礼，座谈期间涉台高层将领几乎全员到齐，接待规格之高前所未见，显示大陆推动两岸建立军事互信，从退役将领做起进入实质性阶段。访问团成员共8位退役上将、8位退役中将和7位退役少将，涵盖各军种，阵容空前。大陆释出两岸军界能搭起交流平台，以推动两岸军事互信的强烈讯息。[①] 两岸退役将领先行交流，创新性地开启了两岸民间军旅文化交流划时代的历史性先机，加强了两岸军队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外界舆论普遍看好，这不仅为两岸民间军旅文化交流架设了一座通向未

① 元乐义：《两岸退役将领交流 迈入实质对话》，中国时报

来的文化桥梁，也显示了两岸军旅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为未来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起到积极作用。

两岸军旅文化是一个母体在不同环境下发展出的两个子体。就目前情况而言，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相对滞后，与大陆以各种方式接待台湾退役将领的开放程度相比较，台湾方面相对滞后。但是，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使得两岸军旅文化交流也有了良好的开始，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若论两岸长远发展，不论其意义或重要性，其位阶不在两岸经贸合作之下。应着力加强军旅文化交流的循序全面发展，如从双方军事的视角感悟文化，以文化的角度解读军事，触摸两岸基层官兵的文化生态、文化内涵，或解析军事变革的文化背景，乃至探讨世界军事的文化渊源，建立权威军旅文化论坛，感悟军事人文精神等，都可成为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热点与内涵。这有助于累积两岸军方共识，也为两岸正式协商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问题奠定基础。

二、军旅文化交流与军事互信

军事互信机制，又称“信任建立措施”或“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简称 CBM），其主要功能在于消除军事活动中的秘密以降低彼此的敌意与威胁。广义的信任建立措施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宗教及意识形态等领域，指从整体上改善安全环境、缓和紧张局势及提高相互信任而采取的措施。近十年来，随着两岸关系发展演变，军事互信机制也在两岸政策的讨论中被越来越多地提及，促进军旅文化交流将是这个过程的必要部分。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能否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成为各界关注与期待的焦点。以建立军事互信为目标的军事交流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军事谈判，不同于经济、文化交流，其涉及的问题十分敏感且层次高、影响大。有道是：“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因此，可在两岸关系逐渐改善前提下，以军旅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步骤切入，循序渐进地推进，从这一意义上看，军旅文化交流是可运用的“信心建立措施”机制与方法，借由两岸军旅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感情，缓解紧张的对立关系，逐渐扫除价值冲突的障碍，结束两岸军队之间长达 60 年的相互疏远，必将减少误会、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培养合作习惯，缓和紧张局势。其意义在于：

首先，不仅有助于降低两岸敌意，增进感情，两岸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

感也将大大降低，减少因为误判、误解或误会所产生的不必要的军事冲突，进而维持台海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军旅文化交流增加将会给予两岸众多企业和商人巨大的安全感，为两岸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给两岸在各个方面上的进一步合作扫清障碍。其次，塑造和凝聚和平发展民意。一直以来，由于两岸处于敌对对峙状态，以及军方缺乏交流，相互疏离，这也给“台独”分子制造“大陆军事威胁论”及煽动民众仇视大陆情绪提供了借口。尤其是每逢重大选举，“台独”分子便开始操弄民粹，渲染“大陆军事威胁”，激化统“独”矛盾，煽动民众仇视大陆情绪，以骗取选民支持。两岸若能从军旅文化交流入手，逐步扩大交流，直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将使“台独”分子蛊惑人心的宣传丧失着力点，有助于塑造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①

总之，目前虽然两岸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但也无现实的军事冲突发生。尽管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任重而道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两岸已在此议题上展现出一定的诚意与善意，两岸的军旅文化交流与互动，以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和平发展的进程。在此情况下，在军旅文化上加强联系互动，联络感情，为建立军事信任机制奠定基础，将有力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军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但双方有着一些共同的基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两岸军人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民族大义之上。维护台海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也是两岸军人的共同责任。目前，围绕“和平发展”这个主题，两岸交流已经在政党、经贸、文化、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广泛展开，军事问题包括军旅文化也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领域。把两岸民间军旅文化交流提高到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高度来对待，也是两岸军人应当共同承担的历史重任。

三、路径选择

两岸军旅文化交流合作既然是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就不宜停留在发表意见的阶段，而应有切实的措施来推动，为此，本文提出以下若干思考：

① 邓允光：《专家详解两岸军事互信 突破僵局需有诚意与善意》，中国网 china. com. cn，2010 - 03 - 22

（一）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推动两岸军旅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以敦睦血亲为其切入起点，以健全人格为其坚固基础，以构建群体和谐为其根本目标。由此而衍生出公正、至诚、仁爱、孝悌、中庸、忠恕、刚明、俭约、信义等价值理念。[①] 中华民族文化源源不断植根在台湾，台湾军官升等必先考四书五经，这种文化精髓也深入台湾地区军人的价值观中。正所谓："百脉通流炎黄血，未曾相识已相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厚历史内涵是推动开展两岸民间军旅文化交流的社会基础和前提。在极为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中，充分蕴藏了"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谐共生"的意涵，而这个"三和精神"之相辅相成则构成了当前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基本理念，[②] 这些理念上升为军旅文化交流的时代诠释，是两岸军方开展文化互动与合作交流的深厚根基和共同操守。两岸理应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寻求两岸军旅文化的共性，增进对话，交流和理解。正确把握两岸务实交流的时代进程，是实现两岸民间军旅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也是两岸军方发展进程符合时代特征、走向和平合作的实际需要。

（二）拓展互动交流

两岸要开展多渠道、多方位、多形式的军旅文化交流与互动。不仅是两岸军旅文化机构、文化组织、文化人之间的交流，而且是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人与事之间的深入对话。两岸当局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支持军旅文化的交流与互访。如在两岸基层军官交流方面，从现役尉官层级开始进行交流互访，从文职人员开始进行接触，逐渐扩展层级，增进沟通联络。两岸军事文化研究还是应该主动、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以学术论坛为桥梁，促进双方的了解，增强彼此的互信。如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军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两岸专家学者可一起深入交流《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对于两岸同胞增强相互了解，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对未来两岸的和平发展应具有正面的意义。如可定期轮流举办各种主题的两岸军旅文化艺术节、艺术展演等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庆祝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纪念日也

① 唐浩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台湾网，：2009－07－11

② 朱新民：《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台湾网，2009－07－11

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纪念，两岸共同举办具有重大意义的节庆活动，这都有助于两岸在军旅文化上更紧密的联结。再如，可试行两岸军事院校交换学生。随着两岸经济文化合作，实现直航和开放旅游，台湾承认大陆学历等方面的合作进展与各项措施的陆续出台，两岸的整体交流合作的大趋势，已经越来越宽松地开始了有效推进与有序落实。两岸军事院校能够交换学生，让两岸军校生互相体会彼此的训练和生活，用亲身的体验去对历史情结等等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让分裂与战争成为过去，将和平与发展变为现实。

（三）循序渐进，建构机制

不断拓展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使两岸军队在交往层面上愈加紧密，从一般交往向更高、更深领域拓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军旅文化交流制度化，构建两岸军旅文化交流新格局。两岸交流不论交流层次或交流的质与量，都已迈入新的高峰，构成两岸新局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两岸军旅文化交流非但不存在任何可以运作的机制，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障碍，交流机制亟待建立。每年可定期举办军旅文化文化论坛，作为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的平台，使双方建立更为密切的、经常性和规范性的交流机制。有了机制化才能保证交流的常规化，避免随意性，增强交流实效，有效集中双方的资源、资金和智慧，推动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由感性交流向理性交流阶段跨越。减少政策性壁垒，让交流更加顺畅，合作更加广泛。另一方面相应出台鼓励政策，支持、扶持从事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的文化机构、艺术团体、文化企业，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和企业赞助，推动两岸军旅文化交流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保证交流的可持续性。

（四）传承黄埔精神，融合创新，共建军旅新文化

黄埔精神，是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以“爱国、革命”为内核的宝贵精神财富，黄埔精神是一个以武德为基本特征，融军事、政治、哲学、伦理等诸因素的多层次的思想体系，是我们时代民族精神和军事文化的集中体现。这样的精神会让我们珍惜并孜孜以求和平发展和统一。黄埔军校是牵动两岸、国共两党、两军感情的纽带，八十多年来，“黄埔”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情感，“祖国尚未统一，同学还需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黄埔校友的一致呼声。黄埔同学的后代们也

开始了续接先辈们的同窗情谊，积极组织座谈等各种庆祝活动，纪念黄埔军校。两岸对黄埔精神有共同的认知和深刻理解。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拉近了两岸的距离。当前，海峡两岸面临着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要求，正确理解黄埔精神，发扬黄埔精神，对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仍有着现实意义。现在台湾地区海陆空三军中有众多黄埔后人，且担任要职，他们的一举一动将决定台湾的未来走向。我们应该思考黄埔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传承，思考如何利用好黄埔精神来加强两岸军旅文化的交流，以这层感情因素为而后的军事交流做好了先期铺垫，为推进两岸和平发展作贡献。①

军旅文化，是军人、军队，有自己受一定规范、准则、价值观念支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由这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支配、制导、影响其思想行为而形成的一整套规范、准则、价值观念以及物质构成。两岸军旅文化是培育当代两岸军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两岸在长期的相对分割的空间内，因为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在传统中华文化基底之下，两岸军旅文化各自融入了不同文化元素，经过特殊环境的特殊磨炼和锻造，已经衍化并形成凸现自身鲜明特色的军旅文化体系，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风貌，各有心得与视野。就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而言，任何一种文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必须是开放的、发展的，只有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比较鉴别、批判选择和不断融合中，才能避免僵滞和衰弱，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两岸军旅文化要保持生机与活力，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不断汲取社会文化的营养，在与两岸社会文化同步发展中扩展军营文化新的内容、新的形式。通过理性的、全面而中肯的分析比较，诠释其内涵，并定位出两岸军旅文化底蕴、文化含量、文化特质及其相互关系，从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的角度去理解、尊重及善用两岸军旅文化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磨合差异，承往共进，把传统文化的积淀传承下来，把对方军旅文化的精髓吸收进来结合实际加以利用，在汲取百家之长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汲取有益的文化精神作为共同尊重、遵循的价值观，整合两岸军旅文化资源，加速推进军旅文化文化融合，由此而带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在心理塑造上的整合，同时让官兵在军旅文化交流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展现，这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还有不可估量的潜在功效。

总之，两岸军队历尽风雨坎坷，同源于黄埔、北伐，携手于抗战御侮，

① 《黄埔精神的内核：为金瓯无缺愿意奉献一切》，2009 年 07 月 06 日凤凰网

鏖战于内战纷争，60 年前，两岸军队兵戎相见，握戈长持。60 年后，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两岸交流合作的各项内容正在受到普遍重视而不断走向深入。近 10 年来，随着两岸关系发展演变，军事互信机制也在两岸政策探讨中越来越多地提及。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的课题，也已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伴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而开始启动。两岸关系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重要变化与和解趋势，两岸民众的人心所向，已经为这种两岸军旅文化交流开辟了有利的前进方向。两岸和海外的有识之士正在全方位谋求两岸军旅文化更具实质意义的应有交流。两岸军旅文化交流的自然兴起，就是这种两岸、两军和解、合作、和平的真正信号。聚同化异，弃嫌求合的两岸军事和解大趋势必会到来。我们要紧紧抓住两岸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全面促进两岸军旅文化交流，努力坚持两岸军旅文化交流走向制度化、常态化，而军旅文化交流循序全面发展必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蓬勃活力。通过交流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由两岸军旅文化交流开启军事互信新篇。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6 月 25 日主办的“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学术研讨会）

以眷村文化为视角的台湾文化考察

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政策研究中心　郝　晨

眷村是台湾特定历史条件下长期相对封闭发展的产物。而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眷村文化，它的形成与发展又总是或隐或显地折射出暗含的台湾文化乃至中华文化蕴涵，并最终为台湾文化理解包容，成为其不可分割且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眷村文化深藏的文化内核，揭示其在台湾文化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品格，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对台文化交流工作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一、眷村文化的独特品格，在台湾文化中呈现出别样风采

台湾的眷村通常是指1949年起至1960年代，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党当局为了安排被迫自中国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历经60余年的岁月洗礼，眷村发展出台湾社会中相当特殊的人文现象，其文化特色自成一格。

（一）内部之间联系紧密，外部沟通相对封闭

眷村居住区域集中、住户身份相似、生存空间狭小，从诞生之初便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单一社区。而眷村人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家族意识、文化感受、国家观念、伦理概念乃至审美、消费趣味等方面也因共同经历趋于一致。这种内部环境的相似甚至相同，使眷村人彼此情感联络频繁，互动相当密切。但也客观上造成了眷村生活与其外部的台湾“本省人”有着相当不同，加之眷村第一代居民多为不愿轻易改变既有生活方式的中、老年大陆移民，传统上的所谓“外省人意识”较为强烈，导致眷村人自我保护心理较强，与外部民众甚少沟通，空间性格也更加封闭，甚至刻意“和台湾本省

人保持距离”，称呼台湾“本省人”为“老百姓”，并“生出了一种对抗，以掩饰对新环境的不安。他们在心理上有意或无意地自我偏爱，让眷村的心理距离外面越来越远”。①

（二）浓浓的思乡情怀纠缠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

眷村早期居民多因战乱迁至台湾，最初大都仅视台湾为暂时避难地，存在严重“过客”心态，多认为眷村“只是一个过程，并不是目的”，“离乱的记忆、乡愁的煎熬、现实的担心”使眷村人大都怀着思乡的心情，期盼随时能够“反攻大陆”，重归故土。考察台湾眷村文化研究现状，在眷村文学、眷村历史及眷村改建议题三类研究成果中，有关“异乡与家乡”的主题始终是研究的焦点之一。② 无论是眷村文学中处处可见的“原乡情结与过客心情”，还是口述历史、回忆录、纪录片、田野调查中记载的“背井离乡——身处异乡——客死他乡”故事，抑或因眷村改建导致文物灭失引起的怀旧情绪，无不展现着眷村文化浓烈的“思乡”色彩。这种弥漫在眷村文化中的思乡之情使眷村“拥有了丰厚的文化象征寓意，它作为压缩了的大陆形象，在特殊的时空里被无奈地平移过来，为它的子民提供了生养的时空，也提供了故土情感的慰藉”。③

（三）汇集交融大陆各地域文化而成“文化大熔炉”

眷村文化的独特，还在于它汇集了大陆各个不同地域的方言、风俗、习惯、穿着和饮食，相较于早期台湾的村落或小区，更突显了它多样性的风貌。据台湾“立委”朱凤芝介绍，1949 年来台的军民“来自大陆的 35 个省”，④ 而大陆不同地域的文化，因为历史因素同时迁徙并凝聚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以眷村这样的简陋群聚型社区网络承载发挥“文化大熔炉”⑤ 的作用，进而积淀融合并呈现出新的文化风采，使在眷村里“常常有走完一个

① http：//news. sina. com. cn/s/2009 - 04 - 16/150017623359. shtml。

② 参阅王佳煌：《眷村文化与眷村研究：问题与展望》，http：//r9. ntue. edu. tw/activity/multiculture _ conference/file/4/2. pdf。

③ http：//qkzz. net/magazine/1003 - 9538/2008/05/2527590 _ 2. htm。

④ 黄柳：《文化遗产 永续经营》，载（台）《胜利之光》杂志 2009 年 12 月。

⑤ 马英九 2006 年 12 月 16 日在“2006 台北眷村文化节”开幕式上致辞表示，“眷村是文化的大熔炉，影响台湾半个世纪之久。眷村文化节非只有怀旧，更希望民众了解眷村在大时代中构成的历史与纹理”。http：//tw. peopledaily. com. cn/GB/14812/14876/5178620. html。

村，就像走完整个中国大陆似的”感觉，可谓是一种文化的奇迹。①

二、管窥眷村文化可见台湾文化一斑，亦处处折射中华文化光影

“所有文化类型都必然是历史的和渐进的”。② 眷村文化的形成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孕育发展并最终为台湾文化吸收兼容，同时仍保有中华文化的坚硬内核，从而历史地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品格。

（一）眷村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台湾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历史发展过程，本身深受移民社会的影响。“移民浪潮来来往往于这个岛屿上，带来语言、生活习惯、政治理念各方面的冲击，原有的文化形态必须短暂消失、空白，重新调适、学习和再出发”。③ 在移民原有文化形态与台湾本土文化不断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台湾文化也“在岛内各族群融合淬励下成长，渐次锻造出它独特的新面貌”④。而眷村住户本来也是移民，同样经历了移民到定居的文化调适，并且成员也在不断演变，“刚开始是外省人，之后与闽南人、原住民、客家人、外籍配偶联姻，不仅消除地域隔阂”，⑤ 也逐渐形成了内容多元的眷村文化，并最终“落地生根”成为台湾历史及文化的一部分

（二）眷村文化的基因来源于中华文化

眷村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一方面是因为眷村住户，特别是第一代本身就来自中国大陆。他们的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精神气质本就长期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暗藏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另一方面则在于眷村文化的内容终究仍不脱中华文化的范畴。虽经长达 60 余年的时代变迁，但在与本就是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台湾本土文化融合过程中，其内含的文化单元，包括语言、文

① http：//sub. khcc. gov. tw/village/index. htm。

② ［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第 18 页，贺卫方、高鸿钧译，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

③ 陈嘉琳：《台湾文化概论》第 5 页，台北县，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8 月 28 日。

④ 见前揭第 59 页。

⑤ http：//qkzz. net/magazine/1003 - 9538/2008/05/2527590 _ 2. htm。

字、艺术、伦理、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文化“深层结构”，以及饮食习惯、节日习俗、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等“表层结构”，均沿袭中国传统，与中华文化并无二致。

（三）眷村文化实为“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典型

马英九2009年10月在台湾“双十节”讲话中提出“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概念，台湾“国家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诠释，指出有“三个特色”：移民带来的传统中国文化、1949年前后的大迁徙所带来的大陆各地文化并交融创新、台湾很好地继承和保存了传统中国文化，并进一步指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台湾最大的文化优势”。[①] 就此分析，一方面，眷村人特别是第一代眷户本就是大陆移民，眷村文化的母体来自大陆；另一方面，眷村人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大陆各个省域的文化在特殊历史时空背景下相聚交融，历经岁月洗礼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精彩，激荡出了别样的风情。眷村人将大陆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气质融合渗透、发扬光大，创造了独特的眷村文化，眷村文化因与台湾结合而打上宝岛烙印，不仅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使台湾文化更具中华文化特色。

三、分享眷村文化，为对台文化交流另辟蹊径

积极开展两岸文化交流，有利于两岸增加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两岸全方位的沟通交流。而眷村文化作为一种集大陆各省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特色于一身的台湾文化形态，完全可以在两岸文化交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文化交流内容可突出眷村文化，逐步实现以点带面

一是故土情结，易于交流。眷村文化重要特点之一是其饱含“浓浓的乡愁”，而怀旧思乡的情愫总是要通过具体实物、眷村文艺作品描述、实地参观勾连的情绪等予以寄托。或是某一省份的特色饮食，或是某地域特有的

① 参阅罗祥喜：《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台湾最大的文化优势》，《中国评论》2010年1月号。

戏曲唱腔，或是鬓毛已衰而未改的乡音……，举凡眷村文化故土情结所涉具体指向，皆可在大陆找寻到明确的投射，给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便于打开局面开展工作。二是单元多样，选择面广。眷村文化包含诸如建筑、文物、美食、戏曲、书画、文学等多种文化单元，同时也蕴含了几乎大陆所有省份文化的因子，为我开展对台文化交流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个面向。可由各省（自治区、市）有针对性地具体筹划，甚至包干组织各地对台特色文化交流。三是岛内热炒，乘势出击。近年以来，岛内掀起了一股“眷村文化热”，涉及眷村的文学、影视作品大量出版、眷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眷村文化节”在各地纷纷举办，眷村文化保护在台湾颇有市场。岛内各种政治势力出于捞取选票的实际利益需要，对于保护眷村文化形态的种种作为也多持赞成态度。借此势头可加大与台湾方面对眷村文化的合作研究与交流力度，采各种有力措施通过眷村文化交流，力争建立具可操作性、可延续性的文化交流工作机制与平台，为全方位深入开展文化交流拓展新局面。

（二）文化交流对象可侧重眷村子弟，建立良好合作基础

出身眷村的第二、三代受眷村文化影响熏陶，多较为推崇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礼仪、修养。即使国家认同与意识形态与大陆存在差异，但积淀在骨子里、溶化在血液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仍使他们与大陆有着相似或相同的道德认识、做人原则和处世方法。从目前眷村子弟分布情况来看，在台湾现有政治生态的冲击下，眷村已不再是传统泛蓝阵营铁票区，绿营也有年轻一代眷村子弟的身影。但无论位处哪一个政治光谱的位置，眷村子弟都比较有一种“大中华”的视野和较为开阔的政治格局，多不会将自己局限在一个岛屿的范围里，为两岸进行深入合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感情前提与思想认识基础。

（三）文化交流形式可趋向多元精致，向南部发展

岛内眷村分布广泛，南部也不例外，以高雄市、县为例，高雄市的眷户数量在岛内排名第3，高雄县的眷村数量与眷户数量在岛内分别排名第5和第4，[①] 合并大高雄后，数量更为可观。鉴此，可在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交

① http：//ntmvc. cca. gov. tw/news. htm。

流形式上精雕细琢，尝试采取恰当形式渗透岛内南部地区。比如，可为岛内眷村文化馆藏机构提供具体实物印证对比，显示眷村文化与大陆的密切联系；可组织大陆各省与岛内眷村文化展馆合作进行省域文化巡展，展现大陆地方文化在岛内眷村的历史变迁；可结合岛内“眷村文化节”举办大陆饮食文化特展，借助眷村独特的饮食文化凸显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可针对具体眷村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地域、单元对口交流等。通过灵活运作，实践贯彻中央对台工作的要求，在争取台湾本省籍民众、特别是南部民众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四）文化交流发展可趋向文化创意产业，渐次形成产业化态势

马英九当局较为重视振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其与“观光旅游、医疗照护、生物科技、绿色能源、精致农业”合列为当局重点致力的六大新兴产业之一，并积极制定“文化创意产业旗舰计划”，在岛内多处设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但目前在眷村文化产业化经营方面着墨仍然不多。而从文化发展繁荣角度分析，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模式有利于建立以营利收入促进文化广泛传播的良性循环。在大陆近年来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化发展与两岸交流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选准眷村文化为切入点，采取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实物及文化产品出口、岛内兴办文化实体等方式，有选择地重点发展与眷村文化相关的出版发行、旅游产品、创意设计、演艺娱乐、文学与艺术品原创、动漫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从而有效扩大眷村文化的岛内影响力，并进一步彰显其中华文化内核，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

四、结　语

台湾眷村现象的出现乃至眷村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厚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在中华传统文化、大陆各省地域文化及台湾本土文化的交织渗透下，多元的文化形态从各个方面对眷村这样一个台湾社会中的“另类”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而最终形成的合力就是格外精彩的眷村文化。在眷村已经走向衰落的今天，眷村文化也在时代的动脉中正被淹没，然而眷村文化的影响力却在台湾社会，乃至海峡两岸与华人世界继续谱写着传奇。考察这一特别的文化现象，进而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护并持续经营以扩大影响，或可对我开

展两岸文化交流乃至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崭新路径。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的新视角：文化社区的理念与实务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叶世明

两岸文化的深入交流需要两岸民众的共同参与，融入百姓寻常的生活，体现可及性与普遍性，使文化交流常规化。扩大两岸文化交流与民间参与，应是未来两岸未来文化交流的着力点。两岸政治、经济、结构、文化理念、文明素质等正处于顺应全球化发展的转型期，如何解读这种变动的、脱域的两岸文化交流，使交流有更明确的方向性。学术界亟待新的理论构架对其进行定位与解读。本文认为定位于文化社区的视角分析与形成扎实的“社区”的交流基础是有益的尝试。本文拟在美国社区论专家桑德斯“社区互动理论”以及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机制”的视野里，探讨文化社区的内涵意义、建构以文化社区为载体的两岸民众间相互信任、密切的文化交流实务。

一、文化社区的内涵

1. 社区概念与变迁

“社区”最初由德国社会思想家 F. 滕尼斯在 1887 年的《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社区与社会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群体，他的社区概念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性的背景影像又是如何投射到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中并怎样改变着社区内部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性的特征即理性化和脱域性二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时间—空间的分离，这一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脱域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即在

现代性发展的情况下，时空逐渐与具体地点、事件相分离，空间与具体场所相分离，从而使不在场的东西愈益决定在场的东西，这显然与沟通、媒介方式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身体在互动之中无需直接在场，可以脱离在场的具体情境。如当代互联网的普及，许多网民为了追求超越时空的情感沟通或共同的价值诉求，组建了形形色色的虚拟化的网络社区（赛博空间），它体现了新兴共同体的实质属性，可以归为现代共同体的一种形式。脱域机制的形成以及同时它必然获取新的特征，而且脱域性给人际结合带来两点影响即：（1）人际与信息的高速流动，这一背景和影响投射进社区内就会产生如下结果：居民的互动日益脱域化。即居民对利益和价值诉求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同一地域内，逐渐走向广阔的社会，在社会中寻觅自己应该归属的共同体。在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趋势更具有了主导性。（2）人际情景的网状化和速凝化。即人与人的结合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有了更广阔的自由结合空间。给人际结合带来的影响是：个体倾向于寻觅与自己具有共同利益或相似价值理念的群体并与之相结合，从而形成日益丰富的中层群体。由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结纽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日益衰落，与之相伴的是现代形式的共同体日益繁茂。传统共同体的固定的地域边界的特征在式微，新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为现代性映像的投射。脱域共同体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就如地域共同体之于传统社会。上述为我们在现代性视野下分析和把握社区变迁及其形式的解构与重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2. 文化社区与两岸文化社区的提出

任何人类社区都可以分解为地理区间与社会文化区间。文化社区的提出源于如下三个因素：一是从传统共同体到脱域共同体语境的社区概念的变迁。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的脱域机制已经逐步地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地域情境中提取出来了。由此，可以抽象概括出现代性视野里的共同体面相—脱域共同体。这一形式概念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共同体的显著特征，挖掘出潜藏的内涵和逻辑线路，又不失共同体概念的精神意蕴。两岸所处的情境与上述的脱域与现代性发展的情形是契合的。二是两岸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两岸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两岸人民在生活方式、文化制度、政治观念等方面都有着隔阂。隔阂的存在自然导致人心的疏离，使得两岸人民在很多方面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文化具有巨大的思想统摄作用，以文化凝聚人心，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使存

在差异的双方达成统一。正如著名文化学者方克立在《“文化中国”概念小议》中所指出的：“从文化的意义来说，中国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因为中华文化是统一的。这样文化的统一是促成中国政治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建构一个政治和文化两岸最重要的基础。这种历史的经验对于中国今天的现实至少是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三是美国社区论专家桑德斯“社区互动理论”认为社区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场域。基于此，为了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可持续与深入，那么该如何建构新的研究视野呢？笔者认为，应该将目光转向现代社会的基础——脱域共同体，建构两岸文化社区。缘由如下：首先，尽管两岸分离，实行不同的制度，两岸人民有与同胞交流、维护与弘扬中华文化的渴求。这种渴求可以通过文化社区社团组织、网络空间、长期或临时性的各种民间组织以及文化庆祝活动来宣泄和满足精神文化的需求。在这些场所与活动中或大规模民众的聚集与交流，有助于他们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文化认同为他们带来心理的满足与安慰。其次，两岸文化社区的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问题。对台湾同胞而言，文化的根在大陆，在文化社区中能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感。两岸文化社区的模式展示两岸生活融合的同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与实现载体。能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和文化活动中，使社区成为培养共同体意识的场所，形成共同的“认同”。再次，两岸的民众才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主体，无论是虚拟还是现实文化社区交流合作与社区参与，都体现其可及性与广泛性。简言之，“两岸文化社区”强调的是共同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它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只有理念思想才是真实的东西，具有黏合性，地理只是附带次要的条件。而且，它作为共同体，最贴近百姓生活。前瞻文化社区理论适用于任何没有地理聚集地的社区。“两岸文化社区”（Cultural Community）作为跨越地理区间理论构思，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地理区域理念，基于两岸以及现代社会的变迁的情境，它包含了两种形式，即一种是虚拟文化社区的建构，一种是实在（现实）文化社区的互动，它提供了阐发与诠释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新视角与新载体。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认为两岸文化社区可以定义为：由一定数量的民众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并非共同地域性生活共同体。核心是参与者的交流和互动，并且在参与者之间将形成一种社会关系。基于两岸空间分离的局限与现实，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虚拟的文化社区。只要信息通讯有一部分是通过电子媒介来传播，而不完全是面对面的传递信息，那么所形

成文化交流的人群就组成了虚拟文化社区。包括虚拟社区对知识共享、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等各方面的作用。虚拟文化社区，存在的空间应该在网络上，文化交流活动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发生的，有别于传统的社会活动；而且，虚拟社区中讨论的内容或话题是产生于社区参与者本身，或者说是参与者驱动了社区，而不是虚拟文化社区服务供应商驱动社区，这点可以明确地区分虚拟文化社区和在线信息服务，前者更强调在网络空间中参与者对交互作用的贡献。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群体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对待朋友般彼此关怀，从而所形成的团体，最终也会形成虚拟文化社区中的一种社会人际关系。

3. 两岸文化社区的结构与特征

两岸文化社区的本质不在于地域结构，而在于“社区居民”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它是由人们的沟通和互动而形成的结构系统，是一种全新的互动和沟通方式。两岸文化社区的特征有：一是多元共存。多元共存是指社区的基本构成因子如居民、文化、环境等是多元的，既是具有各自特点的独立个体，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存在着鲜明的差异性；同时，这些社区的基本构成因子又汇聚在跨越时空的界限，表现为共存性。二是交互共生。汇聚在同一时空界限之内或跨越界限的文化社区基本构成因子的不同个体之间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不同构成要素彼此之间呈现动态的相关性、交互性和渗透性的特性，共同构成彼此相依的共生网络。将文化社区置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宏观背景中，将文化需求作为构建两岸文化社区的“火车头”，满足两岸文化建设与两岸基层合作交流的需要。如在台湾，保留了许多传统的中华文化，同时又有外来文化的影响。近年来台湾制造业的发展，令文化创意的空间更加扩大，使文化与创意的结合成为台湾的强项。而台湾创意与大陆市场的结合，将为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文化经济圈的疆域会跨越政治疆域，成为另一种全新的生存形态。三是泛时性，即共时性和历时性并存，它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既是断裂的又是延续的，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总的来说就是泛时的。在虚拟文化社区上，共时性可以以在线交流的形式存在，同时，两岸异地的参与者存在于同一事件中互动，这无疑扩大了共时性的概念，因为地域的无限延伸直接带来了参与者的不可知性和话题范围的无限量扩张。四是在虚拟文化社区上，真实和虚拟的双重性交织存在着。虚拟文化社区和现实文化社区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

同，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一样。虚拟文化社区来源于现实文化社区，虚拟社区是现实空间在虚拟空间的“投影”。因为，虚拟文化社区提供的服务版块也是根据人们现实的需要而设定的；实在（现实）社区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规范会影响到虚拟社区的构建。而且，虚拟社区所提供的交流是现实社区交流的延伸和提高。脱离现实，虚拟文化社区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虚拟文化社区对现实文化社区也有影响和反作用。虚拟文化社区使现实社区中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虚拟文化社区空间开拓了人的思维。二者是互补而非取代的关系。虚拟文化社区是一种对现有生活方式的冲击，同时，它也是对现实社会空间的拓展。总之两者是互补互动关系，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各取所长，互相弥补，依靠对文化社区的认同，依靠文化社区精神的凝聚整合，推动两岸文化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实务探讨

以上区分了文化社区与传统社区的不同概念指涉，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文化社区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两岸文化社区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它能满足两岸人民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对其研究和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是民间社团和非营利组织，它们是培育两岸积极的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对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以及两岸新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意义。

1. 两岸虚拟文化社区的建构

当代社会已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时代。对于互联网社会化的今天，互联网不再仅停留在一个终端，它正在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并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需要。虚拟文化以其多媒体、点对点、及时互动等特点而具有传统文化无法比拟的优势。世界上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数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虚拟社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方式甚至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传统社区中的每一个人。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形态，不仅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同时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社区活动试验空间。它给予人们的是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却更具想象的生活文化空间。比如一个两岸虚拟文化社区能提供给社区成员一个快捷、便利的相互交流的平台，大家因有共同的文化喜好、价值观、生活方式，可以进行情感交流和经验共享，可以形成亲密无间的关系，可以形成一种真正的

社区（公社意义上的）。具体形式可以是论坛、评论、博客、维基百科、圈子或社会性网络、即时通讯等等的个体或整合。它可按照成员的不同兴趣爱好进行分类，如成员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贴吧。比如由于喜爱同一个诗词、书法或影片等而聚集在一起自发地在社区中发布他们收集的信息和创建的内容，与其他爱好者一起分享等。作为虚拟文化社区成员，他们或是因为这个社区提供的文化活动选择在这个社区交流，或是因为同样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成员之间相互沟通，相互关联，并产生影响。以上这些要素聚合在一起，相互作为，产生了每个社区独特的社区文化。甚至相对传统社会，虚拟文化社区由于不局限于地理的区划，使人们可以超越时空交流，从而更加适于社区的聚集和发展。虚拟文化社区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真实社区，可从虚拟走进现实，面对面地交流，也可从现实走向虚拟，即原本就现实地存在的交流与互动通过网络来延展交流的空间与途径。其实，在网络的舞台上，真实与虚拟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大陆的虚拟社区已有一定的影响和规模，将其应用于两岸文化交流不仅可能，而且很有必要。现阶段的应用正处于起步状态，有着广阔的研究和发展空间。随着 IT 科技的进步以及显卡性能的大幅提升，虚拟社区已经逐步从 2D 演化到了 3D，用户通过下载客户端可以进入这些虚拟社区，在这些虚拟社区里，每个用户都有一个虚拟化身，用户完全可以在现实世界里一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增强了网络虚拟社区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实状况看，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谁掌握了他们，谁就掌握了未来。能否加强对台湾青少年的中华文化教育，能否增强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凝聚力，是能否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客观地讲，台湾社会的老一辈，甚至中年一代他们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识较浓，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没有什么疑虑。台湾社会的青少年一代则不同。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以不在场，脱域地交流。充分利用互联网形式加强两岸青少年的文化交流等。首先，应充分利用这些技术，使两岸的文化交流跨越空间上的障碍。建立介绍、宣传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站，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尤其青少年，更好地了解祖国大陆；其次，以文化活动或文艺作品为载体，凝聚因有“共同兴趣”，或历史上、宗族上的渊源而汇聚的群体，因为这一“共同兴趣与渊源”唤起了成员共同参与的意识，使他们积极或自然地参与虚拟文化社区活动成为可能，并建立关于两岸各项文化交流的专题论坛，创造两岸同胞互相交流的机

会，为两岸的文化交流献计献策，共同关注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动态，从而保证民众一定程度的联合以及文化的交流。再次，扩大宣传，有助于社区成员产生“价值唤醒”效应，吸引大量民众积极参与，并形成一定的社团，这种社团不仅是现代社区文化结构形成的基础，而且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诸如文化社团与文化节等应成为两岸社会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地理区域不存在时，这些社区文化组织便转而成为社区结构的主要构架。

2. 现实文化社区

两岸文化社区意识的形塑可被视为一种“文化主张”。两岸文化社区没有明确的地理界限，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因中华文化而凝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区。源远流长、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成为发展两岸文化社区的丰富养料。20 世纪 80 年代，大陆在政府的推动下，人们开始谈论社区，关注社区，研究社区，社区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两岸的大格局下，社区建设将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而台湾地区社区营造从乡村开始实施，再逐步扩展到城市。社区营造运动以“一乡一特色”、“由下而上”、“民众参与”、“发掘地方文化”等为理念，通过“社区工作坊”在短时间内形成社区共识与行动计划。从实际情况看，两岸的社区各有自己的特色，不同的社区有时受外部条件限制，有自己的发展重点，所以在规划工作时也可以不拘一格。从某种意义上讲，社区是社区居民行动的舞台。两岸可以在各自社区建设的同时，借助现实的社区，通过两岸社区的社团活动交流、文化庆祝活动等，以加强两岸社区建设管理方面的交流、沟通，促进两岸基层组织合作，满足社区成员的文化需求、情感需求以及心理需求，丰富两岸民众的文化生活，使文化交流在真实空间内具体化与普及化，使大家通过情感互动，形成共同的文化意识，共同参与推进社区的建设以及两岸的社区建设交流，担负起共同的责任，强化共同的基础。在参与者共同磨合下，一段时间自然会形成一种交融的较统一的价值观念，从而营造出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汇聚社区共识，提升、累积两岸文化社区的社会资本，并推及两岸社会。

三、结　语

纵观世界各国，对于大部分社区建设实践者来说，社区是培育社区精神和激励合作技巧的过程，它包括一群人为了共同承诺目的和目标所具有的热

情、天赋、洞察力和经验，包括：相互之间的包容；相互之间的熟悉；相互之间的尊敬；对于思想和观念冲突的容忍；可信的相互沟通；成员之间为了社区的成功和健康发展相互负责等。为此，我们必须把作为促进两岸基层交流的手段与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共同体的社区建设联系起来考察，并作为社区建设的内涵一并推进。我们讨论的重点不仅是强调互动、体验，更有促进两岸文化社区的社会化、群聚性和由此产生的相互影响和关联作用。我们会继续探究文化社区的发展，不断加深我们对其的认识。如下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与探讨。

1. 虽然虚拟文化社区有上述的可行性与优势，同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虚拟社区使人获得现实社会中无法获得的自由、便捷等，但目前虚拟社区的使用成本仍是相当高的。由于我国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使用网络者事实都是文化素质较高、收入较高、较具社会影响力的阶层，造成网络社区事实上的不平等与局限。其次，虚拟文化社区对现实社会的复制过程中，会删除或夸大（有意或无意）一些细节，造成虚拟文化社区发展的失真和迷乱。特别是目前网络社区管理基本源于个体的良心和道德，尚未能有效、规范地控制，网络社区的失控问题应值得关注。

2. 两岸文化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成员对所属文化社区或所属的文化群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即使这群人散布在两岸的各个角落，他们也会把自己看作社区的一分子，这样的社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区。文化社区成员的参与度是文化社区建设的深厚基础，也是提高社区凝聚力，形成社区归属感的根本所在。在巩固和发展以往交流的范围、形式、方法的基础上，两岸文化交流从人员对象讲，应是全面性的，越广泛越好。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深入的面越广越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从而也更有利于两岸的统一。

3. 由于中华文化凝聚力而产生的两岸文化社区，借用文化社区的理论，参照我国社区建设的经验，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路径，从文化社区理论引申出的文化交流合作的实务更是一个全新而复杂的课题，要完成从理论探讨到政策设计乃至社区层面的实践，还有漫长的探索过程。

最后，文化中蕴含着民族的精神，继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举起文化的旗帜，应在旗帜中看到神圣、光洁和未来。文化社区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建设的意义体现在基层性、日常化、新的载体与力量。文化交流是两岸人民建立感情的有效途径。只有扩大两岸的文化交流合作，两岸同胞才有可能沟通感情，加深理解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增进两岸共识，增强两岸团结。

坚持保护和调动两岸民众建设文化社区的主动性、积极性，政府群众文化职能机构和社区管理部门不仅要多加关注，更要加大公共资源长期投入，提供全方位多层面的服务。期待更多的同仁加入到对于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之中，以共同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理论与机制创新，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8－26页。
2.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同祖同根，源远流长》[C]. 方克立：《“文化中国”概念小议》[A].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432.
3. 柴晋颖、王飞绒：《虚拟社区研究现状及展望》，The Investigation Status and Forecast of Virtual Communities，《情报杂志》，2007年第5期，第101－104页
4. 《从前现代到现代——共同体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第31－35页，张云昊：第19卷第2期2006年6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张佩杭：《网络文化——社区文化的新形态理论评论》，《中国文化报》，2003年5月31日第003版。
6. 杨毅周：《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意义》，《台声》，2007年6月，第10－12页。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其交流合作之探讨

宁波大学　邓启明　熊德平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英、美和澳大利亚等国，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现已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支柱产业，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是全球经济运行和文化发展，成为国家财富和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201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也对文化创意产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

祖国大陆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台湾地区以其现代社会的活力与创意丰富了传统文明的内涵。后金融危机时代，海峡两岸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在充分利用、共同挖掘中华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生产出更多优秀文化创意产品，将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共创双赢，值得尝试。本文拟以宁波市为例，着重就甬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发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得出相应对策建议，起抛砖引玉作用。

一　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践与问题的提出

1. 台湾地区实践

一般认为，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2002年由台湾当局多部门共同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首次较明确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理念。该小组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就是“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的形成与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能力，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行业”。参照英国的管理方法与经验，台湾将文化创意产业划分为视觉艺术产业、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工艺

产业、文化展演设施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建筑设计产业、广告产业、设计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数字休闲娱乐产业和创意生活产业13个类别。2004年7月，第一本全面反映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年报《2003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年报》出版，2005年6月第二本年报出炉。

为了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和产品的附加价值，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台湾当局推出了“挑战2008：行动计划”方案，其中重点推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①。此后，全台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显示出了美好的发展前景。若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当局2002年至2007年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一期计划”，使从业人员从16万人增加至21万人、比增30%，营业额达新台币6329亿元、比增45%，总产值占GDP的3.18%；2008年开始实施“文化创意产业第二期计划”，目前已补助成立4家育成中心，共计32家艺文产业业者进驻，总产值2072万元，并完成“创意媒合王”网站。目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大台北圈”（台北市、台北县）、台中市、高雄市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市。

此外，为推动文创产业发展，2009年3月“行政院”又成立了跨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同年5月，“行政院”核定通过了“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计划4年内投入300余亿元，推动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工艺、设计、数字内容六大旗舰计划，让台湾成为亚太文化创意产业汇流中心。该计划还将设立华山、台中、嘉义、台南和花莲创意文化园区，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努力，台湾地区已成为科技产业重镇，马英九在竞选时期就曾别具一格提出“将观光、金融、医疗健康照护及文化创意作为台湾未来四大旗舰产业”的政策构想；近日“总统府”更被出借台视、三立偶像剧《倪亚达》当做拍摄场地，连宪兵都充当了临时演员。

① 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1）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重点在于强调推动组织及协调机制、网络流通整合机制、整合发展活动产业以及加强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机制等。（2）设置文化产业资源中心。包括教学资源中心、创意设计中心、创意文化园区、影音事业发展中心等。（3）选择文化产业发展重点。重点推出媒体文化产业，具体包括艺术产业、电影电视产业、流行音乐产业、图文出版产业、数字休闲娱乐产业、整合媒体产业信息资源。（4）台湾设计产业起飞计划。计划中推出了活化设计产业推动机制、开发设计产业资源、强化设计主题研究、促进重点设计发展等一系列行动措施。

2. 问题的提出

显然，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是最近10年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其从业企业数、营业额、产值等方面均有所增长，对突破当地产业发展瓶颈、提高民众收入及繁荣社会文化生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现有企业中多数是独资或合伙的小型企业，年销售额低于500万新台币的厂商，占总额的80%左右。其中又以资本在10万新台币以下的小企业占多数，属于小资本运作，无法发挥“规模经济”与“范畴经济”的作用。而且经营5至10年的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其营业额一般要比10年以上的企业高。因此，如何鼓励更多人才与资本投入创意产业、扩大产业规模，增加产品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借由“品牌化”策略提高附加价值，都是政府与民间的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随着台湾地区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的下降和大陆排名的上升而呈现出台湾人力资源和资金蜂拥“外流”到大陆的现象（或趋势），也在文化经济领域内开始出现。尽管大陆的文化领域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但“隐形台商”已成了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群在大陆从业的主要模式（刘瑾，2007）。这种两岸文化交流活跃了大陆文化消费和投资市场，丰富了大陆文化创意产业资源和产业链元素，但随之而来的经济风险、法律纠纷也愈演愈烈。如何找出适当的政策缓解途径，也已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课题之一。

正是在共同经济背景和共享文化资源背景下，大陆与拥有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台湾实业界，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里也发现了新的合作天地。正如2009年台湾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所言，“历史的机遇像一列向前疾驰的列车，她轰轰然驶过去。如果你未能搭上，可能再也无法追上；如果你不在停靠的列车站准备好，她不会等待。”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华人文化创意产业，正站在这个站台上。海峡两岸的政府和民间理应充分合作，牢牢掌握机遇，让华人文化在世界发光，让西方人在生活体系中认同并体验中华文化。

二　大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两岸交流合作初探

1. 大陆的实践探索

如前所述，当前文化软实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已成为一个城市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增添经济发展活力的必然选择。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共十六大报告即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构想，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推进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随着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也随之启动。特别是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从广义上看，创意产业包括工业创意、农业创意、服务创意以及文化创意等方面内容。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以创意为核心，向大众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心理、娱乐产品的新兴产业，是文化产业中最具创造性和先导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事实上，大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始于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3年中宣部"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正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背景和发展阶段基本特征，2004年国家统计局将文化产业划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及相关文化产业层三个大的层面[①]。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政策鼓励与大力支持下，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如今上海已有创意园区80多个，北京、深圳和杭州的创意园区也很多。如：拥有雄厚经济文化和科技资源的北京，2004年正式提出要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首都新的发展规划的重要领域，现已走上快车道。再以海峡西岸福建省为例，2007年该省先后出台了"加快创意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和"推动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并给予资金支持；2009年该省又进一步出台了"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12年将形成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文化产业群。

2. *初步交流合作*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闽台文化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连

① 一是核心层文化产业，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二是外围层文化产业，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三是相关文化产业层，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详见：2004年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接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推动闽台合作的强大动力。一方面，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推动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及相关议题不断深入；另一方面，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使两岸合作成为可能。特别是2009年5月和9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先后发布，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中心”。显然，在两岸产业都面临着加速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如何充分发挥“五缘”优势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科学、合理整合研发、设计、生产、行销等环节，尤其是不断激发创意、增添设计成分、贴近民生、提升生活质量、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诸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岸文化产业交流与对接模式，努力创造双赢的局面值得努力。

当前海峡两岸人员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选择进入大陆市场发展，并带来了优秀的创意、巨额的资金和丰富的运作管理经验，特别是流行文化，已经走在了前端。如出版印刷，在东莞等地有大量的投资。在广西，台商在桂林投资大型的文化旅游项目、雕塑园、“愚自乐园”，在一些原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旅游资源的地方，通过成功策化，成功开发了“乐满地”和“世外桃园”两个文化、表演内涵丰富的旅游景区。此外，台湾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巨大的市场支撑，而近水楼台——大陆便是绝佳市场（杨渡，2009）。事实上，台湾业界可以凭借大陆的市场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创立品牌，进军全球，就像好莱坞当年凭借着美国国内足够大的内需市场进军全球一样。而近年来，以“一脉传承·创意未来”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厦门）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等的先后举行，以及2009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在厦门举办的4个重要活动[①]，即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其背后则是两岸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合作的良好契机和美好愿景，值得肯定。

三　宁波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践及存在问题分析

1. 宁波市发展实践

近几年，宁波市文化创意产业呈现持续、快速发展态势。2006年从业

① 分别为：第二届海峡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五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第二届厦门国际动漫节及2009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

人员22.7万人，比上年增长7.1%，占全市从业人员的5.3%；总资产达636.5亿元，增长15.1%；完成总产出445.3亿元，增长19.4%；实现增加值113.9亿元，比上年增长25.5%，高出全市生产总值增长速度8.5个百分点。目前，全市已有文化产业经营单位近2万家，200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133亿元，正在成为甬城经济新的增长点。

总的看，宁波市文化产业能在危机面前逆势上扬，首先是得益于“十一五”期间，当国家确定了“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快产业整合，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发展战略时，全市敏锐而及时地抓住了国家文化产业战略布局为宁波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引导政策。特别是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推进文化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都市产业及相关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并在“十一五”期间设立3000万元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重点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大规模培育发展创意产业，加快发展以创意产业为重点的都市产业。

据了解，宁波市有关部门出台的扶持文化产业优惠政策，内容涉及税收、规费减免，融资担保、研发机构补助、房租补贴、人才引进和物业管理等各方面。自2008年全市首个创意园新芝8号建成启动，短短一年间，宁波市已出现镇海创e慧谷、鄞州128创新园、江北“1842外滩”创意产业基地、134创意谷、财富创意港、慈城“天工之城”DIY街区等特色鲜明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初步形成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动漫设计和表演、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广告、艺术品创作和交易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行业；呈现出对外交流不断扩大，各级领导和主流媒体普遍关注，创意氛围日益浓郁的发展态势。

事实上，早在2004年宁波市就对发展文化产业给予了高度关注，除了政策扶持外，还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文化创意人才，包括宣传文化系统推出的“六个一批”人才评比等。人才培养方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开设了动画专业，并设立动漫产研基地——宁波市大学科技园“创e慧谷”；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设立了法律与传媒学院，并申报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浙江万里学院设立了文化传媒学院、大红鹰学院设立了软件学院。宁波还先后举办了甬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文化创意产业培训班等，编辑出版了《宁

波市文化产业统计概览》、《宁波市文化产业投融资目录》，举办了2006、2007中国宁波世界创新工业设计展和2007宁波市工业设计创意产业香港推介会等活动。

2. 存在的问题

尽管宁波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很快，但跟其他先进的、文化创意产业比较领先的城市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与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适应。特别是文化企业整体水平并不高，大多集聚在生产复制环节，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普遍存在上游原创不足、中游生产环节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下游市场营销能力不强的软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亟待提升。

此外，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还不同程度存在着观念、体制及人才缺乏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体制障碍。主要是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缺乏统一协调，区域整合能力不强，扶持促进机制不健全等。二是专业人才缺乏。尤其是那些善于市场管理的人才，以及文化创意型与科技型人才。三是观念滞后。不论是管理者、产业经营商还是消费者，都存在认识不清、理解狭隘的情况，急需大力宣传与普及教育。

若据国际惯例，支柱产业对GDP的贡献力应达到10%以上，目前宁波文化创意产业对GDP的贡献力只有4%，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影响力显然偏低，突出存在企业规模小、档次低，经济效益不高，以及高素质管理与服务人员缺乏，政府扶持与行业管理行为不规范等方面问题。

四　推进甬台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1. 提高认识，合理规划

丰富的人文资源[①]和富有活力的民营资本，是宁波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潜在比较优势。近年来，宁波市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现代传媒、文化演艺、文化旅游、文化会展、包装装潢印刷业、文化用品制造业等一批重点文化产业群。据了解，未来几年宁波市将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支柱

① 宁波拥有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儒商文化，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和丰富的民俗民间艺术资源等。

产业来培育，力争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使得宁波文化产业的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经过近10年的发展创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在组织建设、产品设计、营销定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①制定原则与发展计划、②推动组织机构建设、③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及④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等方面。可以通过邀请台湾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专家前来考察指导，通过举办两岸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交流会和研讨会，并结合当地实际，有的放矢地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建议进一步提高认识，全面整合旅游、科技、文化、教育、历史等方面资源，科学制定宁波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各行业（或分领域）具体发展规划，促进创意产业跨越式发展。

2. 加强辅导，科学开发

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由“行政院”主管，先后出台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一期计划”、“第二期计划”和“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等支持和规范产业发展政策法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值得借鉴。后金融危机时代，宁波市正处于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政府可牢牢地抓住这一发展契机，进一步完善相关扶持与引导政策，大力拓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与国内外市场。据介绍，宁波市将率先建立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基地，鼓励我国台港澳地区和国外著名文化创意、制作、营销机构与企业合作，研制文化附加值高的出口导向型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宁波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和文化贸易口岸。同时要研究、借鉴台湾地区实践经验，推进行业管理与自律，包括加大服务平台建设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使宝贵资源与有限资金形成有效合力，为文化创意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等等。

3. 以台引台，促进合作

要充分把握当前海峡两岸经贸合作纵深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甬台经济合作试验区构建，加强产业间的交流与分工协作，推进甬台合作更上一层楼。尤其是要做大做强现有在甬台资企业，通过“以台引台”的方式，引进台湾大型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和财团进入宁波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抓紧研究、设立台商文化创意产业试验园区，使甬台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与合作的目标更明确，推进更有力。同时鼓励台湾会展业在宁波举办展览，或在甬设立公司，组织大陆企业赴台参展。也可邀请岛内现有文化创意产业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创意产业企业的负责人等组团来访，以举办“学习班”、“研讨

会”等形式，与有关县市分管领导、相关部门干部、专业人员及企业家进行交流探讨，互通信息，交换心得，分享经验。

4. 培养人才，专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有完善的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硬环境，还应具备先进的管理方法与优质的服务水准等软环境。因此，加强文化创意产业专门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其管理和服务水平，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其生命力是否长久的一个关键。目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万里学院和大红鹰学院等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先后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动画和软件等相关专业，宁波大学还率先设立了“创e慧谷”这一动漫产研基地。作为补充，目前还可考虑通过举办培训班或定期讲座来宣传普及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也可利用专业学校或职业中学来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专业技术人才。

5. 携手发展，合作共赢

海峡两岸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在文化创意产业上可谓源自一脉、各具优势，也是两岸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最具基础、最能引起共鸣和最实际见效的。一般认为，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在于人才、资金、技术和行销能力，而大陆的优势则在土地、原料、工资、市场等方面，特别是政治稳定、市场广阔、经济高速发展、产业基础庞大。尤其是宁波的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甬台两地若能互相合作，必成强势伙伴。合作的内容，可以从促进制造业升级、创意产业创作、创意人才培训等方面入手。即：充分发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在投资、科技研发和专业人才方面的优势，推动制造业的升级和区域分工；同时利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熟悉国际市场运作规则、具有丰富经验的优势，加强宁波文化创意人才培训与培养，共同开发国际和国内两个文化市场。

最后，从台湾方面看，其文化创意产业起步稍早。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波之后较早提出了“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观点，现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制、理念以及产业模式。面对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面对新一轮金融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未来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无疑将从两岸合作中获得更大生存与发展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共同而深厚传统中华文化的海峡两岸，如能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将两岸文化交流具体升级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开发与营销协作，则不仅能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之复兴，而且将在产值上创造两岸经济的双赢，进而实现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巨大转变与飞跃，促进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共同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 汪素芹：《国际服务贸易》[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 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04 年 3 月 29 日。

[3]《两岸联手助推华文走向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

[4]《北京与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交流与合作》[J]. 海峡科技与产业，2007（2）。

[5]《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人群发展状况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2）。

[6] 刘瑾：《在京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群体扫描》，2007－10。

[7] 台湾“经建会”：《服务业发展纲领及行动方案》，2004 年 12 月。

[8]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一期计划营业额 6329 亿元，中国新闻网，2009－07－13。

[9]《台湾马政府推文化创意产业 祭出蓝海策略》，http：//www. bjmmedia. cn，2009－02－17。

[10]《台湾鼓励文化创意产业　出借“总统府”拍偶像剧》，华夏经纬网，2010－03－07。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0 年 3 月 24 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吴巍巍

近年来，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在延续紧密互动的良好传统基础上，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特征，闽台宗教界更加积极开展多种形式交流，并朝扩大化、专业化、理性化方向发展。

一、新形势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现状

2006年至今，闽台宗教文化交流总体呈现的是频繁热络的局面，并在传统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一些新的动向。2006年，传统闽台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佛教文化交流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宗教与学术的结合更加紧密。2007年5月，马祖进香团直航妈祖的故乡—莆田湄洲，实现了湄洲和马祖首次通航。2008年7月，420名香客组成的台湾民俗文化进香团，从马祖福澳港出发，首航福建省宁德港，实现“宁马台”客运直航首次突破；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保生大帝神像赴澎湖巡游团及部分信众270余人，乘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两岸周末包机飞往澎湖，成为祖国大陆首个通过空中直航前往台湾地区进行交流的民间信仰团组，在两岸交流上再写下一个“第一”。2009年6月，应台中县王姓宗亲会邀请，福州市闽王金身赴台巡安暨宗亲文化交流访问团一行85人护送闽王金身从马尾直航马祖到台湾岛进行为期10天的巡安活动，这是闽王王审知金身第一次跨海巡安台湾岛。10月，古田县临水宫祖庙“顺天圣母”陈靖姑的金身“起驾”踏上巡游台湾之旅。

台湾方面，国民党政权重新执政后，注意改善与大陆的关系，积极支持两岸民间宗教团体的互动往来，“三通”的开放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信众宗教活动往来。过去一直阻扰两岸宗教交流的政策性限制逐渐得以消除，“宗教

直航”使得以往难以实践的大陆信众入台开展宗教交流也得到松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两岸宗教文化交流获得宝贵的发展契机。不过，也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宗教议题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项，如2009年在台湾“八·八水灾”过后，民进党陈菊竟然邀请达赖喇嘛来台湾访问，打着宗教的幌子来谋取政治资本，其结果是受到广大台湾民众的抗议和谴责，说明台湾民众在宗教与政治问题立场上的理性态度。

当前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交流，最可喜的变化是大陆宗教团体直接入台活动，在大陆保持对台开放宗教“绿灯”的双向互动往来层面，又增添了新气象。这些政策上的松动给两岸宗教团体的自由活动提供平台。例如，以往长期关系蔽塞的闽台基督教界也开始互相访问、增进了解。2009年12月，福建省基督宗教研究会代表团一行9人访问了台湾部分教会，并且捐赠“台北市召会八·八水灾”30余万人民币，这对于两岸基督宗教的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在当前国家支持福建对台工作先行先试的意见发布后，闽台宗教交流也成为福建宗教界提倡先行先试的重点领域。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普法建议中央充分赋予福建在开展赴台宗教文化交流事务中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并提出以福建为试点，将宗教界赴台交流的管理和审批权限下放给福建；政府外办、公安、宗教事务管理等部门应提供更多行政协助和统一管理的窗口等具体措施。

二、新形势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的特点

当前，在两岸关系愈益紧密、互动更加频繁的历史局面下，海峡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也应时代潮流而动，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呈现出许多积极可喜的变化趋势和动态发展格局。近年来闽台宗教文化交流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福建赴台宗教活动增多，双向互动得到切实落实。两岸关系的积极进展，在政策上给予宗教活动更多的便捷通道。闽台神缘关系在良好的历史境遇中得到进一步加强。2008年以来，大陆信众团体开始直航台湾；福建神灵神像也不断赴台巡游，庙际网络互动得到更为全面的充实。

第二，传统的交流活动依然延续不断。过去海峡两岸宗教交流主要是台湾信仰群体到大陆进香谒庙，寻根问祖。新形势下这种往来活动也历久而不间断。例如，2006年台胞进香团谒拜仙游田公祖庙，台湾玉二妈到东山认祖等；2008年台湾张圣君信众前往永泰县嵩口镇、盘古乡的张圣君诞生地

与祖庙，进行宗教崇拜仪式；2009 年建宁报国寺延请台湾僧侣前来参加开光法会活动；顺昌齐天大圣文化节吸引了台湾大圣信仰的信众参加其中的宗教活动仪式等。这种台湾宗教团体来福建参加宗教活动的事项依然盛行不衰。

第三，以宗教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得到加强。2006 年，在福州举行的海峡两岸佛教（福州鼓山）文化交流活动，是半个世纪来规模最大、代表性最为广泛的一次两岸佛教交流盛会。来自台湾佛教界 25 个县市 500 多名诸山长老、大德高僧借此善缘回山礼祖，共同追忆佛祖功德，探讨两岸佛教界的繁荣未来；同年厦门举办首届“保生慈济文化节”、“两岸观世音文化研讨会”，邀请闽台两地专家学者共同研讨；2009 年 4 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就两岸宗教文化研究进行深入探讨；2010 年在泉州举办的首届“闽南文化节”也有以宗教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宗教与学术的结合更加紧密。

第四，宗教交流活动与经济产业结合更加密切。近年来，随着海西战略的深入，“海峡旅游”品牌浮出水面并得到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闽台宗教文化是旅游资源重要构成要素，宗教层面的交流为“海峡旅游”产业提供了支持。据统计，1986－2004 年台湾同胞到湄洲进香人数达 127. 8 万人次[①]，近年来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中。这种巨大的人力优势，为福建旅游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样，伴随近年来两岸“三通”的实现，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人数逐年增加，其中不少人到台湾也参加当地民俗宗教活动，通过宗教这一要素带动了台湾旅游业的旺季。不仅如此，宗教文化交流还为两岸文化产业发展开拓空间，例如宗教纪念品、宗教崇拜祭祀物件、以宗教为模型的动漫产品、宗教音像、宗教图书杂志出版事业等，都能成为地方文化产业开发和发展的潜在资源。

第五，宗教交流与地方文化资源开发相连动。当前，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呈现显著特色之一为福建各地方大打“文化资源”牌，梳理对台的神缘品牌。例如，福州佛教鼓山与台湾的佛缘联系，莆田的湄洲湾妈祖故地，厦门保生大帝闽台缘，泉州的关帝信仰，漳州的“开漳圣王”信仰，古田的临水夫人信仰，闽北的大圣信仰，闽西的定光佛信仰等，这些都已树立起各自

① 陈晖莉：《闽台宗教文化旅游与两岸关系互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对台宗教文化交流的“区域性”品牌标签。不仅为当前对台统战工作带来动态的内涵，也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做大做强这些宗教文化“品牌”，可以为当地带来良好的经济效应，更有利于闽台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发展。

第六，沟通交流的平台更加开阔，理念与思路也更灵活。由于政治政策上的原因，传统的闽台宗教文化交流格局主要是民间往来互动，以台湾进香团来访福建宫庙为主。近年来，在良好的时代境遇下，闽台宗教互动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仅有双向的信众进香、神像巡游，宗教直航的“快车道”，两岸还积极举办“文化节”、“论坛”等层次更高的活动形式，涵括宗教的内容；甚至还发出了成立两岸宗教事务合作管理委员会等先行先试的新理念和思维，极大深化了两岸宗教交流的内涵。

三、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当前，在两岸关系朝着积极、理性方向良性发展的时代情境下，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交流也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契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可预见的发展趋势有：

（一）双向互动交流的热络局面还将持续，并将取得更多的活动成果。闽台宗教信仰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积淀。台湾民众信奉的神灵，源于福建的占了绝大多数。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渊源关系，台湾的宫庙每隔一定的时期都得上福建祖庙谒祖，乞取祖庙的香火回去，这种宗教活动俗称为“进香”。同样，福建主神应邀赴台湾绕境巡游，接受信徒的朝拜也有悠久的传统。据记载，在清代中叶和日据时期，湄洲妈祖就曾多次应邀赴台绕境巡游[①]。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福建主神神像开赴台湾巡游，受到台湾信众的崇奉，如前述闽王、保生大帝、临水夫人等，这些活动形式已经愈益受到两岸信仰民众的认可和采纳。

（二）宗教文化交流在形式与内容上还将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近年来，海峡两岸宗教界的互动取得丰硕的成果，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突破。例如，除了传统的“进香”、“巡游”等活动形式外，还出现了

① 王见川、李日伟：《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妈祖信仰》，《民间宗教》第三辑，1992 年，第 352 页。

共同举办和参加“祭典仪式”、“文化节”（宗教层面）、“法会”、“论坛”等形式的互动交流。宗教文化交流是一项与时俱进的行动，它们将被时代赋予更多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三）闽台宗教文化还将进一步体现两岸民众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情感。近十几年来，数以百万的台湾同胞到福建祖庙进香谒祖，寄托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每一次的谒拜祖庙的活动，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信仰者参加，认祖思乡、两岸同根的情怀通过宗教信仰活动得到进一步升华，并沉淀于闽台民俗文化之中，在客观上发挥着维系闽台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的桥梁和纽带的社会作用。闽台宗教信仰作为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广泛为两岸同胞所认同。共同宗教信仰的进一步升华，就会发展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文化的认同则是祖国走向最终统一的重要基础[①]。

（四）宗教文化交流还将与“海西”建设的平台结合得更加紧密。当前，国务院支持福建加快建设“海西”的宏伟工程正如火如荼开展。在“海西”建设的时代大潮中，福建发挥着对台工作先行先试的特权和重任。在宗教工作领域，宗教界人士建议，中央应充分赋予福建在开展赴台宗教文化交流事务中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鼓励福建创新对台宗教文化交流工作机制和途径。除了前述的管理、审批特殊权限，还可以设立专项基金，规划并赞助闽台重大宗教文化交流活动[②]，等等。

（五）宗教文化交流与学术、媒体领域的结合也将更为密切。宗教信仰是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的重要对象。当前，宗教在这两个领域的表现也很显著。以宗教与学术结合为例，仅 2006 年，闽台之间以宗教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就有多场，如在厦门海沧举办“海峡两岸青礁慈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办的“海峡两岸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泉州的“海峡两岸关帝论坛”等，近几年此类研讨会不断继续，说明海峡两岸在宗教文化层面学术交流的强大生命力；近来闽台学术界还开展以宗教为题材的学术合作事项，如 2009 年福建师范大学闽台中心与台湾艺术大学合作探讨闽台古宗教建筑调查、修缮工程等。又如在媒体报道领域，近年来两岸宗教文化交流也往往伴随着电视台、新闻记者等媒体工作者的采访、录像，宗教界的动态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近来频频举办的大型“海峡论坛”、以宗教信

① 林国平等：《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闽江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② 普法：《闽台宗教交流应先行先试》，《闽南日报》2009 年 3 月 8 日。

仰为主题的“文化节”等，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中。

综上，随着两岸关系以更加崭新的姿态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闽台宗教文化的交流也将借着大陆对台政策的契机和“海西”建设的春风，步入又一轮的发展航道。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孙中山复兴中华文化思想及其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启示

孙中山基金会　熊席麟

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一心救国、不懈奋斗、追求真理的一生。早年，为“谋中国之革命”，他向西方寻真理，全面而彻底地接受西方民主思想文化，反专制、倡共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由于未能广泛深入地组织民众，加上帝国主义的干预，袁世凯不久复辟帝制，随后又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国仍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孙中山一面为捍卫共和制度艰苦奋战，一面开始痛苦反思，上下求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道。为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他大力倡导复兴中华文化，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昭示、激励着人们。

一、孙中山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精神，引领人们的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

经过多年的经验教训总结，孙中山清醒指出，对欧美的物质文明应当仿效，但对于欧美的政治思想“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① 1924 年，孙中山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明确提出了“复我国粹”思想，认为为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必须弘扬本民族文化，这样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路。

①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20 页。

但是，孙中山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要对传统文化加以现代化重塑，以此引领人们的思想，团结人民，共同奋斗，实现“三民主义”。他宣称要恢复儒家的道德，承袭传统儒学一贯提倡的“忠孝、仁爱”，并保留基本词意内涵，但抽掉封建“三纲五常”的糟粕，而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孙中山解释“忠”，称从前讲忠是忠君，现在忠君不可取，但“忠”这种精神还是要保持、发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就是把性命牺牲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他强调：“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① “忠”本身是好道德，只是时代变了，内涵也应该变，对国家和民族的忠，比过去忠君自然要高尚得多。

“孝”是儒学中最重要的道德，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孔子将孝作为立身之本，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不能不要。”在孙中山看来，孝不仅是孝敬长辈的固有美德，还应该“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来成一个‘国族’以抵抗外国”②，以追求孝道的精神来发扬“团结力”。

孙中山以“博爱”诠释“仁”，认为能博爱即做到了“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③。孙中山多次指出：“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行仁”就是践行博爱，“以成救国救民之仁”。④ 他在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中，把“仁”诠释为“救世、救人、救国”，“救世”是宗教家之仁，军人之仁则是“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

孙中山还推崇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政治哲学。他说：“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9页。

③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页。

④ 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但他同时指出：“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如“修身”，主要是指讲究文明教化，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他批评有的国人修身的功夫太缺乏，一举一动缺乏检点，随地吐痰、留长甲、不刷牙等。

孙中山结合时代精神，树立起近、现代新道德观，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包含了我国全部的传统道德。他提倡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孝悌仁爱、团结和睦；提倡诚信重义、遵守法纪；提倡选贤任能、奖掖人才、乐善助人、为民服务……凡此种种极大地教育了人民，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孙中山通过复兴中华文化，激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以利救亡图存、留种保族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和掠夺榨取，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不少国人虽深感危机，但束手无策，丧失信心。孙中山沉痛回顾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发展状况，指出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都以为国家强盛非仿效西方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① 对于这种状况，孙中山深为忧虑，认为“悲观之心理为民国最危险之事”，“酿成全国悲惨之气象”，以至于“样样敷衍苟安”。为纠正这种绝望心态，孙中山大声疾呼，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希望振奋民族精神，扫除悲观论调，唤起人民大众的自尊、自重和自强。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所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如英、美、法、日等要高得多”。目前，国家地位之所以“一落千丈”，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失去了民族精神”，所以“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②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呢？孙中山认为就是那些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如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等，“这种特别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页。

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页）当然，这些传统精神诚如前文所述，是经改造过的，但其对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传承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经历了多次同军阀的较量之后，孙中山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是反动派总后台的政治现实，是破坏中国统一的头号罪魁祸首，“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孙中山高举起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为当时颓萎不振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运用传统文化中关于“王道”与“霸道”的思辩，把欧美列强近百年来对亚洲的压迫行径以所谓“霸道”文化来加以论述，强烈批判列强武力横行，“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他指出，像中国这样正在世界上争取自由和统一的国家，尤其需要国人充分发扬传统爱国精神，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成才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孙中山还大力阐扬“智、仁、勇”精神，并以之作为军人精神教育的内容：军人之智在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合于道义；军人之仁在于“为国尽力”；军人之勇则在于“成仁取义”；热情赞颂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鼓励人们为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安危团结奋斗，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①

三、孙中山复兴中华文化是为光大传统美德，再造东方文明

孙中山是一位高瞻远瞩、具有世界眼光的伟大革命家，他在民国初建时就表示：大家“以为中国复兴之目的，无非欲成为一强盛之大国，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而已；然此绝非吾人努力最后之目的。”② 他立足中国而放眼世界，以“建立大同世界”的民族文化理想为雄伟宏图，在致力于改变祖

① 《孙大总统演讲军人精神教育》上海，民智书局，1922.11。

② 孙中山：《中国的下一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7页。

国命运的同时，又力图为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美好前途着想。

所谓“大同世界”语出我国古代典籍《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孙中山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他经常引用这段文字的内容作为题词赠语，寄望于友人，同时也抒发自己的政治怀抱。到晚年，他更把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世界未来命运联系起来，从政治哲学和国际战略的高度来发挥“大同理想”，直接为后来中国和平发展国家大战略的开创订立了基础。

孙中山宣扬，一个独立、统一、强盛的中国，是实现与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这不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客观条件所决定，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素以爱好和平为民族特性，中国人几千年来都酷爱和平，而中国固有的“王道”政治文化在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时，向来主张以理服人、睦邻友好，反对不讲公理的强权政治。中国几千年实行的是“平天下的主义，……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周边各国都“怀中国的德”，这种“讲和不讲打得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他进而指出：从世界文化潮流发展的趋势看，“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光明”的必然结果。为促成这一发展趋势的尽快实现，孙中山主张，中国首先应联合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列强的侵凌，彻底摆脱列强的束缚，求得各民族的完全独立。他揭露西方列强鼓吹的“世界主义”与“大同世界”是大相径庭的，完全悖于民族的平等，听信列强“世界主义”的谰言，必将造成中国亡国灭种的严重后果。因此，真正的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生而来的，讲世界主义必须以承认各民族自由平等为基础，而“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也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

孙中山进而指出，中国统一、发展起来后，在维护人道正义和争取世界和平方面，负有重大义务和责任，要济弱扶倾，“用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

的人打不平”。[①] “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②]

综上所述，孙中山先生复兴中华文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潮流；既坚定推进本国的独立、统一、富强事业，又放眼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达到了与时俱进，开放进取，吸纳现代文明，为民族发展注入时代活力的目的，同时也团结凝聚了人民，振奋了民族精神，为后来革命的成功、民族的昌盛乃至世界的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

当前，两岸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平发展成为台海共识，尚未完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新时代的十字路口。当此之时，深思孙中山先生复兴中华文化思想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启示实属必要，我们从中不难得出以下有益的结论：

一是两岸和平发展必须以传承中华文化为纽带，凝聚当代价值共识，增强民族向心力。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思想上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主张尊孔复古者有之，纷繁混乱，涣散不堪。他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国民“一盘散沙”状态是那时中国最致命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因此，高举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大旗，以海纳百川的雄伟气魄继承创新，引领国人取得共识，逐步恢复了民族固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个历史的启示至今仍然意义重大，发人深省。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没有统一，两岸人民由于长期的隔绝与对立，加之历史恩怨、政治差异的影响，在许多问题上都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而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挑战，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彼此间情感落差也比较大。两岸思想差异、认识差异以及情绪顾虑都是明显的。如何弥合这些裂痕、矛盾与冲突，无疑成为摆在两岸中国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借鉴孙中山先生的历史智慧，透过两岸人民对彼此共同文化的认同，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为纽结，建立起共同价值观。这样才能使两岸和平发展维系在最为可靠的文化基础之上，使两岸人民的心逐渐凝聚、团结起来，为日后更加伟大的民族大发展做好准备。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254页。

二是两岸和平发展必须以捍卫中华文化为旗帜，振奋民族精神，与分裂分子、反华势力作最坚决的斗争。应当看到，当今世界强国环立，仍有不少信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列强。他们害怕中国的统一与强盛，不愿看到两岸中国人共同携手实现民族的振兴，因此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他们用心良苦地挑选出一些民族败类，暗中提供大量经济与政治支持，扶其上台，攫取权力，大肆推动“台独”、“去中国化”，妄图摧毁民族文化核心价值，切断两岸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曾几何时，有人在岛内狂妄叫嚣“正名”、“制宪”，运用政治力将“中邮”、“中船”、“中油”通通改名，并要重订所谓“台湾的节日”，甚至要“去国语化”，欲借由更改教科书、考试科目等，彻底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从台湾连根拔起。这与昔日帝国主义借助国内不肖军阀破坏国民革命、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文化何其相似。彼时，中山先生挺身而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激扬起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打破了列强的侵略迷梦，粉碎了反动军阀的狼子野心。中山先生的光辉垂范至今仍昭示我们：只有振奋民族精神，与分裂分子、反华势力做最坚决的斗争，才能维护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利益，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两岸和平发展大局。当然，我们深信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富，具有强大包容性、渗透性与生命力，不是任何个人与任何政党为特定的政治目的，用特定的政治手段所能破坏得了的。相反，只要两岸中国人真正能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那么时代的大潮迟早将迫使那些不肖子孙更弦易辙，改邪归正。

三是两岸和平发展必须以弘扬中华文化互为感召，互助共荣，同创新时代的民族辉煌。中山先生传承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的理想，融合自己的思想，进行系统阐发，形成了和平匡世思想，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其和平匡世思想强调立足自身发展，发扬东方“王道”精神，扶弱济倾，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接纳人，以成“大同”之治。这一思想在当代中国得到忠实的继承与发扬。可以说，当今两岸和平发展的实现就是孙中山先生和平匡世思想在海峡两岸具体落实的光辉范例。大陆把两岸和平发展作为一种大战略提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原来狭隘的统一观念（为统一而统一），而是着眼于更高层次的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其一大陆可以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受台湾问题干扰，立足自身，抓紧时间把民族的主体力量发展壮大起来；其二大陆和台湾通过和平交流，可以同时发展，共同振兴中华民族；其三在互利双赢的和平发展中自然融合，水到渠成的完成政治整合和国家统一。共同和

平发展的政治智慧为两岸人民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未来，两岸炎黄子孙应当携起手来，大力加强文化交流与联系，进一步将弘扬中华文化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实质内容，同时放眼世界，吸纳更新的时代精神，共同迎接新的挑战，共同开创新世纪的民族辉煌！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变革与发展述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陈忠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胡锦涛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恰到好处地点出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并且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两岸文化的关系。本文的主旨即从近代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台湾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大陆近代文化关系。以往讨论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问题时，有关两岸传统文化的关联谈得多，近代文化的关系谈得少，常常把中华文化局限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中，忽略了两岸近代以来文化的转型、变迁及相互关系。之所以如此，可能源于与近代以来台湾文化发展道路与大陆的区别，但细究中华近代文化的发展，不难发现，这种差异正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国幅员广阔，文化难免会有地域差异，尤其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各地域受外来文化影响有深浅强弱之分，外来文化的来源也不尽相同，发生的变化自然会有不同。其实，不仅是在两岸，在大陆的沿海和内地，在台湾的北部和南部，也多少都存在不同之处。

一

钱穆曾提到：“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

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①] 近代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嬗变与转型。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不仅出现了各种新的文化形式，文化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动，孔孟儒学及封建纲常名教受到了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而动摇，西方的进化论、民权学说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新的政治和文化势力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指导与反对旧文化的思想武器。社会变革的加剧，以及维新派、革命派的推动，近代新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

民国成立，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和科学作为一种有机联系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追求的价值目标，几乎渗透到所有重要的文化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民族主义激情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促成中华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的内在动力。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即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文化现代化则是实现此种转换的途径。故而，中华近代文化表现出罕见的复杂性，内容包罗万象，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西方近代文化；有新文化，也有旧文化；既有殖民主义文化，也有爱国主义文化。近代文化还表现为很强的地域性差异，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近代化比较发达，文化也随之参杂更多的近代因素，而内地则相差悬殊。近代文化的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大陆与台湾近代文化的关系。

台湾地处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近代以来，一直处于中华文化近代化的最前沿。台湾文化自有清一代的耕耘，终于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到了清朝后期，台湾的社会文化，已经相当彻底的“内地化”了，与大陆文化没有什么区别。[②] 鸦片战争后，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台湾处在风口浪尖，在1862年以后先后开放淡水、台湾、基隆、打狗等口岸，近代初始即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强势冲击，台湾文化较早进入近代化的转型。洋务运动时期，在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的主导下，台湾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近代化实践，从架设电线、创办新式煤矿、修筑铁路、开办新式学堂、近代工业等等，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省份。虽然当时的文化革新还处于器物阶段，但毕竟已从传统中打开一个口子。

①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弁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7页。

② 陈孔立：《清代台湾社会发展的模式问题——评“土著化”和“内地化”的争论》，自陈孔立主编：《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二

然而，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被迫割让台湾。举国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维新变法思潮使近代化由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层面。台湾由于被割让给日本，陷入彻底的殖民文化，但台湾民众仍努力坚守中华文化的本位，对抗殖民政策。文化关系不会因主权的割让而就此断绝，更何况割台乃是日本侵华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台湾绅民拒不承认。乙未割台，台民抱着一线希望，把武装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在台湾的抗日斗争，甚至比在大陆更持久和激烈。当时《申报》从台民英勇顽强的抗敌精神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在《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远人》一文中，该报认为台民的抗争精神，让举世看到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俾薄海内外闻之，知中国固有人在。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该文回顾了与泰西通商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挟其长技以凌我"，清政府虽恩威并举，但皆不得要领，反倒受其轻视。而此次台民的抗争，"忠肝义胆，毅魄强魂，精诚贯日月，复痛迥天地，金石可泐，而此心不可泐，磅礴郁勃之气，积之愈久，发之弥光，鬼神昭鉴，如在其上"，列强至此"乃始知中国之民，固大有可用也。始知之轻中国者，安知后日不从而重中国乎"，因之，台湾自立关系实在非浅，"足关系天下之大局，而快天下之人心"，既张扬了国人的英勇抗敌的精神，也有力地震慑了列强，"从旁观觊觎之心，自此或稍知止乎"①。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运动中，台民自发成立了"台湾民主国"，这虽是为争取外援的一个策略，却也反映当时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意识到这种体制有利于动员全体国民的力量致力于图强御侮。②

日据时期，中国在台湾的主权虽已丧失，中华文化并未随之被颠覆。此时的台湾文化，仍然是中华近代文化在逆境中发展的一个表征，而文化近代化则得到深化。此时的两岸文化交流并未断绝。不少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名人，如梁启超、孙中山、章士钊等人的思想曾影响了台湾。梁启超 1911 年

① 《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远人》，《申报》1895 年 7 月 15 日。以往论者引用此文时，都局限于论述其发出"抗日保台"或反对割台的声音，其实其内涵并不仅在此，而更多的是该报受台民感动，觉悟到民众的力量对于国家的意义。

② 在外人的影响下，当时一些国人对"民主"已经有所了解，希望变革体制以挽救国家。

游台，由于当时梁氏如日中天的声望及其对台民沦于异族统治的同情，虽在台仅停留两周，但对台湾知识阶层的文化心理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①] 期间，梁启超与林献堂、林幼春等人会面，“使他们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仍有学问”[②]。章士钊则在台湾宣传中华文化。孙中山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革命者，有台湾志士参加了国内的革命斗争。中国同盟会在台湾成立分会，传播革命思想，探讨台湾光复问题。他们的活动影响了蒋渭水等人，间接影响了台湾的民族运动。

台湾的知识分子也很注意引进大陆的新文化。当时《台湾民报》在抗议日本殖民者干涉中国书报入台时指出，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嫡流，所以“中国的书报和台湾文化，尤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们把日本据台后，台湾文化中的“旧文化”凝滞不能进展，新思想、新学术又不能普遍，归因于中国书报在台湾流通不便的结果。[③] 当时不少台湾知识分子旅居大陆期间，亲身感受到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了刺激，回台后也着力于提倡台湾的新文化运动。

不过，台湾面临着比大陆更为严峻的殖民文化统治。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移植日本大和文化、消弭中华文化的同化政策，从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加强控制，企图把台湾人民改造成“帝国忠良着实的臣民”。这给台民带来极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急迫感，有人指出：“我们先祖虽是来自中国，居住美岛，然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不能算做安定，社会的文化，还没有普及。若不赶快想个法子，来启发文化，来振起民气，恐怕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不欲自认做劣败者，也不可得，不愿受人淘汰，也不可得了。”[④]

于是，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负有抵制日本殖民文化、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带有更为浓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台湾的文化先行者成立文化协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讲习会，宣扬中华文化，启迪民智。他们创办《台湾民报》，利用舆论工具，向台湾民众广泛宣传中华文化传统。抵制日

① 陈昭英：《启蒙、解放与传统：论二十世纪二〇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省思》，《台湾与传统文化》（增订再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年，第 179 页。

② 叶钟荣：《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1971 年，第 13 页。转引自陈昭英：《启蒙、解放与传统：论二十世纪二〇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省思》，第 179 页。

③ 《对于输入中国书报的台湾海关的无理干涉》，《台湾民报》，1925 年 6 月 28 日。

④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 年，第 51 页。

式教育，坚持汉文汉字的普及和传播。利用各种合法场合，保持民族文化传统，驳斥日本殖民者的同化论调。这些运动，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进一步扎根和传播，是中华近代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比照两岸的新文化运动，会发现两者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批判封建旧礼教、提倡白话文运动等。台湾新知识分子对三纲五常、民间迷信和陋习予以激烈的批判。尤其揭露以孔教为名附和殖民当局压制启蒙运动的崇圣会等“圣道宣讲团”的假儒学面目。五四运动后，张我军等台湾知识分子还提倡摒弃文言文及旧文学形式，倡导台湾新文学。他们以《台湾民报》等刊物为阵地，主张进行白话文学的建设和台湾语言的改造，进而提出文艺大众化的路线，发展出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运动。他们希望通过拯救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和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进行民族文化自救运动。①

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场文化启蒙运动，除了宣传中华传统文化，还传播了现代西方文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正式揭橥了近代文化的核心价值——“民主”和“科学”，台湾的新文化运动同样高张“启蒙”口号、宣传民权思想。《台湾青年》的创刊词强调一战后人类的觉醒包括“民族自决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② 该刊还指出，大陆已然觉醒，倡导白话文运动，实行言文一致，台湾“岂可袖手旁观”，也应急起提倡改革文学，“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③ 在他们看来，如果台湾人学习白话文，接触中国近代的新刊书籍、报纸和杂志，便能与大陆同步获得进步和文明。④

当然，两岸的新文化运动的差异也很突出。大陆新文化运动以批判传统文化为己任，甚至于提倡“全盘西化”。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取向则是新旧文化调和，在推动文化变革的同时，也致力于宣传和保存中华文化，追求民族、文化的认同。虽然当时岛内也有要求台湾应紧跟大陆，对传统文化予以彻底的改造，但遇到强大的阻力。在大陆逐步消亡的书房、诗社在台湾不衰反盛。实际上，台湾的文化运动始终与民族解放的政治运动并存，其

---

① 陈昭瑛：《启蒙、解放与传统：论二十世纪二〇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省思》，《台湾与传统文化》（增订再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年，第 207 页。

② 《台湾青年》创刊号，1920 年 7 月 16 日。转引自陈昭英：《启蒙、解放与传统：论二十世纪二 V 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省思》，第 184 页。

③ 《台湾青年》3 卷 6 号，1921 年 12 月 15 日，重刊于 4 卷 1 期，1922 年 1 月 20 日。

④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台湾》4 年 1 号，1923 年 1 月，第 12 页。

对台湾民众影响效果最显著的还是“民族意识的昂扬”。[①] 这种差异与所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大陆属半殖民地文化，当侵略势力的压迫还不是十分强烈时，人们对自身文化批判和反思的空间较大，程度反而更为深刻，台湾则面临殖民文化的侵蚀，与祖国文化的联系遭到限制，在孤立无助的环境下，危机感更为迫切，产生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文化保守主义也更加强烈。他们在批判封建旧礼教、假儒学的同时，也极力阐发传统中有利于启蒙和解放运动的因素，还从自身存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出发，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运动。[②] 正因如此，台湾的近代文化仍然保留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在广大的乡村，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深厚根基。日据时期两岸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亮点，即是台湾从传统闽南戏曲“芗剧”发展出“歌仔戏”，又传回闽南地区。

然而，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改变对台湾的文化政策，推行更为彻底的“皇民化”运动，取缔各种民间文化组织，企图实行完全的民族同化。但台湾人民仍然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抵制“皇民化”运动，以民间信仰为例，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神道教信仰遭到台民的消极抵抗，日本战败后，马上被中国人传统的神佛信仰所取代，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根深蒂固。

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和人民，尽管面临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的压迫和“皇民化”运动的冲击，仍能坚持中华文化的本位地位，同时，在大陆近代文化运动的启发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革新和发展。当然，在殖民环境下，台湾的近代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沾染某些殖民文化的因素，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台湾民众在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时，并非都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展现相当的能动性。他们“那种对台湾文化向上的想象、对近代化的警觉以及对台湾社会里中国文化的批判，在在促成了台湾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对日本殖民统治某些的表现有所肯定，台民也是从日本本身乃是中华文化的接受者的角度来

① 蔡培火、林柏寿、陈逢源、吴三连、叶荣钟著：《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学海出版社，1976 年，第 319 页。

② 陈昭瑛：《启蒙、解放与传统：论二十世纪二〇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省思》，《台湾与传统文化》（增订再版），第 205 – 209 页。

考虑的，并非视之为异己文化。[①] 而这种带有祖国意识的文化主体性，正说明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化仍是中华文化近代化的一分子。

三

1945 年台湾光复，中华文化在台湾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国民党政府恢复对台湾的主权后，实行一系列的文化复兴政策，致力于“去日本化”，再“中国化”，一方面扫荡、摒除殖民文化，一方面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文化，把原殖民地的台湾人民重新塑造成为中国国民。陈仪为首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首先从推广国语入手，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订国语教材和标准，举办各种国语培训班，设置国语推行所，采取各种措施，掀起学习国语的热潮。配合中华文化重建的工作，台籍精英游弥坚、许乃昌、杨云萍、陈绍馨等人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旨在“铲除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遗毒，创造民主的台湾新文化”，通过创办《台湾文化》杂志、出版书籍、举办各种展览，宣传中华文化，铲除日本文化的影响。

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岸的文化交流再度中断，中华文化在两岸则走了一段殊途同归的道路。国民党政府迁台，一批大陆的文化人士入台，也把更多的大陆近代文化的成果带到了台湾，提升了当地的文化。但“二二八”事件以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更加片面、武断，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台湾文化“国民党化”。他们试图扫除所有的日本据台留下的文化、思想和习惯，未能认识到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台湾受日本长达 50 年的殖民统治，不可避免地留下日本文化的因素，这其中有殖民奴化的因素，也有些值得肯定的方面，简单地视台民为皇民化、奴隶化，甚至以此为排挤台民的借口，不仅不利于培养台民的祖国感情，也会造成台湾内部族群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台民自身也不承认文化教养低于祖国，且认为已受过高度资本主义的洗礼，不再残存封建毒害。[②] 20 世纪 60、70 年代，国民党当局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然其目的在于为抵制来自“全盘西化派”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冲击，但客观上有助于保存、传播和发扬中华传统文

① 陈君恺：《台湾的近代化蜕变——日治时期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意义》，自李国祁教授八十秩寿庆论文集编辑小组编：《近代国家的应变图新》，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 年，第 349－350 页。

② 黄英哲著：《“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第 289 页。

化，使台湾出现了重视传统、回归传统的趋势，不过，由于运动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重视形式忽视内容，限制了实际效果。[①]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三民主义”为旗帜，要求将台湾人国民党化，国家是国民党的国家，这种强调一元化的文化政策以国民党当局坚持的“中华文化”压抑各种地方文化，否定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坚持和发展，反而造成台民对中华文化的误解和矛盾。[②] 解严以后，一元化的文化政策被打破，台湾文化日趋多元，显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与生机。

而大陆解放后，一度由于极“左”思潮，偏离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路线，对传统文化采取否定态度和破坏政策，对同生于近代的异己文化采取抵制敌视态度。但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极“左”的文化路线得到纠正，政府和社会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对近代文化的各个流派也更为宽容与客观地对待，这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谈两岸的文化关系，局限于传统文化的范围是远远不够的。近代台湾文化历经晚清、日据、光复三个阶段，有中断也有发展，是中华近代文化变革的组成部分。有种观点认为，两岸的文化交流作用在于促使中华文化实现“在现代脉络中传承与创造”，而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被视为“一种媒介与接引中华文化和现代化的历程”。[③] 姑且不论这个观点有何意旨，从文意上看，首先，没有意识到台湾文化的近代化本身就是中华文化近代化的一部分，其次，有否认近代以来大陆文化的近代转型的嫌疑。实际上，台湾文化的近代化也继承了大陆文化近代化发展的成果。以台湾一度盛行的“新儒家”思想为例，其思想源自20世纪30年代，在大陆文化保守主义复兴时期，由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融合中西哲学，所建立“新孔学”、“新理学”、“新心学”等体系，他们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基础。近代以来，有关中国文化出路的各种观点，在海峡两岸都出现过，不论是“全盘西化”，或者各种殖民文化的冲击，都无法改变中华传统文化的本位地位，这都说明中华文化不仅历久弥新，活力十足，一以贯之，始终活跃，其巨大的张力所产生的延续性，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①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② 林果显：《什么是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的工作为中心》，自《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延续与断裂》，第126－127页。

③ 沈清松：《从文化观点看台湾经验》，宋光宇编：《台湾经验（二）——社会文化篇》，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429页。

历史已证明，近代文化只能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文化的精髓，促成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前，近代文化的转型仍未完成，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仍是大陆与台湾共有的命题。两岸应汲取百年来的文化发展和变革的经验与教训，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努力。

（本文发表于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3月24日主办的“弘扬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学术研讨会）